

# 呼和浩特文史資料

ᠠᠨᠵᠢ ᠶᠢᠨ ᠬᠣᠲᠤ ᠠᠨᠢ ᠰᠢᠨᠠᠨᠢ

- 
- 实 话 往 来 林 横 秋
  - 纪 史 述 之 纵 卷
  - 坛 商 教 族 会 物
  - 政 工 文 民 社 人

第十辑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

## 第十辑

呼和浩特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 目 录

## · 政坛纪实 ·

- 民国时期绥远历届执政者 ..... 张尔杰(1)  
1934年蒋介石归绥之行 ..... 白燎原(46)

## · 工商史话 ·

### 醇厚社与三元成

——归化城最老的行社与字号 ..... **刘映元**(52)

义成源百货店的生意经 ..... 王志曾 梁福寿(61)

### 注重信誉 苦心经营

——华记洋广杂货店小史 ..... 卢秀杰(64)

归绥市的饮食行业 ..... 乌丙宇(69)

归化城皮毛行业的兴衰 ..... **刘映元**(76)

#### 一、兴衰始末

#### 二、白皮行

#### 三、黑皮业与香皮业

#### 四、永和成毡坊

宝丰社的成立及其活动 ..... 张肇斌(94)

归化城的典当业 ..... 张肇斌(97)

绥远城的老字号 ..... 同 田(103)

解放前归绥的印刷业 ..... 韩寿松(108)

崔铁炉的发展与名牌的创立 ..... 崔继周(112)

太平庄乡五路村商业史料 ..... 韩云琴(115)

归化城的牲畜贸易 ..... **刘映元**(125)

牛马桥、庙会和流动商贩 ..... 彭 勇(128)

· 文教述往 ·

- 从蒙古文化馆到蒙古文化研究所..... 忒莫勃(131)  
呼和浩特满族教育发展概述..... 佟鸿洋(135)

· 民族之林 ·

- 略谈北平蒙藏学校土默特旗学生的斗争  
(1929—1949)..... 赵相登(142)  
绥远城满族人口演变概略..... 蒙 林(172)

· 社会纵横 ·

- 土默特史事杂谭七题..... 于永发(176)  
呼和浩特洪水灾情述往..... 白慧中(188)  
清末民初归绥地区的景观和祠宇..... 刘蒙林 舒顺华(194)  
孤魂滩·先农坛·郎神庙..... 伯 谋(201)

· 人物春秋 ·

- 爱国民主人士李致方..... 岑喜珍(203)  
解剖学专家刘其端的事迹..... 刘春甫(211)  
为人师表 风范长存  
——记我区语文教育专家杨秉祺先生..... 王克勇(222)  
巴静山先生与职业教育..... 克什格(232)  
记畜牧专家佟树蕃..... 鸿 举(244)  
献身农业教育的李藻先生..... 富景华(250)  
忆挚友卢宾..... 杨 致(255)  
平生所重推探求  
——金德海阿司的治学之路..... 代 林(263)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一至十辑目录索引..... (272)

后 记..... (281)

# 民国时期绥远历届执政者

张尔杰

绥远是祖国锦绣山河的一角，地处祖国北疆，包括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远在明朝中叶，绥远这块地方已经是土默特蒙古驻牧地的一部分。以后随着塞外明朝边兵、农民及逋逃罪犯流入的同时，也把劳力、技术、文化带了进来，出现了农牧业经济的兴旺发达。延及清朝，进入此地的汉人逐年增多。清政府为了安民课农，便于管理，就在雍正元年（1723年）设立归化城厅，雍正三年（1725年），拨归化厅由朔平府管辖。乾隆元年（1736年），增设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尔三厅。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绥远城。乾隆六年（1741年），再设萨拉齐厅，连同上述四厅都划归新置的山西分巡归绥兵备道（以下简称归绥道）管辖。乾隆十年（1745年），大同府在察哈尔右翼设丰镇厅，朔平府也在察哈尔右翼设宁远（凉城）厅。迄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也把这两厅拨划给归绥道管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归化城厅分支出武川厅，萨拉齐厅分支出五原厅和东胜厅，这就是绥远（归绥道）地区在清朝末年的行政范围。

民国元年（1912年），废厅改县，厅同知称县知事。撤归绥道改为观察使衙门。民国三年（1914年），设绥远特别行政区，与山西实行分治。除丰镇、宁远等绥东五县划给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外，归、萨、托、和、清、武、五、东八县，及土默特旗，乌、伊两盟十三旗，统归绥远将军管辖。同年，将军改称都统。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绥远特别行政区改置绥远省，都统改称省主席，将原归化城城区、绥远城城区合称归绥市，是为旗、县、市并存的开始。同时，又把绥东五县划归绥远省，并先后增设包头、临河、安北、固阳、沃野五县

局。

抗日战争爆发后,包头以东各县先后沦陷,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蹙居后套,把五原、临河两县及安北设置局分划为五原、临河、安北、宴江、米仓、狼山六个县,作为抗日根据地。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又恢复了“七·七事变”前的县政区划。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1954年3月,撤销绥远省建制,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至此,绥远成了历史名词。

绥远虽然早在雍、乾两代已经逐渐开发,和光绪末年的贻谷放垦,但到民国初年与内地省分比较,依然是单烟疏村,野色苍茫的地方。特别在民国十年(1921年)平绥铁路修到归化城以前,越发显得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民风古朴。全境居住着蒙、汉、满、回各族,充其量也不过一百七十七万人,基本上还是农牧兼营,工商并行的社会经济。就是这样一个绥远,先后“光临”过二十来位执政者,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结束。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革命的敌人袁世凯窃夺以后,在中华民国的国度里,便拉开了动乱的战幕。先是洪宪复辟,大动干戈,袁世凯在护国各省环鼓而攻之的打击下死去后,北洋军阀体系立即分裂为冯国璋的直系,段祺瑞的皖系,和寄生于他们之间的逊清遗老派,以及尔后坐大的张作霖奉系与闫锡山的晋系。他们之间都以帝国主义为背景,今日连横,明日合纵,朝为股肱,暮为雠仇,都在妄图争夺奴役全国人民的最高权力而轻启战端。所有各派系附庸的政客、军阀一帮人,也因利害一致,水涨船高的缘故,各为其主地出谋效力,一直延续了二十年之久。人祸官、兵、匪,加上天灾旱、涝、疫,尽管人民已经在水深火热中呻吟,但横征暴敛的重赋,和互争雄长的内战,却照旧互不罢手。

正是由于北洋反动政府中央,因为权力的倾轧,政柄的转移,才使各省区的各级统治大员嬗变迭更,象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绥远便是典型的例证。

在绥远省(区),自民国元年(1912年)张绍曾首任新体制的绥

远将军,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傅作义接任绥远省主席之间,轮番统治斯土者计十七人组建过十九届政府,终民国之世,则为十八人历二十届。他们是张绍曾、潘矩楹、蒋雁行、王丕焕、申葆亨、蔡成勋、马福祥、李鸣钟、蒋鸿遇、宋哲元、商震、满泰、郭希鹏、汲金纯、商震(再任)、李培基、徐永昌、李培基(再任)、傅作义、董其武。

以上执政者虽然所属的派系不同,任期的长短各异,手段的巧拙有别,但歧视少数民族,扼杀进步力量,镇压人民反抗,重税盘剥,广种鸦片,扩军备战,从而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层出不穷的武装反抗,则差不多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其中尤以晋系对绥远的统治时间最长,功过也很错综复杂,关系也很矛盾微妙。由于晋绥地理相连,历史上的归绥道又属于山西管辖,绥远汉人的祖籍多来自山西,闫锡山又把改称为晋绥军的晋军重兵常驻绥远,故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前,不论晋系的谁来绥远主政,重大问题都须取决于闫锡山。他把绥远视为禁脔。足见晋绥分治以后,并没有摆脱晋系的控制。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傅作义出席了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的军事会议,命傅回军绥远的后套,组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从此晋绥分家,另起炉灶,傅作义才成为一声喝到底的绥远执政者。

那么,绥远各族人民在这许多执政者手下俯仰求生,是怎样活过来的呢?为此,尽可能地搜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按照他们任职先后的顺序,撰写一篇《民国时期的绥远历届执政者》,让后人对于衮衮诸公的治绥政绩(包括正反两面),能有一个比较概略、公平的历史评价,就是很必要的事了。

#### 一、张绍曾(1912.10—1914.2在任)

张字敬舆,直隶大城(今河北大城)人。富有爱国思想,在北洋体系中较为开明。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革命党人有所接触。辛亥革命时任清朝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师长),继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密谋起兵会师丰台,直捣北京,推翻清廷。因协统潘矩楹告密,吴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蓝天蔚潜

逃，他亦落职，避居上海。民国建立后，袁世凯网罗人才，但对张绍曾并不放心，仅给他一个混成营的卫队，派到绥远当将军（1914年1月任绥远都统）。

民初的绥远将军与清代的绥远城将军不同。清代的绥远城将军相当于一个大军区司令，权力很大，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一般由满人特任。他除了统辖着绥远城的满、蒙、汉八旗官兵外，还兼管归化城的土默特官兵，必要时还可以指挥调遣宣化、大同、右玉、宁夏及土默特卡伦的官兵。而民初的绥远将军，则仅为一省区军政长官。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袁世凯改称各省都督为“××省将军”，以督办军务。绥远也是这样。

张绍曾于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十四日（壬子年九月十九日）莅任视事，他升起了中华民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后，改厅设县，执行新制，把土默特旗的山租、煤税、地租生息等款，要全部收归将军署起征，藉以取消旗制。激起全旗官民的愤怒，共推武尔功等人为代表，赴京请愿。他主张绥远与山西实行分治，终于在他离职后的民国三年（1914年）冬，北洋政府把绥远划为特别行政区，在行政系统上摆脱了对山西的隶属关系。

与此同时，外蒙古独立也由传闻变为事实。张绍曾按照袁世凯制定的“先稳定内蒙各旗，再解决外蒙问题”的决策，用武力把乌、伊两盟盟长请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召开了“西盟会议”，取得了“联合东蒙，反对库伦”的共识。并把绥远城八旗满兵，土默特蒙古兵，原归绥道的后路巡防队，及添练巡防队、垦务巡防队和他带来的混成卫队营，合编为绥远第一、第二两个混成旅，任将军署参谋长朱泮藻兼晋北（防蒙）中路司令，统一指挥该两旅。并与驰防包头的晋北（防蒙）西路军司令孔庚，驻大同的晋北（防蒙）东路军司令陈希义各部，向外蒙独立军经过激烈战斗后，于民国三年（1914年）七月，取得了全线胜利。其间，他强行解散了土默特陆军营，逼走三连连长玉录投向外蒙。并把土旗十二参领扣起来作人质，要挟玉录回旗。十二参领合陈《十不可投外蒙书》以明心迹。事



态的发展正在吉凶难卜的当儿,武尔功代表的请愿胜利归来——袁世凯为了怀柔蒙古人,指令张绍曾保留土默特旗权,一切山租、煤税等仍归旗署管理。张绍曾也因两次派兵进剿玉录失败,只好采纳中俄谈判签订《恰克图条约》的中国首席代表陈篆的建议:“请出玉录的亲人,劝说玉录回旗”。于是派出玉录的族兄武尔功,朱宝山的祖父朱噶兰达,和大盛魁经理段履庄等人,找玉录说合,玉录也派和他同时倒向外蒙的第四连连长朱宝山为代表,与他们接头对话,终于收抚玉录为绥远骑兵游击队,任玉录为司令(此际,已由潘矩楹任将军)。但该队的编制限额为三百人,玉录原有一千余众的人马,除又给驻在召河的保商团安插少数人外,都参加了卢占魁领导的蒙汉联军,促成绥远独立队之第一次大发展。

然而,祸不单行,灾情屡见,“民国元年八月,归化县黑河水涨,沿河二十四村被淹成灾,萨拉齐城被洪水冲坏三丈余,善岱、中滩二十七村被水成灾”<sup>①</sup>。而卢占魁的联军已蔓延后山前川及河套(今巴盟),渐成燎原之势。

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后,继续为步上皇帝宝座扫清障碍。次年二月,便把张绍曾调回大总统府供职<sup>②</sup>,实际是软禁。改派潘矩楹接任绥远将军。

## 二、潘矩楹(1914.2—1916.10 在任)

潘字丹庭,山东济宁人。辛亥革命时,任新军第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旅长)。因向清廷告密吴禄贞、蓝天蔚发动兵变有功,被提升为张绍曾落职后的第二十镇统制(师长),实是北洋政府的死党。他以北洋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的头衔,率领改制后的陆军第二十师(原二十镇),于民国三年二月十二日(甲寅年正月二十一日),接印视事,主政绥远二年零八个月。

潘矩楹在职期间,竭力为袁世凯称帝效忠。首先要完成贻谷没有完成的垦务工作。民国三年(1914年)六月二十九日,他出示晓谕:“……至于私种官荒,盗卖旗地,更属指不胜屈。本将军奉令督办垦务,现飭于归化城设立清理地亩总局,专理清查察哈尔右翼及

土默特地亩事宜……”。次年(民国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他给财政部的咨文又称：“本都督到任后,审量事实,默察情形,非从垦务入手(不可)……,其在东垦者,如丰、凉、兴、陶四县……”。其在西垦者呢?自然是饶不了土默特旗了。于是就把贻谷所定的二十二条《清查土默特地亩章程》,增益修改为《修正清理土默特地亩章程》,并在归、萨、武、托、和、清六县分设清理地亩局,开展清丈工作。“应准该旗蒙民于阴历八月底以前,(将土地)备价赎回……”。但时间仓促,蒙民急切筹款不及,以致坐失土地权。汉民饱经清丈人员敲诈勒索之后,又付出高昂的地价,才能换上部颁地照,弄得债台高筑,妻离子散。由于岁次乙卯,俗称“乙卯大照”。它的确给蒙汉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故激起蒙汉人民的共同反抗。

与此同时,潘矩楹大量散发“筹安会”编印的《孙文小史》、《“国贼”孙文》、《民党真象》等宣传品,妄图以谎言虚构,败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越发激起绥远各民族各阶层的无比愤慨。卢占魁以独立马队的旗号,组成蒙汉联军,在革命党人王定圻策划下,虎踞武川、固阳境内。潘矩楹惶恐万状,包头紧闭城门,归化城市面一日数惊。卒被卢占魁连陷萨拉齐和托克托两座县城,潘矩楹悍然捕杀了王定圻!

王定圻字平章,号亚平,包头刘宝窑子村人,毕业于太原优级师范学堂(相当于中专)。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年),他以督学官身份作掩护,担任西北方总指挥,宣传革命,发展会员,民国元年(1912年),被选为众议员。闫锡山想用归化关这一肥缺对他酬劳和笼络,王坚持不就。当袁世凯派武装胁迫议员都选袁为大总统时,王在选票上愤书“袁世凯”三字以抗议。民国二年,他以归绥中学堂学监和《归绥日报》社长职务作掩护,担任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归绥支部的主任干事。就义前夕,已被袁世凯撤销了议员证,并驱逐出京。但他仍回绥远坚持领导工作。由于张绍曾和潘矩楹多把带来的直鲁文人安排为各县知事,依作政权统治基础,任河北河间人王朝烈为萨拉齐县知事。此人贪赃枉法,

特别恶劣。更因潘矩楹利用乙卯换照，大肆搜刮地皮，使蒙汉人民伤财失地，怨声载道，苦不堪言。王定圻又创办《绥远一报》，理直气壮的指斥暴政，抨击时弊，对贪官污吏的非法行为，毫不留情地揭露和声讨。王朝烈先串通在归绥中学堂当图画教员的老乡宋铁珊，鼓动学生闹学潮驱逐王定圻，没有搞起来。宋便带领少数歹徒去砸报社，被爱社工人张玉堂用铁锹把腿劈伤，都统署审判处就根据宋的投诉，将报社社长李正乐及助理卜兆瑞、亢锦荣（三人均系党人）扣起来，妄图压服。但王定圻照旧还是肩上挎着手枪，骑着青马，每天先到中学校处理完校务，再到头道巷的报社关照报务，并仍让主笔李笑天继续坚持出报，口诛笔伐，绝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精神。潘矩楹一帮只能无可奈何的骂他是“土匪校长”。这是民国四年（1915年）七月间的事，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八月，杨度等在北京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革命党派弓富魁潜来策动卢占魁反袁。卢于九月间正式举起反袁旗帜，自称“塞北都督招讨使兵马大元帅飞虎上将军”，比蔡锷在云南起义护国还早三个月。潘矩楹侦悉卢占魁有政治背景，不敢以一般土匪等闲视之，电告袁世凯求援。十一月，卢占魁进窥包头，城防空虚，绅商害怕城破伤财，联电向北洋中央请兵。袁世凯的陆海军统率办事处派冯占元为总司令，李鹤翔（李际春）副之，带领步、骑、炮共十个营的兵力，驰赴包头“剿匪”。十二月二十日，被卢占魁击溃于武川县境的银号地方。冯占元损兵折将，弃械丢炮，逃回包头。卢即乘胜进兵，攻陷了萨拉齐县城。

不久，潘矩楹截获了王定圻致南方党人董尧山促黄兴起兵讨袁，并承诺“以二千（之）众为援”的一封信。于是立即把王扣起来，于民国五年（1916年）一月十三日（农历腊月初十），亦即卢占魁弃守萨拉齐城后，再陷托克托县城和河口镇的前一天，以“勾结乱党，图谋不轨”的罪名，被杀害于旧城南的孤魂滩，死年二十八岁<sup>⑧</sup>。

不仅如此。潘矩楹又把另一党人经权（字子衡，土默特人）扣捕，严刑逼供，坚贞不屈，便长期羁押在监，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被释

放。在同一时期，潘为了镇压人民反抗，把绥远骑兵游击队扩编为警备第三路，升玉录为司令。甚且开烟禁，种鸦片，筹军饷，加赋税，残民自肥。

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北洋政府撤销了土默特旗副都统，实行总管制，降为县一级政权。绥远绅商界共推包头人卜兆瑞赴京，向上控诉潘矩楹祸绥罪行。土旗参领都格尔扎布派郭象伋、武尔功等也到北京请愿，绥远总商会会长、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借给白银五百两作路费，都在段的卫队簇拥下，偕赴首都。即当时所说的“郭象伋的笔杆子，武尔功的嘴头子，段履庄的垫银子”。但袁帮一群官僚，正热衷于“洪宪”登基，忙于镇压各省护国起义的军务，都没心思过问他们的上告。好在袁世凯于六月五日一死，人民被压抑的心情又开始欢跃起来。潘矩楹因失去了靠山，不久便被蒋雁行取代了他的绥远都统。

### 三、蒋雁行(1916.10—1917.6 在任)

蒋字宾臣，直隶阜城人。他由北洋陆军训练总监升任绥远区都统。与直系首领冯国璋的关系很深，称冯为世叔。

袁世凯死后，护国各省依照孙中山所颁民元《临时约法》，承认了没有跟袁世凯叛国的副总统黎元洪为继任大总统，实权则操诸皖系首领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副总统一缺落在冯国璋身上。由于绥远不是直、皖两系必争的地盘，段祺瑞选择了没有兵权实力的直系蒋雁行，接替潘矩楹。

在蒋雁行接任以前，潘矩楹已把绥远搞得千疮百孔，糜烂不堪。当卢占魁指挥的反袁义军连陷萨拉齐、托克托和东胜三县城的时候，包头于民国四年(1915年)年底开始戒严，整整关了五十来天城门。潘矩楹无能为力，向上求援，北洋政府于民国五年(1916年)二月中旬派多伦镇守使萧汉杰(字良臣)以绥远剿匪会办的头衔，率八百多人的兵力进入后山。萧的部队是淮军，仍以当年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那种顽固反动传统，对蒙汉联军展开狠打痛击，才把卢占魁的主力赶过黄河，进入陕北、陇东。另股赵有录、白彦山

各部，被武川县知事兼警备司令王朝烈所收编，赵被聘为都统署参议。

同年六月，萧部奉令东调。党人弓富魁奉派到陕北协助卢占魁扩军建军，结合三边高石秀<sup>①</sup>和陇东庆阳张九才的哥老会队伍，于秋收时期麾军北上，回到武川西区同兴公和广义魁（固阳），白彦山立刻重归卢占魁大营。这时候，卢的人马约有一万来骑，归化城北一过蜈蚣坝，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武川县政府寄治于归化城。蒋雁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带着北洋陆军第一师蔡成勋部的褚恩荣旅，于十月二十七日（丙辰年九月十一日）接任视事的。

卢占魁的大军集结武川、固阳境内，先头部队已挺进蜈蚣坝一线，绥远新、旧两城岌岌可危。蒋雁行下车伊始，不遑休息，让带来的心腹归绥道尹申葆亨与潘矩楹的人办理交接手续，自己亲赴前线督战，不料却陷入独立队的包围之中，褚旅的一个整营被消灭于毛忽洞地方。经此惨败，他感到光凭现有兵力，已不能解决“卢匪”的问题，于是便想到收抚是最好的一着。他先给远在南京坐镇的副总统冯国璋写信，特别强调绥远区内有二百多座洋教堂，由于兵力单薄，很难一一保护，所以比国教士二人，屡次请求收抚<sup>②</sup>，以说明不得不收抚的主张。终于在固阳黑教堂神甫南怀义，大地主孙板达子，后套的王同春等人从中斡旋下，于民国六年（1917年）农历二月中旬，对联军在黑教堂经过点编，收抚为绥远骑兵游击旅，任卢占魁为旅长，全旅移驻后套的乌兰脑包镇一带，据当时担任收编委员会的文案关钟麟老人生前所写的回忆录载：卢部在收编后，“纪律维持的很好”<sup>③</sup>。但除把一万多张免死证发完外，由蒋的副官处长张朝凤经手的二十万元资遣费，仅发放了一半云。

绥远绅商界认为蒋雁行收编卢占魁是失策。因为仅收编了卢的嫡系，原来依附于卢部的各股独立队，仍然打着卢占魁的旗号，在大青山、两狼山后及沙拉木里河、托城、和林、清水河一带丛集<sup>④</sup>。尤恨蒋让种鸦片，不改潘矩楹暴政。京议员李景泉，省议员杨作舟（杨修渠），分别提出弹劾案，并推段履庄、荣祥进京上告。这

时，蒋雁行已到京出席督军团会议。行前，让归绥道尹申葆亨代理都统职务，把警备司令的事托付给张朝凤。但申、张二人丧失警惕，很快就被王丕焕夺了权。

#### 四、王丕焕(1917.6—1917.7 窃权)

王字灿章，河南淮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辛亥革命时，任清朝新军第十镇二十九协骑兵营长，驻防开封。他以绥远混成旅旅长的职衔，随蒋雁行来到绥远，蒋颇依重，让他兼任绥远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及绥东剿匪司令。在蒋离开绥远不久，即以突击手段把张朝凤扣起，编造罪名加以处决。并自立为绥远都统。先向徐州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张勋)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张勋于七月一日，在京拥立溥仪复辟时，只任命他为署理绥远都统。他接到上谕，发出了一通“率同归绥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恩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的电报。同时通令各机关商店悬挂大清龙旗庆祝。并在都统署西辕门外也搭起彩棚，把旧城戏园的千二红、二庆旦、飞来凤诸艺人调来，演唱了三天晋剧。

但王丕焕嫌溥仪封的署理绥远都统不够，又自称是将军。没想到“辫帅”张勋以调人进京倡乱，从六月三十日到七月十二日，仅仅闹腾了十来天，就被段祺瑞“马厂誓师”的部队打败了。张勋拖着辫子跑进荷兰使馆避难，所有寄生于直、皖两系的逊清遗老派，又都缩头缩脑的躲藏起来。王丕焕见势不妙，悄悄告别了好不容易在都统署挂起的大清龙旗，惶惶兮兮的席卷脏银(确数不详)逃之夭夭。

同年二月，乌拉山大火，自梅勒更召至哈德门沟，延烧五十余里，延长三阅月始息。九月，鼠疫从东三省传入绥远境内，“十二月，归、萨、托、和、凉、陶、五各县，时疫流行殆遍”。至次年三月，又起肺疫，由包头蔓延全区，“城市街衢，寂无行人，城乡大道，人迹几绝<sup>⑧</sup>”。

#### 五、申葆亨(1917.7—1917.8 代理)

申字稀辅，江苏宿迁人。他随蒋雁行来当归绥道尹。由于王丕

焕已经逃走，他于民国六年（1917年）七月二十日，开始代理蒋雁行的都统职务，处理日常例行文件，为时仅二十来天。但也不难看出：绥远政局纷乱，是受北洋中枢“府院之争”影响的结果。段祺瑞击败张勋，重当国务总理，冯国璋依法取代了黎元洪的大总统，段祺瑞根据王丕焕那份“……伏乞皇上圣鉴”的电报，派蔡成勋来绥远查办附逆案，并接任都统。

#### 六、蔡成勋（1917.8—1920.12 在任）

蔡字虎臣，直隶天津人。在冯、段重新分配权力中，他这个直系干将以陆军第一师师长兼任绥远都统。于民国六年（1917年）八月十日接印视事，主政绥远达三年零四个月。

蔡成勋的整师人马进驻绥远，装备优良，军容威武。且因薪饷都由北洋中央按月拨发，商贸活跃一时，市面也显得较前繁荣。绥远区原来没有地方银行，经他倡议，建立起绥远平市官钱局，并自兼董事长。新旧城之间，旧有一条绕道姑子板村，全长约五、六华里的车马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一遇天雨，泥泞难行。他派该师工兵并征发一部民工修成一条直达马路，加高路面，方便行人，还在马路两旁栽植杨柳，以壮景观，是为现在中山东路的最早路基。

蔡主政绥远后，要草要粮，加征加赋，东打西杀，抓车拉夫，一心一意妄想把绥远搞成自己的基地，以为北洋政府把守北大门。因而镇压了五英雄起义，驱逐了绥远骑兵游击旅，仍旧大种鸦片，荼毒绥远人民。当时流传着一首民歌：

数九天来水成冰，归化城坐下个蔡都统，  
四栅口安兵要粮草，害的是黎民老百姓！

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敛财掠名的恶劣行径。聊举两例：1、绥远自民国元年袁世凯明令禁烟以来，蔡成勋以前的历届主政者，都是明禁实不禁地收税罚款了事。所以每一位下台的将军或都统，在绥远绅商代表赴京告状时，几乎都有一条开烟禁的罪款。蔡成勋比他的前几任聪明，下车伊始，就贴出堂皇布告，并三令五申，严禁种烟，违者重惩，绝不姑宽。但暗里却派心腹分赴各县，向知事面授机

宜,指示广种。各县知事深知种烟首先对他们有利,何乐而不为?更何况按规定每亩烟地除征收烟浆若干成外,还收所谓罚款若干成。于是明禁暗纵,鸦片越种越多。结果,烟农所收的烟浆几乎全部归官。因此,种烟的人个个呼天喊地,后悔莫及,而大小官吏,人人私囊肥满,其手法之“高妙”,实为历任所不及。2、其夫人病歿绥署,蔡不但借机敛财,而且借此敛名。除挽幛实物一概收揽外,或由总务处长刘书言面授,或派人分赴各县向知事授意送万民旗、伞。仅各县绅商人士所送万民旗、伞即有百余件。那时正值新旧两城之间马路修通,当出殡蔡夫人之日,五里之遥的马路上,送殡人群浩浩荡荡,所有旗、伞执事,象出塞一般,前端已至旧城尽头,末端尚未走出新城署门,真极一时之盛。“灵柩回到天津,又将旗、伞举出表演了一回,都说老蔡在绥远的德政不错,不然哪有这些万民旗、伞呢?所谓‘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摘引自屠义源老人生前所撰《绥远政坛见闻琐记》)。

还有,军纪败坏,赌博成风,中级以上官佐,多爱打牌、抽大烟、叫条子,很少出操训练,士兵作风就可想而知了。政治则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习以为常。例如当时绥远的财政来源,大抵依靠清源局税收,此外全仗稽核所收烟亩罚款。但清源局有规定,就是纳税进出找零,作为各局长的合法外块,至于暗地捣鬼,就难以例证了。

蔡成勋的胡作非为,激起绥远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土默特旗人满泰(字子舒)、安祥(字子楨)、云亨(字嘉惠),萨拉齐县人刘聚章(字会文)、李雨山五人,响应孙中山在广州发出的护法号召,于民国六年(1917年)初冬,发动萨县一区警备队、五区保安队、石拐煤矿矿巡队官兵约千人之众,并联合驻防后套的绥远骑兵游击旅卢占魁部,起兵声讨蔡成勋。虽因蔡某派兵镇压而失败,但被后人称颂为“五英雄起义”。之后,议员李正乐、闫肃、赵子让、韩俭、任和卿、荣祥诸人,也以合法身份,赴北京向国务院控告。但在蔡成勋主绥期间,北洋中枢反复政变,几经改组。先是民国七年(1918年),大总统冯国璋被国务总理段祺瑞胁迫去职,次年病死于北京。段的



御用“安福国会”，通过选举形式，扶起逊清遗老徐世昌为大总统。到民国九年（1920年），继冯国璋为直系首领的曹锟，在吴佩孚帮助下，又起兵把段祺瑞击溃，赶下了台，直系重掌北京政权。为了巩固南方阵地，调蔡成勋去当江西督军。李正乐诸人跟踪追赃，在北京逼蔡成勋吐出四万元息讼，使蔡落一个辞职而去。曹锟另派马福祥统治绥远。

### 七、马福祥（1920.12—1925.1 在任）

马字云亭，甘肃导河（今临夏）人，回族。他出生于寒门。父亲马千令原为行商小贩，生育四子，马福祥排行老四。后因老二马福禄中了武举，门庭从此显赫，使马福祥能在读书练武中长大。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甘肃撒拉回起义，他和二哥组织民团自卫，受到提督董福祥的赏识，收编为董的部属，后随董福祥卫戍北京城防。在八国联军围攻北京时，因马福禄战死给他挣下一个记名提督。旋跟董福祥护驾慈禧太后逃奔西安，得有机会一路讨好慈禧的宠信太监小德张（张祥齐），所以很快被提升为宁夏总兵，从此，马福祥扶摇直上。

辛亥革命时，马福祥见甘、宁将领纷纷响应，他也从众。民国二年（1913年），伊盟扎萨克旗班第达经师喇嘛旺丹尼玛，为了配合外蒙独立军南下攻打包头，派兵占领五原，他用诡计把旺丹尼玛诱到黄河南岸杭锦旗的惠德成地方，逮捕起来解送北京。袁世凯旋升他为中将，任宁夏护军使兼宁夏满营将军。之后，袁世凯命他专剿卢占魁的独立队，从后套打到伊盟并到陕北、银川附近，又打到后套而后山。苦战三年，胜负难解，几次差点被卢占魁把侄儿马鸿宾、儿子马鸿逵给活捉了去。及卢占魁率部南下，参加了于右任领导的陕西靖国军后，马福祥所部回防甘宁老家。

迨直系重掌北京政权，调蔡成勋督军江西后，北洋政府由于再也选择不出一个嫡系正宗干将，就把不是皖系，也与直系无关，且较熟悉绥远情况的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发表为绥远都统。这时已经是民国九年（1920年）十二月了。但马福祥顾虑重重，迟迟不敢到

任，一直拖到次年春末，由于绥远绅商表示欢迎，才留下侄儿马鸿宾看守宁夏，自己带着儿子马鸿逵走马上任，成为绥、宁两省区的统治者。

马福祥接印以后，倡言澄清吏治，兴利除弊，用人唯贤。故把老资格的士绅李景泉委为归绥道尹，名上屠义源、荣祥任为清源局长，大盛魁经理段履庄为财务整理处总办。这些先生们因想给地方上办些好事，无不入彀。另用满族人李春秀当都统署副官处长兼塞北关咨议、禁烟善后局会办、筹饷局局长等要职，后又调任警察厅厅长，一时舆论大哗，人言啧啧。但仍聘请归绥商会会长邢克让为都统署参议。且因萨拉齐县苏波罗盖村人董仲山，由于上京控告马福祥，马与他交成了朋友，也给了他一个筹饷局局长，终于被时人列入马氏“三凶四害”之一！

在军事方面，除他带来的昭武军所部外，在来绥前向北洋政府请准一个只发副食补贴，没有薪饷、给养供给的第五混成旅番号，这旅人是由河州地方民团凑合起来，仓促成军，少枪没弹地徒步跋涉来到绥远，活象一群难民，于是就给儿子马鸿逵一个绥远混成第一旅长的兼职头衔，再给郑泽生成立绥远混成第二旅，收容过去在绥远驻过防的毅军、淮军、绿营及张绍曾、潘矩楹、蒋雁行、蔡成勋历任将军都统遗落下的失意官佐和散兵游勇，组建起来。同时为了吸收绥远的独立队，又在包头给河州人蒋辉若一个骑兵支队的番号，并让哥老会龙头杨万楨（小五杨）当了蒋的副司令。这些队伍当然由地方上供给。于是区的筹饷局应用而出，各县则叫着军粮局。但因部队番号杂，官兵素质坏，军粮摊派重，和农村濒临破产，基层政权的甲头催交不起来，就派兵直接进村到户坐催勒索，没有粮草就折价要钱，弄得鸡犬不宁。致使原来规定的每亩二升五合征收率，提高到每亩五升上下，正式田赋还不在此数。

农民遭受田赋与供应粮草的双层压榨，如牛负重，怨声载道。有的铤而走险，揭竿为匪，有的参加了哥老会，希图摆脱困境，找到一条生路。更加灾荒降临，农业欠收，社会越发动乱起来，促使绥远

出现了独立队第二次高峰。

与此同时，马福祥仍以筹饷为名，让警务处长余鼎铭（字介议，甘肃导河人）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贩毒。由甘肃、宁夏两省鸦片产区大量采购烟土，派部队护运到归绥。因京绥铁路已经修通，再转运京、津出售，然后从京、津采购沪广洋杂百货，返运绥、包、甘、宁营利，来回倒卖，大发横财。同时还让绥远公开种植鸦片，仍以烟亩罚款抽成征税，尽量收购，责成绥远禁烟善后总局（各县设有分局）专司其事。仅归绥市一隅，烟土充斥，烟馆林立，烟商如梭，绥区烟民与日俱增。光在旧城街头巷尾挑幌子的烟馆，就多达三十余家。而所谓禁烟善后总局，则是一所笼络、收买、豢养土豪劣绅与食客的牟利机构，让一些地方闻人坐领干薪，因人而异的分为五级对待——一、二级属于会办、坐办、帮办、咨议、参议之流，他们所领的车马费，月为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其余则为三至五级，月领津贴由四十元起码，至一百五十元以下不等，这些无功受禄的人，对马福祥的统治，自然不会再有什么异议了！

李春秀与马福祥素无一面之交，一下就给了他多种要职，其故安在？只因贻谷来绥远放垦，他见一般旗民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仅依靠俸禄供养，别无其他生活来源，担心日后困难会更大，为了解决长远问题，除让每人领地若干亩耕种外，拨出发商生息白银三十万（？）两，又给八旗官兵拨下河套兰镇一带好地二千余顷，作为满民的捐廉垦地和福利事业之用。

李春秀时任旗民生计处处长，对于上述银两和垦地有管理好的职权和责任。因此，马福祥便对他重用起来。二人勾结，狼狈为奸，把兰镇的垦地名之曰“卖给”马福祥。马仅付出大烟五千两，就把二千余顷土地据为己有。李春秀除了给每一旗民分散三两外，余均为个人鲸吞，致使旗民生计断绝！

至于三十万（？）两白银，前几任将军、都统都有挪用不还的事实。李春秀是马福祥的筹饷局长，当然给马筹的最多。李春秀还向马福祥献策，把新城西门外清朝用过的大教场，仅以五千元的廉

价,卖给了天主教堂。该场面积约十顷,场内有演武厅七间,休息室十间,场畔有大树千余株。为此,罗马教皇赠给马福祥“五星勋章”一枚,也给李春秀在新城盖起两处房院。

民国十二年(1923年)冬,深居都统署两宅的马福祥内眷,因取暖不慎失火,卧室被烧为灰烬。翌年夏季,马为恢复旧观,仍由李春秀当掮客,将满民祖传领有的兵房,每间一律以二十元作价,强迫拆购,以致民怨沸腾,无所栖居。群众对李恨之入骨,切齿的骂他是“三凶四害”的首恶<sup>⑨</sup>。

此外,由于鄂托克旗与宁夏毗连,马福祥拥有一身而兼绥、宁两省区的大权,便把本来属于绥远鄂托克旗的陶葫芦滩十六段地,霸归宁夏省。并把上八段地分给侄儿马鸿宾,下八段地分给儿子马鸿逵,专设陶乐县加以管理。

绥远的哥老会,在民国九年(1920年)已经拥有自己的武装,大龙头小五杨(杨万楨)就坐在萨县保卫团团部发号施令。团总侯斌臣(侯宪章)是老同盟会员,他在党人刘会文擘划下,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三月二十八日,率该团官兵一千余人起义反马,旋为马福祥诱杀于新城南门外。所部无人统帅,分股发难,卒被打散。

奉系张作霖,在包头开设了鲁昌洋行,作为特务机关,给哥老会接济枪支弹药,并密委杨万楨为奉军第二十五旅旅长。特务机关被马福祥破获后,杨即躲藏起来。但为他们做工作的马部排长马虎臣,却被扣到绥远模范监狱囚禁起来。

民国十二年(1923年)岁杪,马虎臣联络劫路伤人待决犯张三(外号飞腿张三),串通全监罪犯,用家属探监时暗递进来的钢锉,在一夜之间都把镣铐锉断。次晨放尿时一声呐喊,冲出监门,闯入驻在监狱附近的马鸿逵炮兵连,抢了七十八匹骡马和四十来支步枪,穿街过巷奔出城门之外,给马福祥以十分沉重的打击。

不仅如此,马福祥收编的哥老会队伍苏雨生、赵有录、王英三个骑兵营(均隶蒋辉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派出支援直军。战后,调驻京郊南苑,马却密通直军把他们全部缴械遣散。王英跑回

绥远，因是马福祥的干儿子，当上都统署的参议。苏、赵二人则跑到河西，呼朋引类，重振旗鼓，专门与马作对。这就使马福祥对哥老会所采取的利用、分化、瓦解阴谋败露，斗争更加尖锐并表面化了！

马福祥令郑泽生兼绥东清乡司令，马鸿逵兼绥西清乡司令，扩编绥远警备第三路为补充团，任玉录为团长，又把跑到北京，鼓动绥远旅京大学生控告他的刘会文找回来，给成立一个警备队，还给王英加委为五原县民团团总（后为包五护路司令）。大开杀戒，全面出击，会剿会匪。并定出杀一颗人头奖一百元现洋的赏额。单在和林格尔境内，就不知冤杀了多少人。马家官兵为了追求赏额，只要在路上碰见了人，便挥刀一砍，割头一颗，回去领奖。

对于马福祥在绥远的“政绩”，曾于民国二年当过归绥县议员的新城满族士绅关钟麟，联合曾当过山西省议员的萨拉齐县人胡虞卿，及托克托县的绥远名律师田肇修，偕赴北京上告。马福祥先托人转禀，分别许以归、萨、托三县县知事相酬，诱劝息讼。被三人拒绝后，马又通过京都警察厅把胡、田二人逮捕，关则跑到热河避难。胡、田被押解回归绥，马福祥却把他俩都派进禁烟善后总局坐领干薪。

绥远旅京大学生成立起绥远旅京同学会，该会创刊《绥远旅京同学半月刊》，以中大学生陈国英（字俊卿）为领袖。潘秀仁以非非、陈志仁以之的为笔名，和其他同学都发表文章，抨击马福祥残民祸绥，荼毒生灵的暴政。由于历年以来，绥远区对旅京大学生每年每人有津贴现洋一百元的惯例，马福祥又给每人各增发一百元，意图收买他们，但这些大学生抓住钱以后，越发著文揭露他的卑鄙行径，马的阴谋失败。

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奉系张作霖进驻首都，临时主持北京政局。马福祥通电拥护奉张，并密电张作霖把陈国英逮捕押解绥远法办。中大同学常斌魁星夜去找校长王正廷、兼中大董事冯玉祥说明原委，请伸援手。即持王、冯署名信件去找冯系警察总监薛笃弼交涉，把陈国英救出

来，马福祥阴谋又一次失败。

冯玉祥、张作霖二人，把不甘寂寞的皖系首领段祺瑞扶上台临时执政。段以首都近郊不宜驻军为由，令奉张仍回东北，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冯系李鸣钟为绥远区都统，调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会办一职是明升暗降，马福祥父子不甘心让出绥远地盘。马鸿逵年少气盛，力主武力挡驾，必要时退守宁夏。乃父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兵力，深知不是冯督办的对手，决定欢迎并就任新职。

#### 八、李鸣钟(1925.1—1926.1 在任)

李字晓东，河南沈丘人。辛亥革命时在冯玉祥营任排长，滦州起义失败后，随冯到陕西，历任冯部营、团长及混成旅长。他熟读经书，亦善作画，个性宽和，平易近人，被称为冯氏“五虎上将”之一。他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一月接任绥远都统，主持绥政十二个月。

李鸣钟一到任，就令孙良诚旅驻萨县，石友三旅驻包头，石敬亭旅驻归绥，田金凯团驻察素齐，对哥老会展开全面痛剿，哥老会也针锋相对，不甘退让。李在盛怒之下，捕杀了哥老会大龙头杨万祯(小五杨)，给以后招致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且因急于为扩军筹集军需装备，召集归化城各大商号经理，动员他们认捐协饷。由于双方索付距离过大，不欢而散。李就以贪污公款为名，把邢克让和段履庄扣起来，勒令退赔。邢时任商会会长，由商会交付十万元后被开释。段则只是大盛魁经理，早已不是会长，贪污公款从何说起？但也从大盛魁设在召河的马场里，挑选了一千匹军马，给郑大章组建了一师骑兵。把段释出后，承认是献给他的。

民国十四年农历正月十六日，绥远补充团团团长玉录，奉包头警备司令石友三之命，孤军过黄河挺进伊盟，追剿苏雨生、金宝山、刘喇嘛各股，不幸在杨三虎圪卜被围殉职，李鸣钟升补充团团附满泰为团长，再进伊盟，把金宝山等逐出伊盟。苏雨生则为冯玉祥招抚为西北边防骑兵游击支队司令。不久，李鸣钟扩编补充团为第三团，由原来的三百人充实为八百多人。旋又升格为旅，任满泰为旅

长。并提升刘会文为绥远警备旅长，王英为包宁护路司令。在绥东，也扩编丰镇警备大队武万义部为宋哲元部的骑兵团，任武为团长兼绥东剿匪司令，旋亦升格为旅，武为旅长。

在政治上，李鸣钟到任后，绥远现出一派新气象，社会风气大有改观：各县知事多派部队文书充任，身穿军衣，腿扎绑带，脚蹬布鞋，平易近人，访贫问苦，办事简快求实，一改旧日官场中的推诿拖拉积习。他亲自选择地方官吏，以选贤任能为准则，并惩办或撤掉一些不称职的人员，也表扬和提升一些留用官员，如和林知事屠义源政绩卓著，不仅受到表扬，还被冯玉祥提升为热河区（都统宋哲元）政务厅（民政厅）厅长。

归、包城内的街头、巷口、要路，都刷有“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醒目标语。“打倒军阀，打倒军阀，赴国难，同胞团结起来，同胞团结起来，齐奋斗，齐奋斗”的进步歌声，不时从操场、课堂、作坊传了出来，并把旧城西马道巷的一处大厅改建为民乐社，每天有不少人去听政策、时事讲话。归化城到武川的山路蜈蚣坝一段，陡峭难行，李鸣钟让副官处长吉鸿昌带领工兵，凿山开路。吉手书“化险为夷”四字，令石匠刻在路壁山石上。又重整蔡成勋时所修的新旧两城直达马路，补栽路旁树木时，李鸣钟亲自参加，带头挖坑培土。另把新城西南城角里的菩萨庙，改建为二十镇的忠烈祠，将庙里的泥塑神像毁掉，供奉起辛亥革命时滦州起义失败所牺牲的官兵灵位。因卢占魁不是二十镇的人，但在北京政变期间，由于叶荃、孙岳等人的牵线，完成了冯玉祥密授的任务，另在庙墙东壁给他建起一间石础砖柱，土木结构的拱脊祠堂，堂内供桌上竖置约三十公分宽，七十公分高的描金木刻龕一具，内竖写“供奉卢占魁将军之灵位”及落款“冯玉祥敬书”等字。

李鸣钟很重视教育事业，先后创立五族学院（奉军入绥，改称公学，之后改称中山学院）、包头二中、职业学校（今内蒙农牧学院前身）、女子师范、全区图书馆（后为省图书馆）、古物陈列室、通俗讲演所（后为省民众教育馆）及平民学校。此外，建立平民医院、老

幼救济院、妓女济良所。特别对移风易俗方面，更下大力狠抓。汉族妇女的缠足更是恶俗，归绥道尹邓长耀领着归绥县知事刘子厚和警察，到桥靠村让妇女们放开裹脚以后，他每天领上剃头匠和满、蒙族查脚老奶奶，站在旧城各街要路口，看见拖辫子和缠足的男女走过，当场就给剪掉和放开。还亲自打着竹板唱道：“现在世道大改变，不重三寸小金莲，裹足如同带脚链，妇女同胞受可怜……”。在广大农村里也有县衙门派出的查脚人员和劝学委员。并且严禁鸦片，令行禁止。封闭全市烟馆，警察大抓烟鬼，强迫送戒烟所戒除。李鸣钟亲自抓了都统署审判长于文景的烟灯，毫不留情的当面把烟具摔毁。

同时雷厉风行的澄清吏治和整顿财政。常派员密查各县政治，对贪污有据者，立即撤换或逮捕。有的县知事犯法，甚至受到鞭责。财政厅长邓哲熙，经常亲自明查暗访，各税局工作人员供职唯谨，不敢丝毫马虎，如被查出漏洞，立予重惩。因此，税收旺盛，超出过去三至五倍。特别是塞北关，由于他是中央税收机关，地方官吏无权过问，但冯玉祥不理这一套，同样严加管理，他一声令下，把“纳税进出找零，必照市价多收一百制钱”的传统陋规废除了，税收当时就超额十余倍至二十倍。正是由于冯玉祥和他的高级干部如李鸣钟这一级官员，都能以身作则，不务虚名，才使绥远开始出现了自民国以来仅有的弊绝风清，兵不扰民的良好秩序。

因为时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冯玉祥、李鸣钟支持革命和群众的爱国行动，所以政治局面生动活泼。故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一月，绥远区选出奎璧、吉雅泰、赵诚、高布泽布等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三月十二日，归绥各界人士在旧城席力图召院内，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沉痛表达了对革命导师的怀念。会后，还在民乐社放映了孙中山逝世纪录影片。四月下旬，中共北方区委派吉雅泰筹办国民党区党部。区党部委员除吉雅泰外，还有五族学院教师杨绍萱，职业学校教师路作霖，归绥中学教师纪亮，通俗讲演所的杨晓曙和托



县人焦守显。后来人们才知道，除纪、焦二人外，其他人都是共产党员。十二月，冯玉祥的国民一军与国民二军，击退直鲁联军的进攻，占领了天津等地，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惧，也加速了奉军、直军、晋军的联合反冯，共同进攻国民军。

李鸣钟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月，调到前线指挥战事，绥远都统一职由蒋鸿遇代理。

#### 九、蒋鸿遇(1926.1——1926.7代理)

蒋为国民军的高级将领。他是在李鸣钟赴前线指挥战事的情况下，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一月间，被代理边防督办张之江派到绥远代理都统的。在职期间，仍随李鸣钟的旧规，没有什么更张。同年七月，他到都统署主持会议时，将教育厅长李泰棻撤职，改派郭象仪为教育厅长。为时不久，即率部西去。由于没有接任者，便把绥远都统大印交给归绥商会，路过包头时，却以都统身份向商会借款。

#### 十、宋哲元(1926.7——1926.8代理)

宋字明轩，山东乐陵人，多年追随冯玉祥。来绥前任热河区都统，热河弃守后，担任前线总指挥。因蒋鸿遇已走，张之江令他代理绥远都统。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至八月离去，为时仅一个多月。

宋让屠义源以绥远政务厅长名义，代他将都统印向商会接过来，到都统署代为处理一切政务，他本人一直驻在绥远火车站专理军务，始终没有进过都统署。凡有关文件由他批示后，交屠义源用印。宋哲元率部西开时，令赵守钰把堆积在火车站的所有弹药，派人引爆，以免资敌。他甫去，商震已到绥远，屠即把都统印交给商震。

#### 十一、商震(1926.9——1927.9在任)

商字启予，原籍浙江绍兴。早年曾在保定陆军军官速成学校肄业，后毕业于辽宁陆军测绘学校。清末为二十镇冯玉祥的同事。因参与滦州起义失败被解职。民国初年，他随冯玉祥投奔陕督陆建章

(冯的妻舅父),陆任冯为第七师的旅长,商为第七师某团团长。之后,陆被陕西陈树藩起兵驱逐,商率李培基和郭凤山共千余人,过黄河投靠了山西阎锡山。在军阀混战中,郭凤山当上晋军骑兵第二师师长,商则成为晋军主将,被阎锡山任为绥远都统。

阎锡山的人事政策历来就是:外省人不如山西人可靠,晋南人不如晋北人可信,晋北人最数我五台人放心。因此,起初要让赵培廉来接绥远都统,经赵进言,阎才发表商震出任绥远都统。另派心腹、代县人冯曦(字子和)任政务厅长监视之。原政务厅长屠义源,把自己保管的都统印上交商震,并请求解职让贤时,由于冯曦向阎推荐屠义源留任,阎即电商仍令屠蝉联。另委派冯曦为实业厅(后改称建设厅)长兼垦务督办。商如外出,冯即代理都统处理政事。

自商震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九月接印视事,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八月,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的五年时间里,国内政局扰攘动乱,错综复杂,发生过大革命失败,蒋、阎、冯、李联合北伐,东北易帜,中原大战等重大事件。绥远虽然地处边陲,但也深受影响。就在五年之中换过七位都统(主席)。都是来去匆匆,政令不长。以致是非失准,民无常法。加以灾荒连年,苛政敲剥,人民早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商震面临的是饿殍载道,民变迭起,土匪如毛,财政奇绌,百业萧条的局面。

他到任伊始,便有英商数人要求退还李鸣钟在职期间,所扣留的三十万只羊及骆驼与汽车。商震批交政务厅长屠义源洽办。屠要英商认错受罚,英商以认错受罚会影响大英国体,愿认贿私了,被屠拒绝后,又到中央外交部行贿走后门,居然电令商震把扣留羊只等予以放行,屠又回绝,坚持要公开罚款三十万元,并限在十天内存款,逾期没收。旋因英商久不再来,商震便令把羊只、骆驼等拍卖,共售价五十余万元,以之购买了新式武器,装备了自己的部队。

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匪情与灾情,二者本来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商向阎锡山提出了收编独立队的设想。阎锡山同意了他的主张,扩编王英为晋军骑四师,满泰为骑五师,石杰与黎明各为独立骑兵

师,刘会文和陈玉甲各为绥远警备旅。因而在绥远掀起了收编热。一时间,各部都派出收编委员,争到匪夥里接洽联络收编事宜。于是晋军骑四师收编金宝山、李三河数股为两个团。第五师收编郭春山、赵青山数股为两个团。石杰收编陈得胜、康存良、小万万、张耀、周鸿宾数股为一个旅,任陈为旅长。黎明收编戴茂山、徐文标合编为一个团。刘会文收编若宪斯,陈玉甲收编范福海……。阎锡山规定按月发给七成薪饷,按点编人数供应给养。但他们被收编以后,除驻地征食和到邻村号草要粮维持人吃马喂外,每月连一分薪饷也领不到。各大股土匪虽说是收抚了,可包头以东丰镇以西,以及后山至黄河两岸,照旧有小股土匪出没无常,大肆滋扰。后套一带仍为王英和陈得胜所盘踞。

这年干旱造成的灾荒笼罩绥远大地。据现有资料记载,“除后套不计外,灾民人数已达六十二万多人。”当时不包括绥东五县,全区人口约一百七十七万人。地方士绅目击时艰,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组成绥远旱灾兵灾救济会,共推李景泉、郭象伋为正副会长,分组四出募捐,请商震兼任名誉会长。总计阎锡山捐了一万元,商震捐了二千元,绥远财政厅拨给四千元,山西和直隶两省慈善机关汇来三千多元。救济会就用这些区区不足两万元购买粮食,在归绥新旧两城设立四个粥场,向流入市内的灾民作杯水车薪的救济。

与此同时,都统署还要从增加捐税、种植鸦片,和清理余荒、夹荒土地的收入着手,以解决两万来官兵(包括收编的)的粮、饷、服问题。救济会向都统署请求拨款赈灾,筹借牛具和籽种,呼吁肃清土匪,建议暂缓加税,要求停止种植鸦片及清丈土地,均置之不理,激起绅、商、工、农、学各界的无比愤怒。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二十八日,国民党绥远区党部(中共绥远地委)组织归绥蒙、汉农民、学生、工人、教职员五千多人,在城南孤魂滩召开绥远难民请愿大会,揭露当局清丈土地、开放烟禁、强加捐税、不恤灾民的暴政。大会由国民党人李正乐主持,中共路作霖等人讲了话。会后,群众

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归绥旧城游行示威，砸烂了清丈局，捣毁了县衙门及知事冯延铸的公馆，终于迫使商震答应了群众提出的条件。惟对撤销冯曦职务一条持保留态度。商震向群众推出的谈判代表说：“这我作不了主，须请示阎总司令才能决定。”

冯曦的父亲是清末举人，与阎锡山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凡晋系来绥主政者，阎都派他为实质上的监军。他在任期间，家住绥远城，每日必乘轿车去旧城丰业银行打牌、抽大烟。时人送他一副“来回五里路，早晚八圈牌”的对联。他曾领导过辟建绥远公园（今人民公园前身）的工作，并亲泐碑文。还在新旧城间的姑子板马路段修一水泥石砌小涵洞，亲书桥名，以志“政绩”。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挖修民生渠时，他趁机为阎锡山霸占土地一块，挪用赈款为阎组建民生机耕农场。结果，因民生渠水位低不能上水灌溉，所购农场机器都变为陈列品。直到“七七事变”初期，傅作义赴察哈尔指挥战事，这位绥远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冯曦，率先跑回了山西。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开始“清党”。绥远的国民党便由纪亮、焦守显、潘秀仁、张遐民、李正才等，组成“清党委员会”，扣捕了杨晓曙诸同志。不少同志跑到老一团隐蔽起来。六月中旬，商震奉阎命，在归绥城北的小教场召开群众大会，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宣布服膺三民主义，参加北伐。

这一年的绥远，仍然久旱不雨，禾苗枯焦。且因兵匪劫掠，农民储备已经耗尽，口粮奇缺，籽种匮乏，耕畜被抢。许多地方的春播无力进行，有些农户则根本没有下种。可晋军不管这一套，反而叫县署为部队征发给养车，担任运输任务。在此期间，救济会于四月间给灾民发过赈粮三千多石，留下二千多担维持粥厂，以后又陆续发放三万五千多元赈款。旋因赈源为战争阻绝，救济工作遂即暂时停止了。

原先，阎锡山和张作霖联合起来夹攻国民军，战前双方决定：撵跑国民军后，由奉军掌握京绥铁路的管理权，晋军接收绥远的行

政权。但胜利以后，都感到对方碍事，因而晋、奉反目。晋军分左右两翼向奉军进兵。左翼由商震指挥，沿京绥铁路直驱北京。右翼由徐永昌统率，沿京汉铁路进取首都。商震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九月离绥，阎锡山令晋军骑五师师长满泰兼后方司令，维持绥远治安。

## 十二、满泰（1927.9——1927.11 护理）

满泰字子舒，土默特旗蒙古族。早年参加同盟会，为“五英雄起义”领导人之一。民国初年，痛感北洋军阀蹂躏绥远人民之苦，曾倡议“绥人治绥”。阎锡山调商震赴前线指挥战事，即令他为后方司令，指挥绥远境内的所有杂牌部队，维护地方秩序。他兼任后方司令不及月余，因代行绥远都统日常工作的冯曦借故跑回山西，地方绅商担心晋军骑四师王英和独立旅陈得胜等部，闯进城里糜烂市面，请他率领李根车旅进驻归绥。旋又拥他为护理都统印，并电请阎锡山备案。

护理都统印满泰，任李正乐为都统署军需课长，张玉戌（张兰田）为政务厅长，阎肃为教育厅长，荣祥为归绥道尹。此外，还把不少地方人士如郑化国等人，聘为都统署参议。但为时仅二十来天，战局发生了变化，奉军师长郭希鹏已经来到绥远。

## 十三、郭希鹏（1927.11——1928.2 代理）

郭字鼎九，辽宁盖县人。早年留学日本骑兵学校。由于晋、奉战争的结局是阎锡山被张作霖打败，郭希鹏以奉军骑兵第十六师师长的身份，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一月，挺进归绥城郊，满泰率领归绥商会人员，把他迎入都统署，捧上绥远都统印后，即率李根车回防包头。

奉军进驻绥远，完全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不住营房，散驻各商铺，毫无纪律可言。

郭希鹏一接任，就把各县知事都换成东北人，除任郭象伋为教育厅长外，各厅厅长、归绥道尹无不更动，都统署的新领导班子，更是清一色的东北人，并以刘震东为绥远警备司令，真是一朝天子一

朝臣。张作霖的政策是“有党皆杀”。绥远的国民党人，除跑到山西者外，都回农村家中或亲朋家中躲藏起来。五族学院被改称“绥远公学”，也引起绥远知识界的恐怖。

这一年的灾情是：“托县瘟疫大作，蔓延城北各乡，死亡七百余人。各县以去岁兵旱两灾严重，民已无力备种，春耕大半停辍。夏复大旱，秋收无望，又成饥岁，灾情严重，救济会集款赈之。”<sup>⑩</sup>次年（民国十七年）二月，奉军归绥道尹刘廷选成立了绥远赈济会，由东北拨运米粮，但因内战方酣，军运繁忙，实无赈济可言。

张作霖对绥远灾情并不关心，着重于紧抓地方武装。在郭希鹏接任之初，就调满泰、王英、刘会文、陈玉甲这绥远四大军头去北京见面。在召见满泰、王英时，要求他俩进攻山西的河曲和偏关，以威胁太原。满泰说：“我带的部队是土旗家乡子弟，他们瞭不见大青山就要哭鼻子，与其到前线影响战事，不如我给大帅看守后方，我是宁愿得罪远亲，也不敢触怒近邻的。我现在不打晋，将来也不反奉……”。王英则毫不犹豫，满口答应。张又要求王英从后套支援十万石军粮，王亦慨然承担。但说：“二十万石也有，只是运输工具困难，还请大帅自己派车去拉才行……”。张作霖见满泰坦诚，王英慷慨，遂扩编晋军骑兵第五师为奉军第三十军，任满泰为军长兼包头镇守使。扩编晋军骑兵第四师为奉军第三十一军，任王英为军长。三十军辖李根车、赵青山、陈得胜、史钦芳等共五个旅。三十一军辖袁占鳌、李三河、王喆（王英之弟）三个旅。张作霖又拨热河的白凤翔、鲍振荣，绥东的郑泽生归王英指挥。结果，王英火烧了准格尔旗护理扎萨克那森达赖的杨家湾，郑泽生等蹂躏了山西的左云、右玉、平鲁、朔县和绥南的托、和、清三县。

张学良接见了刘会文和陈玉甲。他们向张汇报了自己的兵力装备，并表达了葵向张大帅的意愿，张也对他们鼓励几句，扩编刘、陈两部为绥远警备第一、第二两个师，分任刘、陈为师长。在过去，来绥远的历届统治者都很吝啬，甚至还要在四大军头上刮油水。而今，张家父子非常大方，除给每人制做一件量体裁衣的高级军呢斗

篷外,还各赠四万元程仪的交通银行支票,另给满泰迫击炮二门及弹药等,同车返绥。

刘会文部辖三个团,乔全清、马骥、戴茂山任团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农历正月十五,武川县城可可以力更镇办红火。驻在该镇的马团一班士兵,因看红火与县城民团发生冲突,被收缴了武器。刘令马率部去追赔损失。马即于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农历二月初二)攻陷可可以力更,大肆抢劫。劫后,曾任山西省议员的武川西区士绅石良欵和东部士绅梁永芳向刘会文控告马骥,刘不理,又向郭希鹏上告,郭令刘撤办马骥,亦不理。郭不得已,对刘说:“你如有困难,把马骥交给我,我替你处理,”仍不理。于是越发激起武川人民的愤慨,由恨马而移恨于刘。遂公推正在北京上大学的武川县人于存灏为代表,跑到张作霖大元帅府上告刘会文。张作霖不胜震怒,改派汲金纯接任绥远都统。<sup>10</sup>

#### 十四、汲金纯(1928.3—1928.6 在任)

汲字殿一,又字海峰,辽宁海城人。曾任奉系热河区都统,在奉军中以少壮精干著称。张作霖把他派来接任绥远都统,带着白子文一个旅的兵力,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月到职,统治绥远区两个多月。

他上任后,令部队驻在小教场的营房里,出操上课,不准随便进城逛游。派出许多便衣人员侦察一切动态。对郭希鹏安排的人事基本没动。还造访了刘会文和陈玉甲,说了不少鼓励与期待的话,根本不提抢可可以力更的问题。

殊不知汲金纯在来绥前夕,已在张氏父子的幕僚口中,基本上了解到绥远地方部队的一些情况,接任以后,又经都统署留用人员和派出的便衣们反映,进一步摸清了他们的底细。于是汲以调刘、陈两师团长以上主官,届时到都统署开会的谕令,把他们同时诬捕起来,次日释乔,说了一些宽慰的话,令他暂代刘的职务。越日,同时开释戴、云、黄三人,在审讯马骥时,马诬供“刁抢一案是师长给我的口头命令”。因此,刘会文被捕七天,即以“纵兵殃民,蹂躏地

方”的罪名结束了生命。陈玉甲因与奉军中的何丰林是朋友，何求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赵倜（曾任河南督军）说情，把他释放。

国民党军继续北伐，张作霖失败。于六月三日全部撤出关外。汲金纯接到电报，密而不宣，却以“大元帅派员来点验”为名，把小教场营房打扫得一干二净，还另派士绅郭象仪、张玉琮到包头慰劳满泰部的官兵。然后令全军全副武装去火车站迎接点验大员。不料到了火车站一声令下，令部队牵马推炮上了火车，才宣布奉命撤退。只留下军需官一人，与商会、农会结算粮草欠款及借用家具破损赔偿等事，并现款付清。岂知他路过天津时，却派部队包围了绥远平市官钱局驻津办事处，武力劫去白洋和大烟三十万元，这才使绥远人认清了汲金纯都统。<sup>⑭</sup>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五日，商震指挥张荫梧师抢先进入北京。涿州守将傅作义也从张学良的软禁中跑出来，收编了一部直鲁联军，占领了天津。主持国民党北伐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头，在北京会商裁军问题不果。蒋的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任阎锡山为华北警备总司令，张荫梧、傅作义分任平、津二市警备司令。阎锡山一跃而为晋、冀、察、绥四省区及平、津二市的统治者。商震被再任为绥远区都统。

#### 十五、商震（1928.6——1928.9 兼任）

在绥远，汲金纯退走，满泰就从包头带领李根车旅进驻归绥，接管了都统印，维护地方治安。但郭春山、赵青山的人，也进城里安营扎寨，要草要吃，弄得学校停课，商铺关门，市面十分混乱。满泰对他们无力制止。

商震并没有亲自处理绥远政务。因为阎锡山为了表示倚重，同时还让他在保定组织河北省政府。所以绥远都统是兼职，商让他的师长李培基代拆代行。商、李二人的关系，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二人都是河北省人，故在晋系中逐渐形成了冀派，也包括张荫梧在内。

李培基遵照阎锡山的指示整军施政。仍任冯曦为建设厅长。仇



曾诒为财政厅长。祁志厚为教育厅长。裁撤归绥道尹公署和包头镇守使署。任原道尹陈宾寅为民政厅长。夺去满泰的兵权,调为土默特旗总管。任卜兆瑞为归绥警察局长。对绥远地方部队展开了全面的、大刀阔斧的整顿。阎锡山把晋军改称晋绥军,缩编奉军第三十军为晋绥军的一个骑兵旅,留李根车为旅长,拨归晋绥军骑兵第二师郭凤山节制。第三十一军缩编为晋绥军骑兵第四师,仍以王英为师长。使几千名编余官兵,一下流散在社会上,激发了绥远独立队再次发展。

转眼已经是同年(十七年)九月。阎锡山同时发表商震为河北省主席,李培基为绥远省主席。

#### 十六、李培基(1928.9——1928.12 在职)

李字涵础,河北省献县人,二十镇出身。辛亥革命时,因参与滦州起义失败,离开队伍。民国初年跟商震随冯玉祥投奔陕督陆建章,任下级军官,陆被陕人陈树藩驱逐后,随商震依附阎锡山,由团长升任师长。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把热、察、绥三个特别行政区改置为省,都统改称省主席。把察西五县划归绥远省,是为绥东五县。李于同月由代理都统实授绥远省主席,统治绥远四个月。

他在职期间,墨守陈规,唯一的“政绩”则是继续落实在代理都统期间的缩编裁军计划:凡编余的校级以上军官,都要遵时到太原军官教导团受训。

满泰的基本队伍李根车骑兵旅,是一支土默特蒙古武装,不论军历、战绩和军民关系,在绥远地方部队中,都是比较好的。但拨归郭凤山节制后不久,又令缩编为一个团,让晋梅五当了团长。

王英部队的基干,来自其父王同春的保镖打手和哥老会小龙头,下级军官与士兵,则是收编的各股匪夥,素质不好,成分复杂,纪律一向很差,编余一千之众,散落在各处。

郭春山和金宝山住在包头,与郭凤山师长交成了好友,金和郭凤山同纳坤伶梁艳楼姐妹为小妻,成了连襟关系。郭凤山便以老大

哥的口气给二人开窍：“久走冰滩，总有一天会被滑倒的。二老弟已经名利双收，何不趁这缩编的机会，向阎总司令请求不去受训，激流勇退，把兵权抓紧交卸，去北平纳福呢？”阎锡山批准了二人的申请后，他俩便携带历年所抢到的金银细软和家眷，到北平合买一所四合头大院，过起了寓公生活。

原属奉军第三十军的赵青山旅，缩编前已调到集宁驻防。他以追击变兵为名，率领全旅哗变，被众推为“绥远革命军”总司令，呼朋引类，很快便啸聚起四五千人的乌合之众，要向李培基算帐。

然而，在李培基大刀阔斧裁汰绥远地方部队的同时，阎锡山却派人在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二市辖区各地，大量招募新兵入伍，积极扩军备战。特别是在绥远，利用荒年灾民挨饿的有利时机，用吃饱饭吸引不少灾民当了兵。并且出于割据的需要，阎锡山派徐永昌来绥远接替了李培基的省主席。

#### 十七、徐永昌(1929.1——1929.10 在任)

徐字次宸，山西崞县人。幼年家境赤贫，父母死后沦为乞丐，后被毅军姜桂题部军需某收留为勤务兵。清末，新军成立随营学堂，他被选送入学，由于成绩优良，考上北洋陆军大学，结识了革命党人孙岳、续桐溪、王法勤等人。毕业后随孙岳奔走于各军头之间。又结识了唐继尧、熊克武、邓宝珊等人。曾任国民三军孙岳部的师长，晋绥军阎锡山部的第三军军长。他与商震、傅作义都被时人称为晋军三杰。他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一日就任绥远省主席，统治绥远十个月。

阎锡山在派徐永昌主政绥远的同时，调李培基到河北，调商震为山西省主席。由于徐是崞县人，另派五台人王靖国为绥远警备司令，王的一师步兵驻防后套，控制包头以西地区。派赵承绶(五台人)率骑兵驻防集宁，守备绥东五县，对归绥形成左右挟制之势。冯曦则仍任建设厅长，作为徐的监军。

徐永昌面临的绥远局面是：“比岁大旱，田地荒芜，各县局农民苦况，大略相同。匪股不时扰害，其最为民病者，为支应军用草料车

辆。”包头县“农产物各种谷属，往者年可产二十四万五千余石，在匪患期间，人民逃亡，田地荒芜，年仅产四五万石。”自民国十五年，至是延达四年之久，上年冬赈，本年春赈，地方财力已尽……。乃（今）春夏滴雨未落，禾尽枯死。夏秋之交得雨尺余，赶种小糜菜类，而入秋后大雨五日夜，山洪爆发，黄河亦决口，大小河混流，归、托、萨、包、五、临、集、陶、丰、凉十县，悉成泽国。中秋前后，大风不止，俨如寒冬，严霜忽降。于是未被水冲（之）田禾，亦经风吹霜冻，颗粒未收。尤以武、固、和及绥东五县为甚”。全省灾民由民国十五年的六十二万人，增至一百四十余万人。<sup>29</sup>

当时，包括后套及绥东五县在内，全省人口不过二百多万人，却有如此惊人的灾民数字，足见灾情之严重。

是年笔者十周岁，记忆颇清。大人们当时称作“血淋淋的年景”。农村惨景可以用“一不停”、“二普遍”和“四多”、“五不见”概括之。所谓“五不见”，即白天不见烟囱冒烟，也没有鸡叫狗咬的声音；夜间不见点灯的住房，都是黑门黑户；村子里不见一株青枝绿叶的树木；街头不见贪玩的小孩；院子里不见喂养的耕畜。“四多”是：老年人投井上吊自杀的多，青壮年逃荒当土匪的多，卖儿卖女卖老婆的人家多，荒野路侧倒毙的尸体多。男女老少，普遍都是鸠形鹄面，瘦骨支离。谁能吃上一顿糠窝窝，那就是富户了。后卜儿海子（今旅游胜地哈素海）也干涸了，二十里内的人普遍去掏“薄梨梨”吃<sup>30</sup>。农村的大地主却趁火打劫，廉价收买土地，借一还二地放借粮。城市的大奸商粮店，囤积居奇，储粮不卖。绥远省政府并不停止各种苛捐杂税的摊派。是年（民国十八年），还吸取四百二十五万元的征款，上交三百九十九万二千余元用于军费，支持了阎锡山。

当时粮价昂贵，人价烂贱的情况是：小米斗价由上年（民国十七年）的三元五六角，涨到四元以上。白面斤价由上年的二角涨到三角以上，高粮斗价也涨到二元四五角至三元上下。而人价呢？最好的年轻姑娘媳妇能卖一百五六十元，最丑的中年女人能卖五六十元，十多岁的少女约值二三十元，男孩子不受欢迎，十来岁的饿

童约值十来元(以上均指现洋)。

我村有个姜四丑,家穷还吸大烟。先把三儿卖到归绥,再把老婆卖到山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背着四儿走在街心嚎啕大哭,哀声酸楚,闻者揪心,后来把四儿也卖到了包头。长子和二儿年岁较大些,为了吃饭,被招募到晋绥军当了兵,中原大战时死了一个。如此事例,村村都有,不胜枚举。

卖人口,时称“走口里”,以河北特别是山西的口里人来买的最多。有的是买去作为自己的妻室或螟蛉儿女,有的是为兄弟或子侄至亲代买,虽说也都是贫苦人家,但总还算个正经归宿。但妇女如果落在人贩子手里,辗转倒卖,沦为娼妓,其命运就更惨了。

卖人口的集散地是包头、萨拉齐、察素齐、绥远各火车站。经中介人就象牛马桥桥牙子那样,与买卖双方袖口子里捏价成交后,把人送进火车里交给买主。这时候,呼天抢地,喊爹唤娘,生离死别的凄惨叫声,震动整个站台。走者哭,送者哭,正要上车的旅客哭,乞食路过看见了的饥民亦哭。此种情景每天都有。

新来绥远主政的徐永昌,成立了全省的统一赈灾机构——绥远省赈济会,自兼赈济会主席。冯曦、郭象伋及民政、财政、教育各厅长为常务委员。潘秀仁、赵允义被派到天津、沈阳与在北平的绥远人尹光宇,在南京的阎嘉傲和阎伟,同绥远的代表分向各方呼吁求援。并远及香港、南洋群岛等地。

民国十八年三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委员王瑚(字铁珊)来绥远视察灾情。他见赤地千里,荒凉满目,饿殍横野,饥民如蚁,惨绝人寰,返京后大声疾呼,引起国民政府和各慈善团体的关注,华洋义赈会派章元善和美国人艾德敷来绥远设立了分会。中、美两国的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也来绥远设立了分支机构。四月间,京、沪、平、津各报社,组织了新闻界西北灾情视察团,赴察、绥、宁、甘各省访贫问苦。绥远省赈济会出了一本灾情图册和新闻纪录片。八月间,南京国民政府发行救灾公债,给绥远拨了七十七万元,但没有募齐。郭象伋向张学良、万福麟写信求援,也给了赈粮五千七百余石。

赈济会又在大同、丰镇共购买了一万一千吨粮食。都因奉军撤回东北时把许多火车皮拉走，和阎锡山让铁路局把火车控制起来赶军运，以致不能及时运回绥远放赈或平糶。他却让平绥铁路把客货运费都附加一成，作为赈灾款项。并由每天只行驶一次的混合列车中，拨出载重八十吨的两节货车，专给华洋义赈会运粮。后来，徐永昌又向阎锡山要到四辆共八十吨的车皮，作为赈济会的运粮专车。张学良捐赈的粮仅运回一半，赈济会购到的粮一直抢运到第二年春天，费时九个月，运回赈粮和平糶粮共四千九百余吨，不及购到数的一半。

与此同时，实际是由地方人士郭象仪等多人负责的赈济会还规定：1、在本地各机关职员中集资捐赈，办法是凡文武官吏月薪四百元以上者，捐俸一月。二百元至四百元者，捐俸半月。一百元至二百元者，捐俸百分之二十，依次递减。2、为了鼓励捐赈，赈济会发布捐助赈款给奖章程。给奖标准分别是：捐款在一万元至五万元以内者，由赈济会呈请国民政府，分别授予匾额或金质褒章；捐款在五千元至一万元者，由赈济会呈请国民政府给予匾额，赈济会授予一等金质褒章；捐款在一千元至五千元者，由赈济会题给匾额，授予二等金质褒章；捐款在一百元至一千元者，由赈济会分别给予二等金质褒章，和一、二、三、四等不同的银质褒章。3、呈请国民政府中央拨款救急。先给拨下五千元，后来又给拨下以关税担保的赈灾公债七十七万元，但未募齐。4、在各大报纸上广为登载，报道宣传灾情惨状，引起更多人的同情和支助，捐衣捐钱者不乏其人，也给灾民分到一些衣物。5、举行义演活动，募集赈款，这一办法也捐到几千元。但最主要的还是华洋义赈会和红十字会的赈济作用。

以工代赈：1、挖民生渠和李三壕渠。民生渠由磴口起，横贯萨县，东向至托县，全长一百四十五华里，是萨、托二县的主干渠，约用过一万二千多人。2、修筑包(头)宁(夏)公路，也用过约一万多人。上述两大工程都是灾民干的。3、在归绥县境内挖掘了一条由西大黑河起，经百什户、陶卜齐、沙梁子二十多村，至浑津桥入东大

黑河的二十条支渠,共为八十华里。4、批准修复常黑赖、北园子、帐房及铁帽等村被水冲坏的堤坝……。

然而,由于全省各县都是重灾区,被灾人数太多,经手赈济人员又从中私饱,故难收到完全回生之效。而且连各县灾民人数、饿死人数、逃荒人数和卖出人口人数,省政府和各县都没有一个较精确的调查统计数字,足见当时的绥远统治者,对于赈济工作的漠视程度了。又因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倒蒋(介石)。阎把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派李培基再次来绥远主政。

#### 十八、李培基(1929.10——1931.8再任)

阎锡山自从当上华北警备总司令,主宰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二市以后,就积极为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作准备,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春,已由原有的十旅人扩充到十四个军,共辖十七个师的兵力。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调整了晋、冀、绥三省主席,李培基再次统治绥远二十个月。

阎、冯倒蒋的中原大战,从民国十九年(1930年)四月打响,双方动员了一百万军队,在山东、河南一带各倾全力厮杀。这是民国时期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军阀大混战。阎任赵承绶为骑兵总司令,率部开往河南指挥战事。他路过大同时,顺手把满泰部当团长的史钦芳并调驻卧虎湾整训的一团老一团的人,全部缴械遣散。调王靖国的晋绥军第三十七师也投入中原大战。绥远警备司令一职,让骑二师师长郭凤山代理。委王英为赵承绶的副司令,随军到河南前线效力,实际是把他软禁起来。

这时候,萨县里素村的陈国英,在老家玻璃圪沁村成立起“蒋记”国民党的绥远省政府,自任省主席,向南京通电就取。并联络给王英当过旅长的袁占鳌,和当过连长的杨耀峰,啸聚成军,驻扎在红岱各村,准备攻取绥远城赶跑李培基。不料消息泄漏,代警备司令郭凤山,立刻在新旧两城戒严,派兵把袁、杨的乌合之众驱赶到河西一带,陈国英也到天津躲藏起来。

同年,李培基成立了绥远通志馆。任郭象仪为馆长,荣祥为编

纂。他们组织人员,经过几年的努力,写成《绥远通志稿》巨著,成为绥远的一部地方志珍贵文献。

他还设置了沃野设置局,派托县人刘继尧为局长。把马福祥利用职权强霸走的绥远鄂托克旗的陶葫芦滩十六段地,重新划了过来。

在补助绥远教育经费的幌子下,公开种植鸦片,为阎锡山广开搜刮军费开支的财源,不惜毒害绥远人民。包头二中学生王绥之,自办不定期《炸弹》刊物,著文指斥他祸绥毒民,苛政自肥的劣绩。他令警察局径到二中搜捕王绥之,王在校长贾武先生庇护下逃脱。教育厅给该校下达了直接开除王绥之学籍的训令。但贾武校长还是让王绥之悄悄随班念完初中,并发给毕业文凭。<sup>⑨</sup>

中原大战的结果,由于张学良支持蒋介石,指挥东北军入关,阎、冯失败。蒋令张全权整顿晋绥军。张学良把晋绥军十四个军,缩编为第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共四个军,依次任商震、杨爱源、徐永昌、傅作义为军长。

张学良与傅作义曾在涿州打过近百日的攻防战,张很赏识傅的作战才能,故在这次缩编晋绥军时,对他十分青睐,决定傅作义为绥远省主席。

#### 十九、傅作义(1931.8—1947.1 在任)

张学良向南京国民政府推荐傅作义接任绥远省主席,由于李培基、王靖国、赵承绶、商震等多方掣肘,一直拖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年底,傅作义方由代理正式接印视事。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1895年6月27日(农历五月初五)生于富有家庭。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阎锡山的中下级军官。涿州守城战一举成名。他带来的四十三师仅辖五个团,后来改称七十三师。他以三十五军军长兼师长,也只有两旅人的兵力。除了这些中下级军干部,没有一个县、区级基层行政干部。他的干部政策是“家生的马驹子不离槽”(傅语),要由自己从小培养。张学良给他派来鲍竹荪、郑道儒分任民政、财政厅长,推荐李大超、李英

夫、苏开元、孟文仲这些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让他量才使用。他接任一个月头上，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迫于形势，任阎锡山为晋绥绥靖主任，以表示捐弃前嫌，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愿望。因此，傅作义又回到阎锡山的节制之下。

阎锡山反省了反蒋失败的原因，认为是经济不行，决定从经济建设抓起，制定“山西省政府十年规划”，要工业山西，农业绥远，特别让绥远要比过去大种鸦片，用罚款禁烟的手段征收烟税，以发展山西的工业。并令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出兵，把蒋介石委任的东北义勇军总司令王英，驱逐出后套。没收了他在后套从其父王同春手里继承的遗产——土地、渠道、牛具。把晋绥军编余的官兵组成屯垦队和军官屯垦队。自兼屯垦督办，令王靖国兼会办，王的旅长田綉章为坐办（后派田树梅接任）。在包头设立督办公署，由会办代行督办事权。

傅作义接任伊始，见“潘赵派”地方势力迅速膨胀，采取团结、使用各派人士的办法，把阎锡山指派的和王靖国、赵承绶推荐的县局长逐渐顶替。其中集宁人樊库，萨县人马定国、张登鳌，丰镇人陈国桢、郭良田，托县人刘继尧等，都陆续分别荐任为陶林、东胜、安北各县局长，几占绥远县局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当时都是“祁焦派”和“绥东派”的骨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秋，傅作义出巡兴和、集宁、丰镇、凉城、萨拉齐五县，访问民间疾苦。同年，傅作义举办了绥远省区长训练班，招考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知识青年，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分配到各县局任科员或下乡当区长。因为自民元以来，绥远农村的基层政权，都操在乡绅土豪手中，傅在巡视以后，决心把豪绅特权收归己有，便开设训练班这一机构，专门培养能贯彻省令的区级干部。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二月二十一日，日军纠集十万之众进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十天之内全省沦陷。日军又向长城各口猛攻，威胁北平。宋哲元、孙殿英、庞炳勋、商震以及关麟征、



黄杰等部奋起抵抗，时称长城抗战。傅作义主动请缨，经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批准，以所部六个团为主力，组成华北第五十九军，开往怀柔一线参战。他亲自指挥，粉碎了敌人占据怀柔以西高地，直陷北平的狂妄企图。

然而，就在傅作义长城抗战，由冯曦代理省主席期间，“祁焦”、“绥东”、“于派”各派联合起来，共推张钦为盟主，鼓动一中、中山学院和师范学校的学生，掀起学潮，砸了绥远省党部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潘秀仁的摊子。傅回到绥远后，召见张钦，垂询挑起学潮的原因后说：“如果再闹，不管是谁，我就认为他是针对我闹事来对待。”学潮因而平息。之后一个时期，傅自兼教育厅长，把被学生撵出来的师范校长刘汉亲自送回学校，开除了一些带头闹学潮的学生，派省政府参议周钧和科长于纯斋，分别代理中山学院和一中校长。又起用各派一些待业人员，分别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就连被赶下台的潘秀仁，也从南京叫回来让当了绥远县政研究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为傅兼任）。总之，利用他的省主席权力，逐渐把绥远地方各派吸引到自己身边，作为依靠力量的一部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秋，傅作义筹办绥远省乡村建设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任屠义源为副委员长兼总干事。先后办了四期，培养出一千二百多名乡村建设指导员（简称乡导员），分配到全省各乡村，清查户口，登记牛羊，核查土地，禁烟（但不禁种）禁赌，建立自卫队，并择优选送归绥集训，发给武器，名曰“绥远防共常备队”。旋又改称绥远省国民兵。任袁庆曾、李大超为正副司令，征绥远壮丁共训了三期（第四期因“七七事变”爆发停征），组成六个团，作为三十五军的后备部队。并另设三十五军干部训练班，招考知识青年经过短期训练，分别给予少、中尉级军衔，充任下级军官。旋以日寇侵华日急，察北沦陷，故在旧城修筑了名曰环城马路，实为省防工事，藉以备战。

民国二十三年腊月末，亦即1935年1月12日，蒋介石电令傅作义协同晋、察、陕三省会剿土匪杨猴小。调动王靖国、赵承绶全部

兵力和他的两旅人马，把杨匪所部赶到陕北，被榆林井岳秀部的张云衢营，在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击毙于靖边县的九里滩。

此外，先后建立九一八纪念堂、五十九军烈士公园、绥远毛织厂、绥远饭店。并重视教育，关心学生。他讲话时教导青年说：“过去的读书是为了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今天的读书是为国家、为民族。”只要有南京政府的要员到绥远，他总领上去学校参观。因此，他在绥远青年学生心目中，为自己树立起慈祥可亲的形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四月二十四日，南京国民政府批准了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公布了蒙政会的组织大纲。所谓蒙政会，对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来说，是走向独立的台阶和向日本讨价还价的资本。于是德王利用此一合法招牌，跑到绥远的百灵庙搞起了自治。土默特旗的一些人士，和老一团被遣散的部分官兵，也陆续跑到百灵庙参加了蒙政会。

同年五月十二日，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其王府——锡盟苏尼特右旗嘉卜寺，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改元易帜，公然叛国。以乌兰夫为首的共产党人，和以傅作义为代表的南京政府，都加紧了策反工作的进程。傅把蒙藏委员会蒙政处处长巴文俊从南京叫回来，让土旗人做土旗人的工作。巴与百灵庙蒙政会保安大队长云继先，以及任秉钧、朱实夫、苏鲁岱等面商后，傅作义接见了云、朱二人，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暴动计划。当场与省政府秘书长曾厚载，三十五军旅长金中和商定了举事日期为二月二十一日，届时金即率领汽车队到百灵庙附近地区，接应暴动队伍。出于保密的考虑，还规定临时碰头地点为住在席力图召院内的前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家中。并发给云继先密电本，以资联络。

保安队广大官兵，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反对德王投靠日本。在暴动成功后，由云继先率领，踏着没膝深雪，于次日到达百灵庙南120华里的二份子村和岔岔村休息时，却被傅部421团孙兰峰部层层包围，并劝令交出枪械。云继先以大局为重，说服了愤怒的官

兵把枪栓卸下交了械。然后乘汽车到达前山，被分驻于萨县的水洞沟门村和归绥县的三两村两地，分别给以“萨拉齐县蒙旗防共大队”和“归绥县蒙旗防共大队”的临时番号。云继先、任秉钧、苏鲁岱、康济民等联名发出通电，向全国表明脱离德王，参加抗日的爱国决心。之后，经过交涉，傅作义虽然把枪支发还了，但仍处处加以克制，把每班十二人的编制，压缩为九人。南京政府经他转发的月薪一万元，实发九千五百元上下。扣发被服粮秣及其他军用物资供应。有时还派人到部队讲话，说些挑拨的言语。同时因云继先挪用南京政府发下的五千元买马费买了白面，惹起官兵的不满。德王密派专人与潜伏在部队里的亲信章文锦取得联系，煽风点火，遂于同年九月下旬，鼓噪哗变，云继先当场殉职。哗变官兵随章文锦拉到后山，被傅作义派出装甲汽车队追击歼灭。后来乌兰夫同志和白海风诸人重新组建蒙古部队，蒋介石给予蒙古保安总队的番号，傅把他改称蒙旗保安总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八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来绥，胁迫傅作义签订《防共协定》，被傅断然拒绝。但自日本侵略军于民国二十五年春唆使伪蒙古军侵占了察北六县后，又收罗民族败类于志谦、王道一、王英等，相继组成伪边防自治军、伪西北防共自治军、伪大汉义军，麇集察北地区，以红格尔图和百灵庙为据点，妄图侵占绥远，进而侵占甘、宁、新三省边界。德穆楚克栋鲁普于是年十一月五日，向傅发来宣战性通电，傅于八日复电斥其投敌卖国。同月十五日，傅作义指挥彭毓斌骑兵师、董其武旅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激战至十八日上午，敌伪败溃，收复了红格尔图。傅即乘胜再进，立调孙长胜、孙兰峰两旅向百灵庙进兵，于二十三日夜发起猛攻，激战至翌日上午九时，守敌大部被歼，取得收复百灵庙的胜利，继而打退增援之敌，收复了日伪盘踞的另一据点——大庙。共缴获白面二万余袋，枪支弹药无数，并有伪旅长石玉山、安华亭、金宪章、王子修等处死日本指导官二十余人，先后率部反正。

傅作义在十天之内连克红格尔图和百灵庙、大庙三座战略要

地,沉重打击了日寇的疯狂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挑起“芦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傅作义被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命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三十五军、十三军、六十八师、骑二师、八十三师和刘汝明部,担任平绥铁路线之防御。旋因战局逆转,奉命撤退到怀仁、朔县、山阴,傅的总部驻节阳明堡。这时候,在归绥市的省银行平市官钱局副局长陈善教与王漳等人,用汽车将该局储备金白银二十一万两,银币八十四万元,以及大批烟土等由归绥市押运阳明堡。车队行抵左云县时,接到左云县政府转来傅的急电:“十万火急,限即刻即到。派人沿途询找绥远省政府送硬币车,火速折回。”为了沿途安全,傅调孙长胜旅护送。傅当时对人说:“这是绥远地方的钱,我给绥远没做什么事,这钱应再送回绥远去。”

傅作义离绥后,令民政厅长兼归绥市警察局长和国民兵司令袁庆曾代理省主席。但赵承绶也率他的骑兵部队到来,自称接任绥远省主席,布告安民。建设厅长冯曦等官僚政客,过黄河逃回山西。国民兵副司令李大超想乘机自创局面,率一部国民兵撤到包头。袁亦于九月中旬率一部“国民兵”及省政府职员、市警察局警官警兵撤离归绥去找傅作义。致使绥远形势乱成一团。

绥远地方各派士绅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走到一起。张钦、潘秀仁、于存灏、陈国英等人,成立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总指挥部,把各县地方团队组成下属四个路(后发展为八个路,极盛时期约有一万骑兵),并号召男女老少积极参加抗日,自己保卫家乡。旋因战局进一步恶化,赵承绶也率部跑回山西。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在敌机扫射下退到包头,敌机跟踪轰炸,城乡人民惊慌不安。各部互相拧枪下马,扩充自己的实力,社会秩序越发混乱。

马占山在李大超的擘划下,在包头召集所有各部队首长如蒙旗独立旅旅长白海风、自卫军副总指挥于存灏,骑七师师长门炳岳(未到)等人开会,组成绥远军政委员会,共推马为委员长代行省主

席职权，然后回军归绥，布告安民，铡了两个汉奸，组织了大黑河阻击战。

十月十三日，马占山为保存有生力量，下令西撤。次日，以贺秉温为首的归绥“临时维持会”把日军迎接入城，归绥宣告沦落。敌人继续西进，占领了萨拉齐和包头。包头沦陷前夕，各部队和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纷纷向伊盟和后套逃奔，沿途混乱，地方糜烂。日机且临空轰炸，低飞扫射，死难男女不可数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傅作义部经历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所部减员太多，将袁庆曾带去的绥远省政府官吏、绥远省防军国民兵、归绥市警察作补充，旋又去守山西省会太原城。太原突围后，退到山西的中阳县。十二月，蒋介石任命傅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绥远省主席一职仍未易人。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傅作义让绥远士绅白映星、赵厉师、赵淑普与省政府秘书长曾厚载随行，指挥三十五军经兴县、保德、河曲、偏关挺进绥境，收复清水河、和林格尔两县城。之后，撤到河曲整训。在共产党帮助下，动员了三千名新兵补充伤亡，建立军、师、旅、团、营、连各级政治部组织，重振三十五军。

同年秋冬之交，傅作义出席了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他回军后套，并组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次年三月，他由河曲率部经伊盟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回到绥远省河套地区。他从蒋、阎矛盾的夹缝中跳出阎锡山的手心，直接与蒋介石挂上钩，晋绥分了家。但又开始了他与蒋的新的矛盾。他在国民党党政军团一元化领导体制下，提出了“为整体”这一口号，要求各级干部都服从于以他为中心的整体之下，把中下级干部逐渐绥远籍贯化，以抵制蒋介石的控制，从而形成了“傅系”。

蒋介石拨归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的部队，计有傅作义的嫡系三十五军所辖一〇一师、新三十一师、新三十二师和一个炮兵团。中央军骑七师，宁夏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马彦的骑兵旅，五临警备旅（由屯垦队改编而成），绥远游击军的两个步兵旅（由李

大超带去的国民兵改编而成),绥远民众自卫军和骑三师、新骑四师、新五旅、新六旅、新三师(白海风部)。总计约有三万多人,能参战者不到两万人,分驻五原、临河、陕坝、乌不浪口、西山咀、蓿亥滩、马七渡口各地区及游击于归绥县以西一带。

同年十二月,日军南犯长沙,傅作义奉命牵制敌人。他先以“攻而示之守”的策略麻痹日军,继即再令扎根于大青山的自卫军第三第四两路官兵,破坏归绥至萨拉齐间的铁路和归武、武固间的各条公路,以迟滞敌人军运。他指挥新三十二师、新三十一师、一〇一师及五临警备旅各部,长途奔袭包头。于二十日凌晨五时摸进城里,与日军巷战两昼夜,完成了牵制任务,于二十二日拂晓全部撤向后套。此役,计击毙击伤日军千余人,敌骑兵十三和十四联队长均被打死,还击毁敌军坦克三辆,汽车百余辆,缴获大批辎重弹药。

民国二十九年农历正月初(1940年2月2日),日军由黑田师团长指挥小岛旅团、伪蒙古军两个师。伪防共自治军三个师共约两万之众,分南北两路进犯后套。傅作义实行空室清野,避实就虚,且战且退,把副司令长官部撤进伊盟沙漠里的圣纳格尔庙隐蔽,让文职人员和军政干部家属向宁夏转移,令各团独立自主打游击,致使日军找不到他的主力,会战计划落空,只好经五原、临河、陕坝、百川堡转了一圈撤回包头。留伪防共自治军王英部和伪蒙古军一部驻扎后套,由日本皇族退休军人水川一夫中将任绥西警备司令,与特务机关数百人监视之,并收缩兵力于五原。

傅作义利用黄河解冻,渠水横流,道路翻浆,后套一片沼泽,机械化部队不能行驶的条件,组织了反攻五原战役。同年三月二十日子夜战斗打响,激战至翌日晚获得全胜。除伪司令王英和极少数伪军幸逃至西山咀外,守城日伪军绝大多数被歼。水川一夫突出包围圈逃到安北县境内,被该县地方团队连长张汉山打死。

五原大捷以后,傅作义在后套立脚已稳,为抗日加紧整军建政。蒋介石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给他增编一个暂三军和骑四军的番号,提升孙兰峰和董其武为军长。

由于宁夏是后套的后方，且为重庆补给傅部一切供应的运输要路，须要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支持。傅把绥远的沃野设置局撤销，承认了马福祥霸占陶葫芦滩为该省陶乐县的合法地位。另设达拉特旗组训处和桃力民办事处，作为设县的先代机构。同时，在整顿了后套的金融以后，把副司令长官部分设在银川、兰州、天水、西安、重庆的办事处连成一条线，作为中转站，用汽车队往返经商，王国英专司其事。日本投降后，又把它发展到香港办事处。

民国三十年(1941年)四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同年秋，傅作义实行新县制，把后套划为安北、宴江、狼山、米仓、临河、五原六个县，取消了区一级政权，由省政府直接任免乡长。当时后套人口为二十八万人(包括军、政干部、家属及蒙民七千六百四十八人在内)。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适龄壮丁为四万八千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开始征兵，先后训练四期为三万六千人<sup>⑩</sup>。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特任傅作义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并指定为绥、察、热三省受降官。紧接着一份电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傅即连夜组织返绥先头官员及部署部队东进，已在敌占区活动的鄂友三、王有功、郭长清、乔汉魁等部配合接收。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冬，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留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自兼察哈尔省主席，后被蒋介石委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解放军于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发动战略反攻，直打得蒋介石三军糜溃，傅作义四面楚歌。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傅部所属一〇四军安春山部被歼于怀来山区。二十二日，三十五军郭景云部覆没于新保安。二十四日，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的孙兰峰十一兵团及一〇五军袁庆荣部被解决于张家口。三大主力嫡系在十二天之内全部输光，并丢了天津，最后才在党的统战政策威力感召下，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二十、董其武(1947.1——1949.9 在任)

董为山西河津人，与傅是晋南老乡。幼年曾在太原陆军小学读书。北伐时期，担任归李济琛指挥下的某部团长。北伐胜利后，部队被裁编，他奔波于上海各地寻找出路。时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遂往投效，委以参谋处上尉职衔。但他不嫌官小，勤奋工作，逐渐被傅赏识，提升为少校参谋。中原大战时，他曾向傅提出阎、冯必败的预言。之后，历任傅部团、旅、师、军长，绥远省主席，华北“剿总”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等要职。他和孙兰峰将军一直是傅系军界两大台柱。是一位工作踏实，任劳任怨，不要花架子，没有吃喝嫖赌恶习的旧军人，与傅氏始终同进退。主持绥政三年，唯一的政绩是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在绥远能于国民党特务、顽固派包围和威胁利诱下，委屈求全，忍辱负重，时机成熟后，毅然决然的领导了绥远“九一九”起义。

### 结束语

自民国元年(1912年)迄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之间，苦难的绥远各族人民，就是在如上所说的历届执政者主宰其命运的魔梦中活过来的。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北洋军阀集团和国民党反动政府，都是造成各种灾祸的根源。今天，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拥护党，听党的话，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明天将会更美好。但因笔者水平有限，本文所述历任将军、都统、主席的主绥政绩(包括正反两面的)，只是概略的和主要的，挂一漏万之处所在不少。而且不确与某些重大遗误，也当必多。为此，吁请知情者予以补正。

---

### 注释：

①、⑧、⑩、⑬，均引自《绥远通志稿》卷 29《灾异志》。

②张绍曾后任北洋政府陆军总监，陆军总长等职。1923年，被选为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后因主张南北统一，和欢迎孙中山进京，被迫辞职。1928年，遇刺身死。

③王定圻的尸体，被他的表弟张煥亭和他的学生王文炳等运回包头，安葬于刘宝窑子祖莹。民国十四年，他的学生李蔚沫、于致仁、张文元等数人给



立了烈士碑。北伐胜利后，所谓国民党的绥远当政者，谁也没有理睬这位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后事。

④高石秀又名高士修、高志清。红军到达陕北后，阎锡山怕他趁机起来“捣乱”，把他软禁于太原。“七七事变”后释放，被邓宝珊聘为晋陕绥边区挺进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日本投降前夕，病死于榆林。

⑤见蒋雁行给冯国璋的信稿(现存内蒙古图书馆)。

⑥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五辑。

⑦见北洋政府参谋本部派出的调查员胡大才上蒋雁行条陈稿(现存内蒙古图书馆)。

⑧“三凶四害”：据传，马福祥统治绥远时，赖“三凶四害”苦害百姓，这七人中，除余鼎铭、李春秀、董仲三外都已佚名。

⑨郭希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国民党绥东骑兵司令的职衔，率领部队深入绥远、察哈尔敌占区打击日寇，转战经年。时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在欢迎他胜利归来的群众大会上，称赞他是“白手起家，建军抗日”的民族英雄。后被胡宗南改编为骑兵军，任军长。解放后，任辽宁省参事室副主任，政协辽宁省常委，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⑩汉金纯：“九一八事变”后，当了汉奸(伪职不详)，日本投降后被依法镇压。

⑪蕨梨梨：是芦苇根部的茎块，黑皮白肉，最大的如雀蛋，无毒可食。

⑫王煥之：包头人。中学生时期，曾一度被选为绥远学生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绥远的国民党特务说他是“共党分子”，从陕坝送到西安坐牢。日本投降后任《包头日报》社长。解放后在镇反时期，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后因念他在学生会主席任内，对革命有过某些好处，改判有期徒刑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民革包头市负责人，政协东河区常委。后病死。

⑬人口数字见《内蒙古参事》第三辑页137及页143。

## 1934年蒋介石归绥之行

白燎原

1933年热河沦陷以后,随着寇氛西进,察绥地区的局势日渐紧张。1934年秋,为加强西北、华北地区的统治和推进“新生活运动”的开展,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到陕、甘、宁、察、绥各省视察。途中因身体不适,便于10月25日抵达北平,在协和医院检查身体。绥远省当局闻讯,电请蒋赴绥视察。成立不久的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亦由委员长云王(即云端旺楚克)、秘书长德王(即德穆楚克称栋鲁普)联名致电,邀请蒋莅蒙指导。10月31日蒋派北平军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委员萧振瀛作为自己的代表,携带自己的亲笔信和赠送云王、德王的肖像各一份、杭绸20匹及金丝猴皮袄等礼物,去面见云、德二王,宣达委员长“眷念蒙古之意”,并请云王、德王赴归绥相见。

11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及秘书长杨永泰、侍卫长宣铁吾、顾问端纳、铁道部次长钱宗泽、平绥铁路局长沈昌一行乘专车离开北平,由平绥铁路西行。次日上午抵张家口,并乘汽车到张北视察。5日,在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等人的陪同下离开张家口西行。6日晨经过大同,骑兵司令赵承绶、第六十八师师长李服膺亦上车陪同。下午2时行抵平地泉站(即集宁),受到前来恭迎的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省党部委员陈国英、省监察委员纪守光、第二百一十一旅旅长金中和及当地各团体代表、各学校学生的热烈欢迎。随后傅作义、陈国英、纪守光、金中和等亦上车,陪同蒋前往归绥。

晚8时20分专车进站。届时,站台上警察、宪兵各一队,步兵一连,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而前来欢迎的地方党政军大员及各界代表五百余人,早已胸前佩带省政府发给的专门标记,列队伫

立，恭候多时了。内有当天下午抵达的蒙政会委员长云王、秘书长德王、萧振瀛和四子王潘德恭察布、蒙政会财委会主任包悦卿、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建设厅长冯曦、民政厅长袁庆曾、省党部委员潘秀仁、赵允义、乔秉华、张守俭、省府秘书长曾厚载、垦务督办石华严、财政厅长苏体仁的代表许庆云、教育厅长阎伟的代表阎肃、塞北关监督张秀升、稽查处总办李居义、会办张钦、推进盟旗党部经天禄、张遐民、牛进禄、土默特旗总管荣祥、高等法院院长李钟翘、地方法院院长严启昆、省农会温廷相、省教育会樊库、地方自治促进会张淑良、市商会贺秉温、骑一旅旅长孙长胜、炮兵第二十一团团团长李柏庆、宪兵司令张家诒、第二百一十八旅旅长曾延毅、第三十五军参谋长陈炳谦、第七十三师参谋长苗玉田、蒙古旅行团团团长李才桂、包头蒙藏分校主任张莅庄、归绥市妇女会代表王素卿及归绥市县党部、新闻记者联合会、各机关团体、各学校、各同业公会、各民众组织的代表。

专车一进站，第三十五军参谋处长李英夫喊敬礼口令，同时鸣礼炮21响，奏欢迎乐。车停后，傅作义、陈国英、纪守光及赵承绶等地方长官先下车，然后蒋介石等下车与欢迎者见面。蒋氏身着黄呢军服，腰佩短剑，在傅作义的引导下首先与云、德二王相见，并对其远道来迎表示谢意。然后在傅作义的介绍下，依次与其他欢迎者见面。随后，蒋氏在傅作义等地方大员的陪同下，率随行人员出站，并向欢迎民众及学生致意，乘汽车赴设在公教医院（今内蒙古测绘局大楼处）的行辕休息。沿途有陆军密布哨位，警宪加岗，另有自行车队往来梭巡，戒备极为严密。马路两旁有各中小学校学生及童子军等列队欢迎。在行辕稍事休息后，蒋氏即乘车返回车站，登专车就寝。

次日（11月7日）蒋介石开始正式视察，全天活动安排紧密，忙碌异常。上午9时至11时30分在公教医院行辕会客，先后接见了中央蒙藏学校包头分校主任张莅庄、萨拉齐县民生渠水利公会工程所主任王仰曾、云德二王、中央军校学生张启祥、四子王潘德

恭察布、省监察委员纪守光、推进盟旗党部贺云章等人。其中与云、德二王晤谈时间最长，云、德二王除向蒋说明内蒙处境之恶劣及提倡自治之真意外，还请蒋设法寻找在北平失踪的蒙政会科长韩凤麟。蒋一面称赞云王德高望重，勉励德王加意辅佐，一面允诺设法寻找失踪者和返京后尽快给蒙政会拨发经费。会谈时有萧振瀛作陪，包悦卿翻译，并摄影留念。11时30分，蒋由傅作义陪同赴抗战烈士陵园巡视，并与傅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合影。

午间蒋回专车用餐，绥远省政府则宴请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与蒋的秘书长杨永泰、顾问端纳等。

午后2时，蒋介石率杨永泰、宣铁吾等随员，在傅作义、宋哲元、赵承绶、王靖国、李服膺等人的陪同下由公教医院行辕乘汽车驶抵小校场（今内蒙古医学院一带）第三十五军联欢社训话。绥远省党政军首脑及各机关公务人员和连级以上军官五百余人到会听训，萧振瀛、云王、德王及四子王潘德恭察布、包悦卿等人亦出席。在军乐声中，蒋氏登上主席台，由傅作义作简略致词后，开始训话，蒋氏训话毕，德王致词。

散会后，蒋氏偕夫人宋美龄开始在市內巡视。在极为严密的戒备下，首先参观新建不久的绥远毛织厂。蒋由傅作义陪同，宋美龄由傅作义的夫人刘芸生陪同，分乘两辆汽车。杨永泰、宋哲元等另乘一辆随行。在绥远毛织厂，建设厅厅长冯曦陪同参观并介绍该厂情况。蒋对该厂颇为赞赏，不仅频频拍照，还当即允诺回南京后即派员来绥指导，并拨款资助。宋美龄亦兴趣十足地询问厂内组织情形和资本额数等。其后，蒋氏等又到席力图召游览，受到喇嘛们的列队奏乐欢迎。蒋氏夸赞召内建筑精美，并当场捐助该召大洋二百元。游览毕，蒋氏等一行又驱车至新城参观绥远农林试验场。在那里，一一验看了为筹备绥远省第五届农产比赛会而征集的各种农产品，大为赞赏，当即勉励傅作义、冯曦等以后要更加注重农业，要推广并改良籽种，以增加产量。

由傅作义夫人刘芸生等人陪同，宋美龄在公教医院行辕举行

茶话会，召见当地外籍传教士葛崇礼主教（比利时人），教士翎冠盔、钮孟，司铎穆清海、穆清和、蓝广济、郎爱礼等多人。席间宋美龄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了“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及开展经过。她还当场捐款千元，作为筹办绥远女子新运会的开办经费，指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女师教师蒋恩钿、卜效夏及外籍女教士数人负责筹备，以切实开展女子放足、戒烟等工作。

5时，在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等人的陪同下，蒋介石偕宋美龄及杨永泰、宋哲元等乘车驶抵大马路南的赛马场，观看由绥远省建设厅特地为蒋筹备的临时赛马会。赛场内外由军警宪派队设岗。各中小学校男女学生及童子军亦列队到场助兴。蒋氏偕夫人宋美龄在东面看台就座。5时5分，在二百一十八旅旅长曾延毅的指挥下比赛开始。比赛全程共三华里，参赛的马共40匹，均来自本市附近。经过分组初赛及决赛的激烈竞争，12岁的贫家孩童李满红以2分35秒的成绩赢得第一名。当建设厅长冯曦领着乘马的李满红至看台下向蒋氏夫妇脱帽致敬时，蒋氏夫妇极为高兴，谦和的询问李满红的姓名、年龄及是否读书。当得知李满红因家贫未能上学时，蒋氏嘱咐他日后一定要读书，有困难可找省主席傅作义解决。蒋氏令傅作义赏给参赛骑师们大洋500元，其中第一名50元、第二名40元、第三名30元，其余由各骑师均分。宋美龄在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和女师教员蒋恩钿女士的陪同下先回车站专车休息。蒋氏则由傅作义陪同，检阅各校学生后，乘车返回公教医院行辕休息，等候宴请云王、德王。

当晚7时，宴会开始。云王、德王及萧振瀛、四子王潘德恭察布、包悦卿、土默特总管荣祥等出席，宋哲元、傅作义、赵承绶、李服膺、沈昌等作陪。席间，蒋氏与云、德二王详谈蒙古问题，指示蒙政会发展畜牧，并电令中央防疫处往百灵庙运送血清。还要求蒙政会保送学生入中央军事学校，中央将予以特别优待。宴罢，蒋氏赶回专车就寝，准备次日离绥赴太原视察。秘书长杨永泰则率领大部分随员于午夜另乘专车先赴山西，宋哲元、赵承绶、李服膺等同行。

这天，正在包头拍摄影片的中国电影联合制片公司经理王元龙等一行六人，亦闻讯赶到归绥拍摄蒋氏莅绥的新闻影片，他们上午曾在省政府为云王、德王摄影，下午又赶到赛马场地拍摄比赛盛况。

11月8日上午9时，蒋氏在专车内传见绥远省建设厅长冯曦、民政厅长袁庆曾、省府秘书长曾厚载等，垂询绥远政况。10时，传见省党委赵允义、陈国英、潘秀仁、乔秉华等，详细了解绥远党务工作的情况，会谈约40分钟。

这时，在绥远省当局的布置下，从车站到机场，沿途岗哨密布，机场附近环列马步哨，戒备森严。全市一律悬挂彩旗，以示欢送，奉命前来欢送的各机关团体、各学校学生和各镇商民早已在新城东门外娘娘庙附近的机场（大约在今新华印刷厂一带）等候多时了。云王、德王、四子王潘德恭察布、萧振瀛、包悦卿、沈昌、张恺、冯曦、袁庆曾、陈国英、潘秀仁、赵允义、张守俭、乔秉华、曾厚载、石华严、陈炳谦、苗玉田、张家谥、曾延毅、金中和、孙长胜、李柏庆、张秀升、李居义、荣祥、李钟翘、严启昆等各界要人及省农会温廷相、陈光祖、省教育会樊库、李森、商联会乔保元、市商会贺秉温、新闻记者联合会惠聘之、市妇女会王素卿等亦先后到场候送。

当从北平和太原前来迎接蒋介石一行的欧亚航空公司德阿奔一号机和福特机先后降落后，前来欢送的各军事高级官员们面朝北排列在机场口路南，云王、德王及各党团机关首脑、各团体代表面朝东排列在路南，各校学生及商民排列在机场东面，场口北面为军乐队、步兵、宪兵和警察等，整个欢送队伍环绕成一个半圆形。看热闹的群众则远远地站在东门外城墙下观看。据估计，前来欢送的人超过万数。

大约12时许，蒋介石一行乘车前往机场，临行前允诺回京后拨款五万元，作为绥远省设立牧畜学校的开办费，以后每月由中央拨发经常费二万元。并犒赏负责保卫的军队、宪兵大洋一万元，警察五百元。当宋美龄与傅作义夫人刘芸生、蒋氏与傅作义、王靖国

分乘两辆汽车，在卫兵乘坐的前导车的带领下抵达机场口时，礼炮一鸣，全体敬礼。蒋介石下车举手答礼。他首先到云王、德王面前话别，感谢他们远道迎送的盛意，嘱咐他们返回百灵庙后代为安慰蒙众，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并令萧振瀛护送两王返蒙。然后，在傅作义的引导下，蒋氏依次到各界欢送者面前频频示谢，并由西边折而向北，巡阅军警宪。最后，与夫人及傅作义、宋哲元、王靖国等一同登上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其他随员则进入福特机。12时20分，飞机徐徐发动。这时军乐大作，礼炮轰鸣，同时各校学生和商民高呼“欢送蒋委员长，拥护革命领袖”的口号，整个机场一片沸腾，气氛达到高潮。但见机窗里蒋氏手持白色手帕，向欢送人群频频摇动示谢，全场人众亦一致还礼。少顷，飞机升上空中，向东飞去。至此，轰动一时的蒋委员长视察终于圆满结束，连日来提心吊胆，精神紧张的绥远军政大员和疲于应付的各界群众亦如释重负，重新感觉到往日的轻松。

---

#### 参考文献

1934年11月上旬《绥远民国日报》、《绥远社会日报》的有关报道，《新蒙古月刊》第3卷1期第82页“蒋委员长在绥远与云德二王会晤”，《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3辑“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第13页，卓宏谋（四版增订）《蒙古鉴》“蒋委员长视察西北各省后感言”。

# 醇厚社与三元成

——归化城最老的行社与字号

刘映元

“醇厚社”是归化城未分十二行社以前全城商号的总行社，小十字西北转角的“三元成”又是醇厚社底下的一家最古老的字号。我于1927年由山西左云来归化城住地方学生意，即参加了从三元成分出来的伙计另组织的天元恒，1933年，我们老掌柜武殿元（祁县人）担任醇厚社总领，我亦随去在醇厚社担任了一年先生（会计兼文牒）。因为醇厚社和三元成保留了呼和浩特成为西口商埠的好多痕迹，以及地方掌故，特将经历见闻谈出，作为文史资料供有关方面参考。

## 醇厚社的组织 and 活动

归化城的商业行业，很早以前就众说纷纭。1861年（咸丰十一年），山西崞县人张曾（字小园）写成的《归绥识略》上说，雍正年间土默特旗都统丹津，仿照京都的办法，在归化城设立了十二行社；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本城人郭象伋（字并卿）和荣祥（字耀宸）所修的《绥远通志》上又说归化城的商业行社共有十五大社和三十小社，并列出行社的名称。不管是十二行社还是十五大社，醇厚社都是名列第一，其次才是走外蒙的集锦社、店家的聚锦社、碾坊的青龙社、磨坊的福虎社、当行和钱庄的宝丰社等等。可见后来纸马栏柜、绸缎铺和布铺轮流担任总领的醇厚社是归化城最早在街上开设门市字号的一个行社。由醇厚社一直代替公家征收“干果帖”税和药行社的东西都保存于醇厚社来判断，连街上卖花生、红枣的小摊，和最早的药铺亦包括在“醇厚社”内。



醇厚社的社房设于归化城小东街关帝庙内，这座关帝庙曾见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农历五月张鹏翮和钱良择所写的《奉使俄罗斯日记》和《出塞记略》两部书中。归化城商界最有势力的山西祁县人的祁县社、太谷巷（后叫太管巷）太谷人的太谷社和宁武巷宁武人的宁武社，每年都在这个关帝庙中唱戏。归化城京庄商人京都社的三官庙，如果建于1648年即顺治五年（三官庙旁的圣母庙曾有顺治戊子〔五年〕燕都弟子朱斌纪书的石碑），那么代表山西庄的第一座关帝庙建于归化城不会晚于三官庙及圣母庙。由于醇厚社在小东街关帝庙内设立社房，可以证明归化城建立行社，不是始于雍正年间，应该是始于康熙后期，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军队在昭冥多战败了厄鲁特蒙古的噶尔丹汗，土默川由边疆变为内地，西口商埠从杀虎口移到归化城不久。

费扬古是伯爵，老百姓对大官不敢呼名，山西口音念“伯”为“白”，费扬古就成了归化城人所谓的白大将军了。费扬古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即来归化城坐镇，曾在归化城的南边，扩建了一座外城，将原来的南城门楼变成以后的鼓楼（恒昌店与西马道巷中间）把四眼井巷和九龙湾也包括在城内。费扬古因战败噶尔丹汗，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八月升为一等公，三十七年（1698年）二月调回北京，康熙四十年（1701年）得病而死，归化城的旅蒙商人，当然对他非常感激，在无量寺（大召）东南为他建筑了一座生祠，便是财神庙巷的费公祠。归化城的商人为了纪念他，每年在费公祠唱戏四次。据《归绥识略》记载，春三月和秋七月由集锦社唱戏，夏四月由十二行社唱戏，冬十月由醇厚社唱戏。十二行社除了夏四月给费公祠唱戏，并于每年六月在火神庙唱戏，醇厚社于冬十月给费公祠唱戏之外，每年正月十五也给火神庙唱戏。从唱戏的记载来看，醇厚社在十二行社中，可跟走外路的集锦社并列，与集锦社和十二行社总行社在归化城鼎足而立。

我在醇厚社当先生时，已经停止唱戏。民国以后只是经管一万

多两银子的布施积累,不过仍遗留着从前的一些规矩。原先在醇厚社包括着好多家门市字号,这时过问社事的只有大南街纸马栏柜中的三元成、天元恒和裕合兴;绸缎铺中的天顺泰、聚生泰、聚兴厚和祥源通,以及布铺中小召前的四合荣、大召前的万顺泰和西五十家街的万兴昌等十家了。除过三家大布铺属于忻县的忻州班子,纸马栏柜和绸缎铺属于太原附近的南县班子和雁门关勾注岭北的岭后班子。南县班子中都夹杂着不少大同与左右两卫的“岭后人”,这是因为明朝在杀虎口与蒙古族人互市时,府十县的财主经营通事行,必须吸收大同与左右两卫的人给充当翻译。他们在杀虎口是如此,到了归化城已成了伙计,前往外路做旅蒙商时,更脱离不了大同及左右卫的人。集锦社的三大号里边,大盛魁的三个财主除了两个是祁县人,一个便是右卫杀虎口的秦家。元盛德和天义德的伙计亦是府十县人和岭后人混在一起。

醇厚社的纸马栏柜三元成是祁县财主,天元恒是祁县人武占元领的祁县王家和左卫谢家,以及王谢两家的天元成(走新疆的西庄)的资本,故属于南县班子。绸缎铺天顺泰为大盛魁的联号,聚生泰是太原上马街田提督家(回族世家、绥远都统冯福祥及晋军师长朵珍都是田家的女婿)所开,亦属于南县班子。纸马栏柜中的裕合兴和绸缎铺中的聚兴厚与祥源通,前者由三元成出来的岭后人组成,后者由天顺泰、聚生泰和聚兴厚三家出来的岭后人组成。裕合兴的财主是大同的梁家,祥源通的东家是大同的元盛祥钱铺,聚兴厚的财主亦领大同财主的资本里边都没有府十县人参加,故属于岭后班子。

归化城的纸马栏柜,以府十县人的势力最大,绸缎铺以大同及左右两卫人最多,布铺是青一色的忻州人。所以醇厚社的一万多两银子布施积累,随着总领的更换,每年分别放到祁县人开的天亨永、大同人开的双兴厚和忻州人开的泰和昌三家钱铺轮替生息。醇厚社由于钱多,经常在小东街关帝庙雇佣着一个看门的听差,并包着一辆轿车,准备总领们出门时乘坐。对于帐房先生,每年还津贴

笔资二十两银子。商业行社以外的各地同乡社，除了祁县人的祁县社和太谷人的太谷社，以及河北省京庄的京都社而外，都不如商业行社富裕。例如大同及左右卫人的同乡社云中社，前清时每年在财神庙唱戏，正月十五还举办台歌游艺，可是没有社房，扮演台歌的行头一直在醇厚社寄放。

各个商业行社都有正总领一人和副总领两人，纸马栏柜出了正总领，副总领即由绸缎铺和布铺产生，绸缎铺或布铺出了正总领，即不能再产生副总领。当了正总领以后可以竞选乡耆，由四个乡耆组成乡耆府（设于三贤庙），便是清朝时的商务会。总领特别是乡耆，代表行社和字号的声势，所以各家字号对于出任总领的掌柜，都支给六十两银子的衣资，好缝制讲究的袍褂，体体面面的去见官迎客。前述有资格担任醇厚社总领的十家字号，已不是普通的纸马栏柜和一般的绸缎铺与布铺，而成了府庄、绸庄和布庄，它们在山东的东昌府、江苏的苏州与河北的行唐等县，都常年住有买客，除了在门市上零售货品，还批发给本城的小字号，支垫前往外蒙和新疆贸易的商贩，除出货品三月或一年后才结算。

归化城的市场，在清朝时为山西庄独占，民国十年（1921年）京绥铁路通车前后，即插入东路班子的京庄。东路班子未跟忻州班子的布庄竞赛，在大什字开设了馥兰斋和言记号，对南县班子的三元成和天元恒等影响不太大，唯独元复永、增兴源、增盛魁、恒聚兴、忠义恒和德铭号这些新式门面的绸缎铺，对山西庄的天顺泰、聚生泰、聚兴厚和祥源通排挤最烈。民国十七年（1928年）外蒙封锁边境以后，集锦社等好多行社已不存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各行各业都组织起同业公会，而醇厚社仍然存在，称醇厚绸布杂货同业公会，京庄的绸缎业和杂货业称鞋帽绸布杂货同业公会。聚生泰绸缎庄的经理山西阳曲人樊培基还两次以醇厚社的总领，担任了归化城的商务会长，其主要原因，都跟山西的南县班子与河北的东路班子进行商战有关。

### 三元成的开设与经营

三元成是开设于十八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的一家老字号。三元成原来的伙计现在已经所剩无几，据前年病故的陈增玉（祁县人）和现在健在的宋连升（左云人）跟我说，解放以前他们都是三元成的小伙计，不许翻阅柜上当初开设时的“万金帐”（伙计所立的合同），只知柜上有一秤砣，前铸三元成三字，后铸“雍正八年（1730年）铸”五字。由此可以看出在雍正八年时，三元成已经是一个自铸秤砣的象样字号，绝不是小的纸马栏柜，开设时间在康熙年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财主，除了祁县的九家外，还有右卫杀虎口的晋泰店。杀虎口在清朝顺治初，即逐渐把西口商埠往归化城移动，据《清文献通考》记载，顺治四年（1647年），清朝把明时好多从前跟蒙古族互市的边口封闭，只开放东口张家口、西口杀虎口和河保营（河曲）三处，到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让户部每年在张家口征税一万两，杀虎口征税一万三千两，杀虎口之所以比张家口还多三千两，是因归化城已经成为跟外蕃贸易的市场，内地和边疆的物资交流，多由杀虎口进出。

杀虎口在明时就设立了户部的征税机构，清时叫杀虎关。户部派驻监督官，底下的经承、书办、巡役、员丁，都由杀虎口本地人和左卫高山营的人担任，这些税吏成了世袭职务，名叫“顶户部”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由于西口商埠已经从杀虎口转移到归化城，故从杀虎口关分支出归化关，其税吏亦是由杀虎口的路家和高山营的王家、成家、任家等世袭更替。清朝初杀虎口的店家，因为归化城成了货物集散地，那里便成了货物过往站，已非一般的发货店，多变成“报关店”。就是行商进出杀虎口，把货物堆积到店内，由店家到税关代为办理打税手续，从中收取佣金。这些报关店，都是顶户部的亲朋所开，不住他们的店，税吏便来百般刁难，住了他们的店，还可以偷税漏税。三元成的东家晋泰店就是此种性质的店家。

三元成的创业掌柜,在杀虎口的时候就不是简单的商人,他既能跟晋泰店搭上财伙关系,而且拥有大同工人组成的一个刻印作坊,特别是他和归化城的延寿寺(席力图召)有特殊的密切交往。据说三元成在康熙年间因给席力图召印刷藏经而发家致富,在归化城打下牢固的基础。

这个年代最古的归化城纸马栏柜,座落在延寿寺(席力图召)和大召(无量寺)的中间,席力图召西边叫东鞋袜巷,大召东夹道东边叫西鞋袜巷,往北是大南街通往大十字,往南是小南街走向南茶坊。三元成的拐角栏柜东向大南街末尾,南向西鞋袜巷起头,正处于小十字最向阳的地方。在西鞋袜巷的西端路北与大召东夹道形成的丁字中心,也有一个南向西鞋袜巷,西向东夹道的拐角栏柜,后墙和三元成的后院和后门接连,当初这个西边的转角栏柜,可能就是三元成的刻印作坊。以后商店和作坊分开经营,到了民国年间,就变成三元成出来的伙计祁县人刘培顺所开的印刷铺三合顺了。从这个转角栏柜出来的几个大同刻印工人,又在对面的大召东夹道路西,另组织了一个三合义印刷铺,遂使大召东夹道成了归化城印刷神马和冥纸的地方。

席力图召和大召中间的两条鞋袜巷的店铺,看来起初专门供应两召喇嘛的各种用品,在三元成南栏柜对面的西鞋袜巷东口路南,有摆了二百多年的一个卖鼻烟的摊子,掌柜来自大同,人们称之为“韩鼻烟家”,子孙成了民国以后归化城的士绅,兴办三贤庙女子学校的韩权,参加编修《绥远通志》和《归绥县志》的韩桂,便是韩鼻烟家的后代。席力图召和小召中间的圪料街,也有不少做蒙古生意的商店,除了卖蒙药的元泰和,还有一个醇厚社的鼎盛新绸缎铺。它和大南街的天顺泰,以及三元成栏柜对面大南街尽头路东一度出现过的萃珍瑞(绸缎铺),都是大盛魁投资和大盛魁的乌里雅苏台分号当家掌柜左卫人姚镛独资经营。这些店铺都不如三元成和席力图召相处过密。席力图召把寸土寸金的地皮廉价卖给三元成修建门面和住室,(包括三合顺那个转角栏柜)三元成堆积如山

的糖色茶箱，都在席力图召西的好几个大殿中存放。

三元成在归化城创立以后，占了清朝鼎盛期的天时，栏柜适中的地利，加之南县班子和岭后班子团结在一起的人和，很早就由纸马栏柜的小杂货铺，变成垄断纸张、糖味、颜料、香烛和干果的“府庄”。所谓府庄是指山东的东昌府而言，因为天津未成为通商口岸以前，纸马栏柜出售的商品，都到山东昌府采购。三元成栏柜腊月的盈余，就足够全年的各项开支，在农历十一月下旬，到腊月二十三前后，伙计们白天应付拥挤不断的顾客，夜晚给贩卖年纸的商贩和四乡的地主配货，他们一天的工作量达二十小时，只能休息四个钟头，除夕夜晚仍不关门。因为小户人家买一两香油或一碟虾酱，也要从北头起的牛桥和南头起的南茶坊打发孩子们老远的到三元成购买。连新城讲究吃喝的满民，亦不照顾鼓楼底下的义盛泉，而要进旧城照顾小十字的三元成。因为三元成的货色齐全，并且货真价实，对待顾客态度良好，真正做到童叟无欺的地步。故远近驰名、信誉卓著。现在这个栏柜已改建为洋式的糖业蔬菜门市部，可是人们仍叫它为三元成。

由于三元成以成批的府庄货物，支垫好多走北路和西路的旅蒙商人与旅新疆商人，所以北自恰克图，南至太原府十县，东自天津，西至伊犁河，山西庄的商人人都知道“西口三元成”（三元成的水印如此称谓）这个古老殷实的字号。故三元成能汇通中国半个天下，兼营票号的汇兑业务。清朝时归化城的镖局，亦依靠三元成揽活，在光绪末年国家未设邮传部和邮政局以前，三元成给传递好多地方的文件。关于汇兑保镖和邮传的详细情况，民国以后住地方的伙计都未赶上，详细情况不得而知，现在难能提供具体事例。

三元成从清朝康熙年间到同治年间，曾经倒换了好几次财东，在财神龛底下的箱子中保存着四五份用红绸做封面的“万金帐”。最近的一次改组，是发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当家掌柜祁县人陈鸿宽，把原有的财主清除，另领了新疆省建立以后跟着发财的奇台（古城子）山西庄商人的资本，除陈本人连财带人的股子

占了一半外,财主还有祁县乔家堡的王殿魁,降法村的郭光元和太谷城内吴家巷的吴家,官场村的吕家。陈鸿宽掌权以后,左右两卫的伙计很受排挤,所以左卫人任克谦、李凤栖等于光绪末年出去领了大同财主的资本,在大南街路东天顺泰和聚生泰对面,成立了归化城第二家最大的府庄裕合兴。同时,三元成的坐房掌柜祁县人吴殿元,因垄断新疆哈密杏干和吐鲁番葡萄干而波动了归化城的市面,于是羽翼日大,不听陈鸿宽的指挥,也带着右卫杀虎口的武九功等小顶生意掌柜离开三元成,出去领了西庄中天元成(总号在奇台,分号在乌鲁木齐,城柜在归化城小南街)及其财主王、谢两家八千两银子的资本,成立了公义和字号,先在小南街崇德店做暗房子生意。民国十六年(1927年)把中和元茶馆的地址接下,在大南街二道巷对过,亦设立了门市栏柜,字号更名为天元恒,成为天元成的联号。

新成立起来的裕合兴和天元恒尽管兵强马壮,但因生不逢时,始终竞争不过根深蒂固的三元成。裕合兴以省吃俭用维持着,武殿元大手大脚,又爱投机倒把,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算帐时,即给东家赔了十万多两银子。故归武九功和我以人力经营,牌匾仍旧,加了一个“盛记”。解放前夕,我把天元恒和裕合兴的铺底和家底合并在一起,另组织了一个义姓茂,1956年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归化城已被日伪统治,三元成采取了紧急收盘措施,当时共有三十多万元积累,按每股一万五千元,大都开了红利,时“蒙疆票”和现洋同等价值,每斤台湾鹰牌红糖价格为一角二分三厘。年轻顶生意的掌柜,反对当家老掌柜的保守,祁县人刘清扬、李丰年等出去在三元成斜对过开设了东盛义,文水人梁万荣和祁县人王庆乐等,亦在大南街开设了晋益西和明义德。但结局和裕合兴与天元恒一样,都在三元成公私合营以前先后停业。

三元成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以后,专靠纸马栏柜维持五十多个伙计的生活,在公私合营时,已经吃净花干,所置家底除了

包括三合顺的全部房产外,厚成完全掏空。另外有二百五十年来的一万多部帐簿书函,一库房各种印板(包括汉文和藏文),府十县中好几个县的同乡社寄放的东西和各种古书旧报,都是研究呼和浩特经济发展史的宝贵资料,可惜全按废品处理,做了纸浆、铺衬和烧火的干柴,成为难以弥补的文物损失。

(本文主要由刘建基先生口述,并参照其它调查资料写成。)

1983年10月完稿



# 义成源百货店的生意经

王志曾 梁福寿

义成源百货店(1898——1948年)在归绥市是一家有着五十年历史的老字号。这家百货店是河北人开的,人员中多数系河北省冀县和新河县人,人数最多时达三十来人。它效仿京津大商号祥字号的管理办法,又吸取本市山西班子重信誉、重积累、多留少分的经营方针,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经营项目和花色品种逐年增加。因此几十年来久盛不衰,不仅在京津客商中能保持一定声望,就是在我市商业中也小有名气。

义成源百货店位于呼市旧城小什字迤北路西门牌五十三号,是繁华的商业中心,三间两层楼房,建筑非常显眼,门上方有“义成源”三个大字,左下方写有洋广货,右下方写有五金店,另有两个招牌分别写“货真价实”、“言无二价”。主要经营百货、针织品、纺织品、文具;另外兼营民族用品(哈达、钮扣等),还有大小五金、玻璃、中西成药等。经营的商品全部由北京、天津进货,并且在以上两地长年驻有专职采购人员。零售对象以本市市民及市内企事业公用为主,批发业务则与市内商贩、临近旗县建立关系。

义成源系合股企业。创始人是程致义,早年小本经营,从北京以驴骡驮贩运商品来我市销售。稍有积蓄后,便与在北京开设义成厚的三位同乡王某、张某、梁某商量在归绥市建立一个固定点,开个小门市部。四个共凑集资金1100元,几年后增加到1500元,作为四个股,每个财力股为375元,程、王、张、梁每人一股,三年为一帐期,根据盈亏结算,进行分配。

五十年经营中,经理主事人先后变更,创始人程致义,于1921年去世。继任经理梁维三,1929年病故。第三任经理马世昌,1940

年马世昌辞职出号,由李绣章担任经理,至1948年呈请歇业为止。

该号批零兼营,以零售为主;批发业务由于和旗县客商以及市内商贩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关系,绝大多数是定额赊销,遵照商务会规定,每年底确定明年的四个镖额即正月、四月、七月、十月四个镖期,赊销单位或个人按商定的镖期归还货款。言而有信,决不食言,否则将自讨苦吃。因此批发部分有时占到整个销售的百分之五十,和零售平分秋色。每年销售总额约10万元上下,毛利率10%—20%不等,除去税金费用等开支,每年可获净利润1万元。每个帐期可获利3万元左右,红利分配除4个财力股外,还有为便利活动业务付给北京义成厚0.5周行股。人力股按经理、副经理、大伙计(多年的骨干人物)论资排辈,按贡献大小逐年递增,分别是0.2—1.2。两个类型的股份等同对待,合计为14—15个股。每个帐期每股可分得红利约2千元左右。每年旧历正月十六日为“说官话”的日子,主要总结上一年的经营情况,本年度的经营打算,每个从业人员的业绩论功行赏,普遍发给奖金,奖优罚劣。该晋升的晋升,该批评的调换工作岗位,对手脚不干净有贪污行为的及时进行辞退。

为刺激销售,体现多劳多得,义成源曾一度施行销售提成4%,每销百元可提4角,年终结算。此举在一段时间内(五年左右)收到一定效果,后因存有弊端,遂恢复奖金制,对没有人力股的职工年终“赠送”(奖金)大于工资,如果生意情况好,红利多,个人表现又好的,能高出工资五倍至六倍。

为提倡节约,反对奢侈,义成源立有几项规定:

- 1、全体同仁一律不准携带家眷。
- 2、不准留长发,一律光头。
- 3、发现贪污盗窃者立即开除。
- 4、不准嫖娼吸毒。当时吸大烟较普遍,各大中商号都设有大烟灯招待,唯独义成源无此招待。
- 5、库房和宿舍在一起,职工存放衣物的箱柜一律不准上锁。身上不准带钱,买东西完全从柜房支取。
- 6、经理没有小灶饭。

为增加企业积累(所谓厚成),达到多留少分,预防亏蚀,也作

了若干规定：

1、帐期盘点商品，一律按进价九折计算，对旧存滞销积压商品，则分别按八、七、五折计算。

2、应收货款也按九折计算，呆帐、死帐一笔勾销。

3、柜台货架边购置边折旧，帐期所剩金额已寥寥无几。

4、厨房炊具、米麦、柴炭，不管储存多少，均按 50 元折价。

店规严明，福利待遇优厚，采取大包干的办法，这是该号能在归绥市存在五十年的主要原因。这方面做好了，大伙儿就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够以企业为家，把本身工作看做切身事业，企业的好坏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值得介绍的还有以下几点：

初进店门的学徒工，每天夜间（关门后）要写毛笔字，打算盘；其他人翻阅进货帐簿，熟悉进销价格，做到心中有数。

学徒期限三年为满，回家路费由柜上支付，期满以后为二年至二年半回家一次，路费仍然从柜上领取。

纸烟、香皂、肥皂、牙刷、牙粉等全部公费购买。洗澡、理发，由柜上开支。

遇有婚丧嫁娶或购置产业，不管帐上存钱与否，照准支付。

1920 年河北闹灾荒，柜上主动捐钱回去，每家一份。1943 年闹灾，支持职工把家眷接来归绥市，协助解决吃住等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全体人员真正体会到企业是自己生活的支柱，企业的好坏和自己息息相关，因此能时刻关心生意的开展，自觉遵守店规店章，努力做好工作，为企业尽力。

1945 年 8 月日寇投降后，物价不稳定，呈波浪状态，主持企业的经理，对如何搞好营业失去信心。在此之前虽将资财往甘肃武威转移一部分，也未能收到理想效果。为应付当时局面，错误地采取了缩小范围、裁减人员的消极做法。由于企业领导思想陈旧保守，剩余人员思想老化，离心离德，于是在 1948 年向市有关部门递了歇业的申请，年底获得批准，从此义成源这个老字号宣告歇业。义成源歇业后不久，1950 年初，北京义成厚原经理贺春亭在原址开设春生号百货店，一直延续到 1956 年公私合营。

# 注重信誉 苦心经营

## ——华记洋广杂货店小史

芦秀杰

### 新城名号

日寇侵华之前，华记洋广杂货店是归绥市新城三大名号之一。与鼓楼南街的义盛泉；鼓楼西街的三合成形成鼎足之势。它位于鼓楼北街路东，营业门面虽只有五间，但其经营范围却很广，品种多达上千种，并批零兼营。经营品种以纸烟、煤油、腊烛、肥皂、火柴等为主，粗细洋布、平唐土布（河北省平山、行唐产）、烟酒糖茶、油盐酱醋、调味作料、各色染料、纸张香烛，盅碗盘碟，就连中药里的圆肉、桂皮、广胶、古月以及五塔牌面粉等等也都经销，真称得上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杂货店。

华记的资本并不大，资金只有银圆不满三千块；店员也不多，不够二十人，经理只有一个。它的经营宗旨是以诚待人，以信取胜。使店员们同心协力，上下一心，民主管理，利益均沾。

华记资金虽然微薄，其商品积存却非常雄厚，库存有时竟多达两三万元，其原因就是一个“信”字。当时的英美烟草公司、华成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德士古、大华、亚细亚、美孚等煤油公司，及本市的各大货庄如三元成、天元恒、裕合兴、晋益西……都是该号的后盾。整车的货物送去当时不要钱，只等逢“骡子”、过镖，（每月底结算叫“骡子”，每季末结算为“镖”）再行结算，这就大大弥补了资金的不足。

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为了垄断市场，便于统一管理，在归绥市设大经理忠义恒一家，下设小经理八家（旧城六家，车站一家，新城一家就是华记）。公司进来的香烟，统由大经理给分配到八户小经理

处。凡全市郊区所有卖纸烟的店铺、摊贩都到这八家小经理处去批购。几家烟草公司，当时竞争也非常激烈，暗中都给以优惠，付以报酬，大小经理无形中得到不少收益。

本世纪30年代初期，绥远城虽然建立了一个小发电厂，由于电力不足，电路短少，安装电灯的商住户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家还用煤气灯、煤油灯照明，因此那时的煤油、蜡烛还在盛行未衰之期。上海的日光皂，本市的火车皂，也相互竞争，代售代销，分期付款，这给华记也带来了不少的利润。

旧社会的商号，顾客购物不少是讨价还价，有些商店往往以次顶好，以欺骗为能事，以奸诈为本领，一些憨厚诚实之人往往上当受骗。而华记的特点则不然，是货真价实，言不二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消费者。因此博得了广大顾客的信任和好评，远近驰名，有口皆碑。许多乡镇农民慕名而来，尤其逢节过年购物者更是拥挤，年货单都得编号排队，定期取货，当时该号业务之兴旺，顾客之多，由此可见了。

## 创业历程

华记经理名叫芦宝全，字子仁，原籍河北省河间县，祖业务农。他在农闲之隙，常常做点小生意，后因亏累，躲债外逃张家口，但人地两生，亦难立足糊口，于民国十五年（1926）随国民军来到绥远。那时绥远督统是李培基，省督统府就在鼓楼西侧（现在的将军衙署），他在西辕门外路南租了一间小屋，迎街开一小窗口，开了个家庭小杂货铺，常年主要顾客是督统府的一帮公务员和隔壁卫队连的士兵，先赊欠，关饷后再还钱。几年时间挣了一些钱，于是在新城鼓楼南侧租了一间门面，雇了两个伙计，开设华记杂货铺。由于他的克勤克俭，苦心经营，逐渐赢得商界的信任，同行的重视。

小商店似春笋般茁壮成长，商品一天比一天多，营业额一天比一天大，生意也一天天红火起来。一间小门面，显然不适应了，他正在苦思冥想如何发展之际，事又凑巧鼓楼北边一家名叫大葫芦的醋酱园关闭了。

提起大葫芦在新城也是一家较有名气的酱园,据说开业初期,为了创牌子,招徕顾客,出卖酱油、醋,不用提子量,而是用剖开的葫芦瓢舀,以示不计量优待。他又在门前挂了只葫芦作幌子,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大葫芦”,它真正的字号名称,反而不为所注意了。这是家合伙店铺,后因内部发生矛盾,停业散伙。芦子仁趁机把买卖兜揽过来,房产货物一齐端,分期付款,翌年偿清,从此大葫芦真的姓“芦”了。

华记迁至新址,自是一番新的景象,营业场所扩大了,商品种类增多了,店员也由三人一跃增到十五六人。英美烟草公司、亚细亚煤油公司相继与之签订了供销契约,本市各大批发货庄也接踵而来,纷纷建立业务关系。原来华记杂货铺的小牌子,也换成华记洋广杂货店大字牌匾。自此店威大震,气象一新,每日店堂顾客盈门,内室高朋满座,来来往往,络绎不绝,专有小徒盘茶递烟,送往迎来。此时的芦子仁已是如愿以偿,心花怒放,对事业前途更是信心百倍了。

### 管理手段

芦子仁订的铺规很严,执行得很坚决,毫不容情。具体规定有:

①所有店员一律不准带家眷,当地有家的也不准随便回去,晚间都住在商店宿舍里。本地的每年回一次家,假期一个月,旅费银圆十块,外地的三年一次探亲假,三个月,旅费三十元,到期必返,如无故超假,按自行辞退论。

②店员在营业时间,不准吸烟,平常不许喝酒,每月初一、十五和节日才给少量的酒,但绝对不许饮醉耍酒疯。

③店员不准随身带钱钞,有钱交账房先生存管,用时索取,余额注明,否则即为犯规。

④不论老伙新徒,一旦发现盗窃财物,哪怕是一点点,立即开除,决不容情。

⑤不准奇装异服,长发油头,妖冶古怪。

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内外打扫干净,上满商品,然后开门营

业。绝不容许顶撞、打骂顾客，对顾客要有礼貌，必先说“您要什么？”每晚营业終了，经理召开一个不定时的小会，总结布置，表扬批评，店员们都把这个会叫“过关”。

⑦更严禁的一条，是聚赌嫖娼（在旧社会和日伪时期有官赌场，官妓院），如有违犯者定开除不赦。

福利待遇方面，除衣服被褥自置外，伙食、医药、洗理、巾皂等都是公费，每到过年还送一份礼物。虽无固定假日，每逢节社日及城乡庙会闹红火时，轮流放假游逛。

经理为使老店员安心工作，除固定年薪外，还建立了一种人力股份称为好汉股，即盈利分红，亏钱不管，按店员的能力给以不同的股份（店员的股份，约占总股份的1/2）。这个办法对调动店员积极性曾起到一定作用。

## 东家其人

芦子仁受了儒教“君子不重则不威”的影响，认为不严肃则不足以服众人，总是板着面孔，冷若冰霜，从来不与伙计们谈笑。只有除夕夜他率领全体店员拈香叩拜财神之后，回首笑着说一声“大家一年辛苦啦！开饭吧！”这是他一年中对店员们仅有的一次笑容。

芦子仁不抽烟，不喝酒，但有嗜茶癖。他供着一佛一神，佛是南海普陀山紫竹林中白衣大士；神并不是赵公元帅，而是身跨赤兔马手提青龙刀千里走单骑的美髯公。佛神前祭器齐全，朔望必顶礼膜拜，平时则独自手捻素珠，垂头不语。

## “华”灯熄灭

华记由于经营有方，自1930年以后，进入了兴盛时期，年年有余，岁岁盈利，可惜好景未长，风云难测。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开始了，10月14日，归绥市亦陷入敌手，不但人民惨遭涂炭，工商业亦受到致命摧残，在敌伪的敲诈勒索、苛捐杂税的盘剥下，许多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了。华记的命运也难例外，勉强支撑到1941年初，芦子仁与其弟芦宝信（人称二掌柜）不得不散伙，所有

财产分为两大股，以抓阄的方式，芦子仁分得流动资产；芦宝信分得固定资产，自此兄弟俩分道扬镳，各行其事。芦子仁携金返里，置产务农，芦宝信利用剩余财产在华记招牌下添了一个“号”字，继续经营。奈何他经商无术，又兼他好赌吸毒，不务正业，残延到 1946 年，曾一度名满城乡的一盏华灯，在凄风苦雨中永远地熄灭了。



# 归绥市的饮食行业

乌丙宇

晚清年代，归绥已是塞外的重镇，归化城（即旧城）设理事同知，隶山西朔平府。乾隆四年（1739年）又建成绥远城，设将军衙门，从山西右卫（现山西省右玉县）移来八旗兵驻防，除携家带口外，也引来许多商号，云集至此，使归化城呈现出一种繁华热闹的情景。商业贸易的繁荣，使之成为塞外边陲的商业中心，在百业具兴的情况下饮食行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街面上开设的酒楼、饭馆、茶馆等有近百家，经营有别，各具特色，常以各自的名菜佳点，特色风味，招徕顾客。大体上可分为五种类型。

一类馆子，也称大戏馆子，就是在戏院里摆设筵席。当时在小召前就有金谷园、便宜斋，小召后有会仙楼、晋阳楼。这些都已无详细的记载，而光绪三年（1877年）在小东街开设的宴美园（即后来的大观园）那可是名噪一时的大戏馆子。宴美园座落在小东街，面对三贤庙巷东口，内设戏台，饭座设一百二十张八仙桌，每桌三条长板凳坐六人，一次可容纳七百多人。摆设筵席，达官显贵，商贾士绅一面推杯问盏，一面品腔听戏，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进餐方式。首任掌柜是山西忻县人王泰棋，后由其侄王禄接任，此人十分能干，他既是掌柜又兼吉升班的班主，集餐饮娱乐于一体，在当时十分卖座。清朝时物贱钱贵，一般六盘六碗的酒席只需白银六钱多，酒饭还包括在内。宴美园每日平均能卖二百余桌酒席。前后经营约三十余年，于1911年改为只唱戏设茶座的梨园业，1927年改为大观茶园。

二类馆子，又称小班馆子，它的规模虽不比大戏馆子，但设置考究，环境典雅，名师临灶，饭菜精美，出入多为官商巨贾等上流社

会的人士。当时较有名气的有座落在棋盘街的荣生元，三官庙街的旺春元，大南街锦福居以及后来的麦香村、风麟阁等都属此类。

荣生元，始建于1880年（光绪六年），是当时归化城十分有名的小班馆子，早年经营状况已无据可查。1932年的掌柜叫张振亭，河北省昌平（今北京昌平县）人，全部资产为自家资本，雇用四十余人，分厅堂、面案、菜墩、小灶、饼铛、帐房六个部分，管理有序，经营有方，日营业额平均在大洋一百三十元左右。曾在荣生元任过掌勺师傅的多为名厨，如杨丙午、王双全、潘起（外号潘聋子）等，尤其这位潘师傅，技术全面，技艺高超，他是1933年从北京来的，此人曾在清朝御膳房做过司灶，生性怪僻，不善言语，但烹调技艺独具一格，口味鲜香，造型各异的宫廷佳肴，如蝴蝶海参、八封鱼肚、凤尾鱼翅、绣球干贝、芙蓉燕菜、熘鸡脯、罗汗大虾、蜜汁山药段等已是该店独具特色的美味佳肴。潘师傅与张掌柜是同乡，在这期间凡在荣生园出来的厨师，大多得到潘师傅的真传，至今呼和浩特地区经营的多种名贵菜肴的原料配制，烹调规程，仍保持着此人的传统技艺。

1935年后，荣生元的掌柜易手于孔令奎，以荣生元的规矩，徒工入店二年内只能打杂，先是伺候掌柜和老师傅，其次干些洗碗、剥葱、杀鸡、退毛、刮鳞、磨刀、倒泔水等杂活，生活待遇第一年月薪大洋一元，第二年月薪大洋两元，第三年才能跟上师傅接触墩灶，薪水也略增加，荣生园于1940年宣告倒闭。

三类馆子，又称大班馆子，也叫二细馆子，经营的品种与小班馆子略同，但其规模，接待顾客的格调，就次于小班馆子。当时有名的如座落在小召前半道街北口路西的惠丰轩、双合元（后改为福义元），新城南街路东的长生园等都属此类。

惠丰轩的前身叫义忠轩，始建于清康熙年间，乾隆年间由乌姓股东（城南八拜村人）投股七千吊钱，郭万子投股两千吊钱，盘下了义忠轩饭馆，改名惠丰轩，内设南、北、西三个客堂，称作三股头营生，满堂时可接待二百余人就餐，接待的顾客多为一般市民，四乡

进城的农民，中、小商号的生意人等。因当时崇福寺（俗称小召）一带是繁华闹市区，客商游人常逗留至此，生意十分兴隆。为了扩大营业，于1920年（民国九年）又盖起了二层木楼，更加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加盖楼房后共四个堂口，可容纳三百余人同时就餐，从业人员最多时达七十五人，经营上活而有序，质量上要求严谨。它还开展了预定饭菜、酒席、送餐上门业务，很受一些商号和官宦人家的欢迎。

这里经营的饭菜品种，多以大众化的品种见长，而且讲究精工细做，从不敷衍了事，即使吃两碗素面，也要给配四碟小菜，堪称服务周到。各方顾客都热情接待，钱多钱少都能进餐，如经营的黄焖鸡、炒杂碎（羊心、羊肚、膘帮、蹄筋俏辣椒，不用肝、肺）、炖吊子（猪大肠拐弯处）、烤乳猪、烤方子、挂炉烤鸭都很有特色，而这里经营的头脑，更是独一无二的看家品种。头脑（又称八宝头脑）据人们传说是明清之际山西阳曲大儒傅青主（民间称傅山先生）根据多年的医道研制了一种适合老年人的食疗养身秘方而制做的，当年只在太原城的清和元饭馆经营过。它是用榨过黄酒的鲜糟，用井水淘洗，淘成乳白色的乳汁，盛入小碗内，即算作一份，置入肥山羊肉两块（约二两重），鲜藕二片，长山药两节，另加葱花、白葡萄干、摊鸡蛋饼切块、炸熟的面疙瘩，蒸热出售。头脑属季节性食品，每年的冬至到次年的立春是吃头脑的季节，每日早市即出售。这种八宝头脑带有浓郁的酒香，多吃也不会醉酒，不饮酒的人也喜欢吃。

惠丰轩在归化城虽然不是名流的馆子，但抗战后的1947年，当时任绥远省主席的董其武将军，曾指定在惠丰轩摆设过一次大型宴席，招待军政要员，可见其名不虚传。

惠丰轩于1949年9月2日终因通货膨胀，债台高筑而倒闭。解放后重新开业，改号公益轩。

四类馆子，系指经营单一品种的专业馆，如饺子馆、包子铺、面食馆等。这类馆子在归化城里，星罗棋布，随处可见，大小不下百余家，如塞北关街的德巨永、万巨堂，新城北街的义昌号，南街的水发

昌,旧城南顺城街的宝顺和,礼拜寺巷口的正兴号,小召前的双圣源,小东街的聚圣源,财神庙巷的双胜永,大召前的公和源、永丰泉、福寿堂,文庙街的德祥元,通顺街的庆丰昌、兴胜全、永义元等不胜枚举。这类馆子经营的品种虽都以面食为主,但花样繁多,有刀削面、拨鱼子、杠子面(由人工压制的硬面条)、大拉面、小拉面、疙团儿、片汤、饸饹等,在调制上还分素汤、煎肉、打卤、三鲜、肉丝、炸酱等,在烹制上还有焖、烩、炒、拌等,品种繁多,口味各异,是一种大众化的饮食。

此外,还有专营饼食的馆子,如馅饼、合子、焖饼、烩饼、炒饼等。

五类馆子,是指烧卖馆、茶馆,这种馆子经营独特,只卖一堂,每日早上开市,中午拉幌,下午就不卖了。那时的茶馆均配营烧卖,在街面上很多,较有名气的首推大西街的德顺源。

德顺源的前身是晋三元,是一家糕点铺,于1931年才改营茶馆,其规模之大,用人之多,效益之高,在当时的归化城里是首屈一指的。一进门是散座客堂,东西厢房另设雅座,桌椅一律是酱紫色南木大漆油面,桌面都用白布罩铺垫,堂馆(服务员)各有分工,有专为茶客端送茶具的,称“撒碗的”,有专为斟茶续水的,称“开水的”,有专为递茶点、端烧卖的,称“跑堂的”,门口还专设一名看座的,分工十分明确。

德顺源茶馆,以品茶为主,对用水、烧水、倒水、沏茶以至所使用的茶具等,都特别的讲究。水是用大木桶,由专人从大召前玉泉井汲取来的泉水,称“玉水”,沏出茶水味正茶香,甘甜可口,多饮也不胀肚。烧水是采用大铜壶,用煤泥做燃料,无烟无灰,以保水质的洁净。茶具有玲珑扣碗、小茶盅、瓷壶细碗。斟茶续水更是讲究,跑堂的手提细嘴铜壶,高高举起,分三股水倒入碗内(指扣碗茶),姿势优美,很有节奏,要做到水不外溅,茶不外溢,被茶客赞为“凤凰三点头”,还有什么“鸚哥倒架”,显示了绝妙的本领,高超的技艺。所备的茶叶也十分齐全,品种繁多,比较大路的品种是砖茶,备有

青砖茶、黑砖茶、贡砖茶。花茶类更是等级不同,品种各异,品口味有茉莉、玉兰,分档次有几上几履之分(指熏制的次数以多为佳),毛尖、白毫等应有尽有,红茶、绿茶也按时令上市。成批购进茶叶后,都要按五钱重分成小包(按十六两一斤分),包装纸以颜色区分,投放茶叶时要当着茶客的面放入,以保证质量。这些都被茶客誉为佳话。

这里的茶点,制做精细,花样齐全,用烘炉制做的刀切、破酥、糖堆儿、小槽糕、麻炉弯等不下三十余种,各种月饼有提浆月饼、翻毛月饼、混糖月饼,还有鸡蛋焙子、马蹄酥、鸡蛋卷,独具风味的糖油旋、素油旋、肉油旋、糖锅盔、肉锅盔等更是远近闻名,不仅店堂出售,而且另设专柜,昼夜营业,十分方便。四乡农民进城,总要买些回去。

归化城的茶馆,兼售烧卖,这是传统经营方式,而德顺源的烧卖制做格外考究,和面、揉面、捣皮、切馅、配料、拌馅、挑烧卖等操作工序都非常严格。出笼的烧卖鲜香四溢,皮薄如纸,柔韧不破,放入碟内团如小饼,用筷子夹起,垂如细囊,吃起来鲜嫩味美,醇而不腻。曾在德顺源工作过的著名烧卖师有陈大礼、张维维、李凤山、陈洪喜等,点心师有史九德(大同人)、李万全、温永财等,德顺源因经营有方,经久不衰,一直经营到解放后,于1950年3月改称德兴源。

当时除德顺源外,还有新城东街的庆和元,牛桥街的德中元,大东街的德和元,大召前的庆荣元、玉福元,通顺街的三合元、双发元等,但经营上和质量上就略显一般,无特色可言。

此外归化城的清真饭馆,也很有名,如座落在旧城大南街头道巷口的南古丰轩于1920年开业,掌柜为白松峰(回族)。西顺城街口的北古丰轩,旧城北门外的同和轩(即现同和轩),都很有回族特色。

除此之外,还有莜面馆、豆浆馆、馄饨馆、酒馆,在全市各个角落随处可见。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归绥,改称厚和特别

市，隶属伪蒙疆自治政府，归化城的百姓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主要生活物资都实行配给制，市内的饭馆有减无增。在此期间，确也开设了几家迎合日本人需要的“日本料理”，如旧城大北街路东，云华池澡堂北的久保料理，新城南街江南馆巷东口的三友料理，新城北街路西、苏虎街口的东亚料理妓馆（一种饮酒时陪有歌舞妓的进餐形式），但这种料理只接待日本人。

除大小坐商外，一些推车挑担沿街叫卖的也都各有特色，很多食品都是分季节、时辰、地点叫卖，很有规律，如回族商贩的黄米枣糕，春秋二季都在上午出售。新城卖的甜窝窝是淘好的小米面、糜米面和少量的黄米面、黄豆面、小麦面，发酵后蒸制而成的，一两面一对，吃起来香甜润口，每日早上太阳未出来时，售者即背着一只椭圆型的木桶，在街巷各处叫卖。到农历四月以后，大街上就有卖茶汤、粉皮、碗坨、豇米凉糕、黄米凉糕的。五月初又有卖大碗酪、豇米粽子、黄米粽子、麻团的。入秋以后，开始有了羊杂碎，一般都是天黑之前出来，挑担叫卖。归化城的干货制品更是五花八门，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如：大白焙子、三角焙子、糖焙子、油焙子、糖麻花、咸麻花、羊油麻花、板麻叶、蜜麻叶、大头麻叶、锅盔、干钉、油果子、糖果子、油饼、薄脆、蜜酥等，都是当时到处有售的大众食品。

历史上归化城饮食行业的变迁，无不与各个时期时局的变化有关。晚清时，这里是边陲重镇，北赴蒙古及远东地区，西去新疆乃至中亚的商驼队，都在这里集散，成为内地物资输出的重要枢纽，曾有过其兴旺时期。清末民初，军阀混战，一些旅蒙商号也大伤元气，加之交通不畅，有些原材料短缺，一些饮食行业难以维持，常是开张的少，歇业的多。民国十年（1921年）五月，平绥铁路修至归绥，局势也较稳定，给归化城的商业包括饮食业也带来了繁荣，较有名气的麦香村（旧城大南街路东）、厚德福（旧城人民电影院街）、长生元（新城南街）等，就是在这—时期开业的。民国十五年（1926年），连续三年大旱，加上民国十八年（1929年），又遇空前的水灾，远县近乡匪患四起，四乡难民纷纷进城，而城内的商贾富户，也乘

机哄抬粮价,开设饭馆、干货铺,大发横财。民国十七年(1928年)每斗小米已涨至大洋一元六角,白面二角四分一斤,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小米每斗涨至四元八角,白面每斤已达七角二分。以1929年开业的麦香村为例,日平均营业收可达一百八十元大洋。

抗战时期,归绥沦陷,物资十分短缺,日寇又严加控制,不少饮食业都无法维持,相继歇业。抗战胜利后,不少商界都锐意将归化城的商业恢复到抗战前水平,绥远省政府也竭尽全力投资,于1946年9月在大西街开办了一个社会食堂,1948年又在联谊社(曾为日本领事馆,现呼市市政府后院二层楼)开办了交际处食堂。在此期间,由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归绥已成了一座孤城,饮食行业所需原料奇缺,加之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酒楼、饭庄大批倒闭。直至解放后,归绥市的饮食行业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它的新生,走向新的兴盛时期。

# 归化城皮毛行业的兴衰

刘映元

## 一、兴衰始末

地处北疆的内蒙古，牛羊遍野，盛产皮毛，有着纺织、制革的丰富资源，但因在海禁未开之前，缺乏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当地作坊只能做些粗陋的毡制品，如毛毡、地毯、毡袜、毡鞋、毡帽、帐篷以及皮衣皮裤等。这些东西销路有限，大都限于本地，而本地即使农区也是半农半牧，自给有余，城市消费当然更有限了。因此，作为北疆重要商埠之一的归化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土拨毛店，在这些店里的掌柜或学徒生活都比其他行业清苦。自1901年（清光绪27年）海禁大开，外商在天津开办洋行，这里的皮毛贸易才逐渐兴旺了起来。以后随政局变化的影响，也出现过几起几伏的波动。

最早的皮张交易。关于皮张交易，以前是在大厅巷口土默特旗都统衙门的照壁前面。据老年人们传说，土默特旗的都统，嫌住在归化城寂寞，为热闹起见，特让市场设在衙门前，以后又把税厅修盖在那里。这个税厅是归化关的前身，在此征收一切商税。为了和新城专收马税的马税厅（在新城马税厅巷）有所区别，故把这个税厅称为大厅。皮张在大厅巷交易，市场便叫成皮厅子。

皮厅子没有牙纪，由皮贩子和皮庄直接交易。皮贩子和皮庄的区别只有一点，皮贩子是独资单干，皮庄则有财东。皮贩子比皮庄在先，汉民中有赵家，回民中有冯家、满家、吴家、杨家。这些人不仅有识别能力，而且有加工技艺。把皮张收回加工拾掇后，再卖给皮革作坊，遂形成父子相传。

再早皮毛没有税捐，所谓“东栏拒，西栏拒，做了一辈子买卖不上税”。以后设立了归化关，才开始征税。每天上午，皮贩子把皮张



用木制独轮小车推到皮厅子，归化关的税务人员就地征收。到了晌午没有卖完的推回家去，明天再卖。庚子年（1900年）后，皮毛市场繁荣，普通人也贩卖起皮张，大厅巷停不下好几百辆独轮木车，皮厅子移到西马道巷土默特旗的仓房院内（即现在的人民电影院处）。到塞北关成立，皮厅子取消，改由皮庄和皮毛店报税。

当羊马店发展成为皮毛牲畜店以后，皮厅子已经取消，在皮厅子存在期间，他们都不做皮毛交易。

归化城的皮毛来源大致有这样几个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内蒙的乌兰察布盟、阿拉善旗的王爷地、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土默特旗各县和察哈尔东四旗；伊克昭盟和陕北的皮毛到包头交易，有时也来归化城。庚子年以后，归化城的牲畜皮毛市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特别是羊毛、羊皮、驼毛、猪鬃，有了出口过洋的广阔销路，天津洋行来到归化城以后，商业界打破了过去的老规矩，不仅干羊店、马店、驼庄、皮庄这些行业很自然地兼营起过去他们瞧不起的土拨毛店业务，连过去经营茶布烟糖的通事行小召半道街的万盛泰，也在太平召前组织了万盛合皮毛牲畜店，座落在大南街而归化城最古老的东胜店、通顺店、长泰店都增添了皮毛业务。至于集资新开的还有不少，其中座落在北沙梁的集生祥就是这期间应运而生又影响很大的一家。集生祥是由干羊店学徒出身的李祥集资四千五百银元，于1908年开创的。到1919年李祥病逝，集生祥已成为拥有四十万元资产，和包头广恒西皮毛店享有同等盛誉的皮毛牲畜店。

民国以后，归化城皮毛市场大大波动，第一次发生在欧战期间。因为洋行停止收购，皮毛价格一落千丈，归化福合成把一批毛存到天津货栈（那里规定存货交付栈租，归化城货栈存货不付栈租），结果把个姓贾的掌柜（大同人）愁得一黑夜白了半部胡须。其它毛店积压之毛也多起虫报废，赔钱倒闭者不少，只有集生祥信息灵通未吃此亏。1918年（民国七年）欧战快要结束时，集生祥的经理李祥估计皮毛一定要起行情，但银行票号早已停止了对皮毛牲

畜行业的贷款,他干着急没有办法,让他的朋友,隆盛庄的寿山老财大量囤积皮毛,结果寿山老财一下子赚了二十多万银元。

从1919年开始,归化城的皮毛牲畜市场又恢复了繁荣。单是集生祥一家就住着十几家洋行,还有北京和锦州的客人,加上外路和通事行驻城坐柜掌柜,人数经常不下二百多人。这时归化城的皮毛牲畜店注意起饮食茶饭,想尽方法和饮食业争夺买卖。集生祥的集生伙房把荣隆元饭庄(归化城有名的饭庄)的灶王请来炒菜。由柜上支垫柴炭米面油酒肉菜,按柜上三成工人七成分红,共用十四个人。这个掌灶的张德厚每年能收入一千多银元,由此可以设想皮毛牲畜行业业务多么兴旺,收入多么可观。

可是好景不长,在1920年就遇上库伦的变乱。这一年红党把恩琴的白党打退以后,就开始限制中国商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在这之前,外蒙虽然由哲布尊丹巴领导独立,但是买卖人照常营业。由于皮毛牲畜能够出口,走外路的比前清时还增加许多。但是1920年以后,能换沙板银子的沙俄钞票变成废纸,外路商人因之大受损失。与此同时,因与俄商断绝来往,新疆的皮毛都挤过绥包两地。从此归化城的皮毛业便走了下坡路。

1926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因为抵制帝国主义,打击买办阶级,特别是冯玉祥出的西北银行钞票在国民军西退时作废,使得绥远的牲畜皮毛业市场冷落了一年多。

外路完全不通,从1930年开始。在这之前,羊马虽然受到限制,皮毛还能走私。由1920年到1930年这一阶段,只有英国的仁记洋行利用英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什么营业都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他们把走外路的买卖人吸收了好多,共支出十几顶房子以汽车作运输,在新旧城马路中间设有堆栈,做了一个时期的独家买卖。1930年外蒙经济封锁以后,仁记也受了很大损失。这次归化城的皮毛牲畜店因支垫外路客人破产的很多。集生祥有八九万元收不回来,因而进行了改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除了塞北关、清源局征税,还有筹饷局向

皮毛牲畜行勒索。傅作义担任绥远省主席后，把筹餉局取消，只由塞北关按货物品种打税，烟征印花税局打印花税。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二年，由于把大股土匪剿除，零星土匪也敛迹。绥远农村的畜牧业和农业一样，逐年增产，故本地的套毛、抓毛及皮张年有增加，皮毛生意也有起色。

日寇统治时期，先是把皮毛列入军用品，以低价强迫收购，后来由三井三菱等五大公司垄断。商人因无利可图多把皮毛藏起，更不到远方开辟货源。日本人发现市场停滞，决定以物易物，在特务机关之下，成立了西北通商公会，由德丰祥经理张廷玺为会长，各牲畜皮毛店为委员。皮毛商中的红纸幌子和甘肃的山西帮商人来往，客人经过国民党统治的关卡不断把皮毛运来，并且用日本人统制的物资，在乌盟和土默特旗各地换毛，很受牧主和地主们欢迎。所以皮毛生意比日本军队统制时期和洋行垄断时期略有起色，皮毛店中的白纸幌子如曹玉亭、马永祥等，利用伊斯兰教的关系，和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等军阀联系，进行走私活动，曾获不少暴利。

归化城自从沦陷以后，因过去此地百姓受过西北银行（冯玉祥出的票子）、奉天官银号（张作霖所出东北钞票）、山西省银行（阎锡山所办）掠夺（钞票随各军阀的倒台而作废），知道蒙疆银行更不会长久，市场交易开始以布疋为核算单位。1945年国民党回到归绥，以为皮毛牲畜店仓库中的布疋都是敌伪的物资，便由李居义领导的接收委员会派科长赵亚民封了各家仓库，后来查明按市价收购，给傅作义的军队做了军衣。当年冬天把布疋起走，到1946年春天才付款，国民党银行出的法币日渐贬值，所得价款加上十倍也买不回原来的布疋。集生祥这一次损失了一千多疋，德丰祥因有傅作义的骑兵十二旅旅长鄂友三给顶门户，没有受到损失。此后，因内战干扰，到解放时，皮毛行由五十多家减少到十五六家。

## 二、白皮行

解放前归化城的工商业发展虽较现在相差很远，但也是雁门

关外较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黑白皮业非常繁荣，分工也细，有制作细皮的，也有生产粗皮的（老羊皮、山羊皮等），而生产粗皮的还有分类。我这里要叙述的是关于白皮业的产销情况。

归化城在极盛时期成立字号的白皮作坊有 80 多家，三五朋合的小皮坊不下 200 多家，从事这一行生产的共有 4000 多工人。最早的经营者是山西交城人。小西街的晋盛显最早，其次是乾隆年间在晋阳楼巷开设的永和盛，以后，随着本城的繁荣，又有定襄人、大同人以及河北省的里府人设的作坊。大同人开的作坊通称为“大同班子”，他们后来居上，几乎控制了归化城的白皮业生产。熟羊皮的工人又叫“毛毛匠”，先前以口外清水河厅和山西代州人居多，到了民国时期差不多尽是大同人了。

这一行经营最久规模最大的，除前述晋盛显、永和盛两家外，还有剪子巷的三盛永，大南街的王盛祥（以上均属定襄人经营），小东街里府人开的春永泰和大同人开的德和永、聚和昌。其中以晋盛显、永和盛、三盛永、王盛祥最为殷实。另外，在天主堂和城隍庙中间曾经有过一个工艺局，系河北人姓蒋的和姓崔的两个人创办，专门给“洋行”做山羊皮皮褥子，经常有 100 多工人操作，工人比规模较大的其它白皮坊超过半数。但为时不久，随着“洋行”停止定货而停止业务。

这一行的原料来源是向皮庄购买，所以不直接向牧民或皮毛店买，是为了挑选方便。这是指老羊皮而言，至于七月皮则是从市民中的皮贩子手中购买。单永和胜所需的皮子每年就是 12000 多张。在币值稳定的抗日战争以前，每张羊皮最贵达到一元二角钱，最贱低到七角、四角。这些作坊须头年七月垫出资金收购羊皮，到第二年腊月才能把成品变成现钱收回，因为这样周转缓慢，钱行不肯给予贷款，所以自己必须资力雄厚。

白皮作坊每年必须在阴历二月初二开工。解放前的买卖因属私人竞争，从事本行业务的又多，非常注意生产质量，生怕败坏了

自己的名誉。洗皮以前要经过十二道工序：濠皮、用鞭杆打，竹板抽，剪刀剪如此反复三次，才用小车推到附近的扎达海河洗皮。老师傅从事这项操作剪毛每天 24 张，抓毛则为 12 张，其它都由徒工完成。

谷雨以后，开始安缸。把洗好的皮子先用火硝熟五天，然后铲除肉渣，再用糜米稀粥泡 10 天至 17 天（根据气温决定），捞出晒干濠温以后，再铲一次才拿去上案。铲皮很费苦力，七月十五以前昼长夜短，每日定额 12 张，以后减为日铲十二张。这一行主要制作皮裤、皮袄、皮褥子、皮坎肩。小东街那三家专做山羊皮的，还制粉皮套裤和粉皮坎肩。粉皮是用化学药品泡制的山羊皮板子（即去毛皮）。最初此类产品只有河北人会熟，以后山西人也学会。白皮袄上案以后的定额每日两件，皮裤、皮褥、皮被每天三件，皮坎肩每天五件。还有一个规矩，即使提前完成定额，也不许提前收工，恐怕针线缝得不密，影响产品质量。

抗日战争以前，粉皮曾行销于平津沪一带，好多仕女用粉皮制作大衣。由于粉皮美观，特别是比棉布耐实，也很受劳动人民欢迎，山西、绥远许多赶车的、拉骆驼的也穿粉皮制作的坎肩和皮裤。一般商民也把粉皮当作春秋两季的衣料。后来因为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而粉皮价格昂贵，销路就不畅旺。日寇占领时期，对皮毛实行统制，市场上就看不见粉皮了。老羊皮腿短，只能在本市和郊区一带销售，山西河北天暖，不需这种皮制品。

有门市部的字号，从七月十五挂出商品，到农历十一月收市。这些门市部都是皮坊掌柜向房产主常年租用的。当他们的皮货销售季节过去，腊月又把门市铺面转租给天津杨柳青的商贩出售年画，正月以后则租给河北顺德府的布商使用，这样转租的钱满够他们的全年租金。粉皮生意则不受季节限制，常年做门市生意。

白皮行若和皮毛贸易的商业比是很不被人瞧得起的行业，但相对的算一种没有风险的所谓熬不熟煮不烂的行业。因为它的原料和成品是随高随低的，当然有一定利润。利润是由工人劳动创

造,有一定核算的。最贵时一件皮袄可卖十二三元,而一张皮子只卖一块二毛钱,最贱时一件皮袄卖四五元,但一张羊皮才卖四毛至七毛。就以永和盛为例,乾隆年间创办时,投资三千两银子。三年一算帐,一俸生意能开一千两至三千两红利。到公私合营时还有资金一万元。

手工业作坊固然需要资本,但它的利润,更多的还是依靠剥削工人的劳动力而来。所以,作坊掌柜对工人的待遇很苛刻,白皮坊更甚一些。此行工人来源分自己培养和雇用师傅两种。来这里学手艺无论出身贵贱,一律以徒工待遇。掌柜先生也都是徒工出身的里手。他们把自己工作完成以后即拿起工具入缸上案。除上年纪的老掌柜,每天早上可以到茶馆中吃几盘烧卖,其他人都是一锅饭。只有初一、十五的午饭以肉菜、馒头改善,平日都是早晨稀饭、炒面(用炒熟的莜麦和黄豆加工磨制而成),中午莜面、荞面。洗皮时略提高点,吃混面(麸皮较多的白面)馒头或面条,铲皮时给老师傅炒菜喝酒。每年除端午、中秋两大节休息外,只有五月初八,六月二十三的庙会(唱社戏)放假玩一玩,其它日子概不休息。中秋节除共分一个大团圆饼外,从十六到二十每天每人给半个小月饼。春节时交城班子可以吃一个月饺子,其它班子过了初八即吃家常便饭。这在当时的归化城来说标准最低。银行票号大摆一月的海味席,他们平时的伙食也比作坊工人过年的茶饭优越。

徒工学艺期间,每年只给一疋老布,一件皮袄,一顶毡帽,一双毛鞋。衬衣和布鞋布袜都由家里供给。唱外台戏时给一百制钱(相当于钞票二角)零花。春节押岁钱最多不超过二元。

学徒期间很少得到休息,老师傅睡觉时,徒工们学习铲皮。学徒的第二年就得推车洗皮,走时因为是干皮只有一百多斤重,回来是湿皮重量达到三百多斤。这些徒工多数是十六七岁的孩子,过重的劳动大大损害了正在发育的身体。到了第三个年头,艺高的顶一个老师傅使用,艺低的两个顶一个师傅使用,每年按三十吊至五十吊挣钱,以后逐年增加三至五吊。前清时,五十吊钱折合银币十二

三元。

徒工由掌柜掌握，学艺之外得给掌柜和师傅端茶进水倒便壶。在掌柜师傅面前都要恭恭敬敬地接受传艺教诲。每晚十一点后才能休息。学艺期满，有一线希望，就是忠诚老实地按铺规劳动几年后可顶一二厘生意（即股份），为此就得苦撑下去。掌柜掌握着一支基本队伍，不怕临时雇用的老师傅罢工。

这里所指的老师傅是从外边雇来的熟练工人。学徒期满，也可到别的作坊做营生，作坊根据技艺也按老师傅待遇。半月评议工资一次。平时每日挣一吊钱，忙月可挣两吊钱。平均工资每月有十元上下。老师傅在收工以后，即可自由行动，不受坊规约束。这时，其中有为了减乏吸食鸦片的，也有嫖妓宿娼的。不过多数很守本分。秋天是本行旺季，有不少老师傅拿上铲刀及其它工具到后山农村牧区串户单干。这些地方工资又高，茶饭又好。这期间，城里的作坊非常缺人，不得不提高工资。

前清时，这种行业资方和工人都有会社组织。代表资方的有白皮行、黑皮行和细皮行合组的威震社，工人的组织是义和社。每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在关帝庙唱三天戏酬神。平日议事的地方在通顺街万盛斋茶馆。这两个代表劳资双方的会社都供奉轩辕皇帝为祖师。

手工业工人因受资方的封建统治很严，罢工是极其罕见的。宣统年间有一次全行业的罢工。此行相沿成习，每半月协议工资时由义和社名叫侯挠子的通知威震社的会首传令各家执行。有一次资方拒绝工人所提要求，便发生了全行业的罢工。罢工期间连柜上的伙计也得停工，因为侯挠子在各家作坊中查看。当时永和盛掌柜照样领工操作，侯挠子进去二话不说，拿起案上裁刀就向掌柜头上砍，掌柜无奈才让停工。结果，这次罢工工人得到彻底胜利。

侯挠子原是胶坊徒工出身，也会制皮手艺。因为他胆子大，所以义和社的工人们就公推他为工人领袖。平时，他以义和社的布施生活，有了事就当顶命好汉。所以黑、白皮坊的掌柜都很怕他。不

过他也公道,过分要求他是不予支持。因为罢工期间不仅照发工资,而且工人在茶馆、饭铺中的花费也要资方开付,资方只好让步。

民国以后,威震社改为熟皮业公会,属商会统一领导。每家字号对公会一年上三五十吊布施。公会的花销也少,一年只在关帝庙唱一台戏。庙上的山门、大殿、钟鼓楼都有红哈拉(一种细呢料)黑大绒镶边的扯檐(即帐幔),还有四五十对宫灯。所有这些开支较之收入微乎其微。义和社也如此,好几千工人只是多一个侯挠子的生活开支,其它花销没有。所以公会存钱不少。

民国时代,官厅镇压加强,工人不敢罢工,义和社逐渐瓦解。侯挠子给西龙王庙农户看了菜园。这个时期因军阀混战不息,苛捐杂税猛增,尤其是白皮业,还得给军队缝制皮大氅,负担日甚一日。给军队缝制军皮衣也给低廉的工价。其中有少数的皮坊,因贿赂军需人员,偷工减料,粗制滥造获了大利,但多数是赔本的。特别是给孙殿英的四十一军赶制皮衣时,数量很大,结果孙军彻底失败,连一文钱也收不回来,因赔本歇业了二十多家皮坊。其它也多改营他业。

沦陷时,日本侵略者统制皮毛,摊派又多,营业也极萧条。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挑起内战,到处抓丁拉夫,各行各业都受打击,百业俱废,作为靠青壮劳力生产的手工业作坊,更无法应付此种局面,实难勉力支持。连走村上山的年轻毛毛匠也没有了。

直到解放,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这才彻底翻身,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康庄大道。皮革生产都纳入国营范围,工人的劳动条件大大改善,按劳分配,生活待遇更是公平合理。因为再不受剥削了,所以每个工人家庭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 三、黑皮业与香皮业

原来归化城最早的制革作坊熏皮行属于靴行、毡行和京鞍行。清朝乾隆年间,长城口外进入农业社会以后,才有黑行。到1921年京绥铁路通车,又由黑皮行业中分支出香皮行业。靴行、毡行、京鞍行的产品主要是供应牧民,黑皮产品则主要供应农民,香皮产品除



了供应靴铺,主要售给京鞋庄和军衣庄。并且经过他们的加工再供应城市居民和军队。除此以外,在制革作坊中还有一种弓弦行。自从枪炮代替弓箭以后,此行只制作毡坊用的弹毛弓弦和牧民套马杆上用的弓弦。

山西和绥远是只隔一道边墙的近邻,归化城的毡行和薰皮行多由山西代县人和大同人开设作坊。由于河北束鹿县的新集镇是我国北方皮革生产和集散地,所以归化城的黑皮行和香皮行多被束鹿人把持。束鹿王家的全聚号在上海、武汉等好多大城市都有皮庄附设作坊。大有束鹿皮匠足迹遍天下的势头。黑行与香行在归化城的皮革行业中,不仅自成一个独特行业,而且有一套不同于山西商人的经营管理办法。

黑行里边分专做蒙古靴的黑皮行和皮条杆上的两种,黑皮行生产钉鞋和鞋面用的股子皮,装饰蒙古靴的散子皮。也生产制造蒙古靴和股子皮的半成品,这些半成品又运往束鹿新集镇加工。据说因为新集镇水土好,所以这种皮张誉满全国,还有出口。此外还兼营一种熏皮行的业务,生产制造蒙古靴的花皮和皮底。鞭杆儿的就是挽具行,他们生产车和农具上用的皮带,还将皮带编制成绳。在街上设有门市销售,不象黑皮坊都集中在四眼井巷和兴隆巷

归化城最老的黑皮坊叫万春长,谢子英的父亲谢老大在光绪年间创办双盛永以前就在那里学艺。规模最大的是四合义。它兼营黑皮、挽具和熏皮三种业务。因为黑皮的设备简单,容易单干,大一点的字号、作坊很难维持长久,三五人朋合的作坊最多。在香行兴起以前,归化城的黑行有字号名称的四五十家,其中设有门市的挽具行约有十几家。至于小作坊则很难估计,从事黑皮生产的工人经常有五百上下。

黑行不论是单生产股子皮或兼生产挽具与熏皮,字号的掌柜都是工把子出身,全聚号在归化城只开设增记毡坊。黑行由工人出身的掌柜经营,多年来摸索出一套利用工人的办法。河北帮对徒工一开始就比山西帮厚道。在学艺三年期间,每月工资三元,除了零

衣零用而外,有余钱积攒,在学艺期满后第一次回家时,都能用平日存钱买一匹好马骑回老家。至于平日的饭菜与其它行业相同,不过春节期间,不分掌柜工人都吃一样饭,可吃半月饺子,都有酒菜。

学徒三年出徒,此时即按师傅待遇,月工资八元,年终都有馈送,馈送比工资多。工资好象掌柜们的应支,馈送等于红利。掌柜分红按生意的厘股作为标准,老师傅的馈送按平日表现。老师傅们为了争取年终多得馈送,每天从天亮以后即开始劳动,除了吃饭和中午休息,一直干到日落,从不计较件数。黑行的生产不受季节限制,生活比白皮坊、毡坊有保障。

黑行供奉的祖师爷是白眉佛爷,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唱酬神戏。黑行的资方和河北来的其它行业的买卖人合组一个会社叫京都社,此社在三官庙。黑行的工人没有行会组织。因为其资方比较厚道,分配原则基本是大河水涨,小河沾光,工人的收入随买卖的收益多少有所增减,工人的利益比较地说和资方接近一致,加之河北人在绥远的较少,掌柜可以用同乡关系把大伙团结在一起。

黑行的掌柜对待工人比白皮坊厚道,还有一个原因,除了挽具业工序比较复杂,制造股子皮很容易单干,掌柜们恐怕老师傅自开小作坊,买卖赚了钱不能馈送过少。老师傅有两条出路,掌柜们待承好就不离开原作坊,可由普通工人升为领桌子的工头,再由工头升为顶生意的掌柜。如果待承不好,只要积攒一二百元,买上一些简单设备就可开小作坊。不过,不管是想当掌柜或想单干,必须以忠诚老实取信,否则得不到社会的支持,因此,黑行工人不走毛毛匠靴匠的斗争道路。

黑皮行的原料主要是马皮、牛皮,驼皮、驴皮比较少用。皮斤子存在时,在这里购买,以后,来源多方。一是向回民屠行和汉民死马行买,二是来自广大农村,农民都是送货上门。每个作坊有几口缸就行,需求量不大,完全可以满足供应。因此,这一行的工人离开城市下乡照样可以生产。以一个工人一天制造一张皮子计算,归化城单是黑行每年就能生产六万多张。成品除供应本地靴铺和京靴庄

外,还行销于山西雁北地区。因为是一种肮脏行业,不为官方注目,税率很低。

香皮行是利用化学药品和简单机器制作,这是从黑皮行分支出来的一个新行业。香皮行简称香行,因为它首先制作的是香牛皮,所以称为香行。以后又制作红色的花旗底皮,为了与白皮坊、黑皮坊相区别,皮革行业中又称为红行。黑行改香行也是从河北束鹿县开始,他们先是在海拉尔从俄国人手里学会制香牛皮的手艺,以后又在天津学会皮鞋用革的手艺。归化城的黑行改香行在张家口之后。为了适应靴铺的需要,民国初年,双盛永、义和昌、公义德三家就首先制造香牛皮,那时机器技术两难,为了压制花纹,只好把有格的铜板固定在上面,再用小车推轧,到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三家才有了压皮机器。

香牛皮靴子深受外蒙古和内蒙乌兰察布蒙民的欢迎,它的销路畅盛。京绥铁路通车后,归化城又增加了美华号、吉升斋等时新鞋店,大同源军衣庄也成立,原来这些京鞋店都用外国原料,为了降低成本,便就地取材,结果大大刺激了本地香皮业的发展。以后香行除了制造香牛皮,红蓝底皮,还能制造皮鞋用的面皮、油皮、黑子皮,以及大同源用的军装皮和皮箱皮。因而黑行改为香行的买卖作坊一天比一天增多,放弃黑行专营香行的生意也出现了。规模最大的有双盛永、双德永、福义德、盛记、义记等,每家经常操作的不下十几个工人,个人单干的则不计其数。

福义德的掌柜袁福贵于1917年把他的表弟王维成找来制香牛皮,到1925年就成了一个能制造各种新产品的皮革作坊,平均每天下缸二十张牛皮,一年能出成品七千张,当时每张牛皮买价不过二两多银子,卖价则为六两。一方尺售二千钱,单此一项就可获利两万两银子,还不算其它皮张的收入。香行老艺人马腾芳,1925年来归化城学艺在福义德就不学黑行手艺,专学香皮制作技术。

黑行改香行后,有的人依旧不放弃黑行这一业务,如双盛永的掌柜谢老大叫他的儿子仍学股子皮手艺,其观点是怕把束鹿人的

祖传手艺传脱。对于工人的茶饭，平时仍是稀粥炒面，莜面山药蛋。只是对制香皮的老师傅提高了工资，由八元增加到十二元。但多数香行一则因业务兴旺，二则受京货店如德华兴、美华号等影响，生活大加改善，上午馒头稀饭咸菜，下午是炒菜馒头。特别是手艺不传外路人的束鹿人，打破了保守陈规，也招收大同人学徒了。后来大同人开过一个福德魁香行，不过终因竞争不过束鹿人而宣告歇业。

香行经历的黄金时代是1921年京绥铁路通车到1928年张库公路断绝这一阶段。香行的谢子英白手起家，在归化城购置下七八处房地产，开小作坊的工人马腾芳也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财。从1928年后，香行走上了下坡路。其原因之一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高级皮鞋的需求量不断上升，而香行生产技术不能迎头革新，产品不受欢迎；其二，外蒙这一市场受到限制，而乌、伊两盟除王公仕官外，广大牧民买不起香牛皮靴。因此，销路越来越窄。

归化城沦陷时期，日本人统制皮毛，成立了皮革组合，那时只有五十八家皮坊，日本投降后，因国民党抓兵要粮影响仍无起色。解放后，皮坊都加入了公私合营行列，随着操作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迈入机械化生产阶段，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 四、永和成毡坊

草原商业城市归化城，地处北疆，气候寒冷，毡制品是不可缺少的防寒用品，销路也极宽广，好的毡制品能远销新疆，至于邻省如山西、河北等地也争相购买，所以当时此地的毡坊很多。清末有三十多家，极盛时期达到五十多家。本行业分为两种行当，永和成、公和成、裕盛丰专做毡帽、毡鞋，天元成和天和公专制毛毡、绒毡。其中以永和成的制品最为精良，远销到太原以南和新疆的奇台、伊犁。特别是它的毡帽深受广大农民欢迎，所谓“永和成的帽子，永升斋的鞋”（布鞋），成为归化城的名牌产品。

永和成毡坊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最初由太原府属南县人创办，光绪初年进行过第一次改组。财东除了祁县王家又增添了忻县冯

家和武川县小五号村的张公和老财。在此期间，老掌柜们总是墨守陈规，满足现状。本来可以扩大业务品种，但他们只生产毡帽和少量毛鞋。每年只生产毡帽两万多顶，毛鞋两千多双。毡帽分大帽、小帽两种，大帽象毡笠，行销于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由通顺街的兴盛魁，小召夹道巷的义成昌、兴隆巷的天盛恒和小西街的复盛兴，这几家西庄贩运到新疆奇台和伊犁等地出售，故归化城街上不易看到。生产大帽的毡坊除永和成外，还有兴和成、裕盛丰两家。大帽所用原料比小帽多，获利也远比小帽多，所以永和成是以小帽争名誉，以大帽作根本。大帽生产占毡帽生产的百分之八十，小帽占百分之二十，尽管销路畅旺，但永和成从清末到民初，一直保持着十个掌柜、五十多名老师傅和徒弟这样一个不大的作坊规模。只维持着一种帐帐开红，掌柜天天过小灶生活的小康局面，虽不寻求改革与创新。归化城的毡坊和皮坊一样，多半是由工把子出身的掌柜执领，唯独毛坊中的永和成和皮坊中的三盛玉，是由非工把子出身的掌柜掌握。因而按掌柜、伙计、工人分别设两个伙房。小伙房按照南县班子的规矩，每顿饭都有几个肉菜，晚饭还要喝酒。永和成的原料是向皮毛店和洋行购买，掌柜、伙计的待遇和原料成本都比各家为高。进入民国，机器制造的礼帽多代替了归化城的毡帽，永和成的业务大受影响，到1934年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这时永和成欠泰和昌五百两银子无力偿还。永和成的经理蒋礼和泰和昌经理李昆都是忻县人，缘于这种同乡关系，蒋礼愿把永和成让给李昆接办。李昆因永和成这面招牌很亮，同意接收。再拿出五百块现洋另外又招了段芝言、赵廷芳、郭绍先等三人，加上旧财东和他的本家共凑成四千元新股。除了买下铺底，按百分之六十开销了旧股，剩下两千五百元资金。李昆和赵廷芳就让住过西庄的李昆的儿子李掌运参与经营，改组后仍由蒋礼任经理，李掌运任副理，于1934年阴历五月，把永和成更名为永和成吉记，正式经营起业务。永和成吉记共四十财股，每个身股二分六厘，财股每百元年付利息五元；身股每人每年坐底工资五十元，每厘生意再加二十

元。红利按人六财四分配。三年算一次帐,成了一种公司性质。由永和成的改组可以看出一个问题,三十年代,金融资本已控制了工商业。

原来归化城的毡坊其经营管理大致是:掌柜负责经营管理,生产则主要依靠工人。工人由学毡匠手艺开始。这是一种劳动强度高受剥削大的手艺行当,所以徒工多来自大同农村中贫寒人家的子弟,做徒工时的待遇是很差的,学艺的头一、二年,柜上只供给单棉衣各一套,单帽一顶,夹鞋一双,和老师傅一起吃大锅饭。平常是早晚稀粥炒面,中午莜面、荞面换着吃,初一、十五中午吃肉烩菜馒头,此外四大节给予改善,即正月十五、五月端午、八月十五,最后是春节。这些节日和顶生意掌柜吃一样的饭。可是春节期间,掌柜们吃一月饺子,而工人只吃五天,除十五外,都是平时的茶饭。除祖师爷诞辰唱外台戏时给毛二八分的茶水钱外,概无其它待遇。到了第三年,基本上学成手艺。这时,生产出的商品以百分之五十无偿地交给柜上,百分之五十则按件计酬,归了带领的师傅,所谓谢师报酬,到了第四年以百分之八十无偿交给柜上,百分之二十归了师傅。此后,才能作为师傅看待,并享受工资待遇。自李掌运担任副理才略加改善其生活待遇。除每人增加一顶毡帽和毛咯噔(毛制靴)而外,还在初一十五请老师傅们吃两顿烧卖。其它照旧。徒工出徒以后,他们就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向资方靠拢,由柜上提拔为领桌子的头儿,成了顶生意掌柜;另一是自寻出路,或到乡下单干,或者参加作坊劳动,成了计件拿钱的工人。归化城各毡坊的掌柜多是徒工出身,他们为了不让徒工成为全面手,限制极严,学洗毛的不学铺毛,学制帽的不许学制鞋,甚至绒毛也要分工,所以非特别聪明并加意留心的徒工很难成为这一行的全面手。徒工以二年时间即可掌握技艺,其余二年可以说完全为师傅和掌柜效劳。为防徒工中途离开,还订有如卖身契一样的契约。学徒不满四年离开者,要包赔学徒期间在柜上的花费。因此,必须忍痛白受四年,才可得到人身自由。

毡坊是一种季节性较强的行业，通常是农历二月初二开工，到九月九日码工，门市是七月十五开工到腊月三十结工。在码工期间，除徒工和少数老师傅而外，其余的老师傅都各回各家。老师傅和掌柜的关系是看谁控制住谁。春天是淡季，老师傅便向掌柜屈服，到了四月初一以后，开始抓毛，掌柜便比较地向老师傅让步。老师傅的工资是月月议价，初一、十五开支。毡毯社的资方，能随意提降工资。由于毡匠的公会组织义和社，不如毛毛匠的义和社团结有力，所以这一行的老师傅斗不过掌柜。特别是民国成立以后，工人受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势力、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越发处于被资本家摆布的境地。掌柜掌握着好多徒工，老师傅很难发动罢工。掌柜把徒工看作自己的基本队伍，被领桌的头儿管理得唯命是从，老师傅则随便可以在作坊中赌钱或吸食鸦片，生活散漫腐化。归化城在沦陷以前币值稳定，老师傅可以月入十元左右工资，（可买三百多斤粗粮）养活老婆儿女不成问题。他们若和家乡农民比较，生活优越许多，因此满足现状，不求提高地位。

永和成在第二次改组以后，为节省开支，小伙房每天吃肉不能超过一斤；开除了有鸦片烟瘾的几个掌柜；每晚十时前熄灯，以保证师傅和徒工的休息。更主要的是在开源方面，打破陈规。从原料来源和业务经营方面开辟新路，进行了以下改革：

先前，永和成生产的毡鞋较粗笨，随着时代的进化，它已成了穷嫌富不爱的东西。新参加的副理张掌运看见毛咯噎非常时新，1934年以前此地只有四五个河北清苑县人会这种手艺，张掌运以最高的工资于1935年把他们聘请到柜上。这些师傅和柜上掌柜们吃一样的小灶伙食，每月拿三十多元工资。经过一年以后，永和成的徒工就掌握了这种手艺。生产的这种毡鞋以优质低价出售，结果在京绥铁路西段各城镇和甘肃武威一带打开了销路。

其时市场上很流行土耳其式皮帽，刘掌运叫工人们试制了几顶毡的，送到国货展览馆展销，很受各方面欢迎。从此，这种土耳其式毡帽就成了官、绅、商人和地主们春秋时节的时髦帽子，建设厅

的厅长冯曦首先戴了一顶。为了扩大销路,还由经理蒋礼带上样品到太原和西北土产公司签订合同,一时行销于晋绥两省。随后,其它各家制帽毡坊也仿制起来。永和成仅此一项年售五千余顶。这项改革给柜上增收不少利润。以后,永和成又试制了一种毡军帽,也打开了销路。晋绥军驻绥远大同的士兵,春秋两季都戴这种帽子,而且由归化城制帽的毡坊供应。为了扩大业务,永和成又增加了制做毛毡和绒毡的业务。

由于业务的扩展,永和成每年新招徒工十人,作坊由八间扩展为十间,老师傅和徒工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这样一来,原料就成了问题。过去多少年都是向洋行和毛店买毛,要经过几层剥削,需要的毛越多,所受剥削也越多。于是,从1935年开始,刘掌运便派顶生意掌柜亲自到后山和牧主直接购买。采购的方法是:头年给卖方预支一部分款项和商品,第二年下毛季节去抓毛。1936年,每斤羊毛只一角二分钱,一斤羊绒不过二角四分,比向毛店购自然便宜许多。不过这样做需要预先支垫本钱,有时也碰到签订合同时价高,付毛时价跌这种情况,但总比向毛店购买便宜得多。由于买毛支垫茶布,抓下的毛,自己不适用的又需卖给毛店,永和成无形中又兼营了货行和皮毛行的业务。如遇商品上涨,索性弃工经商,如果买卖茶布和皮毛可以谋取暴利,干脆把毡坊业务停止,全力投入商业。

抓毛在每年清明和立秋以后,分两次进行。届时,柜上只留少数人看门,老师傅和徒工全体出动。为了争取时间,办好事情,出发以前和回来以后,均吃好饭,并请师傅和徒工吃几顿烧卖,以示酬劳。

由于以上几项改革,永和成的生意蒸蒸日上。在1937年的开头一帐,每份身股就开红三百银洋,连同财股的红利和公积金,以及增加的一个财神股子,三年当中获纯利四千多元,还不算换毛的货品和存下的绒毛等厚成。买卖正做得顺手的时候,日寇侵占绥包。沦陷以后,柜上召开了一次股东会议,决定了应付时局的办法:



一、把资金财产一律折成布疋，以此实物作为核算单位，免遭伪蒙疆银行钞票祸害；二、由三年开红改为年年分红，以预防环境恶化抽不出资金；三、根据情况，把业务搞活，尽量经营“早种早收”的本行外的业务。

在沦陷以后的头一二年，还能进行正常业务。1940年，环境起了重大变化，一是日本占领者统制皮毛，禁止毡坊生产非军事产品；再是后山的八路军和自卫军进行反封锁，禁止商人前去抓毛。这时毡坊给伪警察花钱由他们掩护，白天休息，晚上操作，日本人就发觉不了。对待抗日军的办法则是给他们捐献毡袜毡鞋，达到既能抓毛也能生产的目的。

1940年春天，日寇发动进攻河套的战争，结果受到傅作义部的反击，以失败告终。沦陷区的人信心倍增。永和成的张掌运原是西庄出身的商人，对甘肃、青海一带商务熟悉，听说在那里经商的同乡都发了财，张掌运便决定向西路再开辟一条出路。一面在归化城继续维持作坊生意，一面以一部分资金办成货物运到甘肃武威设庄。当时，归化城的商号到武威设庄的很多，永和成也把大部资金移往武威。

1945年日本投降以前，凉州的分号向银行贷款大做投机买卖，这年八月胜利炮一响，法币价值提高，货价猛跌，永和成在甘肃的买卖整个倾产还债。不久，归化城又打起内仗，傅作义接连征兵要粮，市上购买力锐减，特别是作坊中不能存留年轻师傅和徒工，只好把业务再加收缩。1949年，正好永和成够了十五年为一期（即股东大会）的期限，多数股东都不同意继续做下去，便抽回股金。副理张掌运因舍不得放弃永和成这三个字的牌子，仍惨淡经营，直到1952年带着铺底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 宝丰社的成立及其活动

张肇础

银钱业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最初的银钱业都是私人经营,也叫银钱商,他们除了结算商贸交易往来外,还搞银钱交易,还可以印制钱帖、银票流通城乡。随着商业的繁盛,银钱业逐渐增多,为了融通相互间的业务往来,起各业周转枢纽和总汇作用的宝丰社应运而生了。

宝丰社是清代乾嘉年间至民国 20 年间,在归化城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钱业行会组织。在其存在的二百多年内,宝丰社作为归化城钱业中枢,对归绥地区钱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组织管理也颇具特色。

归化城是清代土默川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塞外货物集散地,商贾云集,贸易兴盛。据志书记载,康熙年间,归化城土默特都统丹津从北京请来各业商人,组成“十二行”,从此有了比较完整的商业体系。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由十二行公议成立了乡耆会馆,公推乡耆四人为最高裁决人,凡商务上的纠纷、诉讼,悉由乡耆会馆公断。乡耆会馆设在归化城三贤庙内。后来这种自发的商会组织,获得官署的批准,将乡耆会馆改为乡耆办公所,由各行推举总领一人,协助乡耆处理庶务,各行公议的商业条规由乡耆总领议定。宝丰社为乡耆办公所统领下的钱业社团组织,由各钱商公推总领一人,副总领二人主持会社。总副领由各钱商轮流担任,任期一年,翌年再行轮换。宝丰社无固定办公机关,亦不专聘人员,何家钱商当选总领,即归其办事。各钱商均为宝丰社社员,遵从宝丰社号令。因此,宝丰社在市面上颇有影响。

宝丰社的活动内容主要有制订银钱行市,发放现金凭帖,总汇

各业拨兑,仲裁钱业纠纷等。

### (一)制订银钱行市

清代至民国初年,绥远地区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极其紊乱,遂出现货币兑换市场予以调剂,清代谓之“钱市”。开始时,由于交易不多,并无固定场所。后来交易不断增繁,逐渐形成有固定场所的钱业市场。宝丰社产生后,归化城各商家买卖钱银均在市口交易,每日清晨,钱行商贩集合于指定地点,按照宝丰社制订的银分(钱两兑换制钱的比价)价格和汇兑价格成交。宝丰社逐日将行市报告官厅备案,并且由官厅向各钱行抽收牙佣。宝丰社开出的钱分及汇水行市,对本省银钱交易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为银两供求有强烈的季节性,现水上下波动很大,低时每百元不过几角,高时可达一二十元之多,遇有银价涨落,宝丰社即有独霸行市的权威,以平抑银价需求。但是,宝丰社也常常利用这种银价涨落之风,大谋银钱之利。当时各钱商有争做“虎盘”者,以进行买空卖空的金融投机活动。尤其在同治光绪年间,此风尤甚,利用银钱的暴起暴落,坐拥巨万,直到官府的多次干预,宝丰社才渐有收敛。这种“虎盘”现象一直持续到废两改元以后,由于银行钞票的逐步推广,现水暴起暴落的情况才渐渐消失,至民国 16 年(1927 年)归绥钱市正式停业。

### (二)发放现金凭帖

宝丰社为调剂各钱商头寸余缺,在同业间组织临时拆借。这种交易最初为五日一期,后改为三日一期,后又改为每日进行,次日归还,利息也是逐日清算,又叫“日拆”。日拆每日都要公开行市,由宝丰社议定,挂牌公布。若有拆出拆入者成交,由宝丰社发给现金凭帖,予以办理。

### (三)兑汇各业拨兑

由于归化城地处边远,银少用巨,制钱交付频繁,便以拨兑一法代替制钱的过帐。各钱商均需靠宝丰社划转,营业始能周转。如各商相互之间有款项往来,只要收付双方将帐款登记在宝丰社过帐簿内,再把过帐簿送交自己的开户钱庄,各钱庄将应收应付帐款

逐步核对,轧出准确的应付应收差额,由宝丰社进行汇总清算。各钱庄互相该欠的差额必须在规定期限兑付清楚,否则,宝丰社有权予以警告。

#### (四)仲裁钱业纠纷

宝丰社制定有各钱商一体遵行的社章行规。若有违背者,即召开社会公议制裁;遇有钱业纠纷,必须先通过宝丰社予以调解。宝丰社为钱业领袖,同时又拥有在业务上加以限制的权力。所以,宝丰社的调解令具有极大的权威。

民国 20 年(1931 年)3 月,宝丰社依照国民政府令,改组为“钱业同业公会”,结束了它将近二百年的历史。

# 归化城的典当业

张肇础

典当业,就是以动产抵押放款为主的一种金融行业,习惯上称此项押款为“上架”,其押放在外而未收回之款项称为“存架”。典当的对象在农村主要是贫苦农民,均因生活所迫进行典当,其他阶层的人典当者也有,但为数很少,也是为了度过一时困境或其他原因而典当的。

## (一)典当业的历史沿革

清代归绥最早的典当业为康熙年间开设于归化城牛桥街的恒盛当,这是绥远地区最早的典当业。据传系山西右玉人所经营,门首悬有康熙御笔的匾额。康熙三年(1664年),典当业正式载入清朝法律。雍正六年(1728年),制定典当行帖规则。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归化城各乡村当铺就有34座,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发展到47家。由于典当业日益兴盛,清光绪十年(1884年)归化城的当铺已初具规模,发展到66家。民国时期,农村当铺虽遭匪盗骚扰,有时竟被抢劫一空,但当铺营业仍然异常活跃,至1936年仍有当铺52家。据《内蒙古自治区十年来的金融工作》记载,1934年统计的19家当铺,当进农民的犁、铧、绳套等大小农具三万余件。当时,典当业虽然官营数少,私营数多,但是私营也多有一定数量的官家资本。所以,清代官署的公款,时有发给当铺生息,并作为官署的正当收入的情况。

归化城早期经营典当业的大多为山西人,有些银钱业也同时兼营典当业。辛亥革命前,典当业务颇为发达,每年皆有盈利,这主要是因为典当内部组织严密,重视信誉,资金周转比较灵活,当商向钱庄借款营运利息较低。又有一些官款发当生息,加之当时物价

较稳定,死当容易变卖出售,所以典当业的经营情况较好,为典当业的鼎盛时期,辛亥革命后,典当业普遍遭受兵燹,元气大伤,加之废两改元以后,钱业因之逐渐衰落,典当业一向仰赖钱庄的信用,贷款告罄,遂使当商多数歇业。到1925年,归绥典当业仅剩11家,资本总计约11万元。(1934年以后,归绥的当铺才有了发展。)

军阀混战时期,农村经济逐渐破产,一般贫民所当之物,无力赎回,死当拍卖困难,典当资金呆滞,亏损严重,复遭几次币制风潮打击,典当业所剩无几。至1934年,归绥所剩的8家当铺中以义源、复源为最大,源胜、聚丰次之。8家当铺合计年终架本为40万元以上。由于农村破产,商业凋敝,商民咸赖典质周转,典当业又一度兴隆起来。典当业用缩短期限、增高利率,降低当值的办法,加重对贫苦农牧民的剥削。据记载,1934年绥远省19家当铺以23700元的代价,当入贫苦农民锄、犁、铧、镐、耙、车轮、铡草刀、爪、绳套等大小农具30224件,除按月息6分收息外,还额外索取栈租、看管费、包装费等。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绥远,归绥八大当被日伪改组为蒙疆新亚有限公司(新亚当),1942年5月伪蒙疆自治政府将所辖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伊(克昭)部分计五盟八十二旗县的47家典当业和日系4家典当业并入伪同和实业银行。至此,西部内蒙古的私人典当业已不复存在。

抗战胜利后,虽有少数当铺复业,但终因百业萧条,民力衰竭而失却其生存的土壤,加上国民政府所发行的金元券飞速贬值,当铺资本损失殆尽,典当业就此衰落。

归化城典当业的种类在清代曾以资本大小,取利高低,当期长短,纳税多寡而有质、押、典、当之分。一般质、押的规模较小。民国以后,它们之间的差异便完全混同了,概以当铺称之,少数大当仅将质、押当作为业务分类。

## 归化城的八家典当业(见下表)

单位:除注明两吊者均为银元

当业名称	开设年月	资本数	营业额	股 东	经副理	地 址
义 源	1890年(光绪十六年)	2500两	50000	太谷县 万庆利	张百年	小北街
元 茂	1892年(光绪十八年)	20000两	20000	行唐永 茂成希庄	汤质动	南柴火市
源 胜	1913年(民国2年)	7200两	40000	涂大光	柳家贵	西五十家街
聚 丰	1916年(民国5年)	30000两	30000	宝字山等	温良成	新城东街
复 源	1879年(光绪五年)	30000两	50000	社永堂等	任良达	东顺城街
日 升	1876年(光绪二年)	18000两	30000	日升光	社仕魁	通顺街
源 恒	1894年(光绪二十年)	15000两	20000	源盛当 柳家贵	柳家贵	牛桥街
兴 隆	1908年(光绪卅四年)	8000两	25000	王盛林	许亭栋	美人桥街

(资料来源:根据《民国24年全国银行年鉴》和部分档案编制)

典当业的资本可分为二类:一为自有资本,即典当股东所出股金;一为外来资本,即向钱庄银行借款或私人存款。典当业的资本额悬殊很大,有多至一二万元的,有少至数百元的。因典当除自己股东所出资本外,尚有钱庄、票号及银行的放款与私人的存款,所以架本(即典当贷放资本的总额)往往超出其自有资金的二倍以上。民国以前典当兴盛时,典当一般为独资经营,非富有殷实之家,难以胜任。因此,开办典当者大多是富商和当地的地主豪绅。民国以后,独资经营者逐渐减少,一般较大的典当均为合资组成。

典当业的内部组织比较精干、完备。一般从业人员为10人左右,设有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也有称经理、襄理的)和管帐先生、柜员等职位。大掌柜是决策人物,主管全号人事和处理重要事务。二掌柜处理日常事务,负责对外联络。三掌柜(也称柜头)总管柜台业务。管帐先生兼管文书、出纳及金银首饰等贵重押品的保管。柜员经办收当、赎当、写票、清票等业务。

### (二)典当业的业务

1、营业方法：典当业办理押当业务时，其操作程序大致是看货、商价、开票、记帐、上架、取赎及拍卖死当。即对典当物品采取按照时价折扣、作价付款、定期定息、凭票取赎、收息付物、本物两清、过期归铺的方法。

2、当物种类：当铺经营的当赎实物主要有金银首饰、衣服、毛皮、钟表、农具等。有时谷物也成为当铺的抵押品。农村主要以衣服、农具为多数，当然也有指田产抵押的，俗称放土帐。特别是在农村经济凋敝时期，下至箩筐、扁担、犁耙锹锄，只要有一点使用价值的，皆可抵押。每票当额均甚微小，以不满一元者居多。

3、当物的估价：当户持物来当，先由柜员验看货物，估物协商，但不论什么当物，再新再好，也不能当原值。柜头在估计当物价格时，须预计当物死当变卖时能售的本金及利息的最高额。一般仅以半数估计，俗称“当半”或称值十当五。但偏远地区又扣作一二成，为六折七折计算，如值十元的衣物只能当三四元左右。如果当户同意估价后，填写当票，然后交管帐先生盖章，连同贷款交给当户，当铺即将当物编号上帐，上架。当户过期不取押品就算“老号”，当铺可下架拍卖处理。当期可有长有短，但最长一般为二十四个月，最短有六个月。到期叫“满期”，满期如不能赎当，也可宽限一个时期，宽限时间可长可短，有的几个月，有的只几天。由于农村金融窘迫，当户鲜有价值高昂的当物，当铺多收当小额当物，因此当本普遍较低，最低当额为1角，1角以下不开票。最高额虽以无限制，但也不过百元，百元以上的特殊情况亦不多见。

#### 4、典当的当期与利率：

清代官署法律公定当铺月利为2%（即2分），高者亦不过2.5%，低的有1.5%。满当期为2年，满期后可以付息续当，否则，过期半年作为死号拍卖。民国时期，典当业押借的时期，最长16—18个月，最短一个月，一般以半年到一年为多。一般是月息3分，个别地区2.5分，最低的1.5分。当铺有年底减息的惯例，如到年底年初一段时间，赎当时可减少利息，过了这段时间又回升。有的当铺



按物的价值高低,当额大小,区别规定利率。

利息的计算方法:在清代有标息利、满加利和折息三种。标息利以标期行息,名称、利率不一。一般冬春标利息高,夏秋标利息低,标内清结,则免加息,一过此限,另议加头。此种另加利息,名曰“满加”。此外还有折息,即以日计息,一般在币值不稳定时期采用。

民国时期的计息方法分为二种:一为足月,如本月五日当入,次月四日赎出为一月。二为逾月,以日历上的标准月为定限,如上例即按二月计息。此外,一些大当商有月不过五的惯例,即满一月尚可宽限五日。一般大当的利息比小当为低,城镇里的当铺利息比农村为低。绥远地区的典当业在农民办理典押时,要扣除棧租费、看管费、包装费等以后再算付利息,尤为苛刻。

典当业的兼营业务:典当业的主管业务是抵押贷款,但普遍兼营他业。如有的当铺兼营估衣和珠宝手饰,个别当铺还办理代客汇兑等业务。

5、当票:典当业给当户开出的票据,称作当票。典当经营者很重视其签发的当票,为防止伪造当票起见,均采用当业沿袭已久的特有字体,票面载明本铺字号、地址、号数、所当物品说明、当本额、利率、满当期限及当质日期。当票编号用《千字文》,一个月用一个字。上帐时因物品种类繁多,采用代号登记,如当棉衣就用“○”,夹衣用“×”,单衣用“:”等。同时对当品都要加用贬词,如棉织品冠以“破”、“旧”二字,丝织品冠以“虫”、“破”二字,皮毛品冠以“大破大洞”、“烂板无毛”,银器冠以“毛银”,首饰注以“淡金”、“沙金”,铜锡器皿则大书一个“废”字,以此来贬低当品价值。当票上的数字也多由密码组成,如旦根为一,抽工为二,末王为三,不回为四,缺丑为五,短大为六,毛根为七,入开为八,末丸为九,先千为十,这样写非当业人员不易识别。当票上还印有“倘有天灾人祸,虫咬鼠伤,各按天命,过期不赎,听凭变卖作本”一类文字,这就使当户不仅在精神上受到屈辱,如遇意外,也无申诉余地。

6、典当的帐簿设置和盈利分配:当铺帐簿设置一般有门帐、普

清帐、实洋帐、日清帐、折合帐、折对帐、超贷帐几种。另外还有一本密帐，为万金帐，主要记载银股、身股的人名及股数银两。盈利分酬一般都是按股计算，财股为 1000 元一股；人股是按柜上人员相加之和计算，学徒工作满 10 年，方有顶生意的资格，初顶生意一般为 2 厘（即 1 股的  $\frac{1}{5}$ ）每届帐期（一般是三年），按所顶股份参加分红。

7、当税：开设当铺，必须向当地有关部门领取当贴，每年向发证部门缴纳当税。康熙三年（1664 年）清户部《则例》规定，典当纳税，每家当铺每年征银 2.5—5 两，这是我国当税的开始。以后税率加重，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每铺年纳税 50 两。民国 3 年（1914 年）财政部电令各省：典当纳税自定章程，报部核准施行。民国时期当税为五十元（银元）。另有查验当贴，应征换领贴费暨注册费。后来则以存架价值按千分之一到十五纳税。

归绥地区农村的当铺，在清朝末叶 1888 年，预征一次当税，每铺征二十年，课银二十两，到 1897 年，当铺又加征课银五十两，比一般征税要重，由于当税较重，所当物品不超过物品价值的 50%，利率又在二三分以上，对贫困农民的剥削是惨重的。

# 绥远城的老字号

同 田

绥远城(今呼市新城)自清、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之后,围绕其中心的鼓楼曾建有四大街八面商铺 1096 间及由八旗分管铺面后房 156 间。其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等几代的历史变迁,这些商铺也经历了兴衰更替,有许多比较有名气的老字号曾在历史上留下过闪光的一页。本文所谈是指清末民初及至解放前这一时期的老字号。

## 一、南街的老字号

绥远城四大街衢,当属南街最为繁华,因这里商号集中,店铺林立,是全城繁华之所在。

先说南街马路以西的老字号,首推最北边的清和园,这是绥远城唯一的清真茶食店。旧址在今糖业东风商场处,有门脸三间,主要经营茶水、包子、烧卖、糖饼、火烧一类。往南与其毗邻的是李家肉铺,俗谓“白毛李”,门市两间,以卤猪肉最富盛名。再往南是义盛泉京酱园,即解放前的永盛泉。旧址在今惠丰园处。这里前后占地上千平米,前店是三间高大的砖瓦平房,屋檐下高悬三块木制黑底金字牌匾,由南而北,依次书写着:海味店、永盛泉、京酱园,并挂着一块木制的一米高的葫芦型幌子;后场院内有百余口腌制酱菜和晒酱的大缸,还有醋房、磨房及一个储存鲜菜的地下室。经营范围是腌制的酱菜,酿造的醋、酱、酱油,还兼营食品、杂货、露酒、罐头、干鲜菜蔬、海味、鱼虾等,由于聘请的是河北保定的师傅,其腌制的手艺高超味道纯正,尤以黄酱和甜酱最为出名。永盛泉正副经理是赵惠田、马凤翔、刘永善。其南是德和义估衣铺,专营寿衣、靴帽,也卖绸缎布匹。紧接着的是江南馆巷口以南的敦义永缸房。此为满

民生计处的财东，由山西人经营油酒缸房和磨房。占地上千平米，规模较大，有三间门脸，专营米面、油、酒、饽饽、切面和曲。再往南是老乔兽医桩，有两间门脸，门前栽有三根木桩，专门给牲畜看病。紧挨着的是画匠铺，专营丧葬纸活，兼做油漆、粉刷、裱糊的营生。往南为卢记染房，有门脸三间，门前高搭一个晾晒染布的大木架，后场是染布的作坊。继则为拐角铺，地址在今西落凤街东口，经营肉食。以南是体仁堂老药铺，有门脸三间，屋檐下挂着一块古朴的木制牌匾，刻写着名人手书的“体仁堂”三个大字。它的幌子甚为别致，在其门脸外，高悬两串木制的或铜质的膏药和丸药的模型，还有两块招牌，上书“丸散膏丹、各种汤饮”等字。这里有坐堂的名医。药铺的南邻是煤炭铺，有门脸三间，主要经营毕克齐的无烟煤和焦炭、煤球、木柴。接着是一个棺材铺，有三间门脸，十几个工匠。其南邻为工艺局，这是满民的纺织筹备厂，后将其临街的门面改为饽饽铺，制做各种糕点，兼营杂货、纸张、纸码，主顾除城里居民外，大部分为东郊百余里以内的农民小贩。再后又将厂房易做满民子弟商业学校。紧挨工艺局的是一个福禄成棚铺，位于现在二眼井巷口南侧，专门经办婚丧时搭棚、赁轿、抬棺、化尸、打墓、葬埋一类的事宜。南瓮城火神庙住持也专门在此承揽佛事。棚铺的南侧是福顺长面铺，规模较小，接着是公义泉面铺。往南为碾子房，此系绥远城唯一的一个米面加工点，碾子房巷也因此而得名。商号截止到羊圈巷，这里已到了绥远城的南城根，此巷为回民的聚居点。

再说马路以东的老字号。最北端的是普太和药铺，有门脸三间，它的经理是清光绪年间归化城副都统文哲浑的后裔文子鑫。主要经营广东普太和的中药，兼卖当地部分中药材。这个药铺很有竞争力，售药质量甚为讲求。中草药都要分味包成小包，第一味里还要放一张石印药签，上面印着草药图及其性味、功能、主治，并标明药铺字号。该药铺邀请著名大夫王士英坐堂门诊，药铺日夜售药。其南是裕和公，主营茶叶，兼卖糕点。过来即为南酱园。这是在永盛泉前，绥远城仅有的一家酱园子，前店有三间门脸，后场有自己

的作坊,向南为福元贞,是绥远城最老的一家纸码铺。它的三间门脸为抱厦明柱式,专营纸码、香表、蜡烛、旱烟叶、茶叶、调料、纸张。再过来是聚合堂面铺,经营米面、油酒、饽饽、切面。其前身是有名的裕川汇,因绥远城的买卖字号大部分是从山西招商来的,各字号都要经裕川汇将所赚钱款汇寄至山西,后来,裕川汇倒闭,改为聚合堂,但当地人仍以裕川汇称之。它的门前,摊贩云集,顾客如云,是绥远城繁华之所在。接着是张记剃头铺,有门脸一间。它的南邻是长生园饭庄,有四间门脸,设有普通座和雅座,是绥远城内唯一的一家饭庄。紧挨它的是福顺元糕点铺。再往南是宏达堂东家药铺,它是归化城宏达堂药铺的分号,专营北京同仁堂的丸散膏丹,兼营部分药材。继而是三义长缸房,亦是满民生计处的资财。这里自制兼卖米面、油酒、饴糖、南粉条。接着是一个草铺,有三间门脸,房顶上垛满了干草。由回民经营,雇佣铡工,专卖喂养牲畜的草。继则是老关豆腐房,由满民经营,制作、批发、零售豆腐、豆芽。挨着它的是六合铺,这也是一家棚铺。继之为公和元杂货铺,经营芝麻、烟叶、蜡烛之类。其南为积巨丰面铺。继而是福顺泰油酒缸房。往南是永泰隆杂货铺,因其邻近南门,主顾大多为桥靠、南店、周富等村的农民。商号以书院街为业。

## 二、北街的老字号

绥远城鼓楼以北的北街,旧时曾因缸房、商号和各种小手工业作坊比较集中而著名。

以北城门为起点,马路以西先是乾泰泉缸房,有三间门脸,规模较大。这里自制油酒,兼带磨房,经营米面油酒、饽饽切面和曲。其南为福义泉缸房,它的财东是东郊郅独利村的高财主。再南是北牛肉铺,这儿专门经营熟肉。接着是几家个体手工小作坊。如:箩笼铺、铜铺、棺材铺、鼓匠房。过来是画匠铺,经营油漆、纸札、裱糊、绘画。继而为三义煤柴铺,由满民经营,专卖无烟煤末、煤球、木柴。再往南是六合铺,这里专营搭棚、赁轿、租赁婚丧宴席的家具食盒一类买卖。继之先是李家银匠铺,后为蔡家银匠炉。

马路以东最北端有一座五道庙，该庙南侧有时兴昌缸房，过来为大兴当。这家当铺资财雄厚，信誉颇高。主顾延及绥远城北郊的三合村、一家村、麻花板、府兴营一带。大兴当以南是得胜鼓匠铺，接着是铜铺、银匠铺，还有一家记煤炭木柴铺。再往南是同泰祖老药铺，经营各种地道的药材，并邀请著名先生坐堂门诊。紧跟着是永义通棚铺，这是绥远城建城后首家由山西右玉迁移来经营埋葬、火化死人事宜的棚铺，北瓮城内真武庙住持在此承揽诵经、超度等一切佛事。棚铺南为大葫芦酱园，经营酱油、醋、调料等。因该铺门檐下设有两米多高的木制大葫芦造型，故以此而得名。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该铺倒闭，代之而起的是河北的财团华记，改为批零兼营进口纸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煤油 and 日光皂。其南截止到鼓楼是福顺昌山货铺。

### 三、东街的老字号

以鼓楼为起点，位于东街北面最西端的是福盛永缸房，前店有门脸三间，后场有两盘石磨，规模较小。它的东邻是马全喜茶馆，仅次于清和园，前店有三间门脸，设有二十多个茶座，厅堂宽敞，由回民经营，营业时间一般从清早开市到午间下堂，生意十分兴隆。经营的项目有茶水、烧卖、包子、糕点，尤以大油旋儿、素锅盔最为出名。再往东是一家铁匠炉，有三间门脸，门前栽着五六根大木桩和十几根小木桩，木桩上拴着绳索，专门给牲畜钉掌。凡东郊三四十里地以内的农民进城时，大多都要在此给马、骡、驴钉掌，生意十分红火。紧接着是义盛永缸房面铺，属中等规模。继之是聚丰当，由山西人所开。它的门脸是一堵高约二米的砖墙，上设木栅、无窗，墙里有窗台和窗户及两扇木质的外包厚铁片的大门。店铺里的栏柜墙足有二米多高，上设木栅，并留有几个营业的小窗口。里面为柜台，营业员都坐着高凳子办理典当手续。当铺里面的四合院是收藏典当物品的仓库，内有防盗、防虫、防鼠的一些设备，特别是防盗很严，其院墙有六米多高，专门有人敲梆子下夜，还养有大狗巡视。凡典当的物品都归类编号。当票是自制的，用木版在麻纸上印刷成蓝

色的各种格纸,并用《千字文》编号。它的库房里设有几口大缸,用来装抵押品,是为预防鼠咬虫吃的。紧接着的是南街义盛泉的一家作坊,占地很大,前店有一小间门脸,经营零星小卖,后场有几百口大缸。往东为福顺公面铺,规模较小。接着是福义泉缸房,也有前店后场,经营米面、油酒、饽饽。隔正白街,东头是一家粮店。再往东为河北人开的一家粉房,规模甚大,专营粉面、粉条,还养着百余口大猪,供应肉铺。

再说东街南面的老字号,仍以鼓楼为起始,最西的是德全森木匠铺,制作并主卖棺材,还制作房舍建筑用的架构,规模较大。往东是一个满族倪姓经营的澡堂,接着为老缸房,是绥远城最大的一个缸房,老缸房街也因之而得名。它的东侧是一个小粮店,院内建有一处带抱厦的房子,专供记帐、收粮、柴粮之用。

#### 四、西街的老字号

绥远城鼓楼以西,由于将军衙署占地颇多,故而商号可谓寥寥无几。西街北面,最东端的老字号是一家澡堂,它的门口高挂灯笼,只要不落灯,就意味着照常营业。其西邻是三合成杂货铺,由满族人经营,有门脸五间,它的门前摊点很多,是西街繁华之地。再往西是西聚合堂缸房,也有前店后场,为南街聚合堂的联号,后场有三盘大磨,制作油酒、曲砖。西街南面,最东边的是聚龙昌、日盛茂两个缸房,以这两家缸房而命名的两条街一直延续至今。接着是柴禾铺,专营煤炭、木柴,后来,柴禾铺巷因此而得名。

随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如今这些老字号早已不复存在了,除了古稀耆老还依稀记得,一般都鲜为人知了。

## 解放前归绥的印刷业

韩寿松

半个世纪以前,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是绥远省的省会。该市地处偏僻,文化不发达。就印刷行业来说,仅大召东、西夹道巷有几家用木板刷印的行业,都是店后设有作坊,工人数名,专门用木板刻制各种文字图案,然后刷印。所印大多为迷信品,什么财神、灶神、门神以及除夕家家户户供奉的仝神。有的还是用各种颜色套版刷印。手工制做虽然粗糙,生意却十分兴隆。每逢过年,四方农民都要进城购买年货,首先要买的还是各种神纸,各家作坊劳动一年的产品,一个腊月都要销售一空。这种行业本小利大,人们都喜欢经营,其中以小东街明善堂书局为首,除刷印各种迷信品外,还用木板刷印《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旧版书,门市销售学生用各种用品,如作文本、仿纸、字帖等,其中最畅销的就是年历,俗称“皇历”,内有二十四节令,还有一般人所喜欢的黄道吉日,遇有婚丧嫁娶都习惯查看皇历,看看是否吉日良辰。因此销售很快,往往脱销,书局不得不再版刷印。后来感到刷印这行进度太慢,跟不上市场需要,所以有人想进一步发展,安装石印,先后有土宝斋南纸店韩希珍、太管巷的梁跃海、马道巷的郭象其,都分别安装了二号石印。当然这比手工印刷先进得多了。各机关的卷宗档案袋、公文表报、布告、通知以及信纸信封,各影院剧场的广告、海报、入场券等等,个人的请帖、讣告,商店的商标,广告,都由石印局印刷,当时石印红极一时。石印局太忙,印一件东西往往要等两三个月才能取上,最忙时日夜加班也赶不出来。那时有句话,“要着急去开石印局”,确实一点不假。石印局逐渐跟不上形势,有人就想改变其经营方针,到外地看看,发觉铅印很有前途,王充实由北京运来八页铅



印机一架,1、2、3、4、5号字母全套,手摇铸字炉一台,在小东街开设小大铅印局。因是首创,业务繁忙,接着又由周保恒运来圆盘脚踏机一架,小八页印刷机一台,手摇式连同石印手摇机一架,在小东街开设华成印刷局,后来陈朝居、赵记都成立各人印刷局招揽营业。这些印刷局都能印小型印刷品,例如名片、请帖、各种公文表报等等。

芦沟桥事件爆发,日寇侵占了华北,又进攻绥远,将归绥市改名厚和豪特市,绥远改为巴彦塔拉盟。日本的印刷业是比较先进的,他们为了宣扬“王道乐土”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等,找到了前电报局长黄博五(黄昌),叫他设法成立报社,黄于是将新城前绥远日报及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两报合并,将所有机器设备搬到旧城文庙街成立蒙古日报社。该报社设备有16页平面印刷机四台、8页二台、脚踏圆盘三架,手摇铸字炉三台、全付字模字架,二号石印二台、摇把裁纸刀一把,以及全部印刷器材及办公用品。蒙古日报为日刊,四版四开。报社设编辑部、总务部、印刷部。黄任总编及社长,印刷部除负责印刷报纸外,还对外营业,承揽各界印刷业务。伪政权刚建立,所以各地的印刷业务不少。后来蒙古日报社改组,黄昌辞去社长职务,由夏铁汉接任社长,松田悟任顾问。蒙古日报是汉文版,不适合需要,必需出蒙文版。但是此地根本没有出版蒙文书报设备,只有求蒙古军司令部、教育部的官员们用手写蒙文的办法来协助。手写一份蒙文报纸,然后再用石印翻印。这种原始的办法一天最快只能印刷二、三百份。松田悟由日本招来一名精通印刷的人叫安川猪之助,他主张建立蒙文铅印。于是由东北聘来蒙文师傅玛希巴雅尔(现在师大印刷厂任职)、乌力吉图(现在政府印刷厂)来建立蒙文字架、铸造蒙文铅字。蒙文是一个单词由几个字头来组成。蒙文铅字铸成后,除按日出版蒙文报纸外,其余就是承揽各地蒙汉文字的印刷品。也有经常出版的刊物,例如蒙古军教育部由阿尔弼吉呼图上校主编的蒙汉文字的半月刊《铁壁》和蒙日文字的《挺身》半月刊。阿尔上校是蒙古族,留学日本,深通蒙、日、汉文

字。

伪蒙疆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后,厚和各主要机关相继迁往张家口。伪蒙疆政府在张家口西沙河路1号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新闻印刷机构,命名为“蒙疆新闻社”和“蒙疆印刷局”。设备很齐全,有轮转机和高速度轮转万能铸字机十几台,平面印刷机包括32页、16页、8页数十台,胶版印刷机(捷克七色)三台,自动裁断机和装订划线等机多台。共有从业人员3000多人。每日发行日文版、汉文版、蒙文版新闻各一份,剩下的时间就承揽全蒙疆的印刷业务,如印刷中小学教科书、年画及各种宣传品等。

设在归绥市(日伪时期改名为厚和市)的蒙古日报社改为“蒙疆新闻社厚和支社”,夏铁汉调到张家口总社主办《利民》半月刊去了,支社长由松田悟担任。印刷方面改为“蒙疆印刷局厚和支局”,支局长是日本人石冢精一。蒙古日报更名蒙疆日报,有汉文版、日文版和蒙文版。印刷厂不断扩大,文庙街地方小,因此,松田把报社及印刷局迁移到北门里乐新楼饭店,把所有前后院全部买下。由于报纸发行量不断增多,平面印刷机也跟不上了,于是松田从总社调来轮转机一台。使用轮转机印刷必须打纸板做成纸型,然后化铅浇铸,才能上机器用卷筒纸开印,活版不能用。万能铸字机每天所铸铅字,用完随即化掉,不再连续使用。由东北聘请张玉宣等四人操作,十几万份报纸一个多小时就可印完。印刷方面非常忙碌,遇有大批印刷品能印则印,不能印送往张家口印刷。蒙疆印刷局实力雄厚,几乎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不相上下。

“八·一五”日本投降,城内日本人连夜撤退,报社也停刊了,不数日,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接收人员入城接收各机关、各厂矿。由长官部崔载之、张心友、刘映元等接收蒙疆日报社。由潘佳绪、张太云等接收蒙疆印刷局。当即办理交接手续,准备出报。长官部在后套原有《奋斗日报》,现在仍用此报头出版《奋斗日报》,由印刷厂印刷。原有机器设备报社想要,印刷厂也想要,双方争执不下,后由傅作义亲自指定归奋斗日报社所有。局面已定,就开始照

常工作。国民党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一日巨涨，职工们无法生活，工作起来也是懒惰无力，有时出报也成问题。省府主席董其武已发觉此事，叫民政厅长王则鼎，找我们谈话，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停报，要苦撑局面，否则将给以处分。职工们拿不到工资，被迫只好干些私活维持生活。直到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和平解放。

## 崔铁炉的发展与名牌的创立

崔继周

归化城的铁匠炉大体分两种：一种是大炉（站炉），像现在的手工锻造场一样，一般用三个人，炉头，即捏铁掌钳的一人，一个打下锤的（与掌钳的对面站），一个煽火的，拉风箱代打上锤。这样的炉又叫黑棒炉。所打造的活基本上不需要过细的冷作，如犁弯、水车、大车瓦、炉条、马掌等活。另一种是小炉（圪蹴炉），也用三个人。炉头坐着掌钳捏铁，一个打下锤的兼作冷造，一个煽火打上锤的，兼干拉风箱、打炭等杂活。这样的炉又叫杂活炉。因它做各种手工匠人的工具、农具、刀具等多种活。

崔铁炉是属于杂活炉。始祖崔林（三顺），祖籍山西大同人，于1870年（清朝光绪年间）来到呼市，在小召前路西、原荣福元点心铺南，永合堂药铺北，开设两间门面的崔铁炉。崔铁炉当时是父子班，崔林带领大儿子崔贵发，三儿子崔贵福，四儿子崔贵有，另外还收一名徒工王根柱（王根柱是现在王铁炉的创始人），共五个人。做的活有摊元宝，打火印（蒙古人给马打的印记），制做各种农具等杂活。

到第二代传人，三个儿子分设三盘炉。一盘炉崔老三，接父亲的班，在原址，有铺面。另二盘炉，崔老大在小招牌楼底下摆摊，早上摆出去，晚上搬回来。从第二代开始，崔老四在原来所干活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增加了厨房用具，如炒勺、片漏勺、火筷子、火铲、饭铲等。一开始打造的厨刀，饭馆厨师不敢用，怕刀刃不好。为了打开这一销路，崔铁炉就先打好刀送给饭馆让厨师试用，用得好了再算帐，不好不要钱。就这样逐渐从送货试用，一直到开始使用。厨师们由不相信到相信，最后到愿意用崔字菜刀，影响不断扩大，销

路从此打开了。

第三代人崔亮、崔镜、崔耀等除继承第二代的传统产品外，以崔镜为代表的崔铁炉技术不断提高，从主要打造刃具和厨具，发展到锻制打草的大镰等难度较大的农具。

第四代传人崔继禹、崔继舜、崔继文、崔根厚等这一代，除接过传统产品外，以崔继舜为代表的传人又增加了蒙古刀及少数民族铁制用具的活儿。

第五代传人，崔锐等又在先辈的传统产品外，发展为专攻仿古刀剑及金银铜制品。

第六代传人继续在呼市街头开设崔铁炉，现共有大小崔铁炉八、九座，崔家先辈的传统技术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光大。并经过技术改造，由完全手工操作进步到开始使用小空气锤、砂轮机的半机械化生产。

在旧社会同行是冤家，互相排挤，为了争得顾客，为了自己生意好，就必须竞争。在竞争中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的还是讲货真价实，质量第一，讲求信誉。崔铁炉也不例外，就是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从第二代传人开始，由一盘炉发展到了三盘炉，顾主仍是原来的几家，不发展新的销路，就吃不饱。面对这样的形势，只得想办法拓宽活路，增加产品品种，不断提高质量，尽量搞出自己的名牌货来。任何一个新的产品要打出招牌，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必须经过辛勤地反复地试制，创出门头。尤其搞刃具，更是艰难，从原材料的选择，到红炉操作，火候的掌握，冷工制作的精心加工，成型出样，到淬火处理，外表的光洁度，最后到开刃使用。这一整套工艺必须精益求精，无论哪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材料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旧手工业作坊都是靠手工锻造，没有科学方法，全凭经验看火色来确认，温度高一点，低一点，都会出问题，硬了掉口子，软了会卷刃。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更有把握地选好材料，崔镜师傅在凭经验选材料的基础上，又加以科学论证，

把各种能做刃具的钢材，如英国的灯塔方钢、炮弹皮、道轨钢、弓子板等，全拿到化验室进行了材质化验，从中选出既有硬度，含碳适量；又有韧性，含锰量也适合的上好钢材，做为刃具的材料，保证刃具的良好性能。

崔铁炉的产品实行“三保”，是为了让顾客放心而采用的一项措施，凡使用“镜”字刃具发现毛病，要保修、保换、保退，以赢得顾客信任。“镜”字的产生，是从做刃具“三保”而来的。随着崔铁炉的发展，同时出现好几盘炉，共同做同一种产品，如同样打菜刀，都打“崔”字，顾客发现问题要实行“三保”，就无法分清是哪一家的货。为了处理好这一问题，必须加以分清。于是，崔镜师傅就打出了“崔镜”两字作为标志，以便与其他几家“崔”字区别。一直到1956年合作化高潮后，不能打带姓的字号，便改为只打“镜”字。到1962年恢复小商品生产，仍然让打老字号“镜”字，并参加了技术表演赛，被评为名牌。1964年，全区又进行技术评比赛再次进行评比，崔镜生产的“镜”字菜刀，正式被评为内蒙的名牌产品，不仅走红了内蒙市场，在全国也有了一定的销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日用小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旺盛，崔铁炉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壮大。到现在，崔铁炉的第六代传人也挂出崔铁炉的招牌，正式进入呼市市场。

现在，崔铁炉的第三代传人，“镜”字菜刀，名牌产品的创始人崔镜师傅已进入高龄，退居二线，由他儿子崔继文接了班，继续打出精工制作的“镜”字菜刀，为社会服务。年高的崔镜老师傅现在是儿孙满堂，生活美满，欢度着幸福的晚年。他老人家愿在党实行富民政策的今天，把崔铁炉这个相传六代，已有一个多世纪的老字号崔铁炉，继续发展下去，他号召子孙们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不能只顾贪图眼前的利益，粗制滥造、自砸招牌，毁了“崔铁炉”这个深受青城人民青睐的名牌老字号。要在改革开放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名牌产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多做一点贡献。

# 太平庄乡五路村商业史料

韩云琴

## 五路村的商业与商人

### 商业

五路村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白塔(辽代万部华严经塔)南一公里处,村南是黑河上游。村内曾有一座元代就存在的佛庙(现在发现的碑文有“元佑定林永安禅师”字样)当时不叫佛庙。可以想见当时的经塔与这个佛庙香火一定旺盛。清代的海蚌公主曾为佛庙布施一顷土地,加之这一带水草丰美,在以往的历史长河中,辽金元时曾是“晴空高悬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的繁荣地方。清朝统治前几经战争破坏,这里成为到处可见砖瓦的废墟。康熙年间随漠南北出现的安定和平,此地才有了人烟。经调查研究,康熙年间五路村就有一个从山西来的姓李的(现在五路村的李猫娃祖先)来和蒙古人搭成地夥计关系种地。接着是山西阳曲县姑姑寨张崔二姓朋合的“通事行”来这里扎占。他们圈起圈套,用茶布烟糖与蒙古人换回牲畜在圈套里喂养,然后赶回长城口里出售。为什么在这里扎占?因为北边的白塔和这里的佛庙能招徕许多香客,南边的黑河能饮牲畜。当时此地有几户蒙古人,居于现在五路的当街。

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把归化城(现今的呼和浩特)和山西雁门关北的朔州、马邑、左云、右玉、平鲁等划归山西朔平府,归化城设理事通知,管辖土默川的汉民与归化城商镇,五路村有了字号,习惯上仍叫“通事行”。这里的通事行与草原其它地方一样,先是开设烧酒作坊兼营茶布烟糖等杂货。由于归化城开辟了沟通库伦的商路,人口几倍增长,土默川已经有了私垦地,通事行使用这种庄户买卖给前来种地的受苦人供给食宿和生产方面的支垫开发

土地。五路村崔、张两家的圪圙里也开了烧酒缸房，并冠以字号名元亨永。此时作坊虽与元亨永同联一体，不久各自独立核算，缸房起名元隆昌。继元亨永而后的还有两个通事行圪圙，一个位于现在当街以北，一个位于东南。东南的属祁县岳家（现仍有后代），正北的查不出姓氏。这时，五路已成为归化城东的物资交流中心（习惯称谓“跌头”）。因为雍正前，五路以北的白塔、保合少，东北的陶卜齐，黑河南的公喇嘛都未形成市口，所以大青山前后，黑河南北的蒙古人都来这里交换物资，乾隆二年（1737年）以后随土默川土地的两放垦，五路又发展为粮食交易市场。

乾隆二年至四年（1737—1739年），归化城东南八里处新建绥远城（现名新城），这期间，太原附近的山区以及雁门关南北的泥瓦木铁工匠、商人、受苦人潮水一样涌入归化城。右卫驻防的八旗兵移入新城，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口粮需要，清政府允许在归化城附近，以“代买米地”形式放垦一部分土地。“代买米地”本来是有限度的，但不少人借机私垦以致蒙古牧民失去放牧草场，形势严峻。乾隆八年（1743年），清政府给蒙古人划拨“户口地”，并有不准民人（汉人）购买兼并等等条文。实际禁止不住，蒙古豪强与汉人老财还是以变相手段逐渐转移地权，土默川的土地被大幅度地开垦着。在这一形势下，五路村便成了粮食交易市场，村北部那个查不出主人姓名的圪圙由崞县的武姓接收后，开了魁盛粮店。元亨永也兼营此业，其它几家同样大搞粮食交易。拨“户口地”之前，五路村以及附近各村还无定居的口外受苦人为提早回家，大多种小麦。因归化城商品面粉的大量需求，出售面粉比小麦合算，所需资本也不大，只要有劳力到魁树沟砍几块磨盘，有一头骡或马就可驾起磨杆磨面。所以，好多人争相磨面，于是以“三扎布”这家为主的蒙古居民点门前便出现了一条面铺街（现名当街）。其中最发达的是寿阳人开的任面铺。随面铺兴起的是炸麻花、烙月饼等干货铺也在这条街上出现了。

乾隆六十年（1795年），大青山后的八旗牧场放垦，山前后的



“通事行”做通事买卖的同时，购进大批土地。五路东北的保合少、陶卜齐以及临近的白塔成为市口北山与东山的蒙古人可就近在这几处通事行交易就不远奔五路了，加之归化城的陆陈行（粮食加工）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五路的面铺街逐渐衰落。这里的通事行在划拨“户口地”与牧场地时，已经用银子买进土地，转化为土地商；开磨坊的小生产者很自然地又回到土地中种田。直到咸丰以至火车开进归绥前面铺街仅繁华了半个多世纪。

咸丰五年（1855年）随土默川种大烟，面铺街有了烟馆。乾隆年间，从归化城经巴寨、添密儿、美岱儿、石人湾、牛家川至德胜口开了一条通往内地的京大路。京大路修通后，货物不再由杀虎口运转，而是经德胜口出入。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托县河口形成水运码头后，西北的皮毛、药材、盐碱等多由黄河水运至河口，然后才用淌子车转京大路运走。五路接近添密站口，为了招徕旅客，五路人便与添密儿展开竞争。车户为草料便宜，旅客为住宿宽敞，宁可绕几里也到五路投宿。火车进入阳高、丰镇后，京大路上更是车马如潮，络绎不绝。当时五路村开起了十几座大旅店，有的还有高级厨师专为凉州土客（贩大烟的）和西边的王公贵族享用。在旅店业红火的时候，本村人也拴起70多辆马车到河口跑运输。这时的面铺街又热闹起来，烧卖馆就有四五家，至于烟馆、杂货、小吃、小喝要有尽有，铁匠炉、木匠铺的叮咛声不息，连耍猴、卖艺、拉洋片的也经常不断，尤其酬神唱戏，村内村外推车叫卖声音此伏彼起。全村已有50多对用大红字写着各家堂名的大纱灯，逢年过节挂在大门两边，本村有全副行头的秧歌队，还有娶媳妇的花轿，送殡的杠房、鼓匠，杠房铺出赁全套青瓷、家具供红白事使用。五路村除元广字的张家在归化城还有字号外，还有武家的银炉，陈家的信成号绸缎铺，杨家天顺连货店，××的杂货铺和四家草料铺、一家山货铺等，市面成了小归化城。

五路村繁华如市，商品社会的奢侈腐化象传染病一样也蔓延开来。既有烟馆、赌窟，更有性质相同于妓院的卖淫处所，村西南部

早有赵坛种的一片大烟。所以民间诗人编出一首通俗诗“孟长有的小店子(赌窟),×××的猪圈子(卖淫处,因附近猪圈多),赵坛的圈园子。”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五路村畸形繁荣中潜伏的危机。

这时的五路已经有了三和渠,被视作刮金板的水地,除由少数自耕农经营外,多数土地都由口里新上来的受苦人替地商去耕种。

民国十一年(1922年)火车开进归绥,财神被归绥车站的货栈迎去,五路的面铺街开始萧条,但那十几家开店的积累了一些财富,扩大了土地占有,全村除吸大烟的穷户外,都还能维持当年的体面。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却下来,沿路村庄无不遭殃,五路这个肥村子骡马被拉了个光,鸡羊杀了个净,草料口粮吃了个干。退军过后,五路人大家小户脸象霜打一样,大户人家纷纷分家,此后,便一蹶不振。当然,商业就谈不到了。

### 商人

当归化城商业极盛的时期,五路种田人的心理深受影响,有的要自谋出路经商,有的则想借重女婿发家,不少俊俏姑娘给商人为妻作妾。其时五路村便出现了一帮以“驸马商人”。因为这些女婿大多在五路置有水地由岳父家管理,当他们商场失败后,到五路安身立命,故人称驸马。当时,这个村最体面的女婿有李保安、吴宝子、田二牛等。

李保安,归化城人,时任四子王旗福义泉的当家掌柜,养有三百多辆老信车往返于锡林郭勒盟交流百货、皮毛、宿泥盐,很有势头。民国年间还当过乌兰花的商会会长。在归化城有几座铺产和垫财字号。

吴宝子任归化城“三义和”的经理,这个字号拥有五百多峰骆驼。

田二牛是祁县大驼商所开恒盛西的二财主。恒盛西和大盛魁有关系,在通往新疆的大西路有几顶房子往来。在归化城五十家街有他的永泰货店,小召半道街有车铺,北沙梁还有××皮毛店。五路人把田二牛弟兄三人叫做大、二、三祁县。现在五路村还有他们

的后代。

此外,还有一个归化城当乡耆的张华。光绪年间,归化城粮店中以东山沟李七十二老财的万成粮店最为雄厚,“七十二”不仅掌握粮市,连鹿茸市场没有他也不能开盘。张华以万成粮店经理而当了乡耆总领。五路的几家老财以城东乡亲关系勾扯张华在五路买了田产。之后,五路这几家老财便把万成粮店当作他们的驻城办事处,张华在五路的田产也不出皇粮水费,彼此都有利图。现在五路的张宝宝就是张华的孙子。

五路这个村子就这样逐渐渗入了商人成分。

下边要谈的就是五路村派生出的商人又扎根于本村的几位颇有代表性的商人。

#### (一)“兵败阵不倒”的广德厚

前述五路村的通事行元亨永,原属太原姑姑寨崔、张二姓合资经营,以后又支出武川可镇附近的广兴义。在大青山后放牧场地时广兴义已在“可镇”扎占有年,放垦机遇一到,他们捷足先登,从元亨永驮着元宝去买地,买到九十多顷(当时用跑马量地,若用绳丈要比九十顷超出许多)。从此而后,在后山建立起十八座对儿伙房的“元广号”字号。在五路,张家独资买有三十顷地(后来都变为水地)。崔、张两家就此转化为商业资本兼地商的“土地堂”。(按,做蒙古生意的分两种性质,一种以大盛魁为代表专跑外路线或西路的商业资本,一种是专在内蒙做庄户买卖兼土地包租转租。前者人称“驼、马、羊”,后者送名为“土地堂”。)“对儿伙房”是设在字号范围的伙房,这种伙房特大,东西对头盘有能容一连人的两盘大炕。为什么盘对儿伙房?后山天冷,地商包有大面积土地,须从长城口里(内地)招徕大批劳力租田种地,劳动者都是赤腿穷汉,有了伙房可供食宿,又可从地商的买卖字号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的支垫,这样资本家就把劳力和土地用资本作为纽带紧紧拴在一起。秋收后,再把受苦人打下的粮食,折成牲畜收购回来,受苦人再把牲畜赶回山西老家出变后养家。受苦人如果发展为自耕农就可脱离“对儿伙

房”。由此可见，崔、张二姓的元广字号其商业势力是很大的了。至今后山的老年人还留有元广字号的印象。他们早在乾隆年间已于归化城的热闹地方小召前开有广兴远货店、广兴粮店，构成归化、城东、山北三位一体的元广字联合企业。这个企业就是由五路的元亨永发展而成。张、崔两家财东什么时候分资单干已经查不清楚，只知道张家的后代一直经营着五路村的土地和归化城的买卖，崔家没有给五路人留下印象，但在后山，崔家比张家名气大。此外，武川农村里也散居着姑姑寨张姓后代，可能是张家的又一支。

元亨永历经改组，光绪年间传到张子仪、张子俨弟兄俩时，在五路有十七顷水地，归化城有两处买卖，太平庄下三村合资开的三和渠，张家掌有世袭“笔写契”（后改为经理）的印把子。子仪、子俨弟兄分家后，张子俨带着赌博所剩不多的钱回到老家。张子仪把分到的一半家业，其中包括以活约出典土地的钱都扩大为资本专心致志地在归化城经商。他在自己小二道巷院中，躺在大烟灯前听取上街的买卖人汇报市场行情决定买进、抛出。由于只挣不赔，胆量越来越大。居然参加到粮食虎盘投机的商战中，光绪末终于被粮老虎吃掉。最后不得不耷拉着脑袋回到五路，只用一头拐腿骡子和一匹瞎眼马去耕种着 50 多亩水地。

张子仪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张联芬，次子叫张联芳。长子联芬原在归化城一家当铺学徒，次子随父回乡，在张子仪失败还乡后的几年中，长子已当上顶生意掌柜，次子也长大成人。长子把逐年挣到的钱交给弟弟，一部分一部分地赎回父亲租出去的“活约”地土。次子接班掌领家务，自己又亲手把犁领着长短工耕种。张联芳生有五个儿子，以“温、良、恭、俭、让”命名。五个儿子上学前就让干活，冬天，让五六岁的孩子给出圈的长工去打灯笼，十一二岁时，就让到厨房里帮学着推窝窝、蒸馒头，能种田的时候，犁、耩、耙、割、打、收都要参加。从中选择学习优良的步步深造，较差的，会记人工账就停学专事种地。后来他家又成为五路村的首富，子孙成了少财东，家长允许他们吃好穿好，唯有劳动不许放下。几位少财主冬天

喝了黄酒,吃了饺子,还是冒着风雪去奎树沟拉石头。据说,民国年间毕业于×大学的张守俭,当了国大代表回家后,照样和长工在一起翻粪。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天,张子仪的孙子张自强,戴着礼帽,穿着大褂,骑自行车回家,路上碰见一辆陷在泥里的大车,车馆怎么打驾车的马就是不动,张自强下了自行车拿过鞭子,手提缰绳,一甩鞭子,马就一跃而起,把车拉了出来。车馆只顾诧异地打量这位知识分子装束的人,他已骑车远去。土改后,张家的人和所有村民一样参加到集体劳动中去,这些老少财主不仅不因劳动痛苦,相反,都是农业活中的能手。张子仪的孙子张自立码的麦垛无论怎样下雨也漏不进水。其它弟兄都不示弱。所以在张家跌倒爬起的时候,人们这样评论“广德厚(元亨永字号的堂名),兵败了阵不倒。”这支最早来五路经商的元广字张家现在已历三个世纪,仍然枝繁叶茂,是五路村兴旺的大族。他们现在兵分两路,一路在呼和浩特的大、中、小学校里任教,另外一路在五路村种地兼养良种乳牛,个别的服务于商业部门。张子仪的四世传人,七十多岁的张自立仍是乡亲中的农业顾问。

## (二)逃荒要饭走西口,拉驼发财五路住

前几年太原市剧协的剧作者郝东黎女士来土默川采集《走西口》的历史素材,也光临我家。确实,土默川上散居着的农商人等,追溯到他们的祖先,绝大多数都有一部“走西口”的沧桑史。下述石占魁家的历史是颇具典型的一户。

光绪三年(1877年),石占魁这一家饿得只剩下他和母亲,是母亲领着他从边墙以里的右玉来到口外,讨吃要饭流落到五路村。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母亲被狼吞去,只剩他孑身一人,只好到城里找出路,给西顺城街的义昌瑞拉了骆驼。拉驼是受苦人中最苦的一个工种。有一首顺口溜这样说:“自身背着三十斤(指行装笨重),风砂打眼步步行。顶星星,踢石头,迷路拨雪粪蛋蛋里寻。放骆驼,拾柴火,架起锅锅化冰雪,哪管干净不干净,我饥我寒不打紧,骆驼吃饱我欢心……”正因为这样,多数人不干这种营生。东家

只有把待遇提高。驼工上工前先给预支二十两银子安家,此外还准许捎一二百斤货,有驼的捎一两峰驼。如果本人不胡花,把挣的钱积累作为资本,本利循环,由小而大,只要不发生意外,三年五载就可发小财,若交好运,驮着的货遇上行情上涨,还可发点大财。

石占魁自幼寒苦,又有奋发向上的志气,吃苦耐劳自不用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各个方面都干得出色,不久当了“把儿头”,有了捎驼,几年就发展成60多峰的小驼队。石占魁的拉驼生活是在走新疆的下西路上度过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西北发生“河湟事变”,此路不能通行。他只好放下驼绳,回到五路买了十几顷地,给儿子们盖了几处院子纳福。房子都盖在五路村的东北部,以后这里便形成了以他为首的驼户居民点。

### (三)你靠祖产开银炉,我凭两腿开个捣金铺

被城东人称为王四老财的王占祥,原籍山西阳曲。在他祖父时代,他家还是大黑河四间房、沟子板什有好几处牛圈的财主,可是到他父亲手里竟踢蹬得片瓦无存。他七八岁时投靠五路村的姑母家。王占祥成人后,长得身材高大,给表兄武铎赶车。王占祥寄人篱下,总觉得不是滋味,何况他又不甘人下。这一年他下定决心做了一件非常事。他冒表兄的名到表兄在归化城开的银炉支出能买两峰驼的本钱,上桥买好驼购上货就随×商号的骆驼走了科布多。他同时兼任驼队锅头,一路做饭。为了多挣钱,驼队一到目的地,他就亲自深入“合少”(旗)中的蒙古包去换牲畜。因为他手勤,随时帮蒙古人干活,很受人家欢迎,换的东西又多又快,当他发展到十几峰驼时就雇佣五路村的小夥子拉驼,托“合少”中的仕官换牲畜。他曾把西瓜放在油篓里经过漫长的戈壁送给他的蒙古朋友吃,这样他交了很好的蒙古族朋友,都诚心诚意帮助他,使他争得速来速去的时间,亲手拿鞭子马不停蹄地由蒙古赶回羊群。没用几年就成了受人恭维的四老财。这位王四老财进了万成羊店,段得功掌柜竟亲手替他梳那锈成毡片的辫子,杨白皮匪夥千方百计去“请财神”(绑票),只因为他没改讨吃滥鬼的样子,溜脱了。为了避乱,民国初年,

他装满细软往城里运，半路上还是被土匪洗劫一空。因他热爱土地，早在五路村就买了四顷水地，给儿子们盖下几处房院，娶了几房媳妇，民国十七年（1928年）外路不通，他回到五路亲手掌犁种起他的田地。他曾骄傲地对人说：“不是土匪刁，我表兄靠祖产能开银匠炉，我凭两条腿定开个捣金铺”。

#### （四）洋行“把儿头”梁怀亮

梁怀亮的家世也不比以上二位强多少。他的父亲梁喜珠，从东边的朝岱村把他和他的妹妹用一条扁担担到五路，租了几亩地，住在一间场房子里种起瓜来，因为很难发迹，便把希望寄托在怀亮身上。梁怀亮七八岁时，父亲送他入书坊去学写字、记人工账。梁怀亮十五岁时，父亲就托人送他到归化城设在库伦的支庄当学徒。到他二十岁时已学得满口蒙古话，当时的库伦，因活佛哲布革丹巴住在当地，不少外国商人或间谍在那里活动，社会很复杂。梁怀亮早熟，懂得好多事，当他二十四岁时就给洋行当了翻译，很快成为熟悉蒙古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的蒙古通。当民国十七年（1928年），蒙古封锁边境后，归化城的洋行纷纷撤庄，北沙梁突然出现了英商和记洋行，特请梁怀亮担任四十八顶房子的“把儿头”（四十八顶房子可能每个合少一顶）到蒙古领房子做生意。据五路人说，他不是骑马指挥，而是坐汽车在各个合少里领房子。他过手的钱多得很。英商撤庄后，他坐飞机回国。只因后继乏人，所以他在五路村没买多少地，在临近五路的添密湾买了十几顷“活约地”。他以为钱多为死，不想民国十五年（1926年）以后，归化城票子混乱，先是国民军西北票刁人，后来又是晋票贬值等等，不知带了哪种票子的害，总之，他的活约地让人家用价值一篮子鸡蛋可赎一亩地的贬值钞票统统赎走。眨眼富贵跌跤穷，威风一时的双马子（村里人叫他的乳名）落了个来去空空。其实在辛亥革命后的旅蒙商人，象梁怀亮一样交恶运的何止少数，丧去性命的也大有人在。王占祥、梁怀亮财破命在实是幸运儿了。

除以上知名度较大的几位外，还有在新疆古城子、归化城、武

川乌兰花等地经商的十几位,其中除田二牛后代田××因新疆动乱转道蒙古回家,又逢蒙古封锁外路不通,留在该地,其他都程度不同地发财还乡购地养老。

本文材料原是已故的刘映元先生于六十年代插队劳动时调查所得,我只是整理了一下。由于水平有限,不能完满表达刘君原意,错误之处尤希编者读者指正。



## 归化城的牲畜贸易

刘映元

归化城是北疆商埠之一。因北通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连山陕,东邻晋冀,自明朝俺达和明朝媾和以来这里便逐渐形成与内贸易的繁华城市,其中骆驼、羊、马等牲畜交易尤为昌盛。这些牲畜大宗的来源于外蒙和内蒙的乌兰察布盟,少数的出自本地的土默特旗。本来这些贸易有极丰富的内容,但我能调查到的材料实在有限,自认为略具史料价值,故仅就所知写出,以供研究者参考。

最初马匹属于军用,民间贩卖受将军衙门监督。很早的时候,马店、马桥设在新城。故马神庙与马王社都设在新城,相应产生的马税厅也在这里,到现在这里还有打着历史印记的马税厅巷。那时旧城只有乾羊店、驼庄、驼桥的牛羊桥以及皮庄、皮厅子。驼庄的行会叫福虎社,羊店行会叫兴隆社,皮庄的行会叫生皮社。这些生意,社会地位低贱,当时的商会(乡耆府)不纳为会员。他们却负担支应临时的紧急军差。

为便于牲畜饮水和出进方便,这些羊马店、驼庄都设在城北扎达海河附近的北沙梁和东沙梁。羊王庙也设在北沙梁关帝庙的附近。驼社的人也在羊王庙酬神。

因为有京羊庄前来买羊,所以牲畜店以羊店生意最好,经常不下四五十家。维持较久的有谦和昌、隆和昌和永兴店等。谦和昌经营了有一百二十多年,是榆次侯家和忻州钱家垫财。隆和昌的财主是武川的公和老财。永兴店财主是察素齐附近的此鸟村李家,李家还兼营南头起的天荣粮店。至于驼庄,虽然本城以及郊区驼户养驼不下七八万头,但需大批骆驼的大盛魁等大商号都直接到外蒙

购买,这里不是主要市场。在这些行业里学生意待遇很低,茶饭粗淡,苦又负重,只有贫寒人家的子弟才来。自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乔家的通顺北店开办,张家口的公义合前来,影响之下,才提高了待遇,改善了生活。

牲畜交易分大宗和零星两种,大群羊和把子马都不进城,是在百灵庙和武川北边的召河一带放牧。羊马店中经常驻有外地的坐房掌柜,牲畜到达,即由店方撮合到买卖双方基本商定价格,店方即备驛车陪同买客前往牧场看货,达成交易,即由买卖双方的把头办理交接。店方向买卖双方各收百分之二的佣金,但所有交易中的车脚盘费都由店家支付。归化关和后来的塞北关都在这里设有税卡,按百分之二向卖主收交易税,税额比城里少五厘。三大号(如大盛魁等)则以百分之一点八征收,交易额越大税收越轻。由牧场回到城里,店家还须到饭馆中请客。

零星的牲畜交易,在最早的时候,牛羊在羊岗子,骆驼在驼岗子,马在新城,驴骡在庆凯桥底下的小河东西,猪在西茶坊。后来因为马禁开放,庄凯桥底下增加了马匹的交易,新城的马桥索兴移到旧城,同时归化城已发展成商埠,牲畜交易影响街上的交通,便在每年的端午节前一律移到庆凯桥,牛羊桥在端午节前,因为卖的是糟牛和料羊,只供本城食用,为数不多,所以北门至羊岗子的那条街上能容纳得下。过了端午,货源增加,便由庆凯桥附近移到太平召前,过了中秋节,外蒙和乌盟四子王旗等地的零星小群都赶到城里出售,太平召前也容纳不了,就移到城北五里的厂汗板村。所谓牛羊桥,其实以羊为主,牛身笨重,多由附近旗县赶来,羊能运行,赶到归化城的多供本市宰杀食用,走外的羊都在蜈蚣坝后。

一九五九年水冲牛桥以前,羊岗子的街名仍然存在,但是驼岗子只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之中。原来一进北门(现在的公共汽车总站以南)单府门前就是驼岗子,和大厅巷的皮厅子紧连在一起,以后单府门前成了繁华的闹市(大北街)驼桥不得不和马桥移在一起。驼桥、马桥也和牛羊桥一样,在端午以前即离开庆凯桥,不过不到

太平召前和厂汗板村而是到了后沙滩。

桥上的牲畜交易由牙纪把持，分为回民十大股，汉民十大股。这二十多家世袭相传，在官厅中领有牙帖叫做帮买。他们是按头向买卖双方打佣。清末民初，马和驼一样，每头佣金五钱白银，牛每条四钱，羊每只四分。税率一律是百分之三。牛羊桥的时间在一清早，驼、马在吃茶以后到中午。

交易的盛衰，受政局影响很大。在和平时代，交易畅达，交易呈繁荣景象，在战乱时期，陷于低潮。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大受影响，走向低谷，桥上再未出现过以往的繁荣景象。羊的大股销路在北京方面，京羊庄就是经营这一方面的羊店。驼、马则走向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马匹的腿更长，因为除拉车、耕地而外还可装备骑兵。如一九三六年，桂系军阀一次就买去五六千匹马，给羊马店增加了不少生意，虽是军用，因绥远不属桂系军阀统治，照样公平交易，并按值缴税。

## 牛马桥、庙会和流动商贩

彭 勇

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归绥地区的商业形式除设有店铺的坐商和走草地的旅蒙商外，还有牛马桥、庙会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成为活跃本地区人民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商业贸易补充形式。

牛马桥，即牛马市，也就是牛、马交易场所。所谓“桥”，一是指交易地点，一般都选择在有桥的地方，因为是交通要道，人来人往，便于做买卖；“桥”的另一层意思，有经济人在买卖双方“搭桥”，以便于成交的含义。归绥地区这种传统的贸易形式，从清朝康熙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年。旧城北门外的庆凯桥（是为庆祝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凯旋归来所建）建成不久，附近即成为当时牛的交易场所，故时人称之为“牛桥”（1959年被山洪冲毁）。后来牛、马均售，但牛桥之名一直未改。随着牛、马交易而来的还有饮食、农具、土特产等生意摊点。桥上轿下，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吆五喝六，异常热闹。乾隆初年建绥远城（即新城）后，绥远城西街成了交易马的场所，时人称之为“马桥”。其大群交易则在绥远城西门外大教场，当时一次成交有时就达千匹以上，出售的牲畜以马、驴为多，牛次之，骡极少。牲畜交易以九、十两月为旺季。驼市在旧城北门里副都统署侧，民国初年移至北门外。羊市数量少的在羊岗子（北门外西北一带），数量较多的在北茶坊，大群交易在水泉和大庄（大青山后）。牲畜市的牲畜多为蒙地所产，大宗牲畜的购者多为晋、冀、鲁、豫客商，本地农村也有买卖牲畜者，但数量不大。

当时买卖牲畜都有“牙侩”从中经纪，成交后从中抽取佣金二分。“牙侩”亦称“牙纪”或“桥贩子”、“桥牙子”，在交易中，牙侩暗中了解卖主和买主双方的卖价和给价，再暗中做双方的讨价还价工

作,以便撮合成交。讲价时,牙侩与买卖双方袖筒内或衣襟下暗中捏手指,同时说一些外行人听不懂的“行话”,如称一为“流”、二为“戳”、三为“品”、四为“瞎”、五为“拐”、六为“挠”、七为“候”、八为“桥”、九为“弯”、十为“海”、十一为“一大一小”、五十五为“两拐”等,以避免第三者的趁行介入,抢走买卖。

庙会,原本为归绥地区各庙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如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的观音庙会,二月十二的十王庙会,三月十八、七月十五的三官庙会,四月十八绥远城南关的娘娘庙会,五月十三的关帝庙会,八月十四的土地庙会,还有不定期举行的财神庙会、吕祖庙会、文昌庙会、龙王庙会、水神庙会、三贤庙会等。一般庙会都举行三天,第一天叫起会,第二天叫正日,第三天为末会。起会的一个月前,归绥所有的饭庄、茶馆、花店、百货店等都要在庙会会场搭棚设柜,庙外由有关行社搭一座彩布大戏楼。届期,归绥市民,四郊五、六十里的农民都要来“赶会”,一则是为了祭祀、祈祷、还香许愿,二则是为了看戏,三则也是为了购货。

起会后,庙会会场热闹非凡,小贩麇集,商点林立,万头攒动,车水马龙。各种风味小吃应有尽有,各种小玩具令人目不暇接,百货土产琳琅满目。

风味小吃有:冰激凌、酸梅汤、凉粉、蜜麻叶、凉糕、粽子、枣糕、油烫儿、油炸糕、烧羊肉、卤肉、熏鸡、熏蛋、饺子、水煎包子、豌豆黄、荞面饸饹、茶汤等。

小玩具有:泥制的搬不倒、彩色泥人和泥动物、挂人儿、布娃娃、布动物、木竹制的单刀、花枪、宝剑、空竹、拨浪鼓、纸制的风筝、风车、人物假面具、薄铁叶制的刀、戟、叉、小喇叭等。

还有妇女的化妆品胭脂、宫粉、杏子油及头络子、腿带、裤带、手帕、针头线脑、鞋帽、锅碗瓢勺等日用杂品,叉耙扫帚等山货,书籍和纸墨笔砚,还有土特产、牲畜等。有牲畜买卖的庙会就属于大型庙会了,如绥远城南关的娘娘庙会,当时也称骡马大会,故时人有顺口溜曰:“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娘娘庙会第一流”。

这种把庙会和集市合在一起，融祭祀祈祷、文化娱乐和贸易活动为一体的庙会，除在城里举办外，大一点的村镇也多举办，相当于内地的集市贸易。

除以上两种贸易形式外，归绥地区的城镇和乡村还有一些走村串巷的小商贩、货郎子，随时随地进行小型的流动式的贸易活动。他们有的挑担，有的背包，手摇拨浪鼓，沿街沿村叫卖。主要经营小百货，如化妆品、花样子、鞋面子、鞋样子、窗花、梳子、篦子、针线和土布、洋布（机织布）以及烟、糖小食品等。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的商贩在早晨、中午和晚上各有专卖，如早晨有油茶面、烙子、油条、月饼、甜窝窝、麻花、大头麻叶、蜜麻叶、老豆腐、豆腐脑、粉汤、馍馍等，上、下午有麻糖、凉粉、碗坨子、烤红薯、枣糕、绿豆糕、豌豆黄、大粒丸、莲花豆等，晚上有熏鸡、沙鸡、辣辣换萝卜等。各种食品的叫卖都有定时，无钟表的人家都以此来掌握时间，一听到某种食品的叫卖声，人们便知是什么时候了。还有一些赶时令的食品，如粽子、大碗酪、元宵等，应时应节，到时准有人叫卖。各种小商贩的叫卖声抑扬顿挫，长短不一，辅之以击打货郎鼓、梆子、铜铃等，成了一曲都市风情的交响曲，令人终生难忘。

## 从蒙古文化馆到蒙古文化研究所

志 莫 勒

蒙古文化馆是德王伪蒙疆政府辖下的一个文化机构,其职能相当于旧绥远省的社会教育机关——绥远省立民众教育馆。

蒙古文化馆虽成立于1938年,但其筹创却由来已久。早在1935年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第二次会议上,就有教育处处长富龄阿首倡成立蒙古文化馆,以促进民族文化的提高。在德王的赞同下,同年10月蒙政会第三次会议便为建立该馆作出具体计划和决定。其组织大纲规定:以发扬固有文化并输入现代新文化为宗旨。拟设总务、图书、博物、体育、艺术、编辑六部和一个游行讲演队,经费由蒙政会筹措一半,并呈请中央补助一半<sup>(1)</sup>。委任蒙政会委员、土默特特别旗总管荣祥为蒙古文化馆馆长,由蒙政会科长陶立滨、参事康济民协助筹办建馆事宜<sup>(2)</sup>。后因时局动荡,蒙政会解体,该馆的创设未能实现。

1937年10月德王伪蒙疆政府成立后,对文化教育事业颇为重视。遂赓续前议,在接收原绥远省民众教育馆、绥远省通志馆、绥远省图书馆的基础上,于1938年6月1日在伪政府所在地厚和豪特(即呼和浩特)设立蒙古文化馆。馆址即原绥远省民众教育馆旧址(原九一八纪念堂后)。

按照伪政府颁布的组织法,该馆馆长一职应“承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政务院院长之命,综理馆务”;而且必须“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并精通两种以上文字”<sup>(3)</sup>。经慎重遴选,以伊德钦出任馆长。伊德钦(1883—?),字规成,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是当时老资格的蒙古族知识分子。清末曾留学日本,后任民国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

议、蒙政会委员、伪蒙疆新闻社监事等职。曾在南京陆军大学教过蒙古文,编著有《蒙文教科书》(与汪睿昌合编)、《注音汉释蒙文读本》等。

该馆人员编制不详。就目前所知,大约有二十年代因参加阿拉善旗德钦一心诺尔布“革命”事件而流亡在外的阿拉善旗人孟克宝音(即田协安,后任伪蒙疆政府主席府事务官、1945年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建国后任巴彦淖尔盟政协委员)、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的归化城土默特台站蒙古文都尔护(汉名文秀,字睿华),贺希格巴图、汪国藩(字树屏)、赵崇福、苏克巴图尔等人,以及为保护《绥远通志稿》和原绥远省图书馆藏书而忍辱留在厚和的原绥远省通志馆馆长郭象汲、原绥远省图书馆馆员王振庭等<sup>(4)</sup>。

该馆内设总务、研究、体育、博物、艺术五部,每部设主任一人,馆员若干人。其中总务部下设图书组、印刷组,主要负责“图书之整理暨印刷之推进”。研究部主要负责“刊物书报及教科书之编辑,蒙日满汉及泰西书籍之翻译”<sup>(5)</sup>。

成立伊始,该馆便积极行动,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将接收的41000余种图书从速整理,剔出“与新政体发生抵触者”,并“添购各种切实应用图书”,制定《借阅规则》,向社会各界(包括儿童)开放<sup>(6)</sup>。1938年10月,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和方便读者,该馆在原有卡片目录的基础上编印出版了《蒙古文化馆图书目录初编》。该目录系铅印,大32开,共321页,依类编排,末附新购之满蒙文书籍和各种参考书简目。虽著录简略,错讹不少,但却是内蒙古地区图书馆事业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书本式目录。

其次,编辑出版馆刊《文化专刊》。该刊创办于1939年,系综合性刊物,蒙汉合璧,内分论著、文艺、杂俎、专载、国际简讯等栏目,稿件内容必须“以着重发扬文化为归,而词旨务与地方一般舆论及政府建设之大计相符合”<sup>(7)</sup>。蒙文版总编及美工为孟克宝音,翻译为贺希格巴图;汉文版编辑主要有文都尔护、汪国藩等。该刊虽系月刊,但出刊往往不能以时。就目前所知,大约出版过5期。该刊



政治色彩颇浓,尽管在今天看来,其内容多不合时宜,但也发表过一些研究历史或文化的有用文章。现存三期已成为研究当时蒙古族知识分子思想和文化活动的重要文献。

其三,参与编辑和审定新教科书,还针对社会需要,出版一些文化书籍。就目前所知,现存有《成吉思汗纪元734年阴阳对照历书》(蒙文)、瑞永汉译的《蒙古社会制度史》(1939年4月)。其中《蒙古社会制度史》是苏联著名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的代表作,在当今之世仍有相当大的影响。该本虽自日文译本转译,质量亦不甚高,但却是我国最早的译本,在介绍国外蒙古学研究成果和普及蒙古史知识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另外,该馆印刷组还承揽些印刷出版业务,所印《蒙古学院成立周年纪念专刊》(1939年7月)现存孤本,是目前研究该校历史最重要的史料。

至于体育、博物、艺术诸部,因资料所限,其活动、作用及影响目前尚不清楚。

1939年9月,伪蒙疆政府与晋北、察南两政权合并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首都迁至张家口。蒙古文化馆未能随同迁移,仍设在厚和,馆长仍为伊德钦。1941年6月伪蒙疆政府实行机构改组,为便于蒙汉分治,专设兴蒙委员会,以强化有关蒙古的行政,促进蒙古建设的发展。蒙古文化馆遂改隶兴蒙委员会,并改称蒙古文化研究所。

按照是年7月25日伪蒙疆政府公布的《蒙古文化研究所官制》,该所“属于兴蒙委员会委员长管理,为研究调查蒙古人类文化并谋及其普及之所”。内设所长一人(荐任)、主事一人(荐任)、调查官二人(荐任或委任)、事务官一人(荐任或委任)、属官五人(委任)。其中调查官“承上司之命,掌理调查、研究、编纂,并宣传、宣抚事务”<sup>(8)</sup>。

与从前蒙古文化馆时期相比,该所的性质似乎有所转变,已成为学术性很强的机构。这一时期,它主要从事编撰蒙古历史,出刊日文月刊《蒙古文化》,翻译《枕草子》、《源氏物语》等日本文学作

品,出版各种启蒙宣传图书,以及制做日本手工纸等工作<sup>(9)</sup>。1941年底出版的蒙文《元朝秘史》(贺希格巴图转写,张家口德王府印刷所铅印),便是该所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1942年秋,伪蒙疆政府将该所职员及图书等一切迁至张家口,并扩充机构,加强工作,“以适应今后彻底唤起牧区蒙人兴蒙意识的紧迫事业”<sup>(10)</sup>。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困境加剧,伪蒙疆政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该所似乎也很不景气,以致默默无闻,很少听到关于它的消息。

1945年8月,随着日寇战败投降,伪蒙疆政府土崩瓦解,蒙古文化研究所也自然消失于无形。以后,在战乱中,该所运自归绥的藏书损失过半,残存的两万余册图书被察哈尔省立图书馆接收,后经绥远省方交涉,检运回绥,重新恢复了绥远省立图书馆。这些劫后幸存的图书,至今仍妥善地保存在内蒙古图书馆。

蒙古文化研究所及其前身仅存在了短短的七年,在内蒙古近代文化史以及公共图书馆事业史上它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

### 参考文献

(1)参见《时事月报》第14卷1期:“绥远设立蒙古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馆”。

(2)参见1935年11月《蒙古前途》月刊“蒙事纪要”栏“蒙古文化馆成立”。

(3)参见1939年《文化专刊》第1卷2期:“本馆成立周年纪念感言”。

(4)参见内蒙古档案馆旧档,全宗419,卷182,件4。

(5)同(3)。

(6)1938年《蒙古文化馆图书目录初编》例言及借阅规则。

(7)参见1939年9月《文化专刊》第1卷5期封二“本刊启事”。

(8)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总务部编纂《蒙古法令辑览》官制篇第三章政务院各会部局第36页。

(9)(10)昭和17年(1942)9月善邻协会编《蒙古》(日文)第9卷9号第124页“蒙研机构扩充”。

# 呼和浩特满族教育发展概述

佟鸿举

满族是一个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清乾隆四年(1739年),从清政府建成绥远城,随着八旗官兵的进驻,满族大规模迁入和定居,满族教育便开始在此发展。

清朝统治者入关伊始,就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皇帝大修孔庙。讲论经义,宣传儒家思想,并亲自写《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把儒学特别是朱子理学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清廷特意在新旧两城都修建了文庙,春秋两季进行大规模祭祀活动。

绥远城建成后,“八旗满洲、蒙古,原设官学五所。”<sup>(1)</sup>绥远城官学是为驻防八旗和两翼蒙古设立的子弟学校,地址在将军衙署内。“将军署有公廨十间,为八旗满蒙子弟肄业处。”<sup>(2)</sup>绥远城官学的设置,为绥远城八旗子弟兴学之开始。

绥远官学设五部分,“凡黄、校、庠、序、塾五学。每学二旗。镶黄、正白二旗入黄学;正黄、正红二旗入校学;镶白、正蓝二旗入庠学;镶红、镶蓝二旗入序学;两翼蒙童入塾学。”<sup>(3)</sup>绥远官学的规模是每学选学生40人。“五学教习,每学两人,教读国书(满文),汉文。”<sup>(4)</sup>“各旗每佐领下,挑选闲散幼丁,年十岁以上,二十岁以下,能习清语汉书者,各十名,按旗入学。”<sup>(5)</sup>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原设的五学以外,又增设“满汉翻译学”一所,<sup>(6)</sup>设置翻译教习两名。当时官学完全是公费,“春冬,每季公费银十三两五钱;夏秋,每季公费银八两四钱一分。一年各学四季共领公费银四十三两八钱二分。”<sup>(7)</sup>那时的教习(也就是教师),都要经过严格挑选和考核。

“翻译教习，由部请题本城将军归化城副都统，率同本城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等官，监场考取二员入学，三年期满。“五学教习，每学二名，由八旗领催、前锋、马甲内挑取。”<sup>(8)</sup>

清同治十一年(1872)，绥远城将军定安倡导八旗官兵捐资兴建长白书院，院址位于新城书院东街的孔庙内。定安，字静村，京城满洲镶黄旗人，姓叶赫那拉，同治七年(1868年)任绥远城将军，任期六年，是历任将军中任期较长的一任。他对教育事业“至为留意”。他兴建书院的目的在于“释甲冑而诗书，化干戈为礼乐”，“维持风化，辅翼升平。”<sup>(9)</sup>书院教授四书五经，颇为严格。书院创建之始，由八旗官员内选派协领经管，并请山长(院长)定“月考”之制：每月课文四次，分大课、小课。大课为每月初三、十六两日，小课为每月初八、三十两日。大课由将军亲自命题阅卷，小课由山长命题。考试内容分经史、论义、时务、条对等。考试方法，或限日缴卷送阅，或临时扁试。考试获得优胜者，获以银两或者当众勉励。因此，“八旗英俊，诵读怡怡”。<sup>(10)</sup>

书院经费，主要依靠建院剩余的五千余两白银“发商生息。”光绪三年(1877年)，将军庆春又捐集巨资。光绪五年(1879年)，将军瑞联又命归绥道员阿克达春集商贾捐银四千两，充实经费。是年，将军瑞联将“长白书院”改名为“启秀书院”。当时的启秀书院“规模足壮观瞻。”<sup>(11)</sup>成为满族教育的重要场所。从长白书院创建到启秀书院这段时间，“进学者颇多，征试亦屡有中式之人。”<sup>(12)</sup>绥远城自道光以来，有满洲、蒙古中过举人二十二人。其中同治十一年(1872年)后，即长白书院创建后中举十八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启秀书院改为绥远中学堂。

绥远中学堂是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学堂”的改革产物。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令将全国所有书院改为学堂。设在省城的改为大学堂，设在各府、厅及直隶州的改为中学堂，设在州县的改为小学堂。书院虽改为学堂，但管理体制与教学内容仍与书院无异，原书院山长为学堂堂长，课程仍以读经讲经为主，修业年限

及寒暑假均未有规定。

绥远中学堂设满文、蒙文、汉文、外文四科。所请教习者是山西令德堂毕业学员。后学堂又设高等小学堂一所，次年又增设初等小学堂一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满文、蒙文两科合并于“满蒙学堂”。汉文、外文两科经过考试，选优秀学生40名组成中学堂甲班，按《奏定学堂章程》实行新学制，设经学、国文、算学、英文、博物、历史、地舆、体操等12门课程，有教师7人，教务提调、监学、庶务提调各1人，书手4人。常年经费白银三千六百两。

1912年绥远中学堂与归绥中学堂合并改为归绥中学校。绥远清代满族官学完成了历史使命。清代末年，绥远城内还曾设有多处私塾，教授满族学生。

绥远官学和书院是清代满族教育的主要机构，为提高民族素质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绥远中学堂合并以前，光绪三十年（1904年）绥远城将军贻谷“对于城内学务，颇多设置，以谋旗学之振兴，”在绥远城内创设左右翼五路蒙养学堂及满蒙学堂。“左翼五路蒙养学堂为东北路高等、东北路次等、中路高等、东南路次等、东南路高等。各堂学生多至21名，少至16名。学科为经学、修身、历史、地舆、算术。教习五员，司事二员。右翼五路蒙养学堂为西北路高等、西北路次等、中路次等、西南路高等、西南路次等。各学堂学生多至18名，少至12名。两翼各设半日学堂一所，各有学生60名。右翼各学学科及教习、司事名额与左翼各学同，常年经费共二千四百两”<sup>〔13〕</sup>根据实地考证左翼学堂在新城傅茶馆巷西头路北，右翼学堂在城隍庙街。“满蒙学堂共分四斋，每斋学生三十六七名，学科为四书及满蒙文（一斋学满文，二、三斋学蒙文，四斋学汉文）。教习八名，司事二名，常年经费四百五十两。”<sup>〔14〕</sup>

清朝末年，鉴于八旗和绿营军队武器陈旧过时，素质腐朽，各方面落后于列强国家，清政府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就开始研究训练新军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钦命铁良为练兵大臣，袁世凯为帮办练兵大臣，命令各省积极练新军，速办武备学堂、陆军

中小学堂,以抗外侮及绥靖全国各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绥远将军信恪在开始训练新军的同时,创建绥远武备学堂。学堂学习德日两国建军制度,学习课程和训练规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贻谷将军到任后积极筹办“武备学堂”,从满族八旗青年中选拔身强有才、文化通达的优秀人才六十名,学习最新式操练与武器训练。当时学生按马甲待遇,每人每月二两八钱银子,还另有津贴。所有学生编成两班,在学生中有秀才三人。60名学生毕业后,分别派充绥远步兵和炮兵营或到北洋速成学堂深造。武备学堂为满族八旗兵注入了新的血液,成为满族了解西方军事的窗口,对提高满族素质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

清朝末年,书院改为中学堂并附设小学堂,是归绥地区近代小学教育的开端,1912年以后,公立私立小学陆续创办,但规模不大。班级和学生人数很少,儿童入学率极低。广大满族群众生活困难,更无力关心教育。

从1912年至1949年,在原绥远城范围内先后曾创立归绥市立关帝庙街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今新城区关帝庙小学)、归绥县立第二小学(校址在今新城区元贞永街)、绥远省第二中心国民学校(校址在今新城区东落凤街庆丰小学)、归绥师范附属小学(校址在今新城区苏虎街小学)、民生小学(校址在今新城区东街小学)。这些学校中只有绥远省立第二中心国民学校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对呼和浩特满族教育影响最深。

该校成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3月28日。为绥远都统署创办的男女义务学校。第一任校长刘汉勋,当时学生只有百余人,第一年毕业只有8名学生,第二期毕业只有39名。民国十七年(1928年),校名改为区立第二小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年)改为绥远省立第二小学校,当时著名教育家张懿任校长。该校经费来源,民国十九年(1930年)以前由绥远省财政厅拨给,以后改为教育厅拨给,每年拨款大洋377元。当时的学制为四二制,即初小一至四年级,高小一至二年级。当时的课程设有语文、算术、自然、修身、劳

作、体育、音乐、图画、说话、自习等，高小尚有地理、历史等课程。省二师资条件较好，教学严谨。因此，绥远城的满族家庭都愿把孩子送到省二学习。省二在教学上曾有一些创新，开设了很多动手动脑、启发智慧的课程，深受各界群众支持。

呼和浩特著名的满族教育家舒乐知(字天民)先生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始，在省二小学任国文和书法教师。他以学识渊博、工作勤恳、诲人不倦的风范，开一代教育之先河，为绥远培养了一大批满族优秀人才。

解放后，新城区政府在各街道办起了识字班、扫盲班，使广大满族群众摘掉了文盲帽子。1952年绥远民族中学(今土默特中学)，开始招收满族学生。至1955年，先后有100多名满族学生在这所学校学习。1956年后，满族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呼和浩特第三中学开设满生班(“文革”中曾一度被撤销，1986年又恢复)。1957年成立了全区唯一一所满族小学，当时在全国尚属仅有。为呼和浩特满族教育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本市有满族同胞3000多人，聚居新城。热心教育的满族上层人士和人民代表一致倡议建立一所满族小学。1957年9月，满族小学正式开学，新城的满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奔走庆贺。何佩君同志任第一任满族校长。到文革前，满族小学规模不断扩大，师资队伍不断充实，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受到满、蒙、汉及其他各族人民的支持和爱护，成为一所民族团结的学校。十年动乱中，满族小学也没有逃脱被“砸烂”的厄运。粉碎“四人帮”后，满族小学获得新生。1978年撤销了初中班。1980年民族工作会议后，恢复为民族学校，增设两个蒙文班，加授蒙文课。1986年在广大满族人士的支持下，开设了第一个满文班。从1980年起，招收全市的满族儿童入学，现在全校满族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20%。1987年，满族小学开始实行党支部监督保证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行目标管理，完善了各种规章制度，学校管理步入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学校制定了“方向明确，思想活跃，素质全面，个性突

出”的校训。坚持“德育为主，五育并举”的办学指导思想，不断提高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学校整体教学水平逐年提高，连续四年获呼和浩特小学毕业会考前2名。学校多次被评为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自治区少先队红旗大队、呼和浩特先进民族小学。

1987年，市政府投资80多万元，彻底改造了满族小学的办学条件，建成了面积为2800平方米的新教学大楼，可容纳18个教学班。同时配有其它先进的教学设备，使之成为呼和浩特满族教育的基地。爱新觉罗·溥杰先生生前曾为满族小学题写校名。

满族小学为教育满族学生奋发图强，努力学好文化科学知识，采取了一系列适合满族学生特点的教育措施，如“白山黑水话满族”等少先队活动，增强了满族儿童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利用第二课堂对学生进行民族知识教育，从小树立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的观念。学校还开展了具有满族特点的文体活动，成立了“满族珍珠球”球队，舞蹈“满族花”在自治区及呼市文艺汇演中获得特别奖。满族学生表演的太平鼓成为呼和浩特满族群众喜庆节日的重点保留节目之一，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满族小学建校以来，共培养毕业生2000多名，其中满族学生约占60%。这些毕业生经过继续深造，大都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有用人才。

呼和浩特的满族教育，不仅重视小学，而且从幼儿抓起。1986年，新城区政府、教育局在新城区元贞永街原新城区第三幼儿园的基础上改建创立了呼和浩特新城区满族幼儿园，岳晓玲同志任第一任满族园长。满族幼儿园的旧址是民国初兴建的一所民居，年久失修。1991年，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三级政府拨款150万元，新建2200平方米的三层教学楼，解决了呼和浩特市满族儿童入托难的实际困难。新建教学楼可容纳8个教学班280名儿童入园，其中满族儿童占全园人数30%。

1993年新楼落成使用。同年，在全市幼儿园验收评比中被评为一类甲级幼儿园。多次被市、区评为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集



体。满族幼儿园编排的具有浓郁满族特点的儿童歌舞多次荣获自治区和呼市的表彰。满族幼儿园真正成了儿童的乐园,人才的摇篮。满族幼儿园的兴建和扩建,进一步完善了呼和浩特满族教育体系,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

解放45年来,呼和浩特的满族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广大满族同胞不会忘记那些为满族教育辛勤耕耘的人们,更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

**注 释:**

- (1)《绥远城驻防志》、学房
- (2)《归绥识略》卷十二地部、官学
- (3)《归绥识略》卷十二地部、官学
- (4)《归绥识略》卷十二地部、官学
- (5)《绥远城驻防志》、学房
- (6)《绥远城驻防志》、学房
- (7)《绥远城驻防志》、教习
- (8)《绥远城驻防志》、教习
- (9)内图藏《绥远城创建长白书院碑记》
- (10)内图藏《绥远城创建长白书院碑记》
- (11)《将军定公安碑记》
- (12)呼和浩特博物馆藏《启秀书院碑记》
- (13)呼和浩特博物馆藏《启秀书院碑记》
- (14)《绥远通志稿》

# 略谈北平蒙藏学校土默特旗学生的斗争

(1929—1949)

赵相璧

本文共分两部分,这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1913年至1927年的情况。因这部分前人已有不少文字,故这里将其略去。

另外,因本人了解情况有限,很难将蒙藏学校进步青年学生的斗争生活反映出来,因此才以《略谈北平蒙藏学校土默特旗学生的斗争》为题,将该校学生运动略作叙述。仅此,也还有很多不妥之处,还望多多指正。

## 一、1929年6月至1937年6月的斗争

### (一)驱赶校长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学生运动走向低潮。为了把全国的学生运动引向深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时发出通告,提出学生运动的新方针,要求各校党团组织要“切实领导学生群众参加政治的、本身的和思想上的各种斗争。”要“争得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一切政治自由”等等<sup>(1)</sup>。当时,北京各校的党团组织遵循这个方针,积极领导学生从多方面展开了斗争。

北京蒙藏专门学校的党团组织,自1925年以来许多党团员和学生中的骨干力量相继离校之后,作为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到1927年6月,由于经费奇缺,学校陷于停顿二年之久。1929年蒙藏院改组为蒙藏委员会,6月,复行开办蒙藏专门学校,责成吴恩和校长负责筹备,分班招生。这一期共招入新生70名,其中土默特旗被招去的蒙古族青年即有30多人。他们是:荣耀振、云麟玉、康济美、殷文麟、巴治国、经瑞霞、云耀宸、云汝霖、卜文瑞、王惠云、伊仲

琚、康福成、云飞扬、云慧、任殿邠、云从龙、云耀精、云硕誉、巴文魁、云薰、云秉章、赵连璧、班文焕、李秀山、云文林、云承祥、云瑞成、云承瑞等等<sup>(2)</sup>。其后，每年都有一批土默特旗的蒙古青年被招入学，因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详见学生毕业档案。

此次复学招生，学校只办了两个中学班，未办专科。学校的名字因此也改称为“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7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会上同时宣布了免去吴恩和的校长职务，任命雅楞丕勒为校长。雅楞丕勒到校之后，积极推行国民政府的宗法专制教育方针，对学生实行高压政策，并在校内职教人员当中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大施淫威，遂激起全校师生的反对，终于酿成一次以驱赶校长为表现形式的学潮。一位在蒙藏学校工作二十年的老教员姚敬斋先生谈及此事时说：“记得北伐成功以后，派有所谓某四爷者（指雅楞丕勒）来当校长。某不识汉字，闻亦并不识蒙字，以号称蒙藏最高学府之北平蒙藏学校，派一不识字人来当校长，试问其是何居心，最低限度也是认为小蒙古为蠢如鹿豕之铁证。既认为学生如是学生，亦无不袍笏登场，滥竽充数。其实学生并不蠢，如上堂开口，即遭攻击，甲来乙去，有不旬日，一门功课，有更换教习至三五人之多者。不自责其所请非人，只说学生捣乱，此其过究谁负之。”<sup>(3)</sup>由此可见，蒙藏学校此次学潮之起绝非偶然。

此次学潮是在云耀宸、殷文麟等一些土默特旗去的蒙古族青年的带动下发起的。学潮爆发之后，全校学生在云耀宸、殷文麟等人的带动下，举行集会、罢课，驱赶不称职的教员，要求蒙藏委员会撤换校长，质问雅楞丕勒等等。

学潮爆发之后，雅楞丕勒见局势难以维持，遂带领一小部分学生，转移到分可所借地上课。姚敬斋所说：“犹记某四爷当校长时，竟于寅夜率西康学生三十余人，另觅校址开课。”<sup>(4)</sup>即指此而言。大部分留校学生，推举旧职教人员成立了校务维持会，继续组织学生上课。

在学生们的反对下，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于9月份解除了雅

楞丕勒的校长职务，并派参事张子和任校长职务，进行整顿。张子和到校之后，首先取消了维持会，接着他又在学生和广大的职教人员中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算平静下来。张子和初到校时，教师姚敬斋曾对他进行了劝告：“学生皆不远千里或数千里，来平求学，绝非为故意捣乱而来，用不识字人作校长，用小学毕业者充主任，学生表示不满，则认为无理取闹，解决之道，一为找军警，逐之出校——轰的政策；一为不与买米，绝其饮食——饿的政策。一轰一饿，诸事皆不成问题矣，此等高压政策，中国内战，实基于此。望张先生以后整顿学校，要使学生有安全生活，有热心教员，使其满足千里来平之希望。”由此，不难看出当时蒙藏学校闹学潮的起因之一，即是国民党的愚民政策和高压政策。

此次学潮，影响很大，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东京蒙古留日学生会”还为此编辑出版了油印刊物《祖国》表示对蒙藏学校学生们的支持。

蒙藏学校的这次学潮，经过张子和的处理，虽然暂时平静下来，但学生们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止。黄奋生《蒙藏新志》说：“（民国）十八年委派雅楞丕勒为校长，到校未久，学生即起风潮，被迫离职，其后五年之内，凡更易校长者七人，其原因多由于学生对历届校长之人格学问表示不满，而政治之起伏关系，亦为风潮发生之原因也。”事实也正是如此。

1930年春，张子和离职，教务主任张景涛代理校长，由于学生的反对，于12月辞职，蒙藏委员会又派前任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为校长。贡王到任未久，因学潮不止，愤激忧郁，突发脑溢血病故。

蒙藏学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校。建校之初，北洋军阀政府就规定每年拨四万八千余元的办学经费，国民党新军阀也继承了这一事实，继续拨款。这样，与其它学校相比经费较为充裕。因此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便把它当作一个安插亲信，中饱私囊的肥缺。于是，一个接一个的反动政客被派来此充任校长。正如老教师姚敬斋

所说：“二十年中更换校长，凡十五六人，除前任张代校长，实为办教育，次则张国耀校长，犹有办学精神外，余则官僚耳，王公喇嘛之替身耳。”这些人到校之后，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结党营私，行大肆贪污之能事，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因此激起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克力更同志回忆说：“1932年至1935年期间，驱赶校长的斗争，在蒙藏学校一再发生。其原因主要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历任校长不但不关心国家前途，学校的事业，不关心学生们的状况，听任自流，反而大肆贪污，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学潮。”老教师姚敬斋也说：“校中纠纷，二三年来，迄未一时平息。”

这期间，在蒙藏学校发生的学潮中，规模最大要算1935年驱赶校长宋绍曾的斗争。1934年的学潮之后，蒙藏委员会又派宋绍曾来蒙藏学校任校长。宋绍曾于1935年1月上任之后，不但没有消除以往的任何积弊，反而将学校办得更糟。图书馆没有书，教学设备谈不上，相反，他们却大肆贪污，就连学生的学习用具和衣服费用也进行克扣，这样便激起该校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学潮。此次学潮发生在1935年的7月。当时学生罢课、教员罢教、集会、质问校长，造成一片混乱。这次斗争一直延续到9月份，蒙藏委员会派唐柯三来校进行处理，并撤去宋绍曾的校长，所谓“引咎辞职”后，学生们才正式复课。

此次斗争，是该校高年级学生成以博（克力更）以及李成林（寒峰）、云麟宝（墨志清）丁贵和等人领导进行的。他们都是土默特旗的蒙古青年，分别于1931年和1932年考入北平蒙藏学校的。当时与他们同时入学的还有很多人，有的是来自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克力更同志回忆到这段生活时说：“当时我已经是学生中的领头的，还有一名叫谢国祥的东部区的蒙古族学生。我们几个人首先商议决定把宋绍曾赶走。为此，我们首先在全校学生中作了宣传，又发动了一些学生家长和一些社会上有声望的蒙古族父老，如李干三、包卫汗、李海、程树仁等等，还有教师中的师大派，也都支持我们。准备工作就序之后，一场驱赶反动校长宋绍曾的斗争爆发啦。

“1935年7月的一天，学生们齐集在校院等宋绍曾的到来。当他一到办公室，学生们就围上去了，接着学生们的家长，在北平住的蒙古族父老也来了。学生代表便在大家面前将宋绍曾的反动行径和肮脏事实逐条揭露出来。宋绍曾听后非常气愤，但在众目睽睽的质问下，无言答对。随后，宋的行李物品被扔出校门。宋被赶走后，那个教务长也被赶走了。”<sup>(5)</sup>可见，当时蒙藏学校的学生运动是非常活跃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也是沉重的。

这次学潮的起因，在于宋绍曾不尽职守，结党营私和大批开除学生，压制学生运动所致。正如姚敬斋先生所言：“某校长有鸦片嗜好，时常不到校，乡谊又太重，职教员非其同乡，便不信任，旧有职教员，渐渐引退，打成了他的青一色”，此其一；“招收学生，亦重乡谊而轻异己。”办蒙古学校，专门与蒙古学生为难，一年之内，开除蒙生至七八十人之多……”<sup>(6)</sup>此其二；“该校职薪大于教薪。闻校长薪金每月四百元，各主任亦各一百五六十元不等，以致职员们的薪金，竟超过了教员的薪金，这求之于世界各学校，大概也不会有”，此其三；“查该校图书馆，除订有《国闻周报》一份及新闻报纸四五份外，其余概付缺如，学生精神食粮缺乏若此，也是容易滋生事端的一因”，此其四；“该校好教员固然很多，而坏教员也不在少数。据闻在暑假期间，宋前校长曾征集学生意见，不良者予以更换，学生曾签名盖章，表示反对者若干人，不知为什么，该校校长又全部聘请，宋校长的遭反对，这也是原因之一”，<sup>(7)</sup>此其五。时人所论上述五点，是该校此次学潮的直接原因，其实质还是宋绍曾等一伙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秉承“委员长方面表示，不愿使学校随政潮转动”，<sup>(8)</sup>推行法西斯教育方针，对学生实行高压政策，压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为阻止蒙藏学校学生的爱国行动，学校当局大量开除学生，解聘教员，国民党北平当局还扬言：“蒙藏学校太好捣乱了，简直不如赶快的解散！”<sup>(9)</sup>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对蒙藏学校学生运动的仇恨和畏惧。

北平蒙藏学校的学生运动之所以如此活跃，与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是分不开的。尽管当时在北平蒙藏学校还没有党的地下组织，但有党员在做地下工作。如语文教师关彤，还有王生然便是地下党员。他们对该校的学生运动极为关注和支持，并给予正确引导。克力更同志回忆说：“我当时在学生中影响很大，是领导学潮的，他们很支持我，经常给我出主意，想办法，我也常和他们商量。”<sup>①②</sup>正是在这些地下党员的关注、支持、引导和帮助下，蒙藏学校的学生运动一直没有脱离革命的轨道。

## （二）为抗日救亡而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东北军张学良部数十万军队不战而退，致使日本侵略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占据东北全境，随后又于1932年进攻上海，1933年占领热河和察北，并向长城各口进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张武装抵抗，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9月20日，中共中央与日共中央联合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22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加紧组织领导群众的反帝运动，武装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了规模浩大的抗日反蒋怒潮。在东北，群众组建了抗日义勇军；在上海，八十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义勇军；在北平，爱国群众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工义勇军；在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的群众也纷纷建立了各种抗日团体。9月20日，北大学生会发出抗日救亡通电，并组织了南下请愿团。

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北平蒙藏学校师生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在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同其它各校的师生一样，他们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演讲，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当时正在该校读书的土默特旗青年荣景贤回忆说：“‘九一

八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有好多东北人流亡到北平,国民党对此无动于衷。北平的各大学都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罪行,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东北。我们蒙藏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游行,演讲,搞救亡活动。东北的流亡学生和人民也在街头演讲,诉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的罪行,他们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深深感受到那种亡国后的痛苦。”<sup>(11)</sup>当时,学生和教师对时局尤为关注,课上课下纷纷谈论。1931年10月27日,蒙古族北平同乡会召开了“讨论应付暴日办法”的会议,蒙藏学校的一部分学生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到会者百余人,一致认为“闻日军抢占东北各地,举国愤慨,群起而反抗,旅京蒙古人,以东蒙地方,首被蹂躏,尤为愤激!”大会最后通过十一条决议案,如组织蒙古救国团,共御外侮;通电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等等。克力更同志回忆当时蒙藏学校的情况时说:“当时在蒙藏学校读书的学生中,大部分是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进步青年,他们关心时局,忧虑国家危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蒙藏学校的一些进步教职员,除在课上课下向学生们讲解爱国道理外,还公开在刊物上撰文,倡导大家团结抗日,救我中华。国文教员姚敬斋以《敬告蒙古前后毕业同学》为题发表文章,不仅沉痛叙述了“九一八”以来的现实,更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化散沙为赤堙:“三数年来,内战频仍,强邻日迫,大局摇动,举国痛心。尤其闻奉军进关,东北健儿,只知在中土谋势力之伸张,致令倭寇生心,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攘攫我四省疆土,入其掌中。举国同仇,中外共愤。……凡我国人,皆宜兴起,化散沙为赤堙,变雌伏为雄飞。”接着又说:“况在蒙古,地界边隅,危急情形,十倍中土,欲图奋发,端赖革新。不有极健全之精神,不足以起衰而振靡。不有大规模之计划,不足以尽秽而涤瑕。”最后更意味深长地说:“怀恋乡土,人有同情,从苦得甘,其味弥永。客居广厦万间,不如自营土窟。自种园蔬,清香适口,常过于海陆珍奇。江南虽然,非我故居,



塞北苦寒，祖宗庐墓存焉。幸今尚属我有，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倘再角逐于外，自乐逍遥，一但反主为宾，鹊巢鸠占，异乡游子，归不得也哥哥。”<sup>(12)</sup>姚先生讲这番话的时候，内蒙西部地区尚未沦陷，所以才发如此警言。其他进步教职员工也同样以各种方式纷纷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的行列。

对于爱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卖国政府恨之人骨，除百般刁难外，又实行白色恐怖。1933年，蒋介石为镇压抗日救亡运动，特派著名刽子手蒋孝先率宪兵三团进驻北平，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北平党的地下组织屡遭破坏，整个抗日救亡运动遇到很大困难。

此间蒙藏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受到很大压制，但学生们仍不放过各种有利时机，继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其中借纪念元太祖成吉思汗进行的抗日宣传活动就很有影响。旧历三月二十一日，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诞辰，每年这一天，北平蒙藏学校照例举行纪念盛典，参加者除本校全体师生外，还有旅平蒙古各界代表、各报记者，有时还有些外国人，校内校外熙熙攘攘，人潮涌动。蒙藏学校的进步青年便借此有利之机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在1934年和1935年的纪念盛典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校园内外贴满标语，其中比较醒目的有：“纪念元太祖要加紧救国家救民族的复兴工作！”“纪念元太祖的意义在唤醒蒙古同胞的民族意识！”等等。会场内，成吉思汗画像两侧有醒目的对联：“想当年成吉思汗地跨欧亚完成帝国事业，望嗣后蒙古青年主掌盟旗复振民族精神”。表现出誓除外侮的气概。

大会开始，主席云文翰报告了开会的宗旨。他说：“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成吉思汗呢？不外有两重意义：（一）为表扬先烈的伟业而知所愧悔，由愧悔而省悟；（二）为认清我们当前的危机，而知所奋发”。继之是教职员代表吴英荃发言。他说：“当前中国危亡迫切的时候，来纪念这位轰轰烈烈的成吉思汗先烈，兄弟实在觉得是有限感慨！……元太祖武功强烈，惟讨东瀛，未竟全功，而它正是我们

目前的最大仇敌，我们纪念元太祖，更要以坚决的意志，将此前仇旧恨一律涤清。”在自由发言中，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巴文奎、赵连璧的发言最为激动。他们说：“我们今天来纪念成吉思汗，除痛哭流涕在元太祖面前赔罪外，我们希望我们蒙古青年，再不要这般的暮气沉沉，要赶快的振作起来，希望于毕业后，不要与腐化的王公与蒙古的政客合作。要恢复旧有的失地！要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在这里他们明确地提出要涤除东瀛，共御外侮。这是何等响亮的口号。晚上的文艺大会，使“素日少与各界接触之蒙藏学校，至此乃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时尚未届，而礼堂早已无立足之地矣！来宾人数，不下五六百人之多”，如此景象的文艺大会，其中大量贯穿着强烈的抗日救亡内容，象《爱国仇家》一剧，“充分表现出一种爱国的热诚，使我们这‘只有知家，不知有国’的观众看了，当然发生一种惭愧的感觉！”；《无名小卒》一剧，更是主题明确，催人深思。全剧大意为“中日于去岁作战时，有一中国密探为日人所获，该小卒刚毅不屈，毫无惧色，虽经敌人再三恫吓，百般利诱，而了不为动。又因彼身上带有军用详细地图一张，后被敌人搜索，乃极力挣扎，卒将此军用地图焚毁，使敌人未能探知我全军机密。这一种为国牺牲的精神，真足以愧死一般认贼作父的无耻汉奸！”<sup>(13)</sup>还有《热血青年》……等等，都具有振奋人心的作用。

此外，更有以撰写文章的方式，宣传抗日救亡，如云从龙以《纪念成吉思汗》为题发表文章，讲道：“在‘九一八事变’后，东蒙古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生吞活剥的夺去，而现在西蒙古所处之地位，又是四面楚歌，在失地未有收复之先，痛定思痛之中，来纪念成吉思汗，我们希望蒙古青年，效法先烈的精神，打破恶劣的环境，为蒙古民族谋幸福而奋斗，为蒙古民族图生存而牺牲。”<sup>(14)</sup>

不仅如此，北平蒙藏学校的进步师生，还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压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蒙藏学校师生的爱国热诚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 (三)反对文化“围剿”

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于1930年至1934年接连不断地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同时,在文化战线上也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文化“围剿”,采取法西斯的恐怖政策,实行文化专政,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极力推崇“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妄图以此来禁锢人民特别是青年的革命思想。

为摧残革命文化,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国民党政府对革命刊物和进步书籍一律进行查封,对文化教育界的革命先进分子进行残酷迫害。仅1930年7月下旬的几天内,北平警察局以共产党嫌疑逮捕的学生即达九十多人;1932年8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教育部颁发《严查国内各大学学生主编或收转稿件之刊》,列举了大量学生所办的进步刊物,以“诋毁政府,鼓吹阶级斗争”为罪名一律进行查封,对进步学生和编撰人员进行迫害。此外,在社会上还动员了一批反动文化走狗,向革命文化进攻。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革命进步知识分子和先进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文化“围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北平蒙藏学校的进步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也投入了这场伟大的斗争。他们传阅进步书籍,创办进步刊物,组织进步社团,表现出蒙藏青年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无畏气概和为追求真理的顽强斗争精神。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全国抗日救国思想影响下,北平蒙藏学校学生们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为正确引导他们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经常派一些蒙古族出身的共产党员到学校以同族同乡关系进行工作。据克力更、墨志清、孟绍等人的回忆,先后到蒙藏学校作过工作的有关彤、高涛、王生然、毕力格巴图尔、包悦卿、乌兰、贾力更等。他们来到蒙藏学校,向同学们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介绍很多进步书籍,包括邹韬奋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生活》、《永生》,以及“五

四”时期的《新青年》等等，对学生们影响很大。蒙藏学校的学生们还通过创办进步刊物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如，因为“日寇凶焰日炽，内蒙古西部形势紧迫”，土默特旗旅平学生会“感于蒙古民族已臻于千钧一发之危境。而一般青年对于救亡图存之道，不能不加以准备”，于1935年4月由该校土默特旗进步青年成以博（克力更）、李成林（寒峰）、云麟宝（墨志清）与殷石麟共同创办《蒙古知行》月刊，以宣传蒙族团结抗日为宗旨，力图“发扬蒙旗文化，促进地方事业，联络蒙汉感情。”该刊定名“知行”，是出自明代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王阳明（即王守仁）“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之句，意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号召大家把抗日救亡的议论进一步变为实际行动。

《蒙古知行》月刊是一个综合性刊物，设有插图、专载、评论、国际、公教、文艺、拾零等栏目。作为学生刊物，后因内容激烈，受学校当局干涉，以及经费不济而被迫停刊，1936年6月殷石麟毕业后，该刊又在归绥复刊，刊期续前。<sup>(15)</sup>据现有资料判断，该刊约停刊于1937年春，至少出过八九期。因经费全靠资助，每期印数较少，主要是赠送蒙古青年，有关机关、部门、各盟旗及蒙古族中的一些知名人士。<sup>(16)</sup>

北平蒙藏学校的进步青年在关彤等地下党员影响下，还通过组建进步社团与敌人进行斗争。“九一八事变”之后，蒙藏学校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救亡情绪十分高涨，要求国民党抗日的呼声很高。为进一步深入地推动本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激发更多的学生与国民党推行的不抵抗主义和白色恐怖政策做斗争，激励人们奋进，土默特旗在蒙藏学校读书的成以博（克力更）、丁贵和、云广青等进步青年学生，在地下党员的启发、影响下，针对学生中存在的少数消极失望、悲观厌世情绪以及部分人为德穆楚克栋鲁普倡导的内蒙古要实行高度自治所迷惑等现象，于1935年上半年共同办起一个“趋生社”。<sup>(17)</sup>意即趋向新的生活，以启发人们觉悟，激励人们奋进。在该社，学生们读到《独秀文存》、《中国怎样降为半殖民地》、范长江的《西北角》、《水星月刊》以及《新青年》的合订本（四本

合订)、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等。趋生社办起后,很受学生欢迎,大家秘密地借阅着该社书刊,在学生中深有影响,激励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活跃了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驱赶反动校长的斗争,搞得非常激烈。

趋生社是在地下党员的影响、支持下办起来的。克力更同志回忆说:“我们办趋生社也是受到了关彤老师的影响,实际上是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办起来的。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教室看数学,关彤老师到后便笑着对我说:‘你们满脑子xy,干什么呀?人家就是要你们什么也不要想,只懂得xy就行了。你们还是多读点好书,会有好处的’。有一次我正读《生活周刊》,关彤老师看到就对我说:‘青年人多读这类书很好,将来对社会是有好处的’。趋生社办起后,关彤老师极为高兴,且给予了很大支持。”趋生社尽管在本校只办了几个月(到秋天因克力更等人毕业也就停办了),但该社的书籍一直在学生中留存、传阅着。

蒙藏学校学生的上述斗争,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青年高昂的爱国热情,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无畏气概和为追求真理的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

这期间,蒙藏学校的教员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也表现出了极大不满。教师姚敬斋在其所撰《敬告蒙古未毕业同学》一文中对国民党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进行了揭露。他说:“最近之新生活运动,徒是报纸大段的记录着深切动听的讲演词,排印着参加运动的照相片。一若话一说出,影一摄出,新生活运动,即大告成功也者。以虚不以实,顾表不顾里……”。“<sup>18</sup>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妄想借孔家礼教禁锢人们的思想,实际上永远达不到其目的。

就全国范围来说,这个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虽然由于左倾路线干扰,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斗争,最终粉碎了文化“围剿”。“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更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彻底破产。

#### (四)参加“一二·九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进犯,1935年,为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制造了华北事变。在经济上也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使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危险。此时,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年7月,国民党驻华北代表何应钦,同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将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控制权拱手奉于日本。同时,蒋介石还颁布了所谓《敦睦邻邦》的命令,禁止发表反日言论和组织抗日团体。12月,蒋介石又派宋哲元组成“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时,平津道口各车站、码头遍插日本国旗,北京近郊经常看到日军演习,日军飞机天天在低空回旋,日军坦克在大街冲驰,日本宪兵、特务到处逮捕抗日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处在战斗前哨的北平青年深感民族危机的深重,迫切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制止国民党反对派的卖国行为。

正当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国民政府,组织抗日联军,以实现抗日救国。《八一宣言》集中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抗日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为加强对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1月秘密组织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并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会议,发表通电,反对任何假借民意的“华北自治”组织。4日,清华、燕京、女一中、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十五所学校,在北大开会,决议联合各校,加强北平学生联合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6日,北平学联发表声明,提出反对日本帝

国主义吞并华北的九条纲领。8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了有三十余所大中学校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会议讨论了游行口号、时间和路线,作了组织上的部署。蒙藏学校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后,北平蒙藏学校的学生在席振华、李成林(寒峰)、周忠孚等人的发动下,于第二天冲破军警的阻拦,与市内其它各校的学生一同上街,汇合于新华门前,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请愿,提出六条要求:1、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2、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3、不得任意捕人;4、保卫地方领土完整;5、停止一切内战;6、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要求遭拒绝之后,学生们即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进行示威游行。沿途各校学生和市民陆续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万人以上。当游行队伍行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国民党宋哲元所部军警堵截。他们用步枪、大刀、水龙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冲来。一场激烈的搏斗一直延续到下午。李成林(寒峰)同志回忆这场斗争时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们蒙藏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当时我们从蒙藏学校出来,走到宣武门被军警堵截回来了,后来又从西长安街走到新华门的。”<sup>(19)</sup>孟绍同志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一二·九’我们参加了游行,是席振华、周忠孚他们领头的,那天我正有点感冒,游行回来后反倒好了!第二天,进行全市总罢课,蒙藏学校也罢课了”<sup>(20)</sup>云麟宝(墨志清)同志回忆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何梅协定卖国契,全国人民齐抗议。我校师生情奋激,痛骂当局胡乱为。……回想当年‘一二·九’,学生爱国上街头。蒙藏学生情激忿,上街高呼反日寇。队伍走到西单口,大刀水龙浇上头。化整为零四处散,改变方式重新斗。”<sup>(21)</sup>

“一二·九”的请愿游行,是抗日救亡运动的转折点,也是北平学生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一二·九”以前,北平学联还是秘密组织,之后便公开化。随之,很多学校又重新组建了学生会、救国会、救亡会等各种抗日组织。蒙藏学校也组织了学生会,抗日救亡活动

搞得轰轰烈烈。

“一二·九”游行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学生运动更加强了控制，反动文人也极力对学生运动进行破坏。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更大、更深入的斗争正在酝酿着。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华北特殊化”要求，准备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变相自治。为抵制“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指示学联，在当日举行全市大示威，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学联对这次示威作了周密部署。全市各大中学校分别组成四个队，城内三队，城外一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大学领导，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游行路线：各队先到天桥集合开会，后进正阳门，经天安门东街，最后到外交大楼示威。

12月16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学联的统一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是日，北平蒙藏学校的爱国学生无视学校当局的压力，冲破军警的阻拦，加入到北平学生游行队伍的第一队，他们高举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大旗，聚集到天桥，参加了上万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项决议案，发表了《告民众书》。会后参加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行至宣武门返校时，遭反动军警的镇压，不少人被捕、受伤。

“一二·一六”之后，北平蒙藏学校的爱国青年，还积极参加了慰问负伤学生的活动。当时，北大、清华、师大、燕京等校发起慰问负伤学生的活动，蒙藏学校从18日开始即派出代表，分赴各校进行慰问。据《北大周刊》所载：18日到东北大学慰问的各校代表中即有蒙藏学校代表，他们还向学联报告了蒙藏学校16日出校游行的情况。<sup>(22)</sup>可是，该校校长黄开文向南京蒙藏委员会报告时却说：“北京学生关于时局有请愿与罢课举动。本校学生自十一日闻讯，即甚激昂，经校长劝导，仍旧上课。不意于十七日，悲愤异常，不复劝止，遂致罢课，今日尚未复课。但未参加请愿及游行举动……”<sup>(23)</sup>



当然,作为一校之长,如果把事情说得太明白的话,对自己确是没有多大好处的。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虽然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但是,群众的伟大力量充分显示出来,它迫使反动派不得不将“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同时,它也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烽火,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开展起来。从12月中旬开始,各地均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

之后,蒙藏学校的学生又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活动。“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把学生运动引导到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通过共青团及时地向全国青年发出号召;把抗日救亡运动扩大起来,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武装自己斗争结合起来。在党的号召下,北平学联于12月30日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召开代表大会。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通过了组织同学南下宣传的决议。

1936年1月2日,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计划“北平南下,天津北上,汇合后沿平汉线南下,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群众,实行学生与工农相结合。南下请愿团共分四个团:第一团由东北大学领导,包括东城各大中学;第二团由北平大学领导,包括西城各大中学;第三团由清华大学领导,包括燕京、朝阳、辅仁等校,第四团由天津各大中学校组成。当时,蒙藏学校的进步青年约有十多人,也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李成林(寒峰)同志回忆说:“‘一二·九’之后,各校组织南下宣传,当时我们蒙藏学校是同师大在一起的。记得南下宣传的我们蒙藏学校的学生就有十来个人,有云德善、席振华,还有我……”

1月3日,宣传团徒步从北平出发,沿途到农村开展宣传活动,并帮助地方建立了抗日组织,扩大宣传团的爱国活动又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挠、包围和殴打。寒峰同志回忆说:“云德善去天津后,被军警给堵回来了,我和席振华出城后,没走多远也被堵回来。当时我们唱着‘大米干饭小米粥,黄咸菜,不给加香油’这首歌。”在

国民党军警的层层堵截下，南下宣传团为保存骨干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到高碑店、保定之后，又返回北平，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蒙藏学校学生又参加了护送河北高中同学返校的斗争，声讨控诉了残害郭青同学的国民党反动派。孟绍同志回忆当时这段历史时说：“‘一二·九’运动之后，国民党大肆逮捕学生，河北高中学生运动的领头人就是这个时候被杀害的。他惨死在狱中，学联为他开了追悼会，同学们为他捐钱，我当时也捐了一元二角钱。”

“一二·九”运动，使华北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更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恐慌，想方设法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1936年2月，反动派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据此解散学联，逮捕学生，大肆镇压学生运动，使整个北平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即使在这种形势下，蒙藏学校的进步青年在寒峰、席振华等人的带领下，在校内又组织了一次纪念成吉思汗的活动，借宏扬成吉思汗的伟业，以振兴民族精神，唤起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据寒峰同志回忆说：“旧历三月二十一日是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日。这天我们开大会，讲演、演戏、跳舞，规模很大，参加人也很多。北平学联也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12月，绥远抗战胜利特别是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刊发号外。12月1日，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接着中共中央还派出代表团赴绥慰问抗日将士，随即掀起了全国性援绥抗战高潮。在北平也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声援绥远抗战，抗议非法逮捕爱国人士沈钧儒等七人的游行。在蒙藏学校读书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绥远土默特旗籍的蒙古青年，他们听到前述消息后更是兴奋，不仅积极参加了此次大示威，而且派出代表，携带大量慰问品和捐款，与北平慰问团一同赴绥慰问了抗日将士。

1937年春，蒙藏学校的学生因寒假期满，纷纷返校。此时，北

平已处于“七七事变”的前夜，局势混乱。学校当局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考虑到该校学生大都是边疆子弟，上课不到三个月，便提前放了暑假。未久，北平沦陷，学校停办。

在“一二·九运动”中，蒙藏学校的爱国学生，同北平各校学生并肩参加了这一伟大斗争，经受了运动的锻炼，显示了他们勇敢的革命斗争精神，因而，到抗战时期，该校好多学生通过各种途径，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 二、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七七事变”后，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华北战场上日军集中30万兵力向我平绥、平汉、津浦路进犯，就平绥路一线，自1937年8月开始，日军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大同、丰镇、集宁、归绥、包头等重要城镇。至11月，除伊克昭盟、河套地区及阿拉善、额济纳旗之外，绥远地区主要城镇和平绥路沿线地区相继沦陷。如同侵略其它地区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绥远地区的过程中，表现了极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无数居民被屠杀侮辱，即使妇孺老弱，亦难幸免。日寇侵入丰镇县城之后，一次就屠杀壮丁78名；攻占萨拉齐县城不到两小时，残杀手无寸铁居民49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布了一系列通电、宣言和决定，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并促成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绥远地区，蒙、汉各族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总方针，广泛开展抗日斗争。这期间一批又一批的蒙、汉各族青年走上抗日的战场。但是，也有大批青年人一时还找不到革命出路，处在仇恨、迷惘和苦闷之中。

这时，停办一年之久的蒙藏学校开始复学上课，一批土默特旗的蒙古族青年同其他盟旗的蒙古族青年一样，抱着振兴民族的志愿于1938年秋回到蒙藏学校。当时，日伪临时政府已成立，将“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更名为“国立北京蒙藏学校”，并强制推行

“中日亲善”、“东亚共荣”等奴化教育，企图把这批蒙古青年培养成为其效力的工具。但事与愿违，这批青年在倍遭蹂躏的家乡早已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们正是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才来到蒙藏学校寻求出路的。

蒙藏学校开学之后，同其它学校一样，受到日伪反动政府的严格控制。在敌人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有些人动摇了，钻进古书堆里不敢过问政治，但大多数的青年同学仍是对现状不满。他们中间的进步分子象李成林（寒峰）、荣宝麟、李培德（浩帆）、云德善、孟绍、伊锦文等人，仍继承着蒙藏学校的革命传统，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着救国救民的道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给他们指明了斗争方向。

北平沦陷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他们在日寇统治极其严酷的情况下，贯彻执行着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准备迎接革命的到来。同时也采取了多头、单线联系的方法，利用亲友、同学、同乡、同事的关系，坚持着斗争。据李成林（寒峰）、孟绍、孙继祖等人的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蒙藏学校的工作是很重视的，常派一些蒙古族出身的干部到学校去工作。象毕力格巴图尔、贾力更、包悦卿等人都到过蒙藏学校。他们向同学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毕力格巴图尔当时的化名叫姚瑞亭，在北平一带作地下工作，以开一个药店为掩护。他虽然不常到蒙藏学校，但与学校的同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在校读书的青年人认为他们是老大哥，是家乡来的信使，所以非常信任他们，一说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拯救蒙古民族，学生们的抗日情绪就更加高涨了。另外，在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影响下，在进步青年的带动下，在蒙藏学校的学生中阅读进步书刊是非常普遍的。李培德（浩帆）同志回忆说：“我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期间，当时的日伪政权对市内大学已经控制得很严，甚至一些中学也控制得很严了，唯有蒙藏学校还比较松一些，所以，我们在蒙藏学校可以读到许多进步书籍，比如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等,还有鲁迅、郭沫若、胡绳、成仿吾等人的著作。而且在图书馆(是学生们自己办的图书社)还可以看到抗战前我们地下党所办的刊物,如《新生活》、《大众知识》等。<sup>(24)</sup>因此,当时蒙藏学校学生的抗日情绪很高,也开展了一些唱进步歌曲,出进步墙报,渴望摆脱亡国奴地位和奴化教育的活动。浩帆同志回忆说:“我们在蒙藏学校还唱革命歌曲。当然只是在宿舍里和一些知心的人在一起唱。记得有《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凤阳歌》等。此外还出过墙报,先是我们班出的,接着其它班也相继出了,最后在各班办墙报的基础上,我又办了一个综合性墙报。这个墙报有散文,有论文,也有诗歌,总的来说都是些进步文章,文章中虽不敢公开喊出抗日,但都渗透着抗日的精神。这种墙报出来后,逐渐引起校方的注意。训导主任看了墙报后,查问了办报人。有一天他找我谈话,并命令我说:以后不准你再办墙报。学校决定停办墙报,从此,墙报便停办了。”<sup>(25)</sup>

蒙藏学校进步青年们的这些活动,虽然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这些活动与党的要逐步开展地下斗争的方针是一致的。对于鼓舞青年的斗志起到一定作用。

墙报虽然停办了,但学生们的抗日意志丝毫没有削弱。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到军队中去”、“到杀敌的战场上去”、“到农村去”、“发扬我们的长处,去学习去工作”,<sup>(26)</sup>为抗日救亡这场伟大斗争做出贡献等号召,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传到了蒙藏学校,家乡人民抗日斗争的消息,如,蒙汉游击队的建立,新三师进驻伊克昭盟,八路军一二〇师挺进大青山,八路军夜袭陶林县,突取乌兰花镇,伏击蜈蚣坝,奇袭陶思浩等等消息,也传到了蒙藏学校,使青年学生深受鼓舞,并无声地形成一个谈革命,谈参军,谈去延安的热潮。李培德(浩帆)同志回忆说:“当时,蒙藏学校也有地下党的活动。我曾记得有两个姓韩的同学,暗地里谈论革命的事,其中一个是与同班,另一个是他哥哥,在高中一年级读书。他们两人经常谈要去晋察冀……,到了晋察冀再到延安学习……。这件事曾经引起我思想

上的共鸣。我们(指丁柏森(潮洛蒙)等)曾经也商议过想办法先去晋察冀,然后再到延安求学深造,参加革命。”正是在此抗日救亡革命洪流影响下,从1939年到1942年之间,一批曾在蒙藏学校读过书和正在读书的土默特旗的蒙古族青年,纷纷走上抗日的战场,投向革命圣地延安。

蒙藏学校的进步青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奔赴延安,投身八路军、游击队去抗日的为数不少。如克力更、寒峰、浩帆、潮洛蒙、丁松秀(黄静涛)、墨志清、乌兰、多子寿……便是其中一部分。潮洛蒙同志回忆说:“我最初去延安是在1939年夏天,当时学校已放暑假。我回到家乡后,就和孟绍、孙继祖、荣善祥等同学商议,约定一同去延安求学。但走到黄河边受到阻拦,没去成。秋天我又回到蒙藏学校。这期间我还是不死心,于是就与浩帆等一些要好的同学暗暗地商议去延安学习的事。寒假期间,浩帆回到家乡,通过亲戚关系,与大青山游击队的勇夫同志取得联系。浩帆给我来信说明了情况,我便回来。1940年我与浩帆一同踏上奔赴延安的道路。……我在离校前也和多数要好的同学谈了去延安的事情,他们说:你先去吧!那里好,你就来信,我们再去。”<sup>(27)</sup>荣志士同志回忆说:“日本人统治内蒙古已好几年了,八路军抗日的事在绥远地区尽人皆知。当时在土默特旗的蒙古人中到延安参加抗日的已不在少数,在同学中也时常谈论这事,受其影响,有的同学也开始去延安。1940年左右去得多,到1942年我们入蒙藏学校后,就再没有去延安的了,这与当时日伪对北平控制的严紧有关。”<sup>(28)</sup>墨志清在一首《奔赴延安》的诗中写道:“国难当头到包头,同窗相商找出路。权贵讥讽令人寒,三人<sup>(29)</sup>商定觅新途。……勇夫、根成<sup>(30)</sup>是亲友,去冬渡河陷深沟。尔今串连青壮年,赴延学习保家园。几人相约一同走,届时未见孙继祖。察镇<sup>(31)</sup>车站找勇夫,顺顺利利接上头。行前回村带二弟<sup>(32)</sup>,未别父亲悄悄走。一连骑兵相护送,渡河直奔延安府。……”<sup>(33)</sup>

由此可见,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蒙藏学校的进步青

年,继承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发扬了“五卅”运动和大革命时代的精神,为拯救中华民族,与全国各族青年并肩走向抗日战场。为中华民族雪耻争光。

### 三、1945年8月至1951年5月的斗争

#### (一)抗战胜利后的学校状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帝国义的支持下,疯狂地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就在这个时候,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也于1946年2月派贾凤翔到北平接收了蒙藏学校,并恢复了战前“蒙藏委员会北平蒙藏学校”的名称。1947年春,蒙藏学校改隶教育部。教育部任陈克孚为校长,并改名“国立北平蒙藏学校”。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及人事关系等原因,这时蒙藏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猛增。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所编《边疆教育概况》记载:“民国三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全校仍保持高初中补习班共七个班,学生二百九十一名,内公费学生一百五十名,专任教职员二十三人……。三十六年,全校高初中及补习班共计八个班,学生三百三十七名,教职员增至四十一人。”又据荣志士同志回忆,“到1948年,由于东北及内蒙东部地区的解放,大批东北学生进入蒙藏学校,其中也有一些汉族学生,因此学生人数猛增至四百多人”,<sup>(34)</sup>因当时学校只有校舍152间,图书5558册,其它仪器、标本及体育卫生设备也相当简陋,学生的学习、生活及费用都遇到很大困难。

依照教育部规定,学校机构设教务、训导、事务三处。教务处下设教学、注册、设备三组,训导处下设训育、管理、体育卫生三组,事务处下设文书、庶务、出纳三组,另外还设有会计室、诊疗室及各种委员会。校长综理全校行政教训事宜,其他人员均由校长聘任,分

掌各部门事务及教学事宜。

教育部接收蒙藏学校之后,同其它大中学校一样,即从政治、思想各方面对学生进行严格控制。

政治上,国民党反动派为压制各学校进步力量的发展,在各校学生中大量发展三青团等各种反动社团。在蒙藏学校设立了国民党的一个“三十六区党部”,负责人有杨润霖、李世英和王铁麟。该组织势力很大。1948年,三青团北平总部又在蒙藏学校发展了很多三青团团员,特别在下半年,该反动组织在学生中发展更快,一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使学校笼罩在一片阴沉之中。

思想上,当局对蒙藏学校学生的控制也很严,稍带进步色彩的书刊都被视为禁物,学生想看些进步书籍非常困难。为打击进步力量,校内的国民党和三青团还千方百计在学生中制造矛盾,极力挑拨东西部蒙族学生之间、蒙族学生与藏族学生之间、一般学生和进步学生之间的关系,极大地危害了蒙藏学校学生的团结,给我党在该校开辟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此外,由于蒙藏学校本身的特殊性,各种政治势力也来此争夺青年。抗战胜利后,内蒙古地区的一些蒙古封建上层、上层知识分子和一些在国民党中央、地方任职的蒙籍官员,掀起了一股幻想通过国民党进行蒙古自治的潮流,蒙藏学校也受到冲击。1946年秋冬,即国民党“国大”召开前(“国大”是1946年11月召开的),蒙旗绥境委员会主任于宝衡(即扎奇斯钦)来到蒙藏学校,大肆鼓吹国民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宣传内蒙古高度自治的主张,以及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四条要求:1、政府必须明白宣布对内蒙自治政府之政策,而内蒙自治须在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下实现;2、中央政府必须向蒙旗担保在蒙旗区域内,废除省县制并取消对该地政府之一切压迫;……。实际上,这根本办不到。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案也不过是其玩弄的政治花招,但他们的鼓吹对蒙藏学校的青年确有很大欺骗性。

在上述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1946



年1月,中共代表团和国民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由中共、国民政府及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1月13日,中共代表叶剑英率工作人员进驻北平,并设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二月创办了《北平解放报》,公开宣传我党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揭露了国民党一手签协定,一手发动内战的卑劣行径。该报受到北平人民和包括蒙藏学校在内的各校学生的热烈欢迎,并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们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

面对严峻的形势,处于困难的环境,在当时还没有共产党组织的蒙藏学校,党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学生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广大学生中极力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到1948年,在蒙藏学校秘密组织了一个“蒙古青年联盟”。这是党领导下的一个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负责人是地下党员陈全,由组织之初参加的十多个进步学生不断发展壮大。组织建立之后,除传达学习党的指示,阅读进步报刊之外,还积极地做了一些实际斗争和工作,如揭露国民党、三青团欺骗学生的阴谋,协调和维护学生之间的团结,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布置,护厂、护校,以及迎接解放军进城等等。体现了他们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热忱。

总之,蒙藏学校的学生,在日伪反动统治时期,渴望摆脱亡国奴地位和奴化教育的心情非常强烈,为之进行的斗争勇敢顽强;抗战的胜利使他们欢欣喜悦。然而,国民党接收北平后的一幕幕丑剧,尤其是在政治、思想上的压制使他们更感到压抑、憎恶。后来是共产党通过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的宣传组织,使广大学生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提高了觉悟,为后来的积极参加社会上的爱国民主运动和校内的反饥饿斗争打下了一定思想基础。

## (二)反饥饿反内战斗争

1946年6月,正当中国共产党为制止全面内战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6月23日,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面对

敌人的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遵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方针，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但是，蒋介石仍不死心，顽固坚持其卖国独裁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1947年3月迫令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团限期撤回延安，并宣告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最后决裂。因此，内战的炮火，燃遍了中华大地。

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政府军事上惨遭失败，经济、政治上也遇到了严重危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人民濒于饥饿死亡的边缘，全国各地不断掀起求生存的斗争。各校学生因无法缴纳学膳费而被迫辍学的人很多，公费生的补贴还不够维持最低伙食标准，加之反动派对各校民主运动的横暴干涉，学生们的愤懑与日俱增。

在蒙藏学校由于内战和饥饿也引起学生们的极大不满。其原因：一是当局的不平等待遇，造成蒙藏学校学生伙食与其他公立学校相比悬殊太大。当时学生们编了这样一首顺口溜，集中地反映了这一问题：“我的肚里饿呆呆，左等右等等不开，盼开饭，偏偏不把饭儿开，无奈何，只好饭厅门外待。窝头好吃就咸菜，吃了一块又一块；小米饭，撒喽喽，就上黄瓜菜，噎住了，只好盛碗米汤来。”<sup>(35)</sup>

二是内战给学生带来的灾难。蒙藏学校的学生大多是来自边疆，吃住均在学校，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1945年抗战胜利，学生们回到学校，本希望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和民族振兴出力。然而，国民党又挑起内战，使得关内外火车不通，消息闭塞，学生们生活本来困难，又得不到家庭资助。因此，人们的反战情绪很大。荣志士同志回忆说：“当时我们去蒙藏学校读书很困难，因为火车不通，有些同学只能步行前往，像1946年春天云恩光、贺福昌（贺希）、荣德兴、荣振华、索恩正（克什格）五人就是徒步返校的。我是1947年去的，当时火车虽然通了，也是一段一段的。归绥至旗下营、丰镇、阳高、宣化、康庄、北平，每段都要换车，很混乱。”

三是美军的暴行，也激起学生们无比愤慨。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北平当局还扬言要取消蒙藏学校的官费待遇。这更是雪上加

霜,使学生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

为此,学生们多次向学校提出要求,希望改善伙食,却毫无效果。于是,在学生当中便酝酿着要罢课、要请愿……。大约是在1946年深秋的一天,在土默特旗蒙古族高年级学生云恩广、贺福昌、荣振华以及汉族学生沈少舟等人的发动组织下,掀起一次全校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当时,云恩广等学生会的负责人先召集学生会成员开会,讨论罢课、反饥饿、反内战的问题。地下党员(当时并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沈少舟同学介绍了社会上和各大学的斗争情况后,大家一致同意罢课。并决定先组成一个罢课委员会,具体领导全校的斗争。第二天,由罢课委员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说明理由,宣布罢课,掀起该校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随后,学生们即上街作宣传,贴标语。未久,校内校外包括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的院内都贴上标语。内容主要是“反饥饿,反内战!”“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吃饭!”……。

罢课之后,学生们一方面向新闻界发传单,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罢课原因,争取舆论界的支持。一方面,又派学生代表到北平行辕请愿,提出“反内战、反饥饿、反对不平等待遇、反对取消官费”等要求。当时会见学生代表的是李宗仁的秘书。他说:一定向行辕禀报你们的要求。<sup>(36)</sup>

这时,南京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主任何兆麟也来到学校出面调停,要求学生停止罢课。学生们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他基本答应。此后,学生伙食确有很大改善,且增加了生活补贴。此次斗争,前后不到十天,学生们取得斗争的胜利。

据王明远同志回忆说:“蒙藏学校内部的反饥饿斗争起来之后,记得北平学联还给蒙藏学校来了一份函,当时贴在学校的墙上,内容大意是:听说你们学校学生对反饥饿的斗争呼声很大,已经行动起来,我们对你们的行动表示支持……”。<sup>(37)</sup>北平学联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组织。它的来函也表明党对蒙藏学校的活动是非常注意的。

蒙藏学校学生的此次反饥饿反内战斗争,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却受地下党员直接影响。参与领导此次斗争的学生会成员贺希同志回忆说:“当时在蒙藏学校是否有党的组织我不知道,但是有共产党派去的地下工作者,如沈少舟就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就是我们学生会和罢课委员会的成员。关于他是共产党员我是在解放后才知道的。”<sup>(38)</sup>对此,云恩光在回忆中也说:“当时在蒙藏学校有无地下党的组织我不知道,但是,地下党员的活动是有的,我知道的有沈少舟,还有一个会计。蒙藏学校的很多活动都是沈少舟出的主意。如1946年蒙藏学校爆发的反饥饿斗争,他和我们一起组成了学生会和罢课委员会。”

蒙藏学校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是蒙藏学校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打破了蒙藏学校阴沉的空气,而且对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也是一个沉重打击。

### （三）迎接北平解放

1948年11月,正当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激战正酣之际,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全国战局和华北战场的形势,决定立即组织平津战役。考虑到北平是中国的古都,中央决定与傅作义谈判,争取和平解放,但决不放弃武力解决。此时,北平地下党各工作委员会共同组成一个准备迎接解放的指挥部,统一部署和指挥着北平城内的各项工作。

困在北平的傅作义集团,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打击下,又受到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虽然他们在平津等地作了大量布防,但失败已成定局,北平城内早已传开了解放军围城的消息,曙光就要到来。

为准备迎接解放,在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北平各校的进步组织和青年都积极地活动起来,在当时还没有党的地下组织的蒙藏学校,作为党的外围组织——蒙古青年联盟,已有一定发展,有些同学还参加了北平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他们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组织了护厂护校、保存文物档案和物资的工

作。

同时,还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讨论研究了如何应付黎明前的困难。学生自治会福利部长荣志士从郊区购回大量玉米,备好北平被围时学生的口粮,解决了首要的粮食问题。

此时,驻守北平的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中,完全陷于绝境,在我方的努力争取下,经过多次谈判,北平守敌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接受了和平改编,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整个城市顿时沸腾了,自由解放的钟声,响彻古都上空。

2月3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雄伟浩荡的队伍从天桥向前门开入,蒙藏学校的师生期待在前门五牌楼和西长安街两侧,与成千上万市民群众一起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是时,家家户户红旗飘扬,古都北平空前欢腾。

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内蒙代表高布泽博和达成义二同志分别接管了蒙藏学校和迁到雍和宫的“热蒙师范学校”。4月2日将热蒙师范并入蒙藏学校。同时,北京人民政府经与内蒙古党委研究,委派原内蒙古军政大学教务长黄静涛同志为校长,云曙碧为教导主任,接替了达成义的工作。并改校名为“国立北京蒙藏学校”,后经政务院通令,取消“国立北京”字样,改称“蒙藏学校”。1951年5月,又更名为“中央民族学院附属中学”。

至此,久经苦难的蒙藏学校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渴望和平、渴望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蒙藏学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蒙古民族的满腔热忱,响应党的号召,一批又一批走出校门,参加了我党组织的南下工作团和北上工作团。这是蒙藏学校革命传统的继续。解放之初,蒙藏学校总计有学生近400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北上工作团的就有230多人。他们到内蒙古乌兰浩特入内蒙古军政大学之后,在党的领导、关怀和教育下,经过学习,进一步提高了认识,走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参军、从政、为内蒙古的解放,为祖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1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蒙藏学校学生积极参加北京市组织的各种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并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志愿军、军干校。记得当时参加军干校的土默特旗的蒙古族青年有瑞桓璧、孙明星、云兴、云继明等多人。其中有的同学还在朝鲜战场负了伤。

总之,蒙藏学校是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她的哺育下,一代又一代的边疆少数民族青年成长起来。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她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本文经索恩正(克什格)同志最后审阅并予修改补充。另外对所有提供情况的同志,深表感谢。

---

#### 注 释:

(1)《中国共产党中央通告》,见《中央通讯》1927年8月30日。

(2)《蒙藏学校学生毕业档案》见《中央民族学院附中80周年校庆纪念》册,第45页。1983年4月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编印本。

(3)(4)姚敬斋:《蒙校丛感》,刊《新蒙古》创刊号,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5)访克力更同志记录。后面凡有克力更同志回忆,均见此记录。

(6)姚敬斋:《对北平蒙藏学校之企望》,刊《新蒙古》月刊,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第四卷第四期。

(7)(8)姚敬斋:《对北平蒙藏学校之企望》。

(9)孤影:《边事三则》,见《新蒙古》第4卷第4期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10)访问克力更同志记录。关彤于1928年入党,克力更同志知道关彤是共产党员,那还是解放后的事,当时并不知道。

(11)荣景贤:《投向革命》,见《土默特史料》第七集。

(12)姚敬斋:《敬告蒙古前后毕业同学》见《新蒙古》第一卷第三期,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13)小月:《北平蒙藏学校纪念成吉思汗大会志盛》,刊《新蒙古》第一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14)云从龙:《纪念成吉思汗》,刊《新蒙古》第三卷第五期,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15)复刊后,因编辑人员已离开学校,故已非学生刊物。

(16)内蒙图书馆编:《建国前内蒙古地方报刊丛录》第93—94页。

(17)有说是“特声社”,经与克力更同志核对,正名还是“超生社”。

(18)姚敬斋:《敬告蒙古未毕业同学》,刊《新蒙古》第一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19)访问寒峰同志纪录。后面寒峰同志回忆,均见此纪录。

(20)访问孟绍同志纪录。后面凡提到孟绍老师回忆,均是此纪录。

(21)《墨志清诗选》第10—11页。1993年远方出版社。

(22)《北大周刊》第1期“一二·一六示威特刊”,1935年12月28日。

(23)蒙藏学校校长给南京蒙藏委员会电文见蒙藏学校档案。

(24)(25)浩帆:《投身革命,奔赴延安》见《土默特史料》第二集第30页。后文所有浩帆同志的回忆,均见此文。

(26)《武汉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

(27)访潮洛蒙同志谈话纪录。

(28)访荣志士同志谈话纪录。

(29)原注:指墨志清、克力更、寒峰。

(30)勇夫,汉名荣尚义。根成,即廉根成,蒙名贾力更。他们都是土默特旗人,蒙藏学校前期毕业生。

(31)察镇:察素齐镇,今土默特左旗旗府所在地。

(32)指墨志清二弟徐史。1940年同赴延安。

(33)《墨志清诗选》第12—13页。远方出版社出版。

(34)荣志士同志访问录。后面凡有荣志士同志的回忆均此访问录。

(35)云恩广访问录。此顺口溜是借流行歌曲“我的心里一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之曲调唱的。

(36)贾希同志访问录。

(37)访问王明远同志纪录。

(38)访问贾希同志纪录。沈少舟,汉族,1946年入蒙藏学校,1948年毕业于高校,考入师范大学。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书记。已离休。

# 绥远城满族人口演变概略

蒙 林

绥远城(今呼和浩特新城)满族人口在清代及民国年间之发展沿革,由于史料匮乏,一直无专文研究。今笔者根据所掌握之史料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不妥之处,请识者斧正。

## 一、清朝时期的绥远城人口

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东北五里,动工兴建一所新城——绥远城。建绥远驻防城的目的,一是为安排从喀尔喀蒙古撤回的对准战争的将士,二是将其做为日后清军进击准噶尔部蒙古的前沿阵地。从漠北撤回的京旗家选兵 2000 人,这时被提高身份,“归入旗分”,成为汉军旗人;从热河而来的八旗汉军 1000 人;从山西右卫而来的八旗蒙古 500 人,三股旗兵共 3500 人,于乾隆二年(1737 年)春夏携带家眷进驻绥远城。<sup>(1)</sup>按一家五口之计算法,时有八旗人口约 17500 人。

乾隆六年(1741 年),因形势之需要,绥远城又在其所来京旗汉军内扩兵 400 人。时绥远城共有八旗将士 3900 人,故全城总人口约为 19500 人。<sup>(2)</sup>

乾隆初年,由于旗人人口的巨增,解决八旗生计的问题已成为清廷的头等大事。为了满洲旗人的切身利益,清廷决定强令部分汉军旗人携眷出旗为民,或转入绿营为兵。乾隆十二年(1747 年),由京旗家选兵而变为八旗汉军的 2400 名将士在绥远城首遭裁汰,被编入直隶、山西两省之绿营。<sup>(3)</sup>在八旗汉军出旗的同时,绥远城驻防“由京师选派八旗满洲兵一千二百名,并由本驻防余丁内拣选五百名作为兵丁,今原存兵一千五百名。共为三千二百名。”<sup>(4)</sup>按一家五口计算,时有旗人人口 16000 余人。绥远城满、蒙、汉八旗兵之联



合驻防局面首次出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随着西北战事的平息,绥远城已不再是军事重镇,无需再设重兵驻防。驻守绥远城近30年的热河汉军兵数此时已翻一番,成为绥远城驻防之主力,但也只能步京旗汉军之后尘了。清廷谕令其全部出旗,于是有2117名八旗汉军将士携眷出旗入直隶、山西两省之绿营。<sup>(5)</sup>至此绥远城只剩八旗兵1300余名,满族总人口随之下降为6500余人。

乾隆三十年(1765年),绥远城将军蘧蕃认为绥远城1300名旗兵人少势薄,不敷应用,经奏准扩兵为2000人。同时定佐领数为20佐,每佐领兵100名。20佐领中,满洲佐领数为16个,蒙古佐领数为4个,随之成为绥远城旗佐之定制,有清一代从未改变。时八旗兵因有2000名,故绥远城满族人口共约10000余人。<sup>(6)</sup>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廷又决定在绥远城增设兵额,将2000兵增至2700兵。驻防山西右卫之满洲八旗兵700人携眷随令迁驻绥远城。时驻防旗兵为2700人,满族人口又增至13500余人。<sup>(7)</sup>

乾隆三十三年之后的近100年间,由于国事安定,绥远城驻防将士数目一直变化不大,满旗人口也有所增长,稳中有升。1840年之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华而带来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以及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族起义等战事,绥远城八旗将士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据《绥远城驻防志》与《绥远旗志》记载:光绪末年,绥远城驻防将士只有3300人,每佐领兵额为165人;全城男妇子女共为11727人,其中男4361人,妇3615人,子1596人,女2155人。<sup>(8)</sup>这是史书关于清代绥远城满族人口最具体的数字记载。

## 二、民国时期的绥远城人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随之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没。绥远城满族随着俸饷的减少及停发,只好背井离乡,四散出逃。满族由于政治上倍遭歧视,经济生活上日益贫困,人口随之减少。据《绥

《远通志稿》记载：民国初年，满族人口只有 8000 余口，与清末人口相比，流失、死亡人口达 4000 余人。由于绥远省内军阀长年混战，政治极度腐败，加之境内瘟疫流行，水旱天灾不断，人民生活十分清贫。绥远城满族更是穷困潦倒，家破人亡。1930 年，一孟姓旗人经与京城佛教会商洽，率领绥远城满民 150 人赴黑龙江垦田。但因其不事农耕，多沦为难民。至 1932 年，绥远城满族只剩 1920 余户，共 4690 口人；其中男 2580 人，女 2110 人。<sup>〔9〕</sup>

1949 年“9·19”绥远省和平解放，各族人民喜获新生。历尽苦难的绥远城满族此时人口已不足 2000 人。也就是说，从 1912 年至 1949 年不足 40 年的时间里，满族人口从 11727 人下降到 2000 余人，人口减少了约六分之五。在北洋军阀及国民党政府的残酷欺压下，绥远城满族几尽灭绝。

据 1953 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呼和浩特市共有满族 2748 人，其中新城区就有满族 2170 人。满族历尽磨难，枯木逢春，人口开始回升。

### 三、小 结

纵观绥远城满族人口之发展变动过程，似可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满族自乾隆初年驻防以来，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发展较为平稳，人口数量有时随着八旗兵数的多寡而有所波动，但绥远城满族人口一直保持在万余人左右。

2、绥远城满族人口全为八旗兵丁及家眷，他们以兵饷为食，绝不以其他行业为生。民国肇兴，此状况也开始改观。

3、满族因为长期受清廷“旗民不通婚”政策的限制，满族与当地汉族不相通婚，而多是在内部或与蒙古族通婚。进入民国后，满汉族之间才互通婚姻。

4、在民国初年，满族由于人为之因素，人口巨减。由清末的近 12000 人减至民国初年的 8000 余人；30 年代又减至 4690 人；至 1949 年解放前夕，已不足 2000 人，几乎殆尽。这是反动统治阶级

欺压少数民族的有力佐证。1949年后,满族人口开始回升,至1953年,绥远城满族已达2170人。满族人口的曲折发展,说明社会因素对人口的增减起着重要的作用。

---

注 释:

- (1)《清高宗实录》卷48。
- (2)《大清会典事例》卷1128。
- (3)《清高宗实录》卷280。
- (4)《大清会典事例》卷1128。
- (5)《清朝文献通考》卷184,兵6。
- (6)《清高宗实录》卷736。
- (7)《绥远城驻防志》卷2。
- (8)《绥远旗志》卷五下。
- (9)《绥远通志稿》卷75。

## 土默特史事杂谭七题

于永发

### 阿勒坦汗葬于何处？

土默特部的杰出首领阿勒坦汗(即俺答)戎马一生,率部雄长塞北达半个多世纪,曾被蒙古中央汗庭授予索多汗、土谢图汗等号,他的建树颇多,如兴办板升农业,促成蒙明友好,打通边内外被长期割断的经济联系,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地区等等,对十六世纪及其后蒙古族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史学界对阿勒坦汗的研究颇多,在已发表的许多研究文章中,很少提及他的葬处,偶尔有人提及也是语焉不详。笔者认为,搞清楚他的葬地及葬式,对土默特以及十七世纪以后蒙古族风俗的变化不无益处,因而不揣冒昧,试述如次。

阿勒坦汗病逝于明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1581年元月13日)。其长子森格都隆汗(即黄台吉)及诸大臣请喇嘛为之诵经四十九日,以超度其英灵。之后,满珠锡哩胡图克图及明朝派来的占师在大青山阳选择吉地,隆重地土葬了他的遗体。

万历十三年(1585年)森格都隆汗将三世达赖喇嘛恭请到库库和屯(呼和浩特)。据《蒙古源流》记载,达赖喇嘛责备土默特汗、诺延等土葬阿勒坦汗曰:“惜哉,汝等何弃掷此无价之宝于地上耶?”并准备按黄教仪规重新火葬阿勒坦汗的遗骨。但是,由于森格都隆汗逝世,土默特贵族在汗位继承上发生纠纷等事,重新安葬一事不得不推后。《阿勒坦汗传》载:

“瓦其喇达喇达赖喇嘛于猪年三月二十六日,  
如同昔日(火化)如来遗骸一般设立坛场,  
尤按经教之制祭祀火化。”

“仿照昔日诸善逝之舍利塔，  
令巴勒布匠人菩提齐持以珍宝金银大造其塔，  
将妙不可思议的灵骨奉安其中。”

以上是火化阿勒坦汗遗骨及将骨灰装入塔内的情形，该书接着写道：

“于召释迦牟尼庙之西厢，  
建起庄严的青色宫殿，  
由瓦齐喇巴尼之化身济陇呼图克图  
及四项僧人妥为撒麦开光(置塔于其中)。”

以上引文说得很清楚，阿勒坦汗的遗骨火化于猪年(即 1587 年)，为安放其骨灰，在释迦牟尼寺西侧专门建造了一座青色宫殿。释迦牟尼寺即大召，明代也称作银佛寺。其西侧，至今仍有一座“青色宫殿”，是为乃琼庙。笔者以为，这就是安放阿勒坦汗骨灰之所在。问题在于，安放灵塔的宫殿为什么会变成乃琼庙？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

首先，后金征服土默特地区以后，皇太极对土默特部领袖右翼蒙古，以及与明朝关系甚好等事耿耿于怀，必欲清除其影响而后快。因此便发生了天聪九年(1635 年)将土默特部王位继承者俄木布洪台吉逮捕，接着贬为庶人的事件。从此以后，土默特部的黄金家族，除了博硕克图汗的政敌(如小诺尔布等)而外，几乎全都丧失了台吉名号，其影响当然也就逐渐消失了。

其次，俄木布既已失掉一切特权，当然也难以保有其财产。如王府被新贵古禄格占据即例证。更有甚者，清初以来，大召每年正月十五日要专为右翼都统托博克家族诵经一整天，以祈福祉。据故老相传，托博克原为俄木布之管家，尚在博硕克图汗或俄木布当政时期，大召怎么可能在重大节日为一个奴仆(尽管是管家)整日诵经祈福？这只有当古禄格、托博克成为新王朝新贵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既然如此，新贵们秉承新皇朝的意旨，也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从各方面消除阿勒坦汗及其继承者的影响，包括毁灭阿勒坦汗的

灵塔,而把用作祭祀的宫殿改为佛殿,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因为清代在这方面未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因而姑且如是说。这难免臆测之嫌,但也绝非妄谈,尚希识者斧正。

### 大青山是怎样变成童山秃岭的?

过去有一种说法:“绥远城工竣,大青山林尽”。意思是说,修筑绥远城伐尽了大青山的林木。诚然,建绥远城所用木料,确实几乎全部伐自大青山,正如乾隆初年的一份文件记载,建威将军王昌在给工部的咨文中说:绥远城“工程用木,于大青山砍伐足够”。究竟需用多少木料呢?同一文件称:“用木之项,城、门楼、钟楼、大小衙署、众兵丁之房舍、仓厂,计有房一万二三千间,需用大小木三十万余根。”而原先为建城在穆纳山(即乌拉山)采伐的许多木料却一根也未用。乾隆四年(1739年)十一月底,归化城都统咨文工部,请将穆纳山伐倒之木二十余万根,“飭交杀虎口监督,俟来年冰化之后,运至塞内作价”出售入官。这证明,建绥远城的木料,确确实实是采自大青山的。

那么,是不是“绥远城工竣,大青山林尽”了呢?也不尽然。但这项工程对大青山森林确实造成了破坏。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设置毛岱、湖滩和硕两个官渡以来,官船一直是用大青山木材建造的,到乾隆十年(1745年),大青山中已无建造官船的大口径木料,只好用小木料凑合,结果很快便坏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土默特户司曾申请前往穆纳山采伐长三丈二尺至三丈六尺的木料,用以建造官船。可见,修筑绥远城对大青山林木的破坏确实很严重,但这只是使大青山变成童山秃岭的重要因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清政府掠夺性的滥采滥伐政策。

据《夷俗记》记载,明代的大青山“千里郁苍,厥草惟夭,厥木维乔”,“彼中松柏连抱”,“材木不可胜用矣”。如此丰盛的林木,建区区一座绥远城怎么能用尽呢?其实,十七世纪后叶以来,清廷已准许边内商民砍伐大青山林木了。如雍正年间成书的《朔平府志》载“笔写契(按,即毕克齐)在归化城西七十里,北通磧口,大青山林木

在此发卖，居在商贾有百十余家。”当时并非仅止毕克齐有木材商，沿山其它地方也有。所伐木料全部运至长城以南发卖，陆路主要通过杀虎口，水路则以毛岱、湖滩和硕（河口）为主要发运码头。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廷准予杀虎口关每年向商人发放照票一百张，特许他们在大青山伐木。这种照票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仍在发放。如乾隆二十三年六月，《理藩院札付归化城都统》文内称：“为杀虎口商人出关伐木，本院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一日颁发铃印照票一百张，交付该监督，当收取地方官员印结、众商人互保甘结后发放，准其出关伐木”，“只准于大青山伐木，不准越界砍伐穆纳山之木。如有违禁砍伐所禁地方树木者，严拿送部议罪”。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造成大青山童山秃岭的罪魁是清政府。

由于掠夺性的砍伐，到乾隆三十年左右，大青山的林木已被采伐一空了。据一份文书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一些来自边内的人占据城东讨思浩附近山场，“伐木并刨取树根转卖”，“不容蒙古人等进出，亦不容牧放牲畜，致蒙古人等需用草木，持价向民人买取”。伐了树，还把树根刨掉，怎么能不使原本郁郁葱葱的大青山变成童山秃岭呢？土默特旗务衙门虽曾于乾隆三十一年以后“张贴告示，严加禁止”，但林木已空，告示不过是徒具虚文而已。

### 清代归化城的牲畜交易税

入清以后，归化城逐渐成为塞北的商业中心。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张鹏翮途经归化城，他在《奉使俄罗斯日记》中说：“归化城外番贸易蜂屯蚁集”，“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足见十七世纪后叶归化城已经成为内地与外藩蒙古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

牲畜是清中叶以前归化城贸易最主要的商品。当时负责管理牲畜交易的是土默特户司，派有官员在驼、马、牛桥及羊市征收牲畜交易税。这种税称作牲畜记档银两，主要用作公费，是土默特两翼重要的财政收入。其收支，每年年终需报理藩院核销。

当时的收税标准是，成交的四项牲畜，骆驼每峰征制钱九十五

文,马、牛、骡、驴每匹(只)征十九文,山羊、绵羊每只征五文。一年的征税额,据档案记载,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至次年十月,归化城征银四千六百三十六两余,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昆都仑四地征银三百一十五两余,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一两余。为明白起见,根据档案资料择乾隆初年若干牲畜交易数据列表如下:

乾隆初年归化城牲畜交易统计表

年	月	地点	骆驼	马牛骡驴	山羊绵羊	征税(文)	折银(两)
二年	十一月	归化城	860	5287	28718	305743	365
		萨托和昆	2	906	1884	26842	44
三年	十一月	归化城	1032	6076	28588	337015	421
		萨托和昆	3	519	1493	16721	20
十一年	十月	归化城	1488	8712	31414	436687	545
		萨托和昆	8	1060	5929	48048	57
十四年	九月	归化城	2124	9189	41350	580071	734
		萨托和昆	3	1043	3993	40067	48
十八年	三月	归化城	343	5886	32783	236358	278
		萨托和昆		565	829		
十八年	六月	归化城	184	6143	18579	303482	357
		萨托和昆		647	1928		

从上表可知,春夏两季相对来说是牲畜交易的淡季,但因时届耕作期,马牛等畜交易相对较多;就交易量说,历年则呈上升趋势。随着大盛魁等旅蒙商在归化城崛起,牲畜交易量猛增,税额自然也大幅度提高。这一情况很自然要引起清廷的注意,于是杀虎口税务



监督上疏朝廷,建议将归化城税务收归户部,乾隆皇帝当然准奏。旋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归化城设归化关,由杀虎口监督统辖,统一征收牲畜税、油酒烟榷税及落地税等。其后,归化关改由分巡归绥兵备道兼管,归化城总税局而外,又设置了归化城四栅口、牛驂、马桥牲畜税局和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毕克齐、察素齐、可可依力更等税局,进一步扩大了税源,仅归化城一地的额征税就有制钱九千串。土默特两翼失掉这项重要的收入怎么办呢?清廷准许旗务衙门每年从归化关提取公费银七千两,年终报部核销。这就是民国初年土默特旗从塞北关提取二千余元公费(主要用作支付协饷)的由来。到二十年代初,塞北关拒付此款,土默特旗在税务方面享受的权利最终被剥夺了。

### 土默特蒙古户口地的由来

清初,土默特两翼同内扎萨克一样,社会经济主要是畜牧业。进入十八世纪以后,由于清廷采取了垦殖土默特牧场的政策,农耕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致到乾隆中期,农业完全取代了畜牧业,土默特蒙古被迫由牧转农。因此,户口地实际上是清廷垦殖政策的产物。

早在康熙前期,土默特地区垦殖草场已见端倪。据《奉使俄罗斯日记》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在城东白塔一带“所见蒙古皆有土屋,能种燕麦、糜子。时方五月,麦仅二寸”。而在归化城更有“屯垦之业,鸡、豚、黍、豆、麦、葱、韭之物”。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在黑河、浑津等处设置粮庄十三圈进行垦殖。于是边内农民也纷纷出边垦荒,当时还是春来秋归的“跑青牛犊”,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据范昭彦的《从西纪略》载,不仅和林格尔一带“有山陕人杂处”,甚至美岱召一带也“有陕人于此种地”。由此可知,康熙以来,垦殖草场由南向北扩展,已有相当规模。为了保证蒙古兵丁能有起码的牧场,清廷按每兵五顷的标准,给土默特兵丁划拨了草场,称作蒙丁地。形成于雍正末年的地亩册,就是这种蒙丁地的档册。

雍正朝,特别是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清廷加速了对土默特草场的开垦,以致草场不断缩小,牲畜大量减少。在生活来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土默特官兵被迫转而务农。但是,他们既要听从调遣从征打仗,又得随时支应各种差役,往往无暇耕种地亩,于是便将地亩租佃给汉族农民,靠租资养贍家口,充当各路苦差。土地出租以后,新的矛盾暴露出来了。首先是土地租佃者有的抗租不交,有的则转租转典地亩,一块耕地短期内竟数次易手,致出租土地者无从讨租。其次,正如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归化城都统班达尔什在乾隆七年(1742年)给朝廷的奏摺中所说:土默特地亩“先前并未按人均匀分配”,“有力者则任意侵占,衣食充盈;无力者则丝毫不得,饥寒交迫。”造成了“蒙古生计日窘”的后果。据统计,乾隆七年土默特两翼蒙古,包括喇嘛、沙比那尔共计六万余口,其中无地或有地不足一顷的竟达二万七千余人,占总人口的45%。很显然,这直接关系到土默特兵丁能否为清廷出征和当差,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喀尔吉善们向清廷报警曰:“若不筹划经久之计,恐将来穷蹙日甚,殊费周章”。于是乾隆皇帝允准给土默特两翼旗众调整地亩。

这次调整地亩的原则是,按实有人口,每口给地一顷,名为户口地。

地亩的来源有二。一是将典给民人的地亩抽出;二是从占地多者名下按比例匀出地亩,统一调配。据档案记载,当时是以佐领为单位,将全佐多余地亩,每顷按十七亩一分三厘抽出,召庙地则按每顷二十六亩七分六厘抽出,共匀出五千余顷土地用作分配。

乾隆八年(1743年),清廷任命归化城、萨拉齐、托克托、善岱、和林格尔、清水河、昆都仑七协理通判为办理田务官,与土默特两翼参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协同办理分配户口地事宜。乾隆八年逐佐调查登记户口、土地,确定了应分配土地的贫苦蒙古人数及用作分配的地亩数量,次年即着手分配户口地。由于抽赎民人所典地亩规定“分别年限,皆以八年为限。典出不满八年者,俟租典期满”,

“再行抽回”，故而这类土地是逐年抽出的，这就决定了分配户口地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完毕。事实上，分配户口地用了六年的时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才基本结束。通过这次分配地亩，按户将两翼旗众所在佐领、村落、地亩数量及座落、四至逐一登记造册，存入土默特旗务衙门档案库备查，此即所谓户口地亩册。

当然，土默特户口地的分配并非仅此一次。乾隆十四年以后，由于兵丁绝户或孳生人口，还陆续进行过局部的调整分配。如嘉庆六年（1801年）土默特司户从丹府位于喇嘛营子的四百余顷牧场中抽出五十顷五十亩分配给穷苦蒙古人就是例证。

对分配给蒙古人的户口地，清廷规定“嗣后永禁典卖，倘有私自典卖者，将买卖双方均从严治罪，土地入官”。同时规定，“未垦之地，不准开垦”。然而，由于当差紧急、天灾人祸或不善经营等因，出典户口地亩并未根绝，蒙古人贫困化的趋势也并未因此而扭转。乾隆中年（1771年左右）以后出现无依无靠的鳏寡孤独者，以及像乾隆初年那样的贫苦蒙古人的事实，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 代买米地是怎么回事？

过去，土默特地区曾有一种说法：“养儿不当差，种地不纳粮。”指的是土默特蒙古族在清代享有此种优厚待遇。其实这是一种讹传，大约是民国初年一些遗老为怀念覆亡了的清王朝而造出的梦呓。

且不说土默特蒙丁必须服从清廷的调遣从征打仗，即以当差而言，仅在归、绥两城各大衙门轮值，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押运钱粮，守卫卡伦，缉捕逃犯以及春秋二季操演等项，应差即数千人次，何来不当差？土默特兵丁的户口地倒真的不纳粮，但以此为据就说土默特人在清代“种田不纳粮”则完全错了，此说如果不是意在宣扬清王朝的“皇恩浩荡”，或许是在表达对民国以来繁重的苛捐杂税的不满吧。

既然土默特蒙古种地纳粮，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土默特境内各类土地中，有一种地亩叫代买米地，也称作小粮地。这种土地就

是土默特人交纳赋税(即官粮)的集中表现。据土默特文献档案记载,乾隆初年,土默特两翼六十二佐领,每佐每年必须交纳官粮五十石,总计三千一百石,这些粮都是由各蒙户交纳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刺麻扎布封为扎萨克辅国公以后,应其要求,免其所属勋旧佐领应交官粮,遂减为三千零五十石,成为定制。

由于水旱灾害,以及穷苦蒙古愈来愈多,因而催解官粮也愈来愈困难。如乾隆九年(1744年)三月,土默特两翼仅解交官粮一千八百五十石,连同所借上年仓谷七百二十石,尚欠一千九百二十石无力交纳,清廷无奈,只得展限二年完纳。类似的情况不断发生,迫使清廷不得不另谋变通办法。绥远城将军诺伦向朝廷建议:将土默特蒙古租典给民人的土地抽出,交各厅另行出租,以其租资买粮入仓,代替两翼蒙古应交的官粮。诺伦在一份咨文中说:“土默特两旗所典二千七百三十三顷六十六亩田地内,抽出一千五百九十三顷九十八亩,交付该同知等,将每年租银三千五百两,照数完纳,买米交库。”这一办法“经理藩院议覆,可种地亩二千七百三十三顷六十亩内,择其靠近蒙古之地亩,匀给无地沙比那尔、土默特二旗蒙古家境贫寒少地人等,以为永业(按,此即鳏寡孤独者及贫苦蒙古地)。其余地亩,令其交纳租银……将众蒙古每年应交米石,替之买齐完纳。”具体办法是,将一千五百余顷地亩分别交归、萨、托、和、清等厅征收租钱,而后解交绥远城同知(即粮饷厅),作为土默特蒙古应交官粮之款,由该同知代为买米交库。因为是代土默特蒙古买米交库,故而上述一千五百余顷土地称为代买米地,又因为所买之米充作官粮,为与大粮官地区别,故又称小粮地。

以上就是代买米地的由来及其用途。就其性质说,代买米地是土默特二旗蒙古交纳国家的赋税,只不过是地亩代替粮食而已。因为这些地亩本来是户口地,改作代买米地以后,地权便不属于土默特蒙古了,所以说土默特蒙古种地不纳粮是没有根据的。

#### 都参领拒贿记过

清季,土默特地区的官场充斥着贪官污吏,简直暗无天日。例

如绥远城防御哈楚罗于 1840 年(道光二十年)诱买民女为妾,受到女家控告。哈探知控方系受人唆使,遂让其母赴京,在都察院控告该城协领海昌、佐领图敏额等 70 余名官员违例“聚赌学戏”,控告绥远城将军色克精阿、副都统特登额“挑缺不公”,控告归绥道衙门书吏“贿和公事”。对此控案,清廷最初命王有壬(知府)审理,王因两造多系满员而不敢讯问,于是又委平阳府云麟会鞠。云当堂被哈楚罗顶撞,陡生惧意,托病禀辞,星夜驰回任所。清廷不得不重新委员赴归化城讯办此案。结案后,该员对将军、副都统、道员等说:“哈楚罗所控本不尽虚,我如先将汉人问定,再问旗兵,再问旗员,诸公有所逃命乎?”所谓官官相护,岂不昭然若揭!

虽然吏治大坏,清廷的封疆大吏对土默特两翼参佐等官的辖制却特别苛严,右翼参领都格尔扎布受到记过处分就是例证。兹将绥远城将军贻谷 1904 年(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给土默特兵司的“札飭”抄录如下:

钦差督办蒙旗垦务大臣理藩院尚书衔镇守绥远城等处将军贻谷为札飭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准归化城副都统咨开:“据兵户两司传询,参领都格尔扎布于贾集贤送银时,适值家中无人,未便自行扭扣,且及早禀称,实属洁己自爱,请毋庸置议”。但贾集贤若不素习该参领之为人可以尝试,何敢冒昧突然而来?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其夙日不知远嫌亦可想见。又访闻其子家居者素有浮浪招摇之劣迹。似此律身未谨,家教不严亦有自取之道。着先记过一次,其子家居亦着该管佐领严加管束,以儆将来,从此悔过,自怨自艾,本将军有厚望焉。合亟札飭,为此札仰兵司参领伊精额遵照,切切此札

右札土默特兵司参领伊精额准此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商人贾集贤有求于都格尔扎布,遂登门馈送银两,图谋打通关节。都参领不在,家人未敢收银,将贾拒之门外。事后,都参领将此事的经过如实禀告了副都统。此事被贻谷

闻知后，命土默特旗务衙门予以彻查。户兵二司调查后，认为都参领并未受贿，且及时禀告上级，“实属洁己自爱”，故“请毋庸置议”。都参领拒贿虽不值得褒扬，“毋庸置议”倒也恰当，而貽谷却给都参领以记过处分。根据只是“贾集贤若不素悉该参领之为人可以尝试，何敢冒昧突然而来”，“夙日不知远嫌亦可想见”，推理臆断竟成了处分人的依据。貽谷这样做，大约是意在扬威慑众。

貽谷在给清廷的奏摺中曾说：“窃查该旗习俗萎靡，非一朝一夕之故，上下蒙蔽，岂一官一任为然”，“十二参领公同印禀”，“处处牵涉副都统文(瑞)”。可见土默特两翼的凋敝主要是朝廷大员造成的。貽谷也知道文瑞“于军饷则多方克扣，于库款则随便私提”，情节不知要比都参领严重多少倍，他并未参劾文副都统，却处分了并未受贿的土默特参领。足见他所谓的“愚意在不追既往”不过是欺人之谈。而其扬威慑众正是为其整理土默特旗务，清理土默特地亩作准备，可谓老谋深算。

### 毕克齐为何有城隍庙？

毕克齐在清代是归化城厅西境重要的市镇，农业、商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在繁华的街市中心地带，有一座虽占地不大，却工艺精致的庙宇——城隍庙。每年的中元节（七月十五日），庙前人山人海，许多人杠枷带锁，恭送城隍出府。这一天与四月初八奶奶庙会一样，是毕克齐最盛大的庙会。

在封建时代，城隍庙往往是建在县治以上的城市中，而且城隍的官阶总是与当地最高长官的品级相同。毕克齐并非厅县治所，虽有一巡检衙门，也只是一个约略相当于公安分局的治安机构，并非一级行政机构，因而不具备建城隍庙的资格。毕克齐居然建有城隍庙，而且城隍塑像竟著一品冠服，这在各地城隍庙中恐怕是非常罕见的。

毕克齐的城隍庙是怎么来的呢？刻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重修毕克齐城隍庙碑记》有如下记载：“本境城隍，是已其神抱道自隐，因我朝运际熙明，遂于顺治十八年现象于镇南古城焉”。“毕

齐克齐盖归化城西鄙巨镇，往来冲区也。其故地曰聚安堡，人遂迁请于此，立庙祀之”。民间传说，顺治年间，人们在镇南大古城村耕田，发现一尊铁铸神像，初不知为何神，后见铁像背后铸有“城隍”二字，才知为本境城隍。于是村民诚惶诚恐地就地盖一小庙供奉起来。其后，随着毕克齐发展为工商大镇，遂将城隍铁像迁请于镇内，盖庙奉祀。约当道光末咸丰初，火居道士边本巍由山西永乐宫迁来毕克齐布道，成为城隍庙住持道士。据云，毕克齐的城隍颇灵异，所以人们无不虔诚供奉。由于历年已久，“庙貌倾颓”，便由边道士出面，联络乡耆王双伯、程敬亭等，约于同治十年（1871年）发起重修城隍庙。《碑记》说“农商莫不欢欣鼓舞，殷殷然相为奉从。该村蒙古何姓，嗜善乐输，即捐地基一块，于是乡耆等率众募化于本街”，“因以鸠工庀材，扩而充之，起建正殿、过殿、钟楼、鼓楼、牌楼、山门、游廊、禅舍以及寝宫、暖阁、桅斗、戏台，一律维新，且添塑其庙”，整个工程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竣工。

据住持该庙的道士说，新庙建成后，重新塑了城隍神像，依照铁像的天官服、天官帽，塑成一品冠服，而把铁像包入新塑像内，同时塑了一尊城隍娘娘像以配祀，正殿内的东暖阁就是城隍夫妻的寝宫。为便于城隍出府，另塑了一尊高三尺左右，与大殿塑像一模一样的神像，以便奉入特制的绿轎大轿出府游街，并到镇东五里多的孤魂滩，超度游魂饿鬼。

由此可见，毕克齐的城隍庙发端于清初在大古城出土的铁铸城隍像，最终形成于该镇商业鼎盛的同治年间。重修该庙时，土默特右翼二甲一、二、三佐的蒙古族出力颇多，如建庙地基是蒙古族捐赠的，修庙的十名董事中蒙古族就有六名。可见，这座城隍庙是由全镇蒙汉群众共同修建的。而蒙古族参与其事，说明清中叶以后，土默特蒙古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在逐渐淡化，其宗教信仰已趋于多样化。这就是清季毕克齐蒙古族独立或参与（包括出资）修建真武庙、马王庙、财神庙、三官庙、龙王庙、奶奶庙等庙宇的原因。

# 呼和浩特洪水灾情述往

白慧中

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特别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显示出这一被称为塞外明珠的诱人光彩。但是在解放前，这里却是个天灾人祸重重的地方。反动统治者们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因而使各种灾害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无法忍受和抵御的地步。凡是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都有亲身感受，人为的兵灾匪患和无休止的战乱自不必说，而大自然降给人们的灾害，如旱灾、洪灾、白灾、虫灾等，给人民造成的危害不胜枚举。

现在单就洪水灾害而言，从近百年不完全的记载来看，其危害程度是相当大的。再从市内三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回族人民聚居的市区西北部，历年来受到的洪水冲淹，自然是首当其冲了。

过去居住在城北近郊的老乡们经常说：“无雨干土漫脚，有雨洪水淹村”。这句形象的话，是对旧社会呼市地区无雨干旱、有雨成洪的典型写照。

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南麓，坐落在多年形成的洪积平原上。背靠大青山，南临大、小黑河，整个呼市市区的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地面平均坡度为3%到5%，形成自然坡度和洪水流向。回民区位居市区西北部，且有洪水冲刷而成的扎达海河河道由北向南穿区而过，直通城西南，流入大、小黑河。

大青山有四条比较大的山沟，这四条大山沟的出山口，正对着呼市市区。它们由西而东，依次为：毫赖沟、坝口子沟、红山口沟、哈拉沁沟。每当大雨季节，山洪由各沟口冲出，顺河道直泻而下，沿河村屯，特别是下游的回民区，便成了遭受洪水洗劫的必经之地。



现将这四条沟的基本情况简述如下：

1、毫赖沟：沟口位于乌素图村和元山子村之间。干沟约长 4.5 公里，流域面积约 5 平方公里，发源于桃耳山和好尔山。

2、坝口子沟：位于坝口子村西。流域面积约 40 平方公里，干沟长 9.5 公里，沟宽 30—40 米，沟口宽处达 170 米，发源于蜈蚣坝南麓。呼武公路贯穿全沟。

3、红山口沟：沟口位于红山口疗养院之东。流域面积约 70 平方公里，干沟长 19 公里。两岸岩石陡立，沟内过去有一股清凉泉水，顺沟流出。

4、哈拉沁沟：沟口位于哈拉沁村东侧。干沟约长 43 公里，流域面积为 630 平方公里。在卯独庆（属乌盟武川县）北有两大支沟汇流于主沟。

在旧社会，居住在市区的穷苦大众，每当有下雨的征兆时，人们总是往北面的大青山方向看，看有没有乌云低压山顶的迹象，判断出会不会形成洪水危害，这也就是老年人饱受自然灾害而又无力抵御所形成的恐惧心理。

追溯历史，百余年来，呼和浩特地区曾经发生过多次比较大的洪水灾害。

旧社会：

- 1、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六月；
  - 2、清·咸丰六年（1856 年）七月；
  - 3、民国四年（1915 年）七月十五日，即农历六月初四日；
  - 4、民国十一年（1922 年）八月；
  - 5、民国十三年（1924 年）七月；
  - 6、民国十六年（1927 年）七月；
  - 7、民国十八年（1929 年）八月一日（农历六月二十六日）；
  - 8、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六月二十七日（农历六月初二日）；
- ……。

解放后：

除 1952 年夏曾发生过较大洪水外,最大的洪水灾害发生在 1959 年 7 月 27 日(农历六月二十二日)。

为了清楚说明在上述年份中,发生的比较大的洪水灾情,我查阅并择录了反映在昔日呼市地方史志及史料中,有关当时的洪水灾情记录。现依次加以转抄:

1、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六月间,呼市周围连降两日大雨,雨大势急,致使山洪暴发,冲毁河槽,漫入农田,直泻归化城内。

2、清·咸丰六年(1856 年)七月的洪水也是很大的。在《绥远通志》中,有这次洪水成灾的记载:“文宗咸丰六年,归化城,霪雨为灾,大雨淹没田禾,告饥,沿河村庄尤甚”。

另外,根据 1956 年 8 月 23 日,呼市糖厂为谋求建厂后厂区及生活区免遭洪水冲击,厂领导指派赵学暖、董永凤二同志,专门走访北山脚下的村庄和当时市内的主管单位,搜集资料 and 了解洪水情况。在他们的走访记录中,记有当地老人对咸丰六年特大洪水情况的回忆。这些高龄老人们说:“听老人们说,在咸丰六年,洪水很大,连阴雨下了四十多天,每日均发山洪,各沟多被冲长刷宽,并毁坏了红山口及哈拉沁沟的大半路,沟有房大的石头。”这虽为口碑资料,亦能证实这一年的洪水是很大的。由于这次洪水直泻市区,冲坏了架在牛东沿河槽上的庆凯桥。

3、民国四年(1915 年)哈拉沁沟因骤雨而聚成洪。根据资料介绍:当年农历六月初四日下午三时左右,天降骤雨,沟中山洪暴发,水量很大,加有东山石咀逼水,河水漫溢,洪水由沟口两岸溃决,直奔村南,冲毁房屋 20 多间,毁坏农田六百多亩,水流直奔新城北门,居民齐集,急用土袋等物堵塞,才幸免于难。

这次山洪发难在《绥远通志》中也有记载:“民国四年夏,哈拉沁山洪暴发,澎湃南来,城北地势稍高,壕浅不能渲泻,衣未直贯北门,声响甚响,震动全城……”。洪水当日下午三时出山口,入夜十二时渐小。

4、民国十八年(1929 年)八月一日夜,天降淫雨,连下五日夜,

致使山洪暴发,直入当时的归绥市内,造成民间损失极大。就连当时的归绥县县长张锡馥、归绥市公安局局长卜兆瑞等地方官员也慌忙呈文告急。卜兆瑞向绥远省政府建设厅写的报告说:“窃查近日以来,阴雨连绵,山水暴发,职局前草桥,钧厅旁甲子桥,均经冲毁……兹复查育婴堂西原有浅河一道,每逢夏雨,山水多并此河下流,因水小势缓,沿岸居民向未蒙受何等损失。此次大雨滂沱,连绵四昼夜,山水洪涛,势甚猛烈,致将两岸居民的田地、树木、房屋,先后被水淹没或冲塌……。”

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的大洪水,给后沙滩一带居住的老住户,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惊恐,至今尚有余悸。这次大洪水的情景,其实我从小就有耳闻。我的外祖父家就住在后沙滩南坡。我的慈母在世时,经常和我们说起这场洪灾险情,“那次发大水,浪头有两丈高,水上了南坡,涮走了半个南坡,水再不退,南坡上住的人家非冲走不可,就这还冲走了你们大外公的半间住房……”。

5、坝口子沟的洪水,以1949年为最大。该年六月二十七日(农历六月初二)下午二时过,天降暴雨,历经两个多小时,山洪由各支沟汇集于主沟,形成巨流。在坝口子村北,因河身弯曲,洪水遇到阻碍,横冲直撞,洪峰高越屋顶,冲毁民房200多间,淹死老幼27人,冲走衣物箱柜及家禽家畜无数,毁坏了大片农田。

接着与红山口洪水合流,直入市区,因漂浮物甚多,将庆凯桥堵塞,水淹两岸,激流再度将甲子桥冲毁。甲子桥曾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七月的大洪水被第一次冲毁。

总之,在旧社会,从清朝中叶以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将近二百多年的岁月中,在呼和浩特这个不算大的城镇,几乎有年必有雨,有雨就成灾。如1920年、1922年、1923年、1924年、1927年、1929年等年份均有较大的山洪溢发。穷人家是“土板墙,土坯房,身无衣,肚无粮,冬天冻个死,夏天雨灌房,天灾人祸顶不住,日子真稀荒。”其惨景可想而知。

解放后,也有些年份有大雨,其中除1952年下了大雨外,就要

首推 1959 年的特大洪水了。

1959 年 7 月 26 日傍晚，天气闷热，呼市上空浓云密布，气压很低，人们感觉烦躁得透不过气来，天色也异乎寻常的黑。时近午夜，北山先行落雨，电光闪闪，雷声轰鸣，由北向南，滚滚而来，顷刻之间，已成倾盆大雨。不多时，山洪冲带着漂浮物呼啸着倾泻下来，沿扎达海河而下。由上游冲下来的大树、房架、电杆、农具、家中用品及衣物等，将横架在河上的三孔拱型大石砌成的庆凯桥全部堵塞。桥的东坡略高于桥西，大水先西后东，向两侧漫溢。此刻，太平街以北的民房，相继浸泡在大水中，歪斜而倒塌，继而太平召一带的大部分房屋也倒塌在洪水中，水势仍直涨不下。东坡漫水，向东向北两侧，直冲而下，后浪涌前浪，势不可挡，庆凯街、礼拜寺巷、和合桥、宽巷子、水渠巷、通道街、营坊道、后新城道、东顺城街、南顺城街……，大水进院进家，浪推房倒，平地水深过腰齐胸。雨在继续下，水位不断在升高。人们扶老背幼，呼唤着亲人，也顾不得想拿什么，大水冲走了什么，都往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急奔。大家相互拉着，搀着，扶着，同呼息，共命运，在洪水中挣扎着……

这时，天已大亮，还在下着雨，天色阴沉灰暗。人民解放军战士奉命出动了，机关干部出动了，人民警察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亲人们奔跑着赶来了……抢着背老人的，争着抱幼儿的，拿米搬面的，往返递运物件的，保卫重要单位往外抢救文件的……

就在洪水漫过庆凯桥的时候，在穹形桥面上，尚有四个人和一头毛驴，被大水围困在桥上，两头水急，退不下来。这四人是回族马车工人马玉、陈德寿，一位卖面的老梁头，还有一个牵着驴的。倏忽间，整座庆凯桥动摇了，被洪水冲垮了，桥上的人随着砌桥的大石条顺流而下，被冲走了。幸存的马玉老人（现已亡故）后来回忆：“我那天是上早班，五明头到单位套马车去拉货。当我顶着大雨走上牛桥（庆凯桥）时，洪水先把桥西头涮开一道两米宽的深沟，我们几个人当时是想过桥西去，可只一小会儿功夫，桥东头也漫了大水，我们急着想退已经晚了，退不下来了。刹那间，桥的东西两头便被洪

水冲刷得与地面道路分开，成了四面无靠的孤桥。顶多10分钟，整个桥身不是歪歪斜斜顺水倒下去的，而是慢慢坐下去的。我随桥掉入水中后，人已沉入河底，我当时心里还清楚，赶快闭住气，伸手抓东西。说也巧，水中有个大木架子，我紧抓不放，抱住架子顺水而下。我挣着在水中翻在架子上，双手两腿紧紧连抱带夹，自己心里想，性命攸关，千万不能丢开大木架子。这时，水急浪大，水推浪托，一会儿被托出水面，一会儿又翻入水底，头上背上腿上被撞被砸，疼得我差一点背过气昏过去，还灌了满肚的苦水。幸好，到了城西南的西水磨村附近，河道宽了，水也下到齐腰深了，我被冲到岸边，死里逃生，用尽全身的力量才爬上岸……”。

当被救入人民剧场暂度洪灾的人们，相互间偎依在那高台阶上向四周举目瞭望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汪洋般的大水，浸泡着那被洪水冲塌的残垣断壁，而往日里那繁荣热闹、商贩云集的“北头起”，一夜间房倒屋塌，凄凄凉凉，不堪入目。

庆凯桥冲垮了，河道没有阻拦了，洪水也顺着河槽退走了。就在水漫市区，回民区群众遭受洪灾的关键时刻，党和人民政府急人民所急，争分夺秒，紧急动员各方的力量，组织抢险救援人员，机关停止办公，全力让房搭铺。友谊、温暖、关怀来自四面八方，献衣物，送被褥，蒸馒头，送开水……这次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毁了大半个回民区。回族人民的好女儿、人民警察的光辉典范于兰梅同志，就是为抢救重要的公安档案而英勇献身的。

紧接着，一场大规模的抢险救灾和赈灾安民的工作迅速展开了。救灾物资源源而至，遭灾人家很快得到安顿，随之，盖民房，建校舍，恢复生产，整顿秩序，也都争分夺秒地行动起来。天冷前，房屋倒塌的人家都搬入了新居。这怎能不让人们由衷地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生活在新社会就是好呀！

# 清末民初归绥地区的景观和祠宇

刘蒙林 舒顺华

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即归化城与绥远城之合称。1929年,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绥远省,归绥即为其省治。归绥地处阴山之阳,黑河之滨,山川绮丽,祠宇众多。现将史志记载归绥景观与祠宇介绍如下:

## 一、归绥景观

1、沙溪春涨:市一中校址,在清朝为归绥道台衙门,民国为省府民政厅署。其东西辕门外,流水萦回,清澈明澄,春深冰浮,游鳞上下,为归绥景观最胜处。

2、石桥晓月:庆凯桥两岸,店面鳞次栉比,车驼往来不断,商贾摩肩接踵。每当黎明时分,雄鸡唱晓,残月照映,桥高水深,别饶情致,颇具江南景色。

3、青冢拥黛:在城南二十里,大黑河之南,有一孤堆奋起,远望如山,传为西汉王昭君之墓冢。其冢高十二丈,占地五十亩。拾级上登,墓顶有小亭一顶。冢前有碑,题“汉明妃之墓”。秋风萧瑟,草木凋零时,冢上仍草色青黛,故名“青冢”。

4、白塔耸光:城东郊古丰州城所在处,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高耸入云,塔形玲珑,精雕细刻,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5、柳城荫绿:绥远驻防满城,四周环水,碧波沸荡,堤列杨柳,垂柳如丝,浓荫淡绿中隐见城堞。风光绚丽,相映成趣,有“塞外苏堤”之称。

6、杏坞翻红:城西北乌素图村,依山傍水,树绿草青,有红杏数千株。叶绿花红,争芳斗艳,山鸟鸣舞,逗人喜爱。每当春夏花开,市人携侣踏青,堪称胜地。

7、虎头瀑水：在城东北奎素沟内之虎头山，亦称虎崖、虎峰、滴水崖。层峦叠嶂，林木青葱，危峰嵯峨，如虎昂首，口吐悬流数百尺，劈空直下，落水处曰龙潭，冬夏不竭。近闻水石相搏，声如鸣金；远观白练当空，飞珠滚玉，令人心旷神怡。

8、牛角旋峰：在城西毕克齐镇北。山如卧牛状，尾北头南，而一角独偏。其峰巍峨秀丽，云气蒸腾，有塞外第一峰之称。

以上八处景观在清末民初时，被誉之为“归绥八景”。

9、玉泉井：在大召南百余步，共和市场在其北。相传康熙35年（1696），圣祖出巡于此，马渴不得饮，以蹄掘地，泉忽涌出，故赐名御泉，今名玉泉井。其水甘甜，四时不竭，居民争相饮用，车水马龙，昼夜不息。有“九边第一泉”之称。

10、海窟：在归化城之东南隅。泉高于地，四周垒台，井壁石砌，旁有罅出水，冬夏不增减。周之市民，得以饮用；左右蔬圃，资以灌溉。

11、灵泉：在城西倘不浪村龙王庙前。泉水粼粼，爽气逼人，水浮紫色，苹藻郁然。

12、神泉：在城西北万家沟内，俗名水神庙，即《水经注》之塞水也。其水分东西两泉，澄澈底，香浓味醇。居民每遇旱时，祈祷于此。

13、温泉：境内有二。一在绥远城南土堡外菜圃中，水性温和，蔬圃滋生，农人喜之。一在乌素图村北龙王庙左，泉水奔流不息，隆冬不冻，青烟白气，严寒季节周围碧草油然。

14、黑水泉：在城西毕克齐镇南六里外，农人逢遇亢旱，虔祷取水，则甘霖立沛。

15、甜水泉：境内有六。一在归化城北茶坊关帝庙前，一在庆凯桥北河畔，一在民政厅照壁前西南隅，一在小西街西口，一在省府财政厅南仓院中，一在大北街四眼井巷内。泉流潺潺，清香味美，为市民资生之源。

16、十八眼井：在城南牌楼板升村。平地出水，纵横十八泉，泉

清而味甘，农人名其为“九龙十八眼”，故名。

17、瓦房院湖：在城之西南瓦房院村北。湖面二亩余，中产鲤鱼，碧波荡漾，水色明亮，人称小海子。

18、龙潭：境内有二。一在万家沟学画窑子山东数里，潭周三十余步。一在城西察素齐镇北之元宝山前，其水与万家沟神泉潜通，虽相距数十里，但投物于此，不日可取出于彼，此为龙潭盛名之由。

19、老龙潭：在归化城东有一卧龙岗，其南百余步有水泊一处，池水极深，居民藉以灌地，此即老龙潭也。卧龙岗其侧有一泉，为潭之源，水性甘冽，市民每日以水车往还，以便饮用。

20、恻园：在省府民政厅内。曲径幽深，古木奇石，鲜花碧草，浓香扑鼻，绿树含烟，浓荫满园。

21、懿览亭：在民政厅恻园内。清朝慈禧太后之父惠征为官归绥分巡道员时，太后随之寓署，常在此游玩。慈禧执政，继任归绥道员者，别建一亭，恭献匾额，题曰“懿览”，取慈禧曾游览于此之意。时亭前尚有慈禧少时坐卧玩赏之石二块。

22、留园：在绥远城东北隅。昔称荣家花园，时为屠义源隐居之所。该园遍植花卉，蝶飞鸟语，颇具诗情画意。

23、普家花园：在绥远城东南隅。该园绿树丛丛，百花争艳，洵属可观。

24、归绥公园：在绥远城之西门外北侧。时亦为省立农林试验场。该园花木繁盛，翠绿葱幽，杂以蔬圃，兼词珍禽异兽，以供众览。斯园地傍城垣，角楼巍然，平绥铁路由城下穿过。登垣四望，亭台楼阁，高树参天，南北诸山，宛如长龙。

25、翟家花园：在归化城外北沙梁。面积约四五顷，遍植各类果木，以千株计。斯园绿荫婆娑，红果挂枝，花香鸟语，生机盎然。

26、龙泉公园：在归化城东，系民国二十年（1931年）省建设厅以老龙潭为基点，建茅亭，植杨柳，辟为龙泉公园，为市民游玩之所。园中立有《建筑龙泉公园碑记》，并有人筑土岗高阜及凉亭，亭名曰“丰乐”。亭前有池，广植莲蒲；池前复为畦，引泉水种稻。亭西



又有公共体育场，环以杨柳。当夏秋两季，游人如织，日以为恒。

27、蟠龙山：在城东北三十里生盖营村北，虎头山西十里。山腰石径蜿蜒似龙蟠，故名。山上有一古塔，高约四丈，周三丈余。塔侧有洞，颇似龙口。山势雄伟，绿树遮天；甘泉四溢，云雾弥漫；绝壁挂瀑，飞雪泻银。可谓人间奇景矣！

28、银洞：在城西毕克齐镇之北，与喇嘛洞毗连。俗传昔有一老僧入洞，进不数步，窄路纷歧，前阻溪流，千转百回，上架枯木为桥，云腾雾起，变幻莫测。僧不敢进而返，后人再无敢探访者。

29、喇嘛洞：在城西毕克齐镇之北。洞前即广化寺，寺广数十亩，分前后二殿。前殿屋宇宏大，所供多佛像；后寺则建于山坡间，活佛吹斯嘎巴居之。该寺常住黄衣僧侣数百，终日礼佛诵经。山坡高处，有一石洞，即喇嘛洞。登石阶一百二十四级，始至洞口，洞口建楼阁三层，内藏佛像甚多。倚栏远眺，峰峦叠翠，松涛轰鸣，红墙青瓦，泉水淙淙，有如江南秀色。

30、玉带山：在城之东北保合少村北山腰，横亘白石数十丈，如玉带环之，故名。其山势如奔马，白带似游龙，光怪陆离，气象万千，疑非凡境。

31、四号山：在城北圪妥儿村南，俗传有古瞭将台。惜今荒烟蔓草，古迹荡然。

32、马鞍山：在四号山西北二十里，有状元碑一，其文曰：“雍正十三年状元李如柏行兵祈雨处”。山势雄伟，青石嶙峋。

33、猴山：在城东秦家窑村。斯山奇峰突兀；巨石森然，如猿猴坐立状，故名。

34、此老山：在城之西北。层峦错落，山势巍峨，上建圣母庙一。每年四月初八，善男信女，祈子拈香者纷集。

## 二、归绥祠宇

归绥城之召庙沿革，世人多有介绍，兹不赘言。现将归绥之祠宇予以概述。

1、孔子庙：亦称文庙，城中有三。一在归化城之南，文庙街即由

此而得名。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归化城土默特都统丹津奏准,在原有孔子庙之基础上,增建正殿二楹,东西庑各三楹,崇圣祠三楹。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道光四年(1824年)予以重修。此为土默特蒙古之文庙。一在归化城杨家巷。光绪三年(1877年),归绥道署利用罚捐商款,在其旧义学之基础上改建正殿三楹,东西庑各三楹,戟门一座,规模颇巨。此为归绥汉民之文庙。一在绥远城南门内东街。光绪末年,将军贻谷建八旗书院,并于院内建孔子庙。民国四年(1915年),归绥道尹张志潭以书院为道署,重加修葺,并移元加封孔子碑于其内。此为归绥满族之文庙。

2、关帝庙:城中有七。一在归化城小东街,除祭关羽外,其后增祀火神、马神、金龙四大王、酒仙、观音大士。一在西茶坊,后增祀三官、孙膑。一在南茶坊,后增祀释迦佛、瘟神、太上老君(金银诸匠所祀)、鲁班(木匠所祀)、吴道子(画匠所祀)、罗真人(理发匠所祀)、轩辕黄帝(成衣匠所祀)。一在北茶坊。一在东茶坊。一在绥远城南门内西街,民国后改为关岳庙。春秋二戊,由都统率属致祭。自民国十七年(1928年)后,其祀典亦废。一在绥远城南门外西侧。

3、文昌庙:亦称文昌祠。城中有三。一在归化城小东街北口。光绪八年(1882年),土默特旗蒙古官兵奉部文,于城东南自行捐输建修。此为蒙古族之文昌庙。三十年代为绥远民众教育馆所借住。其正殿亦为图书馆所占。一在海窟龙王庙前院,此为汉族之庙。一在绥远城东南隅,此为满族之庙。文昌庙所祭神为“文昌帝君”,即主宰功名、禄位之神,故其香火有时比文庙还盛。

4、玉皇阁:在归化城西南。前殿除祭玉皇大帝外,又增祀三官,东祀三皇及历代名医,西祀金华圣母,过殿祭祀灵官及子孙圣母,其余祭祀真武、雷神、火神、马神及观音菩萨。

5、龙王庙:城中有三。一在海窟北,曰南龙王庙,建于同治元年(1862年)。除祭兴云附雨的龙神外,内附祀风、云、雷、雨、八蜡、马神、酆侯(书吏所祀)、蔡伦(纸工所祀)、眼光菩萨。庙前有文昌庙、魁星阁。一在西菜坊西北,曰西龙王庙。雍正年间建。中祀龙神:

东祀八蜡，西祀风神。庙之西北有村，即以庙名。一在绥远城北门外东侧。

6、三贤庙：亦称三义庙，在归化城大南街东小巷（即三贤庙巷）内。除祭刘备、关羽、张飞外，后增祀观音孙真人、井神、仓神。修建于雍正年间。

7、吕祖庙：在归化城大东街东南之吕祖庙街内。正殿五楹，中祀吕洞宾（八仙之一），左祀太阳神，右祀太阴神。西耳房一间，祀大仙神。东西两庑各六楹，上西房祀释迦牟尼佛。南建乐楼一座，照壁一座。该庙于光绪四年（1878年），由归化城同知常桂用四乡绅耆所捐四千余金修建。

8、财神庙：城内有二。一在归化城大召前东小巷。一在绥远城西北隅。所祭者为赵公明，即财富的守护神。

9、十王庙：在归化城小北街西小巷。正殿祭佛、道教所传十个主管地狱的阎王，即：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伍官王、阎罗王、变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转轮王。内附祭地藏王菩萨。东西殿祭火神、财神、子孙圣母。

10、三官庙：在归化城隆寿寺（乃莫齐召）之东北。前殿祭祀道教所奉三神，即天官、地官、水官，并附祭关帝。其西为鲁班庙，又西为子孙圣母庙，再西为边宁寺，祭观世音。过殿祀真武、马王与关帝。其地即为三官庙街。

11、东岳庙：在归化城南漏泽园侧。岳者，葬也，即祭祀死者之所。庙前为城隍行宫，东向。每年清明、中元、十月朔致祭。旁有小庙祭孤魂，亦称孤魂庙。

12、城隍庙：城中有二。一在归化城北门外常平仓东（即城隍庙街东口路北处），雍正年间建。一在绥远城南门内东街，乾隆中期建。所祭神为城隍，即道教所传守护城池之神。

13、费公祠：在归化城财神庙西。康熙年间，商民为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建立生祠，将军逝，即塑像以祭，东龛塑都统丹津像，西龛塑齐布森像。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学士松筠奉使来归绥，商民又

绘像附祭于此。

14、苏武庙：在归化城之南。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也先汗挟明英宗至小黄河苏武庙，是为该庙。

15、格根汗庙：在归化城北门外。后金(清)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亲征察哈尔林丹汗，驻蹕归华城，悬敕谕庙中，禁侵毁。

16、昭烈祠：在绥远城之西南隅。民国元年(1912年)，国体初更，外蒙古抗之，内犯至喀尔喀右翼旗之鸿厘寺(百灵庙)。绥远城署将军张绍曾率师进剿，大破之。民国十四年(1925年)，死者33人被建祠以祀，绥远都统李鸣钟立石志其事。

此外，归化城内还有圣母庙、郎神庙、禧神庙、观音庙、玉泉阁、天齐庙等；绥远城内有旗纛庙、马神庙、马王庙、菩萨庙、土地庙、山神庙、家庙、东娘娘庙、西娘娘庙、姑子庙等。因资料所限，不一一叙述。

## 孤魂滩·先农坛·郎神庙

伯 谋

孤魂滩的确切位置在归绥市旧城南茶坊和西菜园中间、大召前史家巷南口外，一直到辛辛板申村北。五十年代初这里还是一片荒野。解放前那里的建筑只有东岳庙和孤魂庙，附近全是乱坟岗子，四周是芦苇草滩，故人们称之为孤魂滩。

此滩何以“孤魂”名之？说起来就话长了。约在二百年前的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旧城）已成为西口（杀虎口）外土默川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商业空前繁盛，大批晋籍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三教九流之人便蜂拥而至，落脚于归化城以求谋生。在其客死于此地后，有力量者便将尸棺运回原籍埋入祖坟；穷困潦倒者无力运尸回籍，则只好到义地（公墓）内找一隅安息之所。按《归绥县志》载：“漏泽园，在大召南口外，凡四十亩，乾隆四十五年复置三十余亩，曰瘞骸所，在漏泽园侧。”漏泽园，为当时的执政者和富商士绅对于那些客死于此地而又无所归者，或以公款、或以募捐购置义地所立的公墓。以“漏泽”名之，大约是取“皇恩浩荡、普施恩泽”之意，而客死异地不能回籍者都是漏掉皇帝恩泽的人，死后入于义地以补施吾皇漏掉的恩泽吧。因而公墓中所埋者，皆为不能运回祖坟安葬的“孤魂饿鬼”也。天长日久，文雅的“漏泽园”的名称渐被人们遗忘，大众化的“孤魂滩”的名称便流传了下来。

先农坛在现在公园假山和两湖迄北一带。乾隆初年，土默特左翼都统丹津奏放“大粮地”后，为了农事的风调雨顺，筑坛以祭祀神农。先农坛西南是马莲滩，有一片回民的坟地。民国年间，在先农坛西南为修公园而凿一石龙头，口中引出一股清泉，故当时的公园

称为“龙泉公园”。

郎神庙在现公园东南隅一带(齿轮厂院西南角处),当时这一带是归化城的东茶坊,有一座关帝庙,郎神庙与关帝庙毗邻。1817年(清朝嘉庆二十二年),由旅居归化城的梨园弟子们捐资修建,庙内主供的郎神据说是吃“张口饭”者(唱戏、说书的艺人)的祖先——唐三郎(唐玄宗,因其爱扮成戏中角色演戏,故梨园弟子们称其为唐三郎,供奉其为始祖)。庙周围还有梨园弟子的坟地。到了清朝末年和民国年间,该庙成了放置无力运回原籍的艺人尸棺的场所。记得儿时曾与小伙伴们去过此地,庙周围长满一人多高的杂草,庙西则是乱坟滩,再往西便是“龙泉”。当时庙已破烂不堪,正房和西房中放置着十几具旧棺木,着实阴森可怕。直到齿轮厂建成投产后,该庙遗迹才荡然无存了。

# 爱国民主人士李致方

岑喜珍

李致方,原名李世魁,男,汉族,1907年7月24日出生在内蒙古土默特旗(现呼和浩特市郊区)保合少村一户农民家庭。

李致方的童年、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接着袁世凯窃国篡权,军阀连年混战,使广大农民陷于更加困苦的境地。李致方一家祖祖辈辈务农。父母一生辛劳,终因年景不佳,儿女较多,常年不得温饱。李致方从小养成了勤劳、吃苦、节省等习惯。

李致方小的时候身体瘦弱,九岁时,父母把他送进了私塾。当时父母对他的念书很重视,要求极为严格,目的是想叫他多学点知识,将来当个教书先生以糊口度日。

由于李致方学习勤奋,智力过人,在192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绥远省立师范。因这所学校是公费,李致方能坚持就学,直至毕业。在师范读书期间,除了认真学好正式课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进步文学作品,如鲁迅的《呐喊》,长虹的《给妈妈的一封信》,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等。1925年,他带着极大的盲目性由吉雅泰、范建中介绍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奉军到绥远后,因怕杀害,于是跑到了包头,过了一段流浪生活,后进入了满泰的绥西镇守使署军需处,担任该处的书记和低级军需。

1926年3月,李致方因母亲病重,回到家乡保合少村。不久母亲病故,父亲坚决让他在村里教书,于是由蒙古族人根海介绍,进入了校址设在保合少村的土默特旗第九小学。当时村长是恶霸地主张大叶,他不同意在村里办这所小学,结果带人将教室顶棚强行

拆去,无奈,李致方只好再次外出谋生。

在村里教书期间,李致方经常与学校的老师和村里的农民交谈,向他们了解农村的情况。问他们现在农民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最痛恨的事是什么?大家都说最痛恨的事有两种,一是胡乱摊派,二是税务过重。当他了解到税吏是最可恨的人时,他就在归绥县东南两区行动起来,发动学生和当地农民跟税吏斗争。在一个夜晚打了十三个税卡,主要是屠宰税卡和验驼税卡。在打税卡之前,李致方就对绥远地区的各种税收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到了税吏的许多作恶之事,如一个尿盆子抽的税要比买价贵一倍等等。打了税卡之后,李致方动员当地农民不交税,因而他被传到了高等法院。在开庭审理时,他列举了税吏的大量贪污事实,拿出了税吏的许多贪污证据,并申明只反对搞贪污的税吏,不反对公正收税,统治者为缓和矛盾,所以没有扣押他。

1926年归绥县农民协会成立后,李致方被选为农协会常务委员、副总干事。总干事是李正乐,杨植霖任秘书。当时李正乐只是挂了个名儿,实际上不管事。农协会的工作主要由李致方负责。在这一时期,绥远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西起包头,东到丰镇的铁路沿线一带,如毕克齐、察素齐、萨拉齐、兵州亥等地都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口号是“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这些口号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愿望,因而许多农民纷纷加入了农民协会。在农协会的领导下,各地的贫苦农民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斗争。他们搞宣传,开斗争会,拉上恶霸地主游街。有农协会撑腰,农民们扬眉吐气,地主老财被整得灰溜溜的。

1927年3月28日,绥远人民终于不能再忍受贪官污吏、兵匪人祸和自然灾害的蹂躏,在归绥城南的孤魂滩召开了“绥远难民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孤魂滩事件”。这是一次以反对清丈土地为主的大规模农民运动,是我党在大革命期间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在绥远地区所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李致方直接参与了这次斗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3月28日这天,太阳刚露头,从几十里以外赶来的农民和城市里的工人、商人、学生等五六千人,汇聚到了孤魂滩的荒野上,大家手拿纸旗、木棍,心情激动,热血沸腾。会场上,一幅用竹杆挑着的白布横联,插在两个墓堆上,横联上用红笔写着六个大字——“绥远难民大会”。

会议由国民党人李正乐主持,共产党员杨曙晓、农协会副总干事李致方、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国民党员张遐民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各界代表慷慨激昂地揭露了丈地委员、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剥削欺压农民的罪行,听众不断高呼口号,整个会场群情激昂,怒气冲天。会后,愤怒的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向旧城冲去。队伍前边挑着难民大会的横幅,由纸匠和中学生组成的突击队开路,按照计划好的路线,向北涌入史家巷,在大召前朝东一拐,又开进财神庙巷。后面的人还没走出大召前,前边的突击队已将地亩清丈局打了个稀巴烂,把卷宗册簿践踏焚毁,地亩局长慌忙逃生。接着,又捣毁了归绥县政府,砸碎了政务厅、财政厅与教育厅的牌子,然后一起涌向新城。

新城四门紧闭,城楼上架起了机枪。示威请愿队伍连呼口号,五六千人发出的巨大怒吼声,使都统署的官员心惊肉跳。都统商震坐卧不安,不得已只好请群众代表进城谈判,终于答应了群众的要求:撤销了清丈局,免去了归绥县长冯延铸的职,禁止种植大烟,至于撤换冯曦一事,商震答应请示阎督军后再办。斗争取得了胜利。当外边等待的群众见代表们获胜回来,发出了一片欢呼,并唱起“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的流行歌曲。散会后,李致方、杨植霖等同志为五千农民协会会员准备好了旅馆和食堂,使他们享受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斗争胜利后欢愉的会餐。

1930年,李致方担任了绥远实业工厂的经理,这个工厂是由阎锡山出资开办的。几年后,因反蒋工厂被关闭,同时,李致方也被开除出国民党组织。

1931年,王若飞同志在绥远被捕。其舅父黄齐生先生来绥远营救外甥时在火车上结识了李致方,于是李致方便把黄老先生接到自己家中居住,并在经济上给予了大力帮助。当时李致方与绥远模范监狱任过十年监狱长的韩子敬是同事,平时有一些交往,借助这层关系,在生活上及其他方面为王若飞同志提供了很多帮助。同时,李致方与其他同志积极组织了营救工作。终因王若飞同志是“共产党要犯”,故营救未能成功。后来,王若飞同志的母亲和弟弟来绥远探监时,李致方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把他们安排在自己家中和名言小学居住。在这期间,王若飞同志家人的来信和捎来的东西,大都是通过李致方转交的。

1932年2月,李致方因营救王若飞同志而遭到了反动政府的通缉。于是由黄齐生老先生介绍,到上海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同年又结识了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并参加了由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在这里,李致方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等理论,特别欣赏“社会即学校”等主张,对小学生当小先生这一方法极感兴趣,同时坚定了教育救国的信心。

1933年,李致方返回绥远。他仿照陶行知先生办乡村教育的方法,在市内创办了名言学校。开始校址设在归绥城内巧尔齐召。校董事除了李致方外,还有柴生华、温培英。1934年春,名言学校由城内迁到农村,总校设在东郊白塔附近的滕家营,取名为“归绥私立名言中心小学普及教育区”。同时,在保合少、塔利、奎素、讨思浩、黑土洼、黑沙兔等村设有分校。

当时,李致方为了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目的,聘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来校任教,他们中间有刘洪雄、杨植霖、王建功、胡泽润、王英杰等共产党员。李致方告诫他们说:“要多加小心,只要不闯下乱子,我是同情的、支持的。”寥寥数语,表达了一个爱国民主人士的赤诚之心。在李致方的保护下,他们利用教师职业做掩护,在归绥城郊开展革命活动,在广大师生中播撒革命火种。在他们的教育、启发下,名言学校的学生杨培林、余平、张旭、彭光华等一大

批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正象杨植霖同志在给保合少名言学校校庆五十周年贺信中写的那样：“名言学校是我们党活动的基地，由这个基地开展革命活动，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培养了革命人才……。”

名言学校是私立学校，政府不予承认，更不给下拨经费，所需费用全靠李致方奔走筹措。当时的办学经费除了李致方担任阎锡山在绥远开办的实业工厂经理，每月所挣的200余元工资外，还要靠李致方的亲朋好友赞助。李致方极善言词，才智过人，人称小诸葛。由于他平易近人，善交朋友，从不嫌贫爱富，所以在他的朋友中间，既有有钱有权的富贵之人，又有身无分文的贫民百姓。平时，一遇红白喜事，他都要去搭礼，在酒席宴上向人家宣传办学的意义，动员人们集资办学。故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长眉毛大讨吃的”（因他眉毛较长）。

名言学校的办学方向是采用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生活教育”的形式，并结合当时的形势注入了抗日救国的内容。比如，当时保合少名言学校的校门上写着六个醒目的大字“读书不忘救国”，校门两边的墙上，一边写着“收复失地”，一边写着“誓雪国耻”。学校的东围墙上刷着“打开中国教育的新出路”，西围墙上刷着“劳力与劳心相结合”，“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等大字标语，一看便知是一所新型的、进步的学校。

名言学校虽是私立学校，但对贫苦农民的子弟不收学费。学校提倡田间学习，农忙劳动。设置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美术等。高年级还加一门社会课，内容是讲近代世界英雄人物，如洪秀全、林肯、甘地、华盛顿等。除此之外，还上农民课，讲的是三民主义。

李致方经常在外奔走经费，但一回学校总要给学生讲课。他的课讲得风趣幽默，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1935年，李致方由于在自己所创办的名言学校聘请了一批共产党员任教，再加上对王若飞同志的照顾与帮助，引起了反动政府

的不满,受到了军统特务的监视,又遭到通缉。就连对他比较信任的傅作义也感到他是个危险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在绥远实在呆不下去了。一天,他跑到傅作义官邸,对傅作义说:“外人看见我好象是一颗炸弹,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就请主席把我送到日本上学吧,如果我不是炸弹,经过培养还可以在绥远做事,假如真的是颗炸弹,我自己愿意到海外或海中毁灭,那样可能随我毁灭的是鱼、虾,否则怕殃及好人。”这段谈话虽是笑话,但很可能打动了傅作义先生的心,于是傅作义先生同意送他出国留学。

出国之前,李致方把名言学校托付给刘洪雄同志负责。因为李致方在创建名言学校之前就与刘洪雄相识,而且交往甚厚。“九一八事变”后,刘洪雄奔赴东北抗日前线,担任了抗日义勇军某师的通讯大队长,后又出任支队长。在一次战斗中,他为了掩护战友,腿部负了重伤,组织上决定让他回北京治疗。此时,李致方正好去了北京。他听人说北京城里有不少从东北下来的伤员,于是就打听受伤的人中间有没有绥远人。后来在协和医院门前发现了躺在那里的刘洪雄同志。李致方就问刘洪雄为什么不看病,刘洪雄回答说钱不够。李致方于是赶紧返回店里,向同乡人李玉山借了钱,把刘洪雄转到了北京德国人办的医院里。后来,刘洪雄医好伤回到了绥远,受李致方之聘担任了名言学校的教师。所以,李致方决定把学校交给刘洪雄管理比较放心。

李致方出国那天,老师和同学们心情十分沉重。火车晚间到站,当时月色朦胧,夜暮笼罩着大地,同学们打着灯笼一直把李致方送到白塔车站。大家恋恋不舍地分手了。李致方到日本后,经常给同学们来信,勉励大家勤奋学习,学好本领,将来为国效力。

1935年到1937年,李致方在日本东亚学校和庆应大学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李致方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返回祖国,投身到了抗日洪流之中。他先从日本乘日轮抵青岛,后在途经太原时,探望了王若飞同志。王若飞同志为了感谢李致方过去对他的热情帮助,在太原家中专门设宴招待了他,并介绍他参加了牺

盟会。接着，他同王景任、李佩芝等人搞了一段儿牺盟会工作。当时，王若飞同志主张让他去延安，并说等一段时间与他一同去，因为当时阎锡山不让王若飞同志自由行动。就在这时，绥远的王建功、刘洪雄写信让他回绥远，共同策动抗日。李致方也觉得绥远熟人较多，便于开展工作，于是征得王若飞同志同意后，返回绥远。

从太原回来后，李致方与当时在绥远的杨植霖、刘洪雄等共产党人策动抗日工作，组织了绥远抗日自卫军。李致方担任了自卫军军需处处长。当时，自卫军只有二十余人，一无枪支，二无弹药。李致方先动员一个地主拿出三支枪。这时，国民党的败兵不断从前线退下来，有些败兵乘机抢老百姓的东西。自卫军发现后就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共缴获枪支十多条。

一天，白塔车站附近的黑土洼村又有一批败兵抢老百姓的东西。自卫军发现后全体出动，到村里缴获了几支长枪和一支独角牛盒子枪。大家正围着看这支盒子枪，不小心让那个被缴枪的败兵溜了。不一会儿，王子修的队伍包围了黑土洼村。杨植霖见势不妙，喊了声跑，大家便四散飞逃。杨植霖钻进了高粱地，刘洪雄跑到打苜蓿麦场面。老乡们正在打苜蓿麦，因都认识他，便把他藏到了苜蓿麦垛底下。败兵们抓住李致方，要枪毙他。李致方着急了，大骂他们。跟前站着的那个排长，指着李致方向被下枪的士兵：“是不是他下你的枪来？”士兵回答说：“不是，是一个穿黄衣服，戴学生帽的（指杨植霖）。”由于李致方以前在该村和附近乡村试办过陶行知新教育小先生制好几年，群众对李致方很有好感，大家纷纷上前求请保释，因而未被杀害。最后他们把李致方毒打了一顿，放了。

1937年10月间，绥远各县交通线全部陷入敌手，李致方与刘洪雄、杨植霖商量后，决定让刘洪雄留绥负责领导绥远地区的工作，李致方和杨植霖等人到河曲学习中共的游击战经验。

11月左右，李致方与杨植霖等人先后到达了河曲。杨植霖等人先行到了五寨，向贺龙将军汇报了绥远自卫军撤退的情况，后奉派先到了清水河县，然后转道回大青山工作。李致方随绥远自卫军

总部退到河曲，然后到五寨拜见了贺龙将军。

李致方到五寨后专门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当时，贺龙将军指派李致方和中共的曾三等人组建了军民联合抗战委员会。曾三同志任主任委员兼该会的民众动员部部长，李致方任民众动员部的副部长。他们活动于偏关、河曲、五寨、保德、神木一带，专门搞统一战线工作，并为贺龙将军的部队筹集经费、粮食、皮衣等。由于劳累过度，在1937年底，李致方开始患吐血症。

1938年春，曾三同志调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劝李致方到延安疗养，王若飞同志也来信让他去延安。于是李致方决定跟曾三同志一道西走延安。他们从河曲起身，由神木到榆林。到榆林之后，李致方病得实在不能走了，于是由曾三同志把他介绍到中共中央驻榆林办事处治疗养病，故未能到达延安。

不久，他又在第六陆军戈武成处任秘书、参谋长等职。

1944年至1945年，他在和林县任县长，后因共产党嫌疑等原因，被傅作义撤职查办。

1946年，由于存灏出面向傅作义推荐，又让李致方担任了绥远省第一监狱典狱长，任职三年。

绥远解放前夕，李致方受董其武之托，曾两次到丰镇与我党同志联系，奔走绥远和平解事宜。

1949年9月19日绥远解放后，李致方历任绥远省人民政府监狱长、萨县专署文教科科长、内蒙扫盲委员会副主任、内蒙参事室参事等职。他是绥远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他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和务实精神，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

十年动乱中，特别是在追查所谓王若飞、杨植霖等同志的“叛徒”问题时，李致方同志由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被强加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精神受到折磨，促使他的病情恶化，于1968年8月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享年62岁。

为纪念李致方同志对党对人民做出的有益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内蒙古人民政府参事室于1986年6月25日，在呼和浩特大青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李致方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 解剖学专家刘其端的事迹

刘春甫



刘其端系内蒙古医学院德高望重的一级教授、国内著名的解剖学家。

## 一、俭朴生活,刻苦读书

刘其端,字式谭,1906年4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南官县东九宫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家五口人,有一姐姐,一弟弟。由于家境贫穷,年稍长,只读了两年私塾。父母认为能看明白几个字就行了,于是就让他帮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刘其端人虽小,但很有志气,辍学后一直没有忘记自学。他15岁那年,他的表兄说要到县城中学考试,非要邀请他去做陪伴不可。他俩到了县城,刘其端看人家考试,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就改变陪考的主意,找主考大人说明情况,要求参加考试。主考官给了他一次机会,与别的同学一齐走进了考场。然而,他竟考中了,并且成绩很突出。他父母很高兴,认为刘其端是一个有培养前途的孩子,于是下决心,克服困难让他进入学校。

刘其端考进中学不久,其父为挣钱供他念书用,劳累过度,患急病离开了人世。刘其端悲痛万分,自己责备自己,父亲是为他学习而病死的,他担心再把母亲累坏,一度有不想学习的念头,经他母亲劝说,他再次振作精神,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努力学习。在生活上,他十分艰苦,住校期间,从来不买菜吃,家里带的咸菜维持一周的生活。每当星期日,他急急忙忙地往回跑,一进家门就帮母

亲干农活儿。其母见他瘦小无力,又不忍心让他干,可他又怕把母亲累坏,能帮多少帮多少,就这样一直到中学毕业,毕业成绩各学科均名列前茅。

中学毕业后考大学,刘其端报了两个学校,即北京大学的医学院和法学院。这二个学院都找他,想把他招走,可是专业只能选一个,究竟上哪一个呢?刘其端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选了医学院,跨进了医学行列。在医学院又是几年的艰苦奋斗,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

## 二、任教高等学府

1931年,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年代,自己从事的专业是高尚的、神圣的人体解剖学。在北大医学院这所高等学府里,他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研究的方向是人体的骨骼、血管、神经、肌肉……。那时,人们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学校的高才生从事解剖专业,似乎有点大才小用,人们不免有些为他可惜。而刘其端却不这样看待,他干这一行有一股钻劲,一头扎在解剖实验室,搬动着那些可怕的尸体。“刘其端热衷于人体解剖学”,这已成为当时北大医学院许多高资老师的公论。

刘其端任教不久,他为了讲好、讲活一节课,使学生掌握人体组织结构,常常放弃寒暑假期的休息,在解剖实验室从事人体学的研究。所以,他能对人体的结构了如指掌。有一次,某老师被学生的问题难住了,好久没有得到回答。这位学生就去请教刘其端,结果这位学生满意而归。事后,许多学生中传诵着刘其端知识丰富的佳话,并向学院提出更换讲解剖课老师的申明。学院批准刘其端承担全院解剖教学任务。这对刘其端是一种压力,可是他有强大的韧劲,勇敢地承担起重任。为了不辜负学生们对他的重望与信任,以及院领导对他任教能力的承认,他除上课外,其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了解剖实验室。学生什么时候找他咨询,他总是热情、耐心地给以解答,并以实例说明。他为了让学生记住解剖结构等,除采用标本实体教学外,还亲自学绘图,以图像教学传授知识。他本来不



是绘画家,但为了达到教学的目的,让学生多学点知识,他省吃俭用,将节约的钱买了许多人体画方面的图书,学习绘图。一遍又一遍,一张又一张,终于成功地画出了许多实用教学解剖图谱。当时,教研室主任很器重他的才华,看了他的解剖图,打内心感到佩服。教研室主任为了使他的大名永远留于后人,让他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图谱上,供全学院使用。然而,他却婉言谢绝了,把解剖图谱全部无私地奉献给学院,他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精神,受到学院领导与教师的赞颂,多次得到表扬。

1931年至1937年,他先后在北平大学医学院、南通大学医学院任解剖学、组织学助教、讲师。1938年,刘其端由于在解剖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北平协和医学院给他晋升为解剖学研究员。他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暗暗地下决心,在解剖事业上为中国争光。

### 三、东渡日本留学

1940年,他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发现,中国的解剖学在国际上还有一定差距,并得知日本有位解剖学家叫西成甫,是世界上颇有名气的解剖学教授。为了在解剖学方面进行知识交流,他又刻苦学习日语,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录取为留学生,于同年东渡日本留学。他到日本留学抱有很大的理想。“有志者事竟成”。刘其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导师正是西成甫教授。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刻苦钻研,不久就写了一篇论文,题目为:《关于鼻额缝》。这篇论文受到导师的高度赞扬,主动推荐到《日本解剖杂志》,经编委会研究决定,在该刊发表。论文发表之后,影响颇大,日本解剖学界不少名人纷纷与他交朋友,共同切磋解剖学问。

刘其端的导师西成甫,一天找他到家里做客,热情招待他。之后,西成甫很坦诚地给他说,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领导很器重他,想让他留在大学任教,从事解剖学研究,并培养他攻读博士学位。刘其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一心想的是中国,留学的目的在于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人才,为中国争光。于是,他谢绝

了学院的安排,不久,毅然起身回到中国这块养育他的土地。

1943年,刘其端晋升为副教授。1947年,刘其端又晋升为解剖学教授,并任北大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主任,时年仅41岁。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北京大学医学院增加了许多专业,招生数量大增,教学任务繁重。然而,该院从事解剖学专业的师资十分贫乏。刘其端为了培养更多的解剖学专业人才,他一边指导年轻的老师教解剖学,一边把自己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主动地承担起2—3个不同班级的解剖课。他每周的授课时数竟高达30小时左右。由于工作任务重,长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日积月累,他患了心脏病、心绞痛。疾病的折磨使他身体虚弱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倒下来,一边服药治疗,一边照常坚持工作。

1950年,中国教育界普遍使用苏联的教科书,他不懂俄文,担心影响教学质量,就从头开始学习俄文。终于掌握了这门外语,并于同年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1951年,加入了中国解剖学会。

#### 四、支援边疆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医学院,不少院校邀请他去任教,他却瞄准了内蒙古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医学院。1956年,他带领妻子儿女和他的学生李益纯(现内蒙古医学院教授)等来到呼和浩特内蒙古医学院。刚刚动工建筑的内蒙古医学院,解剖教研室一穷二白,找不到一根可供教学用的骨骼标本。然而人体解剖学课程又是医学院必学的基础学科,怎么办呢?刘其端心急如焚,急匆匆找到院领导说:“让我带着同志们到荒郊野外的坟地挖些没有主的尸体骨骼来吧。”院长看到他已年过半百,心里很不是滋味地说:“您这般年纪能行吗?”“行!”这就是他的回答。这么有权威的大名鼎鼎的教授去挖死人骨头,干没有人愿意干的活儿,人们感到十分惊讶,同时,人们也为他那种忘我的精神感动了。一批从内地分配到医学院的学生纷纷响应,坐着马车,带着干粮,跟着老教授来到南郊荒无人烟的坟地挖死人的骨骼。老教

授和几位年轻教师,如李益纯、李定一、王之烈、马成忠等(这四位现皆为医学院解剖教授)一起干,把挖到的骨骼拉回去制成标本。为第一堂解剖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李益纯回忆说:从3月一直挖到9月,共挖出几百套骨骼,当时在国内所有医学院都比不上内蒙古医学院的标本多。”

1957年,刘其端认为解剖学会工作对促进横向联系、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扩大学术交流、培养人才等方面,特别是活跃内蒙古的学术气氛极其重要。于是,他积极筹备成立内蒙古解剖学会分会,他当选为第一任理事长,成为第二届全国解剖学会委员。

同年,他被聘为中国解剖学会名词委员会委员。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较完整的《人体解剖学名词》一书的编写和审定工作。该书对推动我国医学教学事业的发展 and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其端担任内蒙古解剖学会理事长20多年,以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领导学会工作,指导会员开展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有许多会员找上门请求他修改论文,他都一字一句地给改。有时甚至是他给定框架、题目等,让会员写,然后再改。有一年,全国解剖学会一次收录了内蒙古14篇论文,全部刊登在论文汇编上,受到了国内同行专家的好评。

1959年,他领导教研组在教学研究及民族团结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内蒙古医学院将他的教研室评为先进单位,并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教先进单位称号,他列席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同年,他被推选为内蒙古政协第二届委员。

1960年元月20日,刘其端被评为医学院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在他的档案里清清楚楚地记述了他的许多先进事迹。其中有这样几点:带病坚持工作,常常到深夜,走在年轻人前面”,“搞技术革新,发动群众搞科研,完成6件新技术”,“提出合理化建议52项”,“教学效果显著”,全科室完成科研论文162篇。同年,他去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学习马列主义一年,使他的学术观点更加明确。

1962年元月2日,内蒙古医学院宣传部批准他为基础部主任。2月28日,内蒙古省委常委第353次会议决定:任刘其端同志为主任职务。

文革期间,刘其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劳动改造”。由于他办事认真,军管人员让他扫楼道厕所,他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一个阶段,医学院让他挖防空洞,他象机器人一样,一声不响地挖,中间也不休息。一回到家里,全身衣服都湿透了。女儿刘笑融赶快给他换衣服,睡一觉起来吃了饭再干。在“劳动改造”阶段,他身体累了,但心还是在人体解剖学上。他为了不让破坏那些亲手制做的宝贵标本,趁人不注意时就拿到自己家里保存。这些人体标本,大都是用酒精、福尔马林等溶液浸泡,他就拿钱让女儿给出去买药液。为保护解剖标本,他不知付出了多少代价,至今这些标本仍在医学院的教学中发挥着作用。

### 五、勇于探索,大胆革新

刘其端自从踏上医学道路,就有一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他的座右铭。1936年至1943年,仅仅几年的时间,他勇敢地探索有关解剖学、比较解剖学、组织学等观点,为教学开创新的方法。在《生物学杂志》、《北京大学医学院论文集》、《北京大学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10余篇。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中如“红血球的血红素内结晶和构造”等4篇被德国解剖杂志(*Anatomische Bericht*)转载;有5篇被日本解剖学杂志转载。

他来到内蒙古医学院后,在《中国解剖学会论文集》、《内蒙古解剖学会论文集》发表过许多论文。其中有关脑颅骨、面颅骨头型的测量检查2篇,学术观点与前人的研究有所不同。过去对头型的研究很多,国外有人提出,白色人种多长头型,有色人种多中、短头型,从而认为长头型人更优越。刘其端选择191个完整头骨,这些头骨大部分取自呼和浩特郊区,小部分取自北京附近,其中有部分

取自蒙古族。他将这些中国人的头骨,用双脚规进行测量眉间至枕外隆凸间的距离,作为颅型的长径,测量左右外耳门之间以上的最大距离,作为颅型的横径。经过详尽的测量,以客观数据说明不同颅型的构成,反映出形态发生有一定的规律性变化,探索出形态学成因的内在科学依据,从而批驳了反动的人种优越谬论。

刘其端在解剖学的教学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工作了 50 多个春秋,一直刻苦勤奋地为培养人才而默默地奉献着心血。他从事解剖教学工作的早年,接受的是德、日派知识;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时,又接受的是英、美式解剖学知识;解放初期,国内兴办苏联式解剖教学法,他又下了一番功夫。几经周折,他对各国各派的解剖学教学法都有所了解,反复比较几国解剖学有关内容,取长补短,从中悟出一套教学规律,即辩证唯物论指导下的教学方法。他认为人体骨骼的形成,与其运动有关,所以,对人体任何一个解剖部位、结构等,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着,只有事物的运动与变化,才有人体结构的变化,骨骼、肌肉等也随之改变。

1953 年,刘其端辩证唯物论的教学方法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青睐,消息传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于是,卫生部就要委托刘其端举办一个全国高级师资班(解剖学),来自全国各地 20 余名从事解剖教学工作的骨干,聆听他的教诲。凭多年的教学经验,他也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旧的解剖学多限于静止、孤立地描述形态,学生遇到死记硬背的困难。刘其端大胆地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教学法,提出了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教学法,明确指出“形态靠功能支配,功能活动依赖形态结构”的观点,在课堂上对系统器官尽力阐明形态结构与机能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观点受到全国师资班学员的高度重视。教学效果非常明显。

1959 年,他为了验证这种教学方法的效果,给医疗系 59 级的学生讲课后,当堂进行测验,结果吸收率高达 70% 以上,他更加增强了信心。他先后编写出了《人体系统解剖实习讲义》等多种讲义,

供北京医学院与内蒙医学院使用。

1962年,他在全国解剖学术会议座谈会上谈了自己的教学经验,他说:“苏联教育部对人体解剖学的教学法主张上大课,我们应该大胆改革,我的经验是以小班形式上课好,理论内容讲解多时,可以上大课。理论与实践实习的课程比例应为1:4,或5:2不等。小班上课讲形态时,学生数最多不超过20人,教师将理论与形态实物相结合讲解,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刘其端这种主张得到与会专家们的赞同,一致建议在全国进行推广使用。

这次会议,非同一般。首先是刘其端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得到公认,同时,也是对苏联解剖教学方式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会后,他的一位非常友好的老朋友很坦诚地对他说:“你的胆子可真大啊!这种观点是十分明显地针对苏联专家提出的,是对苏联专家观点的全盘否定……”。刘其端笑着回答说:“理不辩不明,学术不争鸣则不清……”刘其端在学术问题上,不受专家、权威所束缚。只要看准了,只要有利于发展我国解剖教学事业,他就大胆地革新,走自己独创的道路。

60年代中期,他扩大了形态机能相结合的教学法,正在全国推广阶段,“文革”开始了。他不得不停止工作。在家里一心搞这一套教学教材,经十几年的功夫,围绕“形态结合机能”和“构造结合机能”为理论基础编写出一套《人体系统解剖学》(约21万字)与《组织学》(约10几万字)的讲义,阐述了如何将对立统一的普遍规律应用到解剖学,并具体举出各章节的例证。

1980年,他又将对立统一指导解剖教学的观点撰写成文,以“形态结合机能自然唯物辩证对立的统一性在自然科学上的应用问题”命题,在中国解剖学会内蒙古分会上宣读。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

## 六、思想进步,品德高尚

刘其端不仅有很深的学术造诣,而且还有很高的思想政治觉悟。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早在抗日战争

时期,神经解剖教授张玉权(进步人士)曾发现刘其端思想进步,就把河北区党组织派来买药的同志介绍给他,他主动承担,亲自买药。就这样,他和地下党组织的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一天,天津伪保安局的局长被地下党组织的代表暗杀了,日本人到处追查凶手。这个人当时危难之极就躲在刘其端的家里,刘其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暗暗地保护了这位同志。这件事他一直保密到文革期间。当他受到审查时,那位地下党组织的代表——张锐戈同志(原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厂长)要为他证明是共产党的掩护者,刘其端怕日后又连累张锐戈同志,再三不让他证明。后来,张锐戈因公故去。张的亲密战友刘友三(原东方红石油化工总厂书记)把刘其端过去为党做过的工作给予证明,交内蒙古医学院组织部,证实刘其端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刘其端为人正直,坦率,作风正派,生活简朴,热心助人。谁有困难他总是热情帮助,慷慨解囊。一次,炊事员有难,急需人民币,他主动拿出30元给他。1968年,刘其端家乡搞农田水利建设,急需筹集部分资金,他听说后,马上汇款500元,支持家乡建设。12月29日南社公社东九宫大队革命三结合领导班子与大队贫下中农文革会联合寄来感谢信。不久,刘其端出生地东九宫村,因打井缺少资金,请他捐助,他接到信后又给这个村寄了400元。

刘其端不爱钱财,不占公家的便宜。有一次,他的女儿笑融,把单位发给刘其端的毛巾、肥皂拿回了家中,他大发雷霆,让她马上送回。又一次,医学院大礼堂公演电影,散场后,笑融最后一个走出,她看见一个小方凳放在那里没有人送回科室,她顺手拿到家里,本想第二天早上送到医学院。可是,刘其端哪里允许公家的财产在自己家里过夜,命令女儿立即送回。

刘其端以他高尚的道德品质、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影响着医学院的全体师生,为广大师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 七、热爱青城·献身学院

1980年,他夜以继日地忙于工作,筹备学术年会,并准备参加

第二届全国科学大会。由于过度疲劳和紧张造成脑血管意外，不得不入院治疗。他身在医院，心却还在解剖事业上，还在惦记着为国家培养高级解剖人才。他总是对人们说：“等我病好了，要带 10 名研究生。”

刘其端晚年身患重病，住北京某医院疗养。在疗养期间，他多次表达了希望早日康复，继续到呼和浩特从事解剖研究工作的迫切心愿。

刘其端在内蒙古医学院工作了 30 余年，他和内蒙古各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爱呼和浩特。医学院的老师去看望他，他含泪诉说：“想念内蒙，死后要把骨骼做成标本放在内蒙古医学院解剖室”。以此作为他对解剖学专业和内蒙古医学教育的最后贡献。1990 年 2 月初，他把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他的学生彭瑞聪叫到身边，安排后事，嘱他一定照他的意愿办，不要违背老师最后的一点要求。2 月 16 日，刘其端不幸病逝于北京，享年 84 岁。彭瑞聪书记、夏家骝教授（北京医学院解剖专家）等人组成刘其端教授骨骼标本制作领导协作小组，于 1990 年 2 月 22 日与刘其端之妻田淑曾、子刘笑觉、女刘笑融商议。其妻及子女，一致尊重刘其端本人生前的意愿，他们同意将其遗体制成完整骨骼标本，长期存放于内蒙古医学院解剖教研组，以实现本人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为解剖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愿望。最后，刘其端的家属一一签字。

经过技术组的专家们精心制作，刘其端教授的骨骼标本制成，并以飞机送回呼和浩特。

1990 年 9 月 15 日下午三点，在内蒙古医学院大礼堂举行刘其端教授追悼会暨骨骼标本揭幕仪式。大礼堂的两侧挂着十分醒目的挽联，长长的挽联上写着：“破陋俗先导师留遗骨在边疆作表率以教后人，树新风众师生敬仰慕昭君志展宏图极为九泉”。追悼会由副院长安志庆主持。院党委书记斯勤致悼词。参加大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常委高教工委书记陈奎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震乙、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李树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



员会副主任石宝山及医学院全校师生约 1500 多人。

送花圈的单位有：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区党委办公厅、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区政协办公厅、区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区高教工委、教育厅、卫生厅、科协等。另外，北京、上海、西安、济南等 10 余个医学院校以单位和个人名义送了花圈与挽联并发来唁电。参加追悼会的全体同志排队瞻仰了刘其端教授的骨骼标本。

刘其端是国内著名解剖学家，他的逝世，使医学教育界失去了一位学识渊博的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他的逝世是内蒙医学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刘其端教授生在河北，北京医科大学是他的母校，他却把遗体献给了内蒙古医学院解剖教研室。这充分表现了他作为老科学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完全彻底为边疆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境界。他的心与内蒙古的医学教育事业永远连在一起。

# 为人师表 风范长存

——记我区语文教育专家杨秉祺先生

王克勇



杨秉祺，又名杨冰圻。1924年1月6日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南方平村。河津县素有“文风县”之称，特别在清末到民初这段时期，河津的新型知识分子辈出，留学回国的学士、硕士、博士众多，他们在本省和外地从事教育，成为知名学者、专家、教授，著称于时。同时到省城太原和京津一带求学的知识分子，毕业后也大都从事文化

教育工作，形成了人文蔚起的局面。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杨家，也可以称得上是“书香门第”。曾祖父、祖父都是读书人。父亲杨肇卿曾做过阎锡山的家庭教师。抗战期间杨肇卿回乡创办了一所“养性学舍”（相当于中等学校），招收因抗战而辍学的高小和中学生。教学以抗日救亡为主，同时开设数理文史等科。杨肇卿先生平易近人，在教课之余经常到街头巷尾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深受群众的拥赞。

杨秉祺幼时一直随父在太原生活。父亲注重对子女的教育，把他送进很有声誉的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学习。他1936年小学毕业，考入太原私立友仁中学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因战争紧迫，父亲带家小回到原籍河津县。友仁中学这时也迁到了山西洪洞县，杨

秉祺此时升至初二,又读了一个多月的书。到了10月底,太原失守,友仁中学解散,他的学业难以为继,不得不回家务农。这时他13岁。

少年辍学,对于求知欲望正炽的杨秉祺无疑是件异常痛苦的事。他渴望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1939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的机会——跟随乔鹤仙先生入私塾。乔鹤仙,字笙渔,河津县人,是当时山西最负盛名的学者,被称之为“国学能手”、“文史专家”。杨秉祺源于对古文的兴趣,跟随乔鹤仙专学古籍、古文。乔鹤仙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杨秉祺在古代汉语、古典文学方面深厚的功底,在日后古汉语教学中的旁征博引、倒背如流,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斯人。

1940年12月30日,日军突然包围了上阳村,捣毁了“养晦学舍”,杨秉祺两年来的私塾学习也宣告结束。后经多方努力,终于在1941年冬天进入了官费的山西第二联合中学,插班到初中三年级学习。42年6月末他通过了考试,初中毕业了。

1942年秋,杨秉祺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山西进山中学高中。在这三年难得的稳定的学习期间,他埋头在书海里,废寝忘食,潜心攻读,学业获得长足的进展,特别是文史成绩出类拔萃,名列前茅。1945年度山西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他夺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从此,奠定了杨秉祺当一名优秀教师的美好理想和扎实的知识基础。

## 二

1945年7月杨秉祺高中毕业。同年8月考入山西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因志不在此,于翌年转入文学院教育系。为了及早适应教师这一职业,他厉兵秣马,于是年秋应聘到母校进山中学任初中历史兼课教员。当时进山中学有这样一项较为特殊的奖励措施,就是进山中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在考入山西的一些大学后,可以在读书期间返聘到母校兼课。一则是给学生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二则也使学生得到相应的报酬,这些报酬基本上够一个学生上学之用,具

有勤工俭学的性质。机会难得，因此杨秉祺倍加珍视，教学认真投入。他在进山中学兼课长达两年，完整地讲授了中国历史课。最初的教育实践，使他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与荣耀。1946年春，他参加了山西省举办的高等文官检定考试，报的是教育行政专业，获得了46年度山西全省高等文官检定考试的第二名。48年12月，他又在北京参加了全国高等文官考试，考试结果据说是全国第三名。

1949年1月，大学毕业的杨秉祺带着多年的梦想和夙愿，于同年2月只身来到了塞北绥远，开始了教书生涯。这一年他25岁。

### 三

杨秉祺是个言行一致的人。1949年1月大学一毕业，他就于2月踏上到绥远的路途。他来绥远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绥远地僻人稀，艰苦闭塞，人才奇缺，这正是施展才华，实现理想的用武之地；二是当时的绥远省主席董其武是自己的同乡，想通过他尽快地找个当教员的职位。他找到了省主席董其武，又托同学找了当时的教育厅长苏颐，结果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在绥远临时中学教书的同学李仰曾帮助他在本校谋到了一个教职。这是49年3月的事，也是杨秉祺四十余年教学生涯的起跑线。

在临时中学，杨秉祺的课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短短的几个月就在各个学校中小有名气。49年5月末，临时中学迁离归绥后，他同时接到了三个中学的聘书，都希望他能在9月份开学时应聘到校教书。他顺利地进入了归绥师范学校。

杨秉祺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对自己取得的成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这给他从事教育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增强了他终生从教的信心。

### 四

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扬眉吐气地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来到了。杨秉祺内心无比激动，充满了激情和干劲，

他要把全部精力和毕生所学倾注到祖国的教育事业。

解放初,杨秉祺在归绥师范教书,同时在新绥中学兼课。50年暑期,绥远恒清中学成立了高中。8月,他由归绥师范调入恒清中学。53年3月,组织上又将他调到绥远中学。

这一段时间,他一直教语文课,教学一丝不苟,很努力,也很有成绩。53年,全市组织过一次公开教学。绥中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由杨秉祺代表学校参加公开教学。杨秉祺讲课出色,获得一致好评,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之后,学校更加注重对他的培养,曾计划让他去旅大市学习外地的先进教学经验。1956年他被呼和浩特市一中(即原绥远中学)评为校先进工作者,又曾两次给他大幅度加薪。

1958年9月杨秉祺离开一中,调到呼市师范专科学校,开始从事高校教学工作。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接二连三,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常被打乱,杨秉祺本人也受到了一些冲击。当时强调“又红又专”、“政治挂帅”比较突出,政治学习活动频繁,生产劳动也不少,上课学习的时间却不多。看到这种情况,杨秉祺非常焦急,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讲,你们毕业后都要当教师,一定要多学些文化知识,“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得有一桶水,而且必须是活水”。杨秉祺还多次对学生进行类似今天的“强化训练”,规定定量的作文、作业,限定在课堂上完成。

这一时期杨秉祺的工作是忘我的,整个身心全部扑在教学上。1959年夏,呼市连降大雨,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西河沿一带一片汪洋。杨秉祺家住西河桥边,房子被洪水冲塌,但他却没有因此耽误一节课。后来,还是一些男学生得知这一消息,主动帮他搬家。但为时已晚,有许多宝贵书籍、资料毁于洪水。

1961年,学校征求各科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当时学校只有中文、数学、生物三个科,杨秉祺被评为中文科教学反映最好的老师,受到了学校的表扬。

1962年11月,杨秉祺又来到了呼市教师进修学校。工作一如

既往,声誉不断提高。该年呼市教育局在进修学校、师范学校和各中学,首次评出三名二级教师(以往最高为三级),杨秉祺名列其一。

## 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降临了。尽管杨秉祺谨言慎行,努力工作,终究没能逃过这场浩劫。他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黑帮”等帽子。审查、隔离、批斗,1967年被关进“牛棚”,整个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一个站了近二十年讲台的老教师,如今被剥夺了登台讲课的权力,再也无法面对自己的学生。这使他心碎,同时也感到莫大的委屈。扪心自问,无罪无愧,自己二十年来一心一意教书,老老实实做人,何罪之有?在教学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又何以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百思不得其解。

68年3月,呼市进修学校下马,他被分配到呼市十九中。在十九中杨秉祺被整得最狠。但杨秉祺始终坚信自己是清白的,黑白不会永远颠倒,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他就是凭借这样的信念,顽强地挺了过来。

1972年5月,杨秉祺又由十九中调回呼市师范学校。这段时间,教学还未正式恢复,政治空气沉闷压抑,象他这样“有问题”的教师抬不起头来,因而难有作为。

## 六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结束。78年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春回大地,百业兴旺,改革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来到了。

这时已年过半百的杨秉祺,以其充沛的热情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社会事务也越来越多,工作日趋繁忙。党和人民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和成绩。

1978年3月,杨秉祺在呼市师范大专班任教。

1978年9月,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特级教师,获此称号的全区仅有10人。

1979年,被聘为呼市政协委员,并当选为常委。

1983年,他来到了呼和浩特教育学院。

1984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5年,获呼和浩特教育学院科研二等奖。

1986年,获呼和浩特教育学院教学优秀奖。

1987年,当选为民进中央委员,民进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副主任委员,不久就任民进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两级主任委员。

1988年,又一次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同年,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审议批准,晋升为教授。这年还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9年,当选为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市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至此,杨秉祺离开了教学岗位,专门从事人大工作。

## 七

杨秉祺从教四十年(中学9年、中师9年、高师22年),成绩卓著,在我区享有广泛的声誉,他的名字已被收入全区、全国的《名人录》中。

纵观杨秉祺的一生,我们从他身上能够发现一个优秀教师所应具备的许多良好的素质。

### 1、勤奋好学,知识渊博。

杨秉祺博学多闻,记忆非凡。他早年苦攻古文,研读《古文观止》,每日背诵一篇,只《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一篇因太长,用了两天。不到一年,整部《古文观止》二百余篇全部成诵。

人们称杨秉祺是“活字典”。他对古文字的渊源、演变、意义了然在胸,问及任何一个字,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很少有人能难倒他。

他精通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他都了如指掌。数学系教授刘峙山回忆道:“文革”时期

我与杨秉祺一起被关进“牛棚”，成为“难友”。每天除了批斗就是劳动改造，一本《毛选》是大家唯一的精神食粮。我们学得都很认真。《毛选》中涉及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每当遇到不解的地方，大家就去请教杨秉祺，他总能给以满意的解答。这使我苦中有乐，在增长历史知识方面获益匪浅。

杨秉祺一生酷爱读书，手不释卷。每天晚上他的办公室灯光总是深夜不熄；图书馆常见他的身影，每逢周末，他还要从图书馆借一大堆书。

## 2、治学严谨，思维敏锐。

杨秉祺严谨治学，勤于思考，能见人之所未见。

1953年，他感到当时中学语文教学中语言部分份量太少，于是在1954年春的一次语文组会上，正式提出这一意见。而到了1954年下半年，这一问题在《人民教育》上提出来了，中学课本开始增大语言部分的份量。

在教学实践中，他敏锐地发现语言教学中，有必要讲些语言规律。1955年上半年，他在语文组会上正式提出了这一想法。这一年年末，学校传达了胡乔木同志关于语文课语言文学分科的报告，其中强调了要加强语言规律的教学这一问题。

杨秉祺始终本着以科研促教学的态度，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了许多科研活动，笔耕不辍，多有著述。写有《古代散文体裁论》、《论〈西游记〉非吴承恩作》、《语文学学习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平水释义辨正》、《综合课与通才教育》等论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专著《古代散文体裁浅论》和论文《论〈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古代散文体裁浅论》是一部优秀的专著，发表后得到了著名学者北师大副校长许嘉璐教授、内蒙古大学萧雷南教授、内蒙古师大梁一儒教授的高度评价。他们称该书“深入浅出，论其大要”；“例证精当，注释准确”；“该书的出版对适应教学的急需，开拓读者的眼界，都有很大意义”；“有广度，有深度，非时下一般文章可比”。在全国只有他和许嘉璐教授写过古文文体论专著，并且彼此互不因袭。《论〈西游记〉



非吴承恩作》首先提出“明代吴承恩写的《西游记》并非章回小说”这一重大学术主张,提出的时间早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3年,早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章培恒教授18年。该篇论文发表后已被《解放日报》(85年10月22日)、《报刊文摘》(第304期)等报刊转载或摘要发表。

此外,杨秉祺写出了评估并预测我国人文科学研究状态的《从一份抽样调查看人文科研中综合研究的不足》。该文是他想建立一门新学科“人文科学计量学”的尝试,着重论述了“通才与专才”的问题,得到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学者周谷城的认同和鼓励。周老亲笔复函,称“尊论先获我心,无任钦佩。通家怕人说不专,避不敢言通;专家以为愈专愈小,即有大用,其实不然。今日国际舆论,已见端倪矣。吾辈有见及此,有机会即呼吁。”

杨秉祺对世界语也颇有研究,他是内蒙古世界语协会理事。早在60年代,他就开始从事国际辅助语的研究。70年代中期,此项研究得到内蒙古科委主任于北辰的大力支持,并推荐他向当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刘仰峤汇报,得到赞赏和鼓励。杨秉祺还就此项研究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交换过意见。

### 3、精心教学,方法多样。

杨秉祺在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上有其鲜明的特点和风格。他的教学方法多样,富于创见。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他采取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每天记一句名言,每天记一句成语,每天写一篇日记,每月读一部好书等。学生每天都有新的收获。他在教学中因人施教,有的放矢。学生们的基础、素质和能力千差万别。针对这一特点,杨秉祺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因人施教。以作文教学为例:他对每一篇作文都精批细改,旁批、总评一针见血,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一目了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根据老师给作文下的评语、指点,让学生重复作文。要求改正上次作文的全部错误,要写得比上一篇更精采,更生动;第三步是在每次考试中都出修改作文错误的题,但

试题是每人一份,各不相同,题的内容就是该学生在本学期作文中所犯的错误。他讲课精炼透彻,声情并茂。杨秉祺对每一节课的内容,都做到烂熟于心。讲课时要言不烦,切中肯綮,精炼透彻。特别是讲古诗文时,神采飞扬,韵味十足,令人陶醉。他的学生们回忆说,听杨老师讲古文,简直就是艺术享受。

#### 4、平易谦和,为人师表。

凡与杨秉祺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人,都会对他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留下深刻印象。

晚年,杨秉祺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一天工作下来已是筋疲力尽。但在工作之外仍经常有些同事、学生甚至陌生人来到家中,请教问题或反映情况。杨秉祺总是热情接待,详细解答,不摆架子,不怕麻烦,有时竟交谈到深夜。

杨秉祺担任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他已60多岁。家虽住在呼市北郊的教育学院院内,但他除了开会、公事紧急外,平时外出坚持乘坐公共汽车。即使需坐小车,他也总是在校门口等车或下车。一则是免给门卫和司机添麻烦,二则是怕骚扰影响学生。因为到宿舍楼必须经过学院大门,穿行教学区。由于学院的面积较大,宿舍楼离校门口有一段较长的距离,为此市有关领导多次劝他不要在校门口上下车,把车直接开到宿舍楼前。但杨秉祺坚持在校门口上下车。

## 八

杨秉祺不但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

80年代以来,他先后担任过呼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委员、自治区民进和呼市民进主委、内蒙古世界语协会理事、呼市语文学会理事长、呼市社联常务理事、呼市红十字协会副会长等职。

作为人大代表,他不负人民重托,认真履行代表职责。经常深

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多方采集群众意见,将群众的意见反映到人代会上或批转至有关部门处理,并及时把处理结果反馈给群众。如教育学院生物系徐连弟老师有关科技问题的意见,杨秉祺就曾专门去找当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武衡反映过,并把有关答复及时告之徐连弟。他是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出色的人大代表。

晚年,杨秉祺把主要精力倾注在自治区和呼市两级人大的工作中。他坚决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决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积极投身我区、我市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满怀信心地为我区实现经济腾飞献计献策,为我区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以及有关重大决策的出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对自治区和呼市两级民进的工作紧抓不懈。民进呼和浩特市委员会,就是在他直接参与下组建的。他带领民进会员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肝胆相照,积极参政议政,使全区民进队伍沿着正确道路不断发展壮大。

1993年2月8日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群召见自治区民主党派负责人,当时兼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委、69岁高龄的杨秉祺,吃过晚饭,急忙赶赴自治区党委会议室。工作中,杨秉祺突感不适,呕吐不止,遂被急送医院。在自治区、呼市两级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医务人员奋力抢救,终因大面积脑溢血,抢救无效,杨秉祺先生那颗长期超负荷运转,似乎永不知疲倦的心脏于2月16日18时45分停止了跳动。

杨秉祺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身后却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  
杨秉祺先生的风范长存!

## 巴静山先生与职业教育

克什格

1989年元月,呼市人民政府为孟绍、吴懋功、巴静山、韩秀英四位少数民族教育工作者,举行了庆贺会,嘉奖他们在教育战线辛勤工作五十余年,为社会培养出大量的各种人才,功在国家。市政府授予他们荣誉证书,以资表彰。



—

巴静山,蒙古族,于民国元年(1912)降生在土默特部一个望族世家,世居呼和浩特旧城乃莫齐召夹道巷。其十一世祖托博克,于崇德三年,满洲皇太极赏给头等轻车都尉,世管佐领。清顺治四年

(1647年),因从征喀尔喀蒙古地方立功,赏给三等男爵,升授都统,接替同宗之杭高之子巴桑,任归化城土默特部右翼都统,殁于康熙九年(1670年)。托博克是姓巴拉格特氏之土默特部人。有三子:长瓦瓦、次古鲁、季乌布什。瓦瓦与其父托博克同时授轻车都尉,世管佐领。古鲁于康熙九年承袭其父轻车都尉兼袭三等男爵。其子拉布察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袭都统兼袭三等男爵,次年卒。都统一职为其叔乌布什承袭。拉布察有二子,长尚第授副都统,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袭三等男爵,本支承袭职爵延至第八代拉什当鲁布,无嗣。拉布察次子都格尔扎布,下延至第九代福禄时,接替承袭尚第支拉什当鲁布原袭职爵,并授任参领(人称福嘎勒达),福禄子麟阁,麟阁子巴静山是托博克之第十一代孙。巴静山曾有一弟一妹,皆少亡。

巴静山7—8岁时,在旧城小东街蒙古老爷庙(关帝庙)私塾念书<sup>①</sup>,其同学有朱实夫、高希柴、殷石麟、赵璧城等。后来转入南文庙土默特小学读书,当时校长是孟学孔。巴在土默特小学毕业后,到北平蒙藏学校上学。在校学习一年多,17岁便在家庭包办下与孟学孔之女结婚,转年18岁时其父亲病故。这样,家无主事之男,这个担子自然就落到巴静山的肩上,负起整个家庭责任,因而北平蒙藏学校的学业,只好忍痛放弃了。

## 二

巴静山20岁左右便与毕力格巴图尔来往上了。这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从他的家庭出身,是土默特旗官僚世家,他已负起家庭责任为一家之主了,完全可以象其他官僚世家子弟一样,过一种优哉游哉的少爷生活。但在毕力格巴图尔的影响下,由理解革命道理到走上革命的道路。

毕力格巴图尔,汉名赵璧城,呼和浩特东郊什兰岱村人,是巴静山奶奶的侄子,与其父亲麟阁是姑舅弟兄,论辈分巴静山叫人家伯伯(叔父)。

三十年代初,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实行独裁专政,

残酷镇压革命,杀害了许多共产党人,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但革命的真理一旦被人们所掌握,它就会发挥出无可比拟的力量,革命者不害怕杀头,前仆后继,不断在前进着。内蒙地区的共产党人,在党的北方局领导下,转入地下活动,坚持革命斗争。就是在这种客观情况下,毕力格巴图尔从苏联学习回来,参加国内的革命斗争。为了有利于开展活动,经常住在巴静山家有二年多,因为巴静山家是土默特旗上层统治者福嘎勒达的府第,所以,一般不会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安全掩护的可靠性更大些。

在此期间,毕力格巴图尔给巴静山由浅入深地讲解了很多革命道理。穷人怎么穷的?劳动人民为什么受剥削?国民党为什么压迫少数民族?只有共产党才是劳动人民的解放者,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求解放,社会才能消灭人剥削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如苏联那样,才会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美好社会。这时巴静山正在二十岁上下,少年气盛,追求真理的心强,渐渐地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毕力格巴图尔经过一年多的宣传开导,看巴静山已基本接受了这个革命道理,以后便给巴介绍认识了纪松林。纪是绥东四旗察哈尔蒙古人,也是和毕力格巴图尔一起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纪松林来归绥也住在巴静山家。后又介绍认识了白海风。其实他们是在进行革命活动呢,当时也让巴静山参加些地下活动,既是对他的考验,也是锻炼。毕力格巴图尔叫巴静山来往跑北平,当交通员往北平送信,从北平取款。巴到北平就住在西单二龙坑首善公寓,完成这些工作。在此期间,还介绍巴认识了胡凤山,胡也是察哈尔蒙古人。有一次胡凤山得了白喉病,毕力格巴图尔和白海风叫巴静山送胡凤山到北平协和医院治疗,巴静山把胡凤山护送到北平,住进协和医院,并在那里陪伴了一个半月,待胡凤山痊愈后,才一起回到归绥。

巴静山23岁时(1934年),到绥东四旗保安司令部工作。这绥东四旗即察哈尔右翼四旗:镶蓝旗、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当时是属绥远省管辖,故其部队建制、给养等均须由傅作义这里拨发。

各蒙旗都在归绥设有驻绥办事处。该绥东四旗保安司令是号称长胡子的达木丁苏伦，其参谋长是纪松林，是毕力格巴图尔指示叫巴静山来此工作的。经纪松林保举，巴静山被委任为驻绥办事处中尉副官，当时胡凤山任驻绥办事处处长。巴静山的主要工作是，每月把绥远省政府拨发的给养、军饷给送到平地泉，达木丁苏伦每月都盼等着，军饷一送到，达非常高兴，就摆席接风，他们之间相处得也很好。

转年(1935)，在毕力格巴图尔的策划下，借口长城抗战，察绥吃紧，通过纪松林，鼓动达木丁苏伦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把处在抗日前沿地带的绥东四旗保安司令部这支蒙古骑兵，编为国家正规军队，给予建制番号，拨发武器装备和经费军饷。达木丁苏伦听了很是高兴，他当然愿意把他统率的地方保安队改建为正规部队。于是起身经山西到南京请愿。随行的有纪松林和巴静山。到太原后受到阎锡山的款待，达木丁苏伦提出要参观山西的兵工厂，阎锡山只送给300支步枪，30000发子弹，3000元钱，对于参观兵工厂，未予安排。他们去山西的目的，正是要看其兵工厂的规模和武器生产能力，这是党组织布置的任务，但未能看上。

从山西到南京，住在蒙旗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是巴维松，云从龙是办事员。到南京后，达木丁苏伦要求见蒋介石，等了一个月后才受到接见，勉励的话说了一顿。在此之前，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在励志社宴请了他们，并安排他们参观了南京做迫击炮的工厂，参观了黄埔军校，最后只送给300支步枪，30000发子弹，至于建制番号一事，以由军政部研究为词，加以推辞了。返回时，由巴静山和云从龙负责把武器运回来。之后，达木丁苏伦与德王来往密切，倾向于和德王合作，纪松林虽再三开导劝说，效果不大。而且达木丁苏伦对于他们控制了其军队也有所察觉，起了戒心。在此情况下，纪松林决定离开绥东四旗保安司令部，巴静山也同时辞职回到归绥。纪松林来绥也住在巴静山家。巴静山曾问过毕力格巴图尔，“怎么你们净叫我参加活动干工作，不叫我入党呢？”毕力格巴图尔、纪松

林他们说,你不是党员干起工作来,对革命更有好处,你多会儿入党还不是我们的一句话吗!现在你干的工作和党员有什么差别!

1936年,中央派白海风来组建绥远省蒙旗保安总队,纪松林和巴静山一齐参加到里边去。这就是以名震一时的云继先、朱实夫等率领的百灵庙暴动队伍为基础,在共产党西蒙工委帮助下,为保卫绥蒙建立的民族抗日武装。因云继先已死,白海风被任为总队长,纪松林为一大队队长,朱实夫为二大队队长,纪贞甫为政训处长,云泽(乌兰夫)为副处长,巴静山被委任为少校军需。司令部设在归绥旧城兴隆巷席力图召的东、西家庙院内,一大队驻在五塔寺召内,二大队驻在巧尔齐召内,全驻在喇嘛庙。这个部队,实实在在成了共产党活动的合法掩护据点了。

1937年初,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发挥这支民族武装的威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在增配了炮兵营的基础上,把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有步兵、骑兵、炮兵的蒙旗独立旅。白海风任旅长,纪松林任一团团长,朱实夫任二团团团长,云泽任政治部主任,巴静山升任为中校军需主任。改编后的蒙旗独立旅,随即于当年秋开赴归绥南郊大黑河一带,与入侵归绥的日本军队进行了战斗,在坚持战斗两昼夜后,主动撤退到包头。后经研究决定再撤到伊克昭盟境内去,并令军需处后勤从包头南二里半渡口过黄河,当他们后勤人员和军需物资过到黄河南边时,被达拉特旗康王的保安队森盖团所掳掠,巴静山也被掳在内。他们不知康王已暗地投靠了日伪,才落得这种结果。康王他只对物资给养有兴趣,对于他们这些人员无所谓。巴静山被拘留了一个多月后获释,并被送到包头。因已和部队失去联系,不知他们现在何处,又在康王的势力管辖范围,也无法找到部队。巴静山在包头向亲友打听家中情况,说是呼市巴家已被日本人查抄过。这样,他有家也不能回去了。因为巴静山是在归绥城南大黑河与日本军队战斗过的蒙旗独立旅中校军需主任,日寇岂能放得过。所以,巴静山只好从包头直接到北平找毕力格巴图尔,再作道理。巴知道毕力格巴图尔在那里常去接头的商店,那是



开设在前门外打磨厂东口的一家商店,名叫马正宗五金店,是掩护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巴找到毕力格巴图尔后,就在北平待下来,和毕力格巴图尔一起搞活动。

### 三

巴静山从包头到北京,直至1949年解放,都没有回过呼市老家。在北京找到毕力格巴图尔,他们分别住在不同的地点,为了安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换过三四个住处。巴静山改名为韩仁、韩继业,毕力格巴图尔早已改名,其中常用的一个名字叫姚瑞庭。到1939年时,毕力格巴图尔建议巴出面办个职业补习学校,在社会上既有了合法身份和工作,又有了住处据点,还能解决点他们自己的生活来源。决定办学校,该办什么学校呢?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在日本人的干预下,要求各机关所有行文,都要用打字机打印,故社会上对打字员的需求量很大,因此他们决定先办打字学校,并定名为正风打字学校,韩继业(巴静山)为校长。打字员培训三个月即可结业,就能应征当打字员,学打字的又以女生为多,且大都是由东三省流亡来的学生,她们是既无经济来源又无依靠的穷学生,急于想学些技术以便自给自立。这符合我党抗日救亡的宗旨。办学校先得租个校舍,经过问讯,看对西单劈柴胡同内的一处小院,还有个二层的小楼,挺合适,备办了桌椅教具和打字机,到北京市教育局申请备案后,即登报招生。

当时,北京市教育局对于学校的教员,每月白给一袋白面,但必须是正式学校的教员,而他们这个打字学校,只是三个月一期,不能算作正式学校。正规学校必须有2—3年学制。招小学毕业生的为初级中等学校,招初中毕业生的为高级中等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也与此相当,除学专业技术课外,必须有文化课,即国文(语文)、数学、外语(英语、日语都行),而且教育局承认学历,在毕业证上验印。为了学校的发展,遂决定争取改为正规学校。二年后,把原来的正风打字学校改为北京市私立正风女子高级职业学校,校长韩继业。<sup>②</sup>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认为财会专业、家政专业、文书专业

比较应时,先办这三个专业,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二年。各专业的必修文化课都相同,只是专业课不同。财会专业:有普通会计、商业会计、工业会计、银行会计、官厅簿记(即行政会计)、珠算、打字。家政专业:有缝纫、烹饪、编织、刺绣、婴儿教育、营养卫生、家庭簿记(家庭会计)、打字。文书专业:有公文书式、应用文类、书法、文书处理(档案管理)、打字、刻印等课程。同时,还招收速成打字,中、英文都有,每期2—3个月;及文化补习班,即单科文化补习。学校的经费来源,依靠学费,短期速成班收入较好,正规班收入较差,互相弥补之下,可以维持学校的正常开支。学校还有少量宿舍供学生住校,并有厨房、饭厅,这样外地来京学生可解决食宿。但有些东北来的学生,入学后有时交不了费,甚至住宿费也交不了,没办法学校也得兜着。故在北京这十来年的办学,也是很辛酸不易的,但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必须坚持。北京正风学校,在十来年中,共培养出2000多名学生,使她们能各得其所,找到自食其力的工作。同时,为从呼市来考入北京蒙藏学校的土默特旗学生,及其他在京上学的中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做保证人。当时学生入学,必须得找保证人才行。前后为200来名学生担保过。

有了这所学校后,毕力格巴图尔一来北京,就可住在这里了。<sup>③</sup>后来一位教员在学校大门的影壁上,写了“做我邦人”四个大字后,引来日本宪兵队将校长韩继业抓走,经多方奔走,虽没出大事,但给学校派来一位日本人,住在学校当日语教员。这么一来,毕力格巴图尔就得回避,不便来学校住了。这个学校一直办到1952年才结束。

#### 四

巴静山于1950年回到离开十多年的呼市后,毕力格巴图尔在乌兰察布盟当盟长兼党委书记,又是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师长,当时他们驻在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部队的供给物资等,在呼市都委托巴静山给筹办,买好后也放在巴家,他们定期来拉运。直到1952年乌盟政府迁到固阳县后,为部队供应物资的筹办任务才结束。

此后,巴静山利用自己祖产房屋,经向土默特旗政府申请批准,办起了新蒙托儿所,实际是幼儿园。从北京香山慈幼院聘请三位教养员来所工作,并完全按照北京正规幼儿园的规定要求办。当时幼儿园的设施有:卫生间、病儿隔离室、浴室、活动室、寝室、厨房、饭厅,为防孩子烫着,冬天不敢生炉子,而是打成地坑取暖。招收从三个月到七岁的孩子。保育费每月5元,学费7元。床位从65个发展到100个。过后又兼办日托班,深受双职工的欢迎。由于幼儿园办得越来越好,阮慕韩市长知道后,几次动员调巴静山爱人刘俊彩到市公办托儿所工作,因本所离不开她,1955年才把刘俊彩调到市托儿所。1956年市里把新蒙托儿所接管后,改为市第六幼儿园,巴静山也随到六幼工作。1957年市教育局将巴静山调去,叫他负责搞勤工俭学,筹办各中学的校办工厂。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订设备,购工具等一系列工作,先后给一中办起机械工厂,二中办起电机厂,三中办起五金厂,四中办起木工厂,五中办起电瓶充电用的镊子加工厂,六中办起五金厂,七中办起纺织厂(还生产过条绒),八中办起印刷厂,师范学校办起农具厂,土中办起机械厂。三年之后,国家提倡大办农业,学校也跟着改办农场。

1962年刘少奇同志提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全日制中学和半工半读式的职业教育要并重。巴静山向教育局领导提出办职业教育的请求,经请示市政府,同意可以试办。那时第六幼儿园下马了,巴提出利用六幼的园址办职业学校。遂以旧城民办职业学校为名,请教育厅支援了100套桌椅,师范学校支援些医用解剖模型,即正式招生开学,巴自任校长。先后开设有:中医班、正骨班、厨师班、缝纫班、电工班、机电班、园林绿化班。并开设三个对外服务的门市部,缝纫门市部在大召西夹道,机电门市部在通顺街,通顺街卫生诊疗所,作为相关专业学生生产实习场所。各专业班都与相关的政府局处挂起钩来,请他们负责派人讲课,安排实习场所,并负责毕业生的安排使用。还聘请社会上有名的骨科专家李枝、田秉树和高级技工来校任教。成立了学校董事会,对办学进行监督指

导,参加董事会的董事有:工业厅长克力更、商业厅副厅长云继光、教育厅副厅长秦丰川、市政协副主席梁子材、市商业局长云献龙、市手工业管理局(今之二轻局前身)局长段荣瑞、市工业局长张新城、市卫生局长郭世俊等。

当时正值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下,在高校招生录取时特别注重政审,凡政审不合格的,家庭有问题、出身不好的,不论你考试成绩多好,概属落榜生行列。有到清华报到入学后,复查政审不合格还被退回来的考生,也来到这所职业学校学习。经过二年多的学习,都走上各种工作岗位,这些学生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独当一面,是挑大梁的主要骨干。用学生们自己的话说:“当时我们是天不收地不留,无处可投的失望者,是旧城职业学校收留了我们,并培养我们走上了工作道路。”到1964年时,全国都在进行“四清”运动,服从大局,旧城职业学校停办下马了。在这三年的办学中,经旧城民办职业学校培养毕业的学生,共有150多名。

此时,教育局叫巴静山回去负责给各中学盖教学楼,他又搞起基建工作来了。先后经巴静山手盖起14中、18中、19中、26中等校的教学楼。接着又叫他筹建教育局工程队,经过努力也组建起来,成为专盖校舍的专业工程队。

## 五

1980年中央提出兴办职业教育,巴静山又提出办职业学校的请求,教育局只同意让他试办,意思是看看办得如何,与上级方针精神是否一致。巴静山打听到36中盖起了新教学楼,便把腾下的旧小楼租下,共有8个教室,2个办公室,成立起头一所呼市职业学校,也就是今天的第一职业高中,巴静山为首任校长,也是职业高中的先驱者。开设有电器、缝纫、厨师三个专业班,学制二年。毕业后,电器班的全到了天鹅电视机厂。厨师班的全到了新城宾馆。缝纫班的全到了西装总厂。这些学生现在都成了主要生产骨干。以后学校搬到小召前原六中校址,并改为呼市第一职业高中,又增设了计算机专业,还盖了新的教学楼。巴静山于1984年退居二线为

名誉校长。

1988年后,巴静山又申请恢复正风学校的要求,因为在解放初,毕力格巴图尔就说过,“应该把正风学校搬回来”,为了继承革命传统,作为对革命工作的纪念,经教育局报请市政府有关领导批复,同意建立呼市私立正风职业技术学校,巴静山任校长,克什格为副校长。仍保持正风学校过去“拾遗补缺”的精神,招收的又是落榜生。根据当时的情况,学校决定先招一个财会专业班。经征得市教育局同意,招高中毕业生,可学习一年专业课;招初中毕业生,须学习二年,其中一年要学高中文化课,一年学习专业课,也可穿插进行。学完规定课程,考试合格,按职业高中,发给毕业证,经市教育局验印后,国家承认学历。不包分配,自谋职业。

在第一班于1988年9月15日开学时,只有8名学生报到。这时办不办的问题摆在面前。因为是以学养学的私立学校,经费不足如何办下去?经过反复商讨,认为,既然政府批了,我们就应咬住牙办下去,赔钱也得坚持办下去!不久又来了几名学生,达到14名(其中高中生3名)。1989年仍招财会专业,在80多名报名者中,录取43名(6名高中生);1990年80多名报名的,录取56名,全是初中生。由于前两年在办学中,加强管理,耐心教导,使不少家长都感到失望的落后生,渐向好转,并能遵纪守法,认真学习,好名声不胫而走。所以在1990年招生中,虽然已录取满员了,但仍有不少家长再三要求让其子女入学,没办法,在教室能容纳了的情况下,适当满足了一些家长的愿望,多取了几名。学校原有10来名团员,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1989年学校与市教育局团委联系,希望学校建立团组织,作为团结教育青年的核心。经过协调,就近与36中团委挂钩,由36中代管,学校于1990年春成立了团支部,接着有很多学生要求入团,经过一定时间的考核,吸收8名新团员,共有18名团员,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对于进一步办好这所学校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

总而言之,巴静山从1939年办北京正风高级女子职业学校起

至今,五十多年来,对职业教育一直锲而不舍,尤其对于那些贫而好学、敏而好学的落榜生,更有特殊的感情,尽量给他们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之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对他们自己,对社会总会是有益的。

## 六

最后,用巴静山同志自己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1937年至1939年期间,毕力格巴图尔我们俩,在北京隐姓埋名干革命,除了终日为安全和生活操心,同时在为革命努力学习各种技术,以便能更好地为革命工作。我们自己就学习过开汽车,学过打字,学过会计,学过日语,补习过英语等多种实用性课目。在这些学习场合,遇到不少不做亡国奴的东北流亡学生,好多女孩子都舍亲弃家,离乡背井,只身入关,并未顾及其生活和前途多么险阻艰难。这使我们很感动,也更增强我们干革命的毅力。‘都是天涯沦落人’。在这种感受启发下,萌发了我们办职业学校的念头,加上毕力格巴图尔给我讲过的苏联社会主义,人民一律平等,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美好向往,所以在北京正风办学期间,有些确实非常困难的流亡学生,摸到我们学校对穷学生的宽容态度,干脆就采取入学时交几个月的费用,以后少交,最后交不了也赖着不走,不但继续学习,还得供给她们住宿吃饭。有什么办法呢?她们举目无亲,撵到社会上会有什么结果呢?不是明摆着的吗!所以,只好尽量给她们安排点不影响其学习,又力所能及的工作,多少补充点收入。待到毕业时,还得想办法为她们联系介绍工作,并须承担推介和担保证人之责,使其能有个工作出路。总括这几句,是想说明,形成我办职业教育的观念,仍得益于毕力格巴图尔的革命启蒙教育,故在前面说过:‘我20来岁便与毕力格巴图尔来往上了,这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解放后,毕力格巴图尔曾叫我把正风学校搬回来,当时条件不具备未能实现。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不但恢复了正风学校,而且还保持着当年正风的办学宗旨和精神,并在新情况下使之发扬完善,为呼市经济建设培养更多的人才,略尽绵薄之

力。以慰老战友在天之灵！”

附记：

本文初稿 1991 年即已写出，未及编排付印，以待来日。孰料，巴静山先生竟于 1994 年 12 月 22 日病故，享年八十有三。噩耗传来，甚感震惊。时我正在医院住院治疗，未能参加吊唁。出院后，适逢政协文史资料编辑新刊，遂将原稿加以整理补充，迅即交稿付梓。时限仍止于 1991 年。以其教育服务社会裨益学生之劳，用彰先生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之志。庶免湮而不闻，聊慰先生英灵于青山黑水间，不亦宜乎！

---

注 释：

①旧城(归化城)小东街的关帝庙，是蒙古的关老爷庙，为清代土默特都统衙门所建，并在庙内设官学私塾，旗下蒙古童稚皆可在此就读。

②引《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八辑，第 40 页，“1939 年，孟绍、巴静山、孙继祖等人在北京西城区辟柴胡同创办了一所私立正风女子高级职业学校，为办起这所学校，孟绍把自己储存的作为学费和生活费的 1200 块银元献出来，作为学校的经费。当时孟绍兼任这所学校的事务主任。”一段。

③《平绥路地下十年》毕力格巴图尔革命回忆录，《北京晚报》连载。引 1960 年 2 月 14 日的第 39 节。“我有一个亲戚叫巴静山，对抗日很积极，就因为在家里呆不下去，才跑到北平，改名韩仁，开办了一个打字学校，低费招收了一些经济困难的青年。还尽他所理解的，经常向学生们进行一些抗日爱国的教育。我一到北平，就住到他开办的“正风打字学校”里了。巴静山为我安排了妥善的食宿条件，还和我商量，让我给他们的学生讲讲政治课。我没有答应，并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了我不讲课的原因：“要不是在归绥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我是不会跑到北平来的。即便你的学生全是好人，都可靠，可我不能轻举妄动……”

## 记畜牧专家佟树蕃

鸿举



佟树蕃,字曼实,呼和浩特新城满族人。姓佟佳氏,属满洲镶黄旗。早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一直从事畜牧兽医技术管理和教学工作。解放后,他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政协常委、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内蒙古畜牧厅副厅长、内蒙古农牧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等职。1983年9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74岁。

佟树蕃先生1909年4月5日出生于呼和浩特新城,自小就开始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十岁入私塾学习。1923年他考入绥远省第一中学。毕业后,担任归绥县立第四小学教员。1930年,他进入北京宏达学院学习。不久升入北京大学农学院附设高中,因他出于对农业的热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本科。从此奠定了他终身从事畜牧业的基础。

1936年夏,他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抱着服务桑梓献身边疆建设的宿愿,毅然回到家乡,应聘到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任教员兼任牧科主任。这期间他和其他教师一起开辟了各种试验田,建立了科学化的家畜家禽厩舍,并把试验成功的优良家畜、家禽品种进行推广,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农牧畜牧的学生。

1937年,他离开故乡,到了济南,任山东省合作指导处技术干



事。当时由于国难当头，时局动荡，他曾奔波于山东、河南、陕西等地，最后他在陕西安康国立四中任教员。

1939年12月，佟树蕃参加中央训练团受训一个月，受训期满后，他又回到安康国立四中任教。当时在安康有许多各地的流亡青年学生，这些青年的爱国热情非常高，学生们曾自发秘密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而立之年的佟先生经常教育这些热血青年，珍惜机会学习知识，等到抗日胜利后为国家出力，科学救国。

1940年初，佟树蕃接到甘肃省农业改进所代所长程秉皓的邀请，辞去了安康四中的教务，于1940年6月动身到了兰州。8月，经靳尚忠推荐到了甘肃省夏河村甘坪寺种畜场任场长，从此开始了他六年艰苦的创业。

甘坪寺位于甘肃西南，水草丰美，是西北地区一个重要牧场。这个种畜场是当时全国筹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种畜场。国民党政府对此曾寄以厚望。认为建设西北，倡导畜牧业为最基本工作之一。于是，国民党政府曾拨巨款在此兴建场舍，购置仪器、选购土种基本畜群，并订购了美国纯种牛羊，订购的纯种赫福牛、荷兰牛及美利奴绵羊都已运到国内，不巧正赶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交通中断，大部分种畜没有能运到甘肃。1935年冬，该场已初具规模。但由于地处边疆，周围环境恶劣，又赶上全国抗战，经费紧缩，隶属机构多次变动，五年之间共换了五任场长，每任场长平均不到一年。佟树蕃是第六任场长。到任时，场中仅有马四十余匹，牛十余头，绵羊荡然无存，经费只够勉强维持员工伙食。

佟树蕃接任场长后，没有被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现状吓倒。他以惊人毅力和献身精神，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种畜场的建设中。

他亲自搭建圈舍，接种羔羊，置备各种器械，至1946年，种畜场马匹增至百余匹，牦牛七十多头，绵羊四百多只。这段时间是这个种畜场最繁荣的时期。佟树蕃在此一呆就是六年。这六年中他克服了种种困难，收集了大量畜牧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在军

马繁殖、疾病预防等方面,取得了大量数据。

这个种畜场常有马步芳的军队和其它土匪出没其间。他们放牧出门都要带枪自卫。

有一次,一伙匪徒星夜袭击种畜场,佟树蕃只身一人,跃马持枪向匪徒还击。匪徒听出了枪声的厉害,四散而逃。他们不仅保卫了种畜场,同时保卫了四方各族群众。

甘坪寺在夏河西北约五十里,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游牧区。种畜场附近有两个藏族部落,一个叫甘佳,一个叫日爱。种畜场刚建成时,场方曾与这两个部落牧民发生若干次误会事件,曾有一藏民被误伤。因此,藏民和种畜场之间非常不友好。佟树蕃到此任场长后,充分认识到只有加强和藏民的团结,双方才会友好相处。他亲自把两个部落的首领请到种畜场,三方划定各自的草场,互不侵犯,并把自己繁殖的良种向他们推荐。他还亲身参加藏民的宗教活动,学习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并学会了简单的藏语。短短的一年时间,他就深受当地藏汉僧俗群众的信任,甘佳、日爱部落发生械斗和纠纷,当地藏民经常请他从中调解。每逢拉卜楞寺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当地僧俗群众都把他邀为上宾。

1942年,佟先生曾写了一份《沦陷区恢复后措施提纲》的报告,报告中他曾指出:中国农民占百分之八十,应该大力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生活。等沦陷区收复后,被日寇破坏的农业需要完全恢复。但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牲畜减少,耕畜缺乏,应该大力发展畜牧业,在大后方多繁殖和贮备牲畜。等到光复后,为缺乏牲畜的地方补充耕畜,不误耕耘。农业发展了,农民生活才会改善。此报告深得上级赞许。

抗战胜利后,1947年2月佟树蕃先生应绥远省政府的邀请,离开甘坪寺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在绥远省兽疫防治处任处长。

绥远省兽疫防治处,是1946年1月1日绥远省政府在伪蒙疆政府家畜防疫处的基础上组建的。1947年4月15日改组为农林部晋绥兽疫防治处,他继续担任处长。1949年9月19日,他光荣

地参加了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平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畜牧战线上的老兵焕发了青春。他废寝忘食,日夜奋战在工作岗位上。1950年佟先生开始担任绥远省畜牧局副局长。刚刚开始新的工作,他便投入到消灭牛瘟,控制口蹄疫的战役中。

牛瘟、口蹄疫是牲畜常见病、多发病。其病传播快,危害大,死亡率高,50年代几乎蔓延到全区大部分地区。这两种疫病在我区广泛流行,不仅影响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各族人民的的生活。佟先生亲自担任我区西部地区技术总指挥,亲自部署成立了防疫大队,深入疫情严重地区。所到之处成立家畜防疫委员会,积极培养干部,充实防疫力量。在乡和村普遍组织了群众性的防疫小组,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封锁、隔离、消毒、毁尸等工作。佟先生积极响应“畜牧与兽医结合,技术与行政结合,技术与群众结合”的口号。深入各地督促检查,每到一处都亲自给当地牧民和民间兽医示范接种、消毒、注射、治疗等一整套办法。组织群众建立疫情情报网,及时掌握疫病规律。根据不同疫病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我区牛瘟和口蹄疫的流行都是在解放初期,当时群众对新的科学知识的认识还很差,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迷信思想,把疫病看成天灾,认为是无法抗拒的。佟先生和同事们就利用报纸广播、那达慕大会、祭敖包会、庙会等机会,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52年把危害最大的牛瘟基本上扑灭了,口蹄疫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为了积极贯彻中央民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精神,他深入内蒙古东西部牧区调查研究。特别是对伊盟草原的沙化问题,早在1953年他就向当地政府提出过如何保护草场、建设草场的建议。

1952年,佟先生当选为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筹建小组的主任委员,为培养发展畜牧业的建设人才多方奔走呼吁,终于在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和山西农学院兽医系合并的基础上,建立了内蒙古唯一的高等学府——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今内蒙

古农牧学院前身),成为我区最早成立的培养高等畜牧业人才的学府。

1954年,他又积极参加内蒙古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今内蒙古畜牧科学院)的筹建工作。

1955年,国务院正式任命佟树蕃为内蒙古农牧厅副厅长,并颁发了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任命书。1956年3月,内蒙古农牧厅撤销,分设农业厅和畜牧厅。9月27日,内蒙古畜牧厅成立。10月,佟先生被任命为畜牧厅副厅长。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畜牧厅副厅长。

作为主管畜牧兽医业务的副厅长,他每年有七八个月时间在全区各地考察蹲点。为筹建呼盟三河牛、三河马良种基地,他连续几年深入呼盟牧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精心观测种畜,细心采集数据,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调查。全区20多处良种马基地,10多处良种牛基地,都有他的足迹。

他不仅重视实地调查,同时也非常重视各项法规、条例的规定。早在1951年,佟先生就曾参与制订了《绥远省兽疫防治暂行办法》,为我区兽疫防治的规范化、法制化奠定了基础。《内蒙古自治区家畜防疫暂行条例》(1955)、《内蒙古自治区防治布氏杆菌病试行办法》(1958)、《内蒙古自治区改良羊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方案》(1959)、《内蒙古自治区良种牲畜管理办法》(1959)等兽医防治、家畜改良的规章条例、办法都浸透着这位畜牧专家的心血。

作为一位学者,他热爱自己的事业,把自己的身心无私地献给了畜牧事业。

作为满族的知名人士,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家大事。

1951年3月15日,他作为特邀代表光荣地参加了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绥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4年3月,佟先生当选为内蒙古协商委员会筹委会委员。

同年7月,他作为人民代表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

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后,他又被选为唯一的一位满族委员。

之后,他历任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三、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1977年12月20日,当选为内蒙古政协四届常委。

他针对内蒙古畜牧业的发展及存在问题多次向人大、政府提出建议。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针对内蒙古自治区生物制药厂的去留问题,佟先生多次下基层,实地调查了解,倾听群众意见,协助工厂找问题,订措施,强烈要求保住了生物制药厂,从而保证了我区兽药的生产、供应,对我区兽医防治工作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十年动乱中,佟先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以坦荡豁达的胸怀,面对现实。1978年彻底平反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和体弱多病,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内蒙古畜牧事业的建设中。1980年,70高龄的佟先生作为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的理事带病赴银川,参加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年会。

1983年9月6日23时,佟树蕃先生因病多方医治无效,与世长辞,走完了他74年的人生旅途。

74年的风雨坎坷,培育了一代学者。佟先生一生为人平和、谦逊,从不夸耀自己,也从不向别人讲自己的过去。他总认为历史只代表过去,并不代表将来。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注重调查,重视实践,并时时教育子女踏踏实实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学习,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属于自己的成绩。

他一生只有一个宿愿没有完成,那就是想在晚年把自己毕生研究畜牧方面的心得、资料整理出来,供后人学习参考。

他把一生全部献给了内蒙古的畜牧业,他的一生不仅是内蒙古畜牧业的骄傲,也是满族人民的骄傲。

## 献身农业教育的李藻先生

富景华



李藻(1902—1968),字翰文,曾用名李翰华,祖籍山西省崞县(1958年改为原平县)武彦村。生于绥远省归绥县毕克齐此老村一个经营地主家庭。

李氏高祖李高,最早是从山西省崞县逃荒到了土默特旗的。由于几代人艰苦创业,从无立锥之地发展为家有土地、牲畜、粮店等的大户经营地主。李藻的祖父死后,祖母将李门这个有上百口人的大家业操持得井井有条。她做事精明干练,待人热情周到,教子严厉规范,在远近十里八乡甚为出名。其父李占鳌是半个武秀才,身材伟岸魁梧,能骑马,善舞刀,还会练石锁。虽然文化不高,但记忆力惊人。

李藻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虽然不免带有阶级的烙印,但他毕竟从小接受了严厉精明的祖母和较为开明的父亲的管教,这为他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1909年,李藻七岁,开始在家中由专人教字写仿。1912年,又在私塾念书。1916年至1918年,到归绥县高等小学学习。1918年8月,入归绥中学学习。1922年,到武川县可镇小学任教,后任该校第二任校长。1925年,李藻考入北京励群学院。一年后,又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于1932年本科毕业。在北京求学期间,他深知“业精于勤,荒于嬉”的道理,从不分散精力,浪费时日,而是励精学业,刻苦努力。凡遇休息日,他都要在宿舍将门倒插起来,并挂上

窗帘,埋头苦读,颇为人称道。

在这个期间,李藻在北京参加了绥远农业学会,并担任该会理事。

李藻由北京毕业后,回到绥远,被绥远省立职业学校校长苗英(字国华)聘为该校教员,从事作物学教学工作。

1933年,学校改为“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该校在苗校长的领导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35年春,大台什校舍建成。由于当时教育厅长阎伟和苗英的人事关系问题,苗校长写辞呈离校,杜尚礼(字子通)任校长。杜上任后,为把学校办成一所名副其实的专业学校,首先抓教师,把学校任教多年的老教师一齐留用下来,并聘李藻为农科主任。李藻在任期间,抓了一些基本建设工作,利用门前七十亩地修建了温室,栽培了果树、花卉,开辟了各种试验田。他强调学生参加各种实验和实习,理论联系实际。他还带头和其他教师一道下手种庄稼,为提高教学质量,美化环境,使学校对附近农村的生产起到示范作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南京由从美国回国的学者沈宗翰主持全国性农作物改良技术培训,当时各省都派员学习作物育种、田间设计、变量分析,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育种方法。李藻是绥远派去参加这次技术培训的唯一的人员。他认真接受了培训,掌握了新技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绥远沦陷,国难当头。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被迫停办。校长杜尚礼不愿当亡国奴,逃回家乡行了医。大部分教职员工留在归绥当教员或做其他事务性工作,李藻也赋闲家中。此时,他的家庭上有双亲,下有妻子儿女,举家数口,难以为生。财产当卖一空,仍然缓解不了窘迫境地。可他宁可度着艰难的日子,也决不为日寇效劳。在闲居期间,他并没有放弃对心爱的作物育种学的孜孜钻研。他明白:日本侵略者终究有一天会被赶出中国的,学业也将有派上用场的那一天。但是,他隐居家中,闭门不出,潜心研究学问的做法

也不能旷日持久。日本特务深知他学历颇高，是当时绥远屈指可数的高级人才，所以隔三差五地到家里，勒令其“出山”工作，诱逼均施，大有不出来就不罢休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李藻为了避嫌，在迫不得已时，来到厚和东落凤街小学任教，历时仅五个月。

在任教期间，他和该校舒乐知、贾文青几位先生一同承担了国文、历史的教学工作。在施教中，潜移默化地启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激发学生的民族感情。李藻讲国文课时，由于古文造诣颇深，故而每讲解一篇古文都往往能达到力透纸背的程度。他虽无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表达特长，但其教态的儒雅，语调的平缓，教风的严谨，一招一式的规范，在当时也深深地影响着学生。

1939年，日伪当局得知他出来工作，便直接将他调往伪厚和市归绥农林试验场任农场主任。这是一个专搞农业技术试验研究的部门，李藻便一心干起了农林试验工作。这时，在试验场当顾问的是日本人山田。之后，巴彦塔拉盟公署调离山田。山田对李藻的才华早已赏识不已，所以，他坚持要李藻和他一道到巴彦塔拉盟公署当他的秘书。如若此时想发财的话，便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李藻一直痛恨日本侵略者，故而，他不得不离开试验场的试验工作，再度借故回家赋闲度日。他看山田不死心，经常来家询探，干脆以得了肺病为由，卧床不起了。白天，他躺在被子里，枕边放着药罐、夜壶，并令家人侧耳细听动静，一听大门有响声，就装作昏睡的样子。就这样，山田看他无望，也就不来了。他就用这种办法，慢慢躲开了日本人的软磨硬缠。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人节节失败。李藻看到了这种局势，便于1945年2月暂时到了归绥市伪厚和农科实业中学担任教员，以待胜利曙光的到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占据了绥远。同年10月，绥远省教育厅长潘秀仁决定恢复绥远省立归绥农科职业学校，再次任命杜尚礼先生为校长。复校后，学校先接收了日伪时期留下的“巴彦塔拉盟立农科实业中学”，然后聘用了原来本校的老教师，组



成了学校的新班子。李藻出任农场主任,兼授高年级农作物学及育种学课程。在数年的教学中编就了《作物育种学》讲义,以当代新的育种理论和技术充实了教学。

由于刚刚复校,经费十分拮据,加之国民党当局忙于打内战,平绥铁路经常中断,无法购买仪器、图书等教学设备,所以,学生不安心读书,教师也不安心教书。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李藻先生仍然坚持一丝不苟地备课,认认真真地教书,兢兢业业地做好该做的一切工作。他备课时,态度十分认真。教案一律是蝇头小楷书写的,从无随意涂改的痕迹。凡讲授的重点、难点,都用红笔划出波浪号,十分醒目、清晰。他讲课一向以严谨而著称,学生在每一节课上,于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感受到他的科学态度,使学生获益匪浅。

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学生参加各种实验和实习,亲自带领学生下田种庄稼,进行科学实验,生产实习,从而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生产技能,把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同生产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由于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也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了联系群众,增强了热爱劳动、热爱人民、热爱专业的观念,受到了艰苦朴素,不怕脏,不怕累,认真负责作风的锻炼。

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后,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杨植霖见到李藻先生后,曾亲自邀请他到省政府来工作。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搞了快一辈子教育了,还是让我留在学校为好。”他婉言谢绝了杨植霖主席。至1954年7月,他还在归绥农科职业学校任教务主任、教导主任、副校长。1954年8月,任呼和浩特市农牧学校总务副校长、副校长。1955年6月,调至内蒙古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58年,被内蒙古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聘为农业专家组组员。1962年3月,任内蒙古农业科学研究所作物系副主任。1963年参加内蒙古作物学会。1965年2月,任内蒙古农牧科学院科学情报资料室主任。1965年7月,任内蒙古农牧科学院半农半读中级农牧技术学校校长。

李藻先生在归绥农科职业学校任教期间,就非常注重科学实

验研究。他在教学中努力推广作物育种新方法,使学生对他所教的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曾在1946年至1949年期间主持了春小麦及大豆的育种工作,曾育出“小白麦”及“金元一号”大豆新品种。此外,还进行春麦秋播的试验研究。他于1957年进行了莜麦原始材料的研究,1960年又进行了莜麦原始材料的观察与整理工作。1958年至1961年期间,进行了春小麦远缘杂交试验;1960年,主持了莜麦化梢研究工作;1961年至1964年,参加了莜麦新品种的选育及春小麦新品种的选育;1962年至1966年,完成了莜麦三省区域试验,选定了“华北二号”新品种,为我区农业科学事业,为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1959年6月,李藻参与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业厅主编的《农家品种目录汇编》一书的编写工作,对莜麦、小麦的种类、来源、主要性状、适宜土壤、分布地区、推广成效都做了科学的具体的说明。1960年,主编了《内蒙古农牧业资源汇编》一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利用祖国丰富的农业遗产,为各地交流品种,引用推广良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68年,李藻先生因患鳞状上皮癌,久治不愈而不幸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 忆挚友卢宾

杨致

—

我和卢宾同志是同乡，又是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未曾分班的同学。大学毕业后，虽不在一起工作，但仍保持着经常的来往，毫不夸张地说可谓“情同手足”。



那是在1938年的秋天，在我们故乡陶林县（现为乌盟察右中旗）城厢镇小学校高小二年级新来了一名插班生，在同班同学中，他的个子最高，但性情腼腆而又温和，下课后别的小朋友们在院子里打闹奔跳，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学画画。小学生容易熟，在

他插班的第二天,我俩就格外要好。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原籍丰镇县,为生活所迫,随父母迁来陶林,投靠其舅父。刚到陶林时,虽有开车马店的舅舅接济,但在旧社会,舅舅家的生活也并不宽裕。不幸其父亲又去世,为了赡养体弱多病的母亲,他不得不牺牲宝贵的童年求学时间,给人家放过马,也曾在一家点心铺当过小伙计。后来,母亲改嫁,他才得到继父的资助,得以插班上学。因为他耽误了两年,所以当时在同班生里他年龄最大,境遇最苦,可成绩也最好。

1939年冬,高小毕业后,寒假40天,我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共同复习功课,为第二年春天考学校作准备。朝夕相聚,不但使我俩增进了友谊,双方的父母也都结成了良友。我俩还都是独生子,这也许是我们像亲兄弟的原因吧!

1940年2月,我俩结伴来到呼市(当时叫厚和市)报考了巴盟师范学校,全被录取。直到1943年12月,整整四年,读同堂,寝同室,食同桌,可谓形影不离,但在专业爱好上,各有不同。我爱数理,他爱美术。因为学师范,毕业后要当教师,所以“小三门”的音、体、美,倍受欢迎。卢宾又有画画的天才,所以倍受美术老师的青睐。加上本人的刻苦钻研,临到毕业前,卢宾的画不仅在学校里拔尖,在社会上也小有名气。

当时,读师范,名义上是衣食住全部官费,但正赶上战争年头,粮食供应不足,同学们除了学校的定量伙食外,多数人都要从家里要上钱买零食贴补。卢宾却把母亲汇来的少量零花钱,全部用来买画纸、画笔和水彩上。小时候放马,在草地上受潮,小腿上长了个阴疮,没钱去医院,只好自己弄点偏方草药,病势虽然得到控制,但疮口溃脓,总不愈合。每到夏天,脓疮发出臭味。他为了不使同屋的人厌恶,总是不等起床铃响,就悄悄地爬起,一个人站在洗漱室里,用淡盐水冲洗消毒,用自制的草药膏,换上多次洗了再用用了再洗的纱布和绷带。有时,我偷偷地观察他用盐水冲洗时,眼含生泪,掀换药布时疼得双眉紧皱,我都忍不住陪着落泪,但他从未向别人叫

过一声苦,更没有因此请过一天假。我劝他用买画具的钱去买药,他总是一笑置之。星期天,同学们纷纷上街下小饭馆改善生活。他却一个人背上画板去龙泉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搞写生,一坐就是一上午。下午同学们有的逛商店,有的看戏看电影。他却只有一个去处——旧城财神庙里出家人于老先生的住处。于老先生是一位不满当时社会,又无力反抗的落魄文人,擅长书画,略谙医术。每个星期天,卢宾去一次,“钉锅”一碗素面条,拿回一小罐草药膏,更主要的是请于老先生给指点画艺。

在艺术上,他没有上过专门艺校,也没进过画院深造。全凭虚心求教,博采众长。在师范三四年级时,他既学人物素描,又搞油画写生。我曾记得不只一次地陪他拜访过当时较有名望的国画家关和璋。关老先生曾对他这位不满二十岁的中学生竟能画出较有水平的工笔山水画倍加赏识。

1943年冬师范学校毕业前夕,号称伪蒙疆政府管辖下的最高学府——座落在张家口的蒙古高等学院(专门培养留日预备生)派人来呼市(厚和)招考新生。经母校推荐,我俩还有张日东三个人去应试。三个人全被录取,主考官日籍教授平松金次郎先生看了他的画后赞不绝口。

1944年初,步入这所高等学院后,我俩都开始了未分专业的专业学习。因为这个学校是按日本短期大学的课程设置,全部都由日籍教授用日语授课。上午是基础课集中学习。下午是自学课,可各选所好。恰好教物理学的平野垣老师是建筑专业学者,擅长庭院楼阁的美化设计。所以,这一年多当中。几乎每天下午卢宾都是在平野先生的书房里度过。平野先生给他推荐了许多世界美术名著,帮他系统提高了艺术理论;也和他共同完成了不少作品,在这样理论结合实践的学习中,奠定了卢宾同志的艺术生涯基础。所以我们说这是完成了“未分专业的专业进修”。

1944年底完成既定课程,经过毕业考试,我们呼市去的三个人都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随即开始了留日的出国准备工作。

在等待渡船期的三个多月中,由于共同性基础课全已学完,自学专业课就能全天进行。这一段时间虽短,但人们的专业知识都获益匪浅,卢宾的画更有长足进步。

1945年夏,由于二次大战战局已定,我们也就改变了赴日留学的初衷,分别回到家乡。不久,日本宣告投降,全国光复。1945年9月我俩又同到呼市(当时叫归绥),原拟补习一段功课,继续完成大学本科学业。但因形势变化,就分别找了工作。

卢宾因有绘画才能和文学修养,到《奋斗日报》社当了副刊编辑。同时,在归绥大南街的“文化之家”兼搞一些图书发行工作。因在报纸副刊上经常发表一些进步言论,“文化之家”也夹售一些民主刊物,在1948年曾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查抄袭击。他从《奋斗日报》社二楼跳窗逃走,幸免于难。这更激发了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

## 二

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教育下,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土默特中学担任美术教员时,创作了《掏粪工》、《朱门》,在绥远中学(即现呼市一中)任教时创作了《戡乱救国》、《拾煤核者》等题材的美术作品,用以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新中国成立后,卢宾把他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部倾注于笔端,用画笔讴歌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他通晓连环画、水粉画、油画、国画等画技。擅长风景画,色调清新,其中多以大青山为题。他创作的油画《土默川土地》于1957年被评为自治区创作二等奖。油画《呼和浩特之晨》在《天津画报》上发表。国画《草原——歌声》被收入《内蒙古十年美术史》画册。1963年他参与了内蒙古博物馆组织的大型革命历史画卷《格尔丹抗清起义》的创作。内蒙古博物馆还收藏了他的《兴安岭之晨》、《奶茶》、《汉明妃和亲图》等多幅作品。1958年,他应聘到北京装修人民大会堂内蒙厅,和张扬合作,创作出颇具气势的巨幅国画《包钢》,至今还挂在那里。此外,他还收集了内蒙古西部地区民间剪纸两千余种,编集

150余种成册，为此荣获内蒙古文化局颁发的民间艺术奖。

卢宾在建筑设计方面参与了呼市人民公园的整体设计和公园内烈士纪念碑的设计。1959年，他与文浩、乌力吉图、耶拉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参与筹备《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之后，他承担了《全国教育勤工俭学展览》总体设计的重任。八十年代，他参与颇有蒙古民族特色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的设计。他设计的最后一件杰作是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陈列馆。

卢宾并不满足于上述创作。他曾和我谈过，在从事美术创作中，有两项憾事。一是继1946年展出一些地方色彩的抒情画后，1947年到48年曾作了大量的贫民生活写生及油画、国画，可惜这些作品一大部分被一个新闻记者以代为出售骗去，不知下落；二是自1979年任师院艺术系主任后，整天忙于教学工作和行政事务，迫使他把专业绘画变成了业余活动。为此，他曾打算待退休后，能有一个比较完整而又安定的时间，去整理他的有关民族文化艺术论述和创作一些有关个人生活经历中感受很深的绘画作品。可惜，由于积劳成疾，过早地被病魔无情地夺走了生命，未能完成其遗愿。

### 三

卢宾一生致力于美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先后在呼市土默特中学和国立绥中当美术教员。1954年后，在内蒙师院（现内蒙师大）执教30年，主讲中国美术史、国画、创作等课程。1956年被评为讲师，1979年晋升为副教授，1982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年卢宾应聘到内蒙师范学院组建艺术专业教研组，当时只有6名教员，29名学生，教学设施极为简陋。他深知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费尽周折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先后聘了高帝、张扬、妥木斯这样的高才生。不久，又迎来了毕业于工艺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的一批年轻有为的美术人才。经过卢宾的动员，全国著名画家邱石冥、王之英教授欣然来到塞外青城执教。在卢宾的努力下，美术专业很快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实力的师资队伍。六十年

代初正值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期,举国都在压缩干部编制,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劳动。为挽留自己专业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他多次找校领导要求,最后让部分毕业生以研究生名义留校继续深造,为美术专业储备了力量。1979年他担任艺术系主任后,更加注重专业教师水平的提高,帮助他们办画展,为他们进修和深造创造条件。1981年,为支持妥木斯在中央美院陈列馆和民族文化宫举办个人画展,他多次奔波于呼和浩特市和北京之间。画展在首都受到美术家高度赞扬,妥木斯的名字也被收录于《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辞典》。

从外地调来的新毕业教师,都是以希腊、罗马、苏联的文艺思想作艺术指导,对民族文化艺术缺乏认识,当然更谈不上继承和发扬。他认为培养新一代艺术教育人才或艺术普及工作者,若不进行本民族文化艺术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就要犯根本性的错误。基于这一认识,他积极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地改革。

首先,对民族地区艺术院校的教学计划和教育方针,提出了改进方案并组织实施。他从1954年到1958年之间,通过教学实践,逐渐认识到单以国家教育部当时制订的简单教学计划行事,不能适应内蒙地区的文化艺术教育发展要求。因之,他就开始筹划在培养学生具有全面绘画能力的基础上,毕业前一年给予选修一门绘画专业的条件,以使学生能有适应普及工作的全面能力。使之既有一门专长,能以胜任教学要求,又能从事美术普及创作。这一主张,得到院领导和美术系同志们的支持,一直在内蒙师院坚持下来。

为了验证他的主张,从1954年建系以来,他亲自担任过美术专业课的全部课程。从1956年开始,又由他开设了中国美术史课程。1979年国家教育部召开了解放以来三十年中第一次全国师范院校艺术系教学工作会议。在此次会上验证了内蒙师院搞的这个教学计划是符合实际的。与会专家公认,它比全国其他师范院校培养的学员,不论人数和质量都居上流。特别是内蒙师院的民族艺术资料的建设与搜集,更是其他院校所不及。



1979年,上级党委又让卢宾担任了美术系主任。他感到这既是一个沉重的任务,也给他提出了一个发展美术系的要求。他曾设想要在三五年内基本上组成一支可以发展的师资队伍;创设一个基本符合教学研究活动的教学环境;筹划建立起一笔艺术教学科研基金和研究人员队伍,并决心为实现这项设想尽最大的努力。

#### 四

卢宾非常重视民族文化遗产。他不仅有过人的艺术鉴赏能力,而且有很高的识辨文物的能力,许多文物在他跟前能立辨真伪,并正确评定文物的年代、好坏与价值。几十年来,卢宾从旧书摊、古董铺、收藏者那里,收集到许多别人认为不值几个钱的文物。卢宾如获珍宝般地把这些文物保存起来,还从北京荣宝斋专门请来老技工对其中一些古画进行裱帧。卢宾为了搞好美术专业的教学,供学生欣赏、临摹、写生,把这些用毕生精力搜集到的文物全部无偿献给了学院。他说:“我不是买不起,只是放在家里不如放在系里更能发挥它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购置,如今美术系收藏的教学资料与国内同类院校相比占有绝对优势,仅陶器一项,就收集了从商周到近代的各种珍品。稀世珍宝莲花碗全国只有5只,这里就存有1只。少数民族名画——喇嘛画,藏有200多幅;中外油画、国画、版画书册、工艺美术资料、各种石膏像的总数仅次于中央美术学院和杭州美术学院。这些文字资料和文物资料在教学中发挥了古为今用的积极作用。1979年卢宾重任内蒙师院美术系主任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些珍贵文物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保藏陈列的条件。于是,他就开始着手实现多年的夙愿——建造一座气势宏伟的美术陈列馆,把那些贵重的文物陈列在厅内,并使每位师生都可以在装饰精美的展览厅展出自己的艺术佳作。为使这一宏伟蓝图早日变成现实,他不分早晚,废寝忘食地四处奔波筹集经费,亲自参加陈列馆施工图纸的设计,选购建筑材料,联系施工单位……同时,还要处理系里的日常工作和完成教学任务;而且在精神上还要忍受由于建陈列馆

而招来的种种非议。这些重担已超出他的承受能力。当筹措的最后一笔经费到手后,他的身体已经垮了,几乎天天夜间呕吐。本人也意识到病情的严重,常常对劝他休养的妻儿和亲友们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把该做的事抓紧了结。”

由于病情急剧恶化,1984年9月28日,他最后一次检查了施工现场后,住进了医院。入院不久,因癌细胞扩散,开始有腹水,可他还在别人的搀扶下主持了美术系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11月份,自治区计委主任暴彦巴图到医院看望他时,他首先感谢上级领导对修建美术陈列馆给予的支持,并说,“我已经把它交给年轻人了……将来配上会英、日、蒙语的解说员,可以更好地对外开放,展厅将是一处很好的外事活动场所。”病危中,他还惦记着美术馆的施工,想看一眼竣工后美术馆的英姿。但他未能等到那一天,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去了……

为了告慰英灵,卢宾同志的追悼会就在刚刚落成的陈列馆里隆重举行。

当师大艺术展厅剪彩的那天,那隆重的场面,卢宾已经见不到了,但与会者无不见景伤情,思念故人。既为卢宾惋惜,也为他高兴。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 平生所重惟探求

——金德海阿訇的治学之路

代 林

金德海阿訇，在华北地区伊斯兰教界中，较有声望。他的大半生经历了曲折的学习探求道路。他献身伊斯兰教，努力研究、探索宗教哲理，始终如一，矢志不渝。



李 原 摄

金德海，字汇川，经名哈吉·尔利。祖籍金陵（今南京市）。据老人口传，在明朝时，金家的一支在北京定居。金德海 1905 年 5 月

26日出生于北京宣武区教子胡同。祖父金贵,父亲金长恩,均为伊斯兰教的“散班阿訇”<sup>(1)</sup>。他们常常为一辈子当“坐板凳头”的阿訇而感慨。遂暗暗祈求安拉<sup>(2)</sup>的襄助,日后能将后代培养成为伊斯兰教的真正人才。

金德海9岁时,入王浩然阿訇创办的北京牛街三十二小学读书。小学三年级时辍学,随父学习《古兰经》。金长恩是位较有心计的人,他当阿訇所得,养活不了六女一子,天天还要跑市场找点营生,或帮人修理钟表,勉强维持全家生活。不管生活怎么艰辛,培育儿子学习伊斯兰教经文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无论遇到多么不如意的事,总是按时悉心指点儿子学习,期望他早日成才。一晃五年,金德海在父亲的认真教导下,学到了伊斯兰教最基础的知识,并培养起浓厚的学习兴趣。

当他17岁时,父亲将其送到北京什刹海清真寺,正式在王殿玉阿訇门下当“海立凡”(学生)。学习一年,金德海的姐姐去看望他,发现海立凡天天吃窝头,生活极其艰苦,王阿訇还常常体罚学生。姐姐不忍,硬将弟弟拉回了家。

次年,金德海又赴奉天省安东县(今辽宁省丹东市)清真东寺,投在了安贞(字静轩)阿訇门下学习。金德海从小亲聆祖父、父亲的教诲,为了却前两代人的夙愿,立志当一名“坐椅子”的阿訇。他天赋好,记忆力强,又善学习,肯钻研,不囫圇吞枣,不玩花架子,脚踏实地地学习。因此,在同学中崭露头角。

嗣后,他又随杨德亮(字明远)大阿訇在北京手帕胡同清真寺、教子胡同清真寺,学习了二年,打下了坚实的阿拉伯语基础。之后,又跟安贞阿訇在宣化清真寺学习一年。

1928年5月,金德海几经周折,终于再到安东县清真东寺,师从王静斋(名王文清,以字行)大阿訇学习。王静斋是中国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在解放前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阿林”<sup>(3)</sup>之一。静老一生勤恳钻研,不断探索,一丝不苟地著述、翻译,建树颇丰。他还一直把培养和造就伊斯兰教的接班人,视为自己的天职。他教学

严肃负责,鼓励学生打好基础,启迪学生兼容并蓄,向广博发展。正所谓“严师出高徒”,金德海得遇静老,是他一生中永远值得回忆的阶段。他不仅跟王静斋老师学习到不少知识,而且老师珍惜寸阴,勤奋译著的精神,更在金德海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印象,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可惜好景不长,不足一年,静老因故辞职,前往哈尔滨东寺赴任。

这时,金德海只好转到天津清真大寺,投在了杨世魁(字觐元)大阿訇门下。杨阿訇在经学上造诣较深,善于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优势及特长,能将经文上的条文与现实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金德海从其左右,在学习上有了新的进步。杨阿訇特别喜爱这个学生,有意在一些公众场合让他出头露面,甚至让其代行阿訇之职。金德海总是能够抓住老师给予的机会,锻炼自己,增长才干。他亦善于事后总结、反思,将以后的事务办得更加出色。金德海是一位有志的伊斯兰教新人,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和锻炼,对自己、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杨阿訇知人善任,发现金德海对伊斯兰教教义有特殊悟性和潜力,认定只要对这株新苗精心培育、扶植,一定会成大材。经过半年余的认真观察和系统考核,杨阿訇认为金德海具备了出师的条件,便在天津清真大寺为他和安庆林举行了隆重的“穿衣挂幃”(即出徒)仪式。

按照伊斯兰教界的一般规矩,当海立凡出徒后,即可行使阿訇的职责,处理一些宗教事务。而金德海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理论深奥,博大精深,经典浩繁,且各代教法学家,主张有别,各成体系,学无止境,自己还远远不能把握伊斯兰教经典的精髓,使其融会贯通。于是,他告别了杨世魁阿訇,回归故里,从北京唐刀胡同清真寺的杨德亮阿訇和北京天桥清真寺的王彦孝(字子忠)阿訇学习。

金德海为广见洽闻,1931年又至北京阜城门外清真寺向米清源(字焕章)大阿訇学习。米阿訇在中国伊斯兰教界的知名度较高,

他对刘智(字介廉)的著作有一定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刘智是中国伊斯兰教的杰出人物,其哲学思想整整影响了伊斯兰教的几代人,并受到无数穆斯林的尊崇。米阿訇不因陈旧说,在讲评刘智的著作时,总是有陈述,有分析,有见解,令学生耳目一新。金德海在米阿訇的亲传下,系统地学习了伊斯兰教的理学和《伟嘎耶》(伊斯兰教法经),对伊斯兰教的宗教思想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提高。

金德海谦恭好学,孜孜以求,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给周围的穆斯林群众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他善于抓住每个老师的优点及长项,向他们虚心讨教,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在学业上日有所进,月有所长。后来,金德海又从天津三义庄清真寺的萧德珍(字毓清)阿訇学习。金德海虽已出徒,但每从一师,仍旧苦苦求学。黄卷青灯伴随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多年的艰苦生活,使他身体渐感不支,1937年不得不辞学回家休养。待稍觉精力充沛时,便又去找老师王静斋大阿訇求教。1938年,静老接任了天津三义庄清真寺的聘书,金德海再次随其一同赴津。

金德海二次师从静老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经典。静老翻译《古兰经》最见功力,被誉为“雅俗共赏之良本”。在三义庄任教时,静老正废寝忘食地完成他的《古兰经译解》。静老是位没有权位之心,也没有名利之念的阿訇,他反对教派之争,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译经,达到心神统一的美好境界。金德海深深地被这种氛围所感染,在攀登知识高峰的道路上更加奋力。静老也将金德海当作爱徒,略有闲暇,想方设法给他吃点“偏饭”。金德海有时也帮助老师抄写和校对一些文稿,师生情谊,愈加亲密。金德海以师徒如父子,为了适合老师的口味,他竟亲自下厨,为师烹调,精心侍奉。这样,金德海能有更多的时间与老师接触,也就有了更多的求教机会。静老进餐时,金德海抓紧时间仔细拜读老师那还飘散着墨香的翻译文稿,先睹者的快感是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更为受益的是,从文稿上,他可直观地看到老师推敲文字的过程,这是外人无法领略到的。最使金德海不能忘记的是,静老曾回忆他在青年求学时,因对

三个词从汉语翻译成阿拉伯语把握不准,竟不顾路途遥远,从天津到二百余里外的沧州,向自己的老师——有“南宋北海”之称的海思福老阿訇请教。这件事,成为鞭策金德海进步的动力。金德海讲:“静老尚且如此,我辈岂可懈怠!”

1942年8月,金德海结束了学生生活,开始了阿訇生涯。他任教的第一个地方便是塞外青城的甘绥礼拜堂(现呼和浩特清真北寺前身,原址在回民区政府楼对面,汽车加油站处)。

人生,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新阶段,也许会十分潇洒,也许并不如意。血气方刚的金德海,既看到了前进的目标,更看到了前进道路上的坎坷。他的人生信条是:自重、自珍、自爱,把心交给广大穆斯林,兢兢业业地完成和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替圣传教的道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旧归绥市,伊斯兰教基本处于封闭自守的状况,教民的政治地位低,经济、文化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欲宣传“遵经革俗”的思想,谈何容易!但金德海阿訇作为一寺教长,清醒地认识到,自封如同自灭。他在努力着,把握一切机会,宣传着伊斯兰教的新思想。

正当他事业上刚刚起步,日寇的铁蹄踏进了归绥,东洋人的魔爪也伸向了宗教这片清静之地。1945年的一天,日本特务头子虚田正季找到金德海阿訇,说日本打算在归绥建立一所“伊斯兰大学”,让他务必将其老师王静斋大阿訇请来任教。金德海的原则十分明确,宁死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可鉴于当时的恐怖形势,他只能悄悄辞去教长,赴天津三义庄清真寺任教。以后,金德海阿訇又曾在石家庄清真寺、大同九楼湾清真寺任教。

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金德海的履历也翻开了新的一张。1951年8月,金德海终于实现了金家三代人的梦——接受了北京牛街礼拜寺的聘书,高兴地前往上任。

在中国的一些回族聚居区,或深或浅有一种观念,即“外来的阿訇会念经”。一个土生土长的人,能在自己故里的清真寺执掌一方教门,这是相当不易的事。金德海将要就任牛街礼拜寺的教长,

成为牛街男女老少关注的焦点。他上任的当天,整个牛街象欢度节日一样,父老乡亲们夹道欢迎这位学子的荣归。

北京牛街礼拜寺,是中国著名的古老清真寺之一。《北京牛街》(北京出版社 1990 年版)一书载,牛街礼拜寺自清朝同治以来,先后主持教务的阿訇有 22 人,都是伊斯兰教界著名的阿訇。牛街礼拜寺聘请金德海为教长,这本身就说明家乡父老对他的伊斯兰教造诣的认可。金德海上任后,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自古北京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藏龙卧龙,人才荟萃。想在这里顺利地尽到“伊玛目”(教长)的职责,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有了对形势的充分认识和估价,金德海阿訇利用所有的机会,博览各种经书,汲取其精华,向伊斯兰教更深的领域迈进。同时,他也意识到,面对操汉语的教胞进行宣传,自己的汉学水平必须提高。于是,他又开始有计划地自修起汉语。解放不久的北京,形势较复杂,人们的思想亦形形色色。金德海阿訇敢于高举爱国爱教的旗帜,联系实际讲经,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受到穆斯林们的好评。金德海阿訇的海立凡、现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图书馆副馆长的赛生发先生回忆说:“爱国爱教是金师的高贵品质。在牛街期间,每逢主麻(星期五)讲演,他多联系时事,正确看待形势,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解放初期,相当一部分人抱有疑虑的情况下,金师的表现实为难能可贵。”

同年 10 月,金德海阿訇参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团,去甘肃临夏专区多木寺乡进行土改工作。他以自己宗教职业者的特殊身份,积极配合土改工作团的工作,为顺利进行土改贡献了自己应有的力量。

1952 年后,他曾应聘到天津三义庄清真寺、河南商丘市清真东寺执教。

1958 年 8 月,金德海阿訇二次被聘请至呼和浩特清真北寺。在这个民风纯朴的地区,他看到人民勤劳,事业兴旺,决定把呼和浩特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下决心为这里的伊斯兰教贡献出毕生



的精力。

重返青城，他看到这里的广大回族穆斯林群众，教门基础较好，“伊玛尼”（信仰）颇虔诚，但文化、教育亟待提高。针对这种情况，金阿匄言传身教，用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的名言：“学习，从摇篮至坟墓。”劝说大家重视教育，学习文化，并把提高广大穆斯林的文化知识，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礼拜寺的大殿里，在海立凡学习的讲经堂里，在穆斯林的家庭里，只要有金阿匄的身影，大家就能听到他引经据典，谈论教育、文化重要意义的讲说。

“学然后知不足”。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金德海常感自己学识欠缺，与时代的要求存有差距。他曾郑重向有关部门提出，给他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1961年，他被录取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研究班学习。在中国伊斯兰教这所最高学府里，他接受了许多昔日在“经堂教育”<sup>①</sup>中没有学到的知识。政治理论、汉语文化、伊斯兰教经学等，凡设课程，他都认真刻苦地学习，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阿匄。

三年学习毕业后，金德海阿匄回到了呼和浩特。正当他想有所作为时，十年浩劫开始了。一日，一伙气势汹汹的造反派找到了这位清真寺的教长，给他扣了一顶“剥削阶级”的帽子。这群人来到金家，欲搜索一些可资斗争的罪状。当他们看到金阿匄家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炕上铺着一条缺角少边的烂席子，便失望地走了。最后，将金阿匄从清真寺扫地出门。为了全家老少的生活，金德海不得不到一个工地干起了壮工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德海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他当选为回民区人民代表，被聘为呼和浩特市政协第五、六届常委，并担任了内蒙古第一、二届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会长。继而，又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四、五届常委等。1983年，金阿匄随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麦加朝觐克尔白，完成了伊斯兰教“五功”之一的“朝功”。

1988年，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重建的清真北寺开始

使用,金德海继续被聘为教长。金阿匍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仍壮心不已,依然执著地追求着,以期在事业上有新的突破。

在广大穆斯林的聚礼<sup>(5)</sup>、会礼<sup>(6)</sup>时,金阿匍所讲的“瓦尔滋”<sup>(7)</sup>,象是有永远道不完的新鲜内容。他对人讲:我虽老了,但不愿自己的心灵麻木,我还希望自己冲破前人的障蔽,努力探索新的领域。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并热情接待来访者。他先后几次接待了内蒙古高等院校某班级师生的集体请教。求知欲正强的大学生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位白发苍苍的阿匍,滔滔不绝地一一解答,令他们不住地颌首赞美。

1991年,年高德劭的金阿匍主动退居二线,辞去了清真北寺的教长职务,担任了名誉教长。1994年又辞去了内蒙古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之职,担任了名誉会长。

在金阿匍的晚年,聊可告慰的是,他唯一的儿子金建华克绍箕裘,学习阿拉伯语初见成效。经父亲的亲自指点,在明了《古兰经》内容的前提下,努力使自己的读音、韵律与内容高度统一,追求诵读的艺术性,曾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首届《古兰经》诵读比赛中获得第一名。1995年,他又被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选派,代表中国穆斯林参加了在吉隆坡举行的第36届世界《古兰经》诵读比赛,并取得优秀奖。建华的成长,包含着父亲的无数心血。

九十高龄的金阿匍,精神尚好,依然坚守宗教功课,拜斋不脱。他在伊斯兰教的学习、研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得到众多穆斯林的首肯。他做为知名的阿匍,被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中。金德海并未因成就而自满,亦未因赞誉而自喜,反而时常以自己在治学的道路上,虽不敢稍有懈怠,仍离老师们的要求差距甚远而自责,更为没来得及静下心来把自己的研究所得形成文字而感到遗憾!

---

#### 注 解:

(1)散班阿匍:尚未穿衣、挂幛(毕业)的阿匍,或一般阿匍。

(2) 安拉：阿拉伯文的音译。伊斯兰教信奉的唯一神的名称。伊斯兰教创立前，是麦加居民所奉诸神中的创造神之名。伊斯兰教创立后，穆罕默德摒弃诸神而独信安拉。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亦称“真主”、“为主的”等。

(3) 阿林：有知识的人。

(4) 经堂教育，亦称“寺院教育”。伊斯兰教在清真寺内附设学校的教育制度。明嘉靖（1522—1566）年间，胡登洲首先在中国倡设寺院经堂教育，并随之出现陕西、山东两派及云南支派。

(5) 聚礼：亦称主麻，穆斯林于每周星期五午后举行的集体礼拜。

(6) 会礼：穆斯林于每年度开斋节和宰牲节举行的集体礼拜。

(7) 瓦尔滋：回族清真寺，在礼拜前由教长、阿訇、海立凡或学识渊博的穆斯林，向礼拜者宣传教义，劝戒从善，称讲瓦尔滋。其内容往往从《古兰经》和圣贤言行中引申道理，阐述教义。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一至十辑目录索引

## 说 明

一、本索引采用分类汇总法,包括政治军事、工商经济、教文卫体、民族、宗教、社会、人物7大类202篇文章以及图片、资料、补白等内容。

二、各类之篇目,系按照一至十辑及各辑之原目录次序编排,以便于对照查找;各篇只列标题,作者一律省略。

三、各篇目后面之数码,圆点前为辑数序列,圆点后为各辑之页码。

四、人物类篇目中,凡标题中未点出所写人姓名者,均在题后括号内加以注明。

### 政治军事类 (32篇)

#### 艰苦的战斗 辉煌的业绩

——记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坚持 ..... 1·1

#### 团结抗战 争取胜利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全民抗战情况点滴..... 1·19

大青山区的反顽固派斗争..... 1·28

抗日战争初期归绥地区的情况..... 1·50

傅作义的干部队伍与第七集团军政训处..... 1·81

解放战争时期的绥蒙部队 ..... 2·1

绥远解放前后解放军的部分活动情况..... 2·28

一九四五年小教场事件..... 2·56

革命熔炉——回忆绥远省军政干部学习团..... 3·25

东桃地区骑兵指挥部的始末..... 3·36

清朝和民国初年的绥远地方部队及驻军概述..... 3·93

第十二战区抢夺包头归绥大同胜利果实的经过 .....	4 · 1
归绥包头战役的经过 .....	4 · 15
国民党中央党部见闻录(1941—1942) .....	4 · 33
绥远省学生军事集中训练回忆 .....	4 · 46
呼和浩特市“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	4 · 64
日本宪兵队长小川暴行录 .....	4 · 117
日本投降后的托克托县 .....	4 · 119
三年抗日游击活动的片断回忆 .....	6 · 1
一九三八年春傅军反攻归绥 .....	6 · 11
日寇侵占归绥罪行片断纪实 .....	6 · 22
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 .....	6 · 26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抗日活动二则 .....	6 · 30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在归包地区的活动 .....	6 · 37
记归绥市小学教师大罢课 .....	6 · 43
第八战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与党政总队概况 .....	6 · 135
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 .....	6 · 144
土默特步骑两营及其演变 .....	9 · 113
先祖父福坛与刀什尔战役 .....	9 · 137
“老一团”始末 .....	9 · 143
民国时期绥远历届执政者 .....	10 · 1
1934年蒋介石归绥之行 .....	10 · 46

#### 工商经济类 (41篇)

新绥之间的驼运队 .....	1 · 133
呼和浩特市地毯生产概况 .....	1 · 147
呼和浩特药行史话 .....	4 · 134
归绥市的粮店行业 .....	4 · 163
回忆义丰粮店 .....	4 · 174
增兴源——久瑞号的历史回顾 .....	7 · 1
绸缎老店恒聚兴忆昔 .....	7 · 13

我所知道的德华兴·····	7 · 31
复兰斋之始末·····	7 · 36
清真糕点铺兴隆元·····	7 · 47
合记照相馆与豫芳照相馆·····	7 · 51
天宝楼金店概况·····	7 · 58
济仁堂京药庄的创业与经营·····	7 · 63
呼和浩特民族用品制造业梗概·····	7 · 68
归绥市的毡毯社与和合义社·····	7 · 85
归化城“金炉社”诸行概述·····	7 · 95
归绥煤炭行业的演变·····	7 · 103
归化城的骆驼交易·····	7 · 126
归化城的养牛大户——白家·····	7 · 133
山西商人与归绥的日升元钱庄·····	7 · 139
话说聚丰当·····	7 · 146
复业长粮食加工厂简史·····	7 · 148
新城聚裕水碾磨坊·····	7 · 153
单说永裕通杠房·····	7 · 156
河口古镇之兴衰史迹·····	7 · 158
我所了解的察素齐镇工商业·····	7 · 165
土左旗商业的兴衰与变迁·····	7 · 175
醇厚社与三元成——归化城最老的行社与字号·····	10 · 52
义成源百货店的生意经·····	10 · 61
注重信誉 苦心经营——华记洋广杂货店小史·····	10 · 64
旧归绥市的饮食行业·····	10 · 69
归化城皮毛行业的兴衰·····	10 · 76
宝丰社的成立及其活动·····	10 · 94
归化城的典当业·····	10 · 97
绥远城的老字号·····	10 · 103
解放前归绥的印刷业·····	10 · 108

崔铁炉的发展与名牌的创立·····	10 · 112
太平庄乡五路村商业史料·····	10 · 115
归化城的牲畜贸易·····	10 · 125
牛马桥、庙会和流动商贩·····	10 · 128

### 教文卫体类(26 篇)

呼和浩特市解放前后学校教育和体育运动发展概况·····	1 · 153
西口菊部旧闻——呼和浩特梨园史话·····	2 · 73
归化城民间器乐——鼓班·····	2 · 145
章叶颖先生著作《我的大学》等 13 篇·····	第五辑
名言学校保合少分校及其发展概况·····	6 · 51
托县县立第一完小的建立与发展·····	6 · 59
民间社火——皇杠·····	6 · 178
呼和浩特蒙医的发展·····	9 · 22
呼和浩特蒙药的发展·····	9 · 33
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	9 · 128
从蒙古学院到厚和兴蒙农业中学·····	9 · 132
绥远五族学院·····	9 · 206
从蒙古文化馆到蒙古文化研究所·····	10 · 131
呼和浩特满族教育发展概述·····	10 · 135

### 民族类(15 篇)

争取和平解放绥远省的回族青年·····	1 · 43
呼和浩特市回族人民婚丧嫁娶习俗的演变·····	2 · 156
土默特蒙古族的婚姻仪式·····	3 · 62
土默特辅国公家世简述——我的家庭情况·····	9 · 1
土默特辅国公漫述·····	9 · 14
近代土默特蒙古族的风俗习惯·····	9 · 46
土默特蒙古族的家谱·····	9 · 56
抗战前夕土默特旗职官的产生与安排·····	9 · 69
土默特六十佐领沿革·····	9 · 80

土默特两翼都统的兴废及其它	9 · 99
归化城的庄头与庄头地	9 · 123
曾祖父白维利创办中和店以及白 氏父子在民族和宗教事业上的奉献	9 · 175
绥远满族岁时节俗	9 · 186
略谈北平蒙藏学校土默特旗学生的斗争 (1929—1949)	10 · 142
绥远城满族人口演变概略	10 · 172

### 宗教类(16 篇)

乌素图喇嘛召沿革	1 · 109
基督教在呼和浩特的传播	1 · 126
乌素图召宗教活动仪式	3 · 67
归绥市的基督教	3 · 77
关于天主教	4 · 180
绥远省天主教神哲学院简介	4 · 184
席力图召及其属庙普会寺概况	6 · 125
绥远教区圣母圣心婢女会初学院简介	6 · 129
土默特地区喇嘛庙的制度及经会仪式	9 · 211
呼和浩特喇嘛印务处	9 · 215
归化城的小召和大召	9 · 217
博格达喇嘛和广化寺	9 · 219
解放前公教教育的回顾	9 · 225
天主教在我区所办的慈善事业	9 · 233
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及其伊斯兰文化	9 · 242
归化城城隍庙史	9 · 264

### 社会类(13 篇)

匪患无宁日的旧社会——忆往事一例	1 · 104
我经历过的民国十七八年特大灾荒	2 · 67
归绥两城的文昌庙与魁星楼	4 · 107



从东土默川各村兴建龙王庙说起 .....	4 · 190
鸦片在归绥 .....	6 · 149
一九四九年种大烟给托县人民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	6 · 165
状告李麟兆 .....	6 · 168
平息祁祥叛乱 .....	6 · 171
黑兰圪力更村史录(1927—1949) .....	6 · 173
土默特史事杂谭七题 .....	10 · 176
呼和浩特洪水灾情述往 .....	10 · 188
清末民初归绥地区的景观和祠宇 .....	10 · 194
孤魂滩 · 先农坛 · 郎神庙 .....	10 · 201

#### 人物类(59 篇)

怀念我的先祖父文克明 .....	1 · 38
回忆我的父亲——张钦 .....	1 · 99
回忆冯玉祥先生几件事 .....	2 · 45
一曲绕梁传乡音	
——记著名二人台老艺人刘银威先生 .....	2 · 130
苦苗逢春花更红	
——记塞外第一位二人台职业女演员班玉莲 .....	2 · 136
绥远知名人士张遐民先生 .....	3 · 1
段履庄之死及其他 .....	3 · 42
塞外满族拳师关德山 .....	3 · 46
塞上名“净”杨胜鹏 .....	3 · 51
我的艺术生涯(韩世五) .....	3 · 57
吉鸿昌将军轶事二则 .....	4 · 60
心中的丰碑 永恒的怀念	
——记五原战役中死而复生的宋海潮先生 .....	4 · 66
赵英先生传奇 .....	4 · 73
技艺出众 传帮育人——记我的老师赵四 .....	4 · 83
呼市民间艺术家——周根心 .....	4 · 94

八十五岁溯往事(田圃).....	6 · 78
著名蒙医萨拉布朋素格.....	6 · 90
塞外名旦任翠凤.....	6 · 96
托县第一高小刘琳校长 .....	6 · 101
著名武师王美 .....	6 · 104
郭长清其人其事 .....	6 · 110
农业教育家社尚礼先生 .....	8 · 1
回族教育家吴懋功先生.....	8 · 14
教育界知名人士苗英先生.....	8 · 27
蒙古族教育家孟绍先生.....	8 · 39
桃李芬芳九州间(贾秉温).....	8 · 54
民族幼儿教育家韩秀英.....	8 · 73
满族教育家舒乐知生平事迹.....	8 · 80
我区民族文献馆藏的奠基者——王庆先生.....	8 · 88
回忆我的父亲——王裕民.....	8 · 97
小记王静卿 .....	8 · 108
梨园全才“小梅梅”	
——记晋剧著名演员亢金锐 .....	8 · 115
老树逢春绽新葩	
——记内蒙古文史馆员刘映元先生 .....	8 · 129
张万仁传略 .....	8 · 137
“吹塌天”和“拉塌地”	
——记著名二人台乐师张埃宾、周治家.....	8 · 145
以翎子功梢子功见长的十七生陈宝山 .....	8 · 152
子材先生在起义过程中(梁子材) .....	8 · 156
回忆我走过的路(韩燕如) .....	8 · 161
著名中医邓子厚 .....	8 · 166
著名助产士白本蓉 .....	8 · 174
著名蒙医教授白清云 .....	8 · 180

朱静川大夫生平 .....	8 · 194
归绥“共和医院”院长何秉如 .....	8 · 200
从事中医多半生的回顾(黄惠卿) .....	8 · 202
人民医生的楷模——记舒兆勋医生 .....	8 · 211
体育界老前辈——孔博泉 .....	8 · 236
从放牛娃到全国冠军 ——记蒙古族长跑运动员伊套特格的一生 .....	8 · 248
体育之恋——苗时雨传略 .....	8 · 254
玉禄事迹补正 .....	9 · 170
忆我的父亲冯振玺 .....	9 · 200
呼和浩特市伊斯兰教协会时福森会长 .....	9 · 257
爱国民主人士李致方 .....	10 · 203
解剖学专家刘其端的事迹 .....	10 · 211
为人师表 风范长存 ——记我区语文教育专家杨秉祺先生 .....	10 · 222
巴静山先生与职业教育 .....	10 · 232
记畜牧专家佟树蕃 .....	10 · 244
献身农业教育的李藻先生 .....	10 · 250
忆挚友卢宾 .....	10 · 255
平生所重惟探求——金德海阿訇的治学之路 .....	10 · 263

### 图 片

昭君墓 .....	2 · 封 2
五塔寺 .....	2 · 封 3
旧城(归化城)北门城楼 .....	7 · 插 1
义生成、中华书局、义盛兴、祥源通、中美大药房原址 .....	7 · 插 1
义盛兴、中华书局、义生成、瀛 西药房、云华池、宏达堂原址 .....	7 · 插 2
利中照相馆原址 .....	7 · 插 2
协力成干鲜果店、明魁号帽庄、南山堂	

中药铺、中美大药房、邮政局原址 .....	7 · 插 3
言记号原址 .....	7 · 插 3
天宝楼金店原址 .....	7 · 插 4
骆驼交易市场 .....	7 · 插 4
旧城(归化城)大南街、大北街老字号详图及序 .....	7 · 插页

### 资料·补白

观音寺 .....	6 · 25
羊岗子 .....	6 · 42
旧城名水井 .....	6 · 109
元和成毡坊 .....	6 · 170
广告——出奇方能制胜 .....	7 · 30
经商谚语 .....	7 · 50
《史记·货殖列传》摘句 .....	7 · 57
燃烧鉴别纤维 .....	7 · 62
“七十二行”漫笔 .....	7 · 84
理发店的标志——三色斜条转筒 .....	7 · 94
旧时商号行话简释 .....	7 · 125
旧时商号称谓简释 .....	7 · 186

## 后 记

这辑史料为综合辑,内容包括政治、工商、文教、民族、社会及人物六个方面,共计 31 篇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为难得的“三亲”史料,较为翔实地反映出呼和浩特市解放前一些方面的真情,对今人了解呼和浩特的过去,会有一定的帮助。“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本书如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或可资借鉴的知识,或今昔对比的材料,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素材,或克己、为人、治学、敬业的精神食粮,那即是我们的夙愿。

为了便利读者查阅资料,本辑特附录了《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一至十辑目录索引。

本书承蒙各位作者的积极撰稿和热心支持,李西樵等同志在协助审改稿件中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地感谢!

本辑史料由代林同志征集稿件,陈玉伯同志主审编排,经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最后定稿付梓。

由于编者的水平及见闻所限,本书中定会存有不妥以至错讹之处。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予以指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编 者

1995 年 5 月 5 日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十辑

作者 =

页数 = 281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目录  
正文